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上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1914—1931

[英] G. D. H. 柯尔 著

商务印书馆

ISBN 7-100-00768-2/D·53

定 价：4.95 元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上册

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1914—1931

[英] G. D. H. 柯尔 著

宋 宁 周叶谦

李鹏远 李梅彬 等译

郭 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v, Part I  
**COMMU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1914—1931

By C. D. 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8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 1958 年版译出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四卷 上册

〔英〕G.D.H.柯尔 著

宋宁 周叶谦

李梅彬 等译

郭健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衡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68-2/D·63

---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4 千

印数 0-2 100 册 印张 14

定价：4.95 元

## 前 言

在撰写本卷过程中，许多朋友给了我慷慨的帮助，对此我必须再一次表示感谢。H. N. 布雷斯福德先生、教授艾赛亚·伯林爵士和朱利叶斯·布朗撒尔先生这三人的意见，我十分尊重；他们阅读了全稿，并加以指点，使我得以根据所提各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我对他们三位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另一些人对其某些篇章所给予的帮助，特别是增补原来所缺的生卒日期。因为我认为，知悉书中人物做出一切值得论述的事情时的年龄，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给我帮助的有：法国社会史研究所的M. J. 梅特隆先生，以及M. 莫里斯·多曼热先生（法国部分）；格哈德·格莱斯贝格博士和吕特·格莱斯贝格夫人（德国部分）；劳埃德·罗斯先生（澳大利亚部分）；J. P. L. 维辛博士（荷兰部分）；勒内·勒纳尔先生（比利时部分）；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先生（南斯拉夫部分）；S. K. 埃万耶利泽斯先生（希腊部分）；鮎泽岩雄教授（日本部分）；路易斯·恩里克斯先生（智利部分）；马克·斯塔耳先生（美国部分）；卡洛斯·埃查奎先生（阿根廷部分）；阿尔泰罗·瓦尔蒂亚先生（芬兰部分）；J. W. 阿默斯先生（瑞典部分）；H. K. 莱姆库尔先生（挪威部分）；唐·费利佩·德布斯塔曼特博士（秘鲁部分）；G. 卢德尔斯·德内格里先生（墨西哥部分）；夏尔·巴比埃先生（瑞士部分）；卡洛·多利奥博士（意大利部分）；约翰·高兰先生（关于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自由出版社的V. 理查兹先生（关于无政府主义者）；阿图尔·莱宁先生（关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我还需向Z. 纳伊德尔先生致谢。他通读了本卷有关波兰的一

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使我在许多方面作了修改。

- vi 如果我的生命允许的话，我将为本书再写一卷，记载的史料至少要等到1945年，或许更近一些。我回顾起来感到，如果我现在写第一卷，许多地方的写法将会大不相同；但我认为，主要之点无须作实质性的修改。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每一个问题或大多数问题都叙述得正确，而是认为，我不可能对已写的内容再做什么实质性的改进。虽然有那么多朋友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但书中的一切见解当然完全是我自己的，而不得归之于那些曾经给我以最有益的帮助的人们。

G. D. H. 柯尔

1957年12月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三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和斯德哥尔摩	26
第三章 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	59
第四章 战时的德国(1914—1918年)	98
第五章 1918—1921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127
第六章 1917—1921年俄国的革命和内战	165
第七章 奥匈帝国的革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205
第八章 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	248
第九章 两个对立的国际(1919—1921年)	276
第十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殖民主义、和平与裁军	327
第十一章 法西斯在意大利获胜	350
第十二章 从1914年到总罢工之间的英国	386
附：主要人物表	435

# 第一章

## 导言

本卷——《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所论述的时期比以前各卷均短，只有18年，而第1卷为60年，第2卷为40年，第3卷为25年。我原拟将1914至1939年间的历史写成一卷；但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最好不将一个性质不同的新时代包括在内，这个新时代以1931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为开端，而以两年后纳粹在德国掌权为其在政治上的形成。我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中，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取全世界工人效忠的斗争；在以后的十年中，虽然这场斗争仍在继续，甚至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但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对民主主义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挑战已比它占据更主要的地位，而且失业到处出现，农产品价格暴跌，罗斯福在美国实行的“新政”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重新阐述所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理论的改变，也使这场斗争受到巨大的影响。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在一卷书中对这两个时期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内容太多不能压缩成一卷的篇幅，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所涉及和注意的中心问题大不相同，无法象我一直寻求的那样统一成一个整体。

实际上，由战争引起的以俄国革命为主要焦点的世界性动荡和混乱，以及企图把俄国的动乱变成世界革命的做法所遭受的打击，已为专门研究从1914年到1931年经济崩溃这一时期的情况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当然，也不可能把叙述的内容完全局限于这些年



的发展。对某些情况，我的论述超越了这个界限，因为就某个国家的事态来讲，1931年似乎不宜作为截止期。而至少在一个情况，即苏联的情况下，我是提前结束的，以免把关于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论述在最不适当的阶段割断。但一般来说，我叙述到大萧条第一次袭来之时，对三十年代的发展则不包括在内，因为这时每个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问题——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最终仍然坚持同以前几乎一样的主张。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中心问题必然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单纯是它的发生，而且还包括它在整个外国干涉和内战时期，以及在列宁于1921年开始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如何得以存在下来并获得发展的。不管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或者对其在思想和行动领域的影响抱怎样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已证明——不管是好是坏，或者也好也坏——它是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事实上比那次大动乱意义还深远，因为它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并且使整个人类陷入大动荡之中。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当中，对它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它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榜样，使社会上各种旧形式的矛盾必然会得到克服；而另外一些人则用毫不掩饰的词句谴责它是人压迫人的一切暴政中最恐怖的一种，而且尽管他们也许是社会主义者，但已准备与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这种暴政，并鼓动在苏维埃统治下的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起来推翻它。诚然，在本卷所论述的时期当中，这种尖锐的分歧总的说来并不象过去10年间那样明显，但即使从一一开始，或至少是从1919年以来，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就表现为尖锐对立的社会哲学和行动纲领，这样一来，如果把实际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说成是，或者看成是在一个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哪怕是松散联合起来的——力量，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并不是说，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更

不用说整个工人运动——已分裂成截然不同互相对垒的两派，各自都认为与对方毫无共同之处。事实远非如此。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的同情，在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学说和反对号召效仿俄国榜样的广大群众中，仍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谴责共产党独裁和赞扬议会民主原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领导人，也大都审慎地不承认对新俄国抱有敌对情绪，并敦促本国政府不要对之采取敌对行动。这也并非出自他们的伪善。他们不能不对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感到高兴，并对俄国人建立新社会的斗争感到强烈的同情，尽管他们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些不仅认为自己必须采取，同时尽可能诱劝其他各国工人也采取的许多做法。

此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支持者既不同意布尔什维克鼓吹按照俄国模式进行世界革命，也不同意那些彻头彻尾的议会改良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些采取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愿意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虽然不适用于较先进的西方社会的条件，但可能是在俄国实际可取的唯一办法——伟大的俄国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抵御许多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至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管思想上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样的怀疑，都准备搁置一边，并注视着苏联的伟大实验怎样发展，殷切希望这种实验哪怕是经过长时期以后会导致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出现；在这个社会中，一般人都能在公有制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有计划地管理生产力这样的体制下决定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观察者总是热心于尽量从最好处设想他们相信将在苏联内部发生的事情。他们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最初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当生存看来最终已完全有保证的时候，他们又为俄国人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欢

欣鼓舞，以之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缓慢得多的生产发展相比较。他们也为在民众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而受到巨大的鼓舞；他们当中许多人访问苏联归来后，对于让他们看到的大力从事的大规模社会和经济建设工程印象很深。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共产党骨干分子强烈的献身精神甚至更为感动，回国后将一个明确自身的目标并认识到必须全力以赴实现这些目标的有纪律的党所取得的成就，同西方社会民主党内组织涣散现象和普遍存在的消极态度作对比。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二人的巨著《苏联的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书名中的“？”在后来的版本中删去了）就是这种反应的突出例子，而由于它出自第一流的费边主义理论家之手，就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费边主义本是社会民主主义披着最富有渐进论和进化论色彩的外衣的哲学。

的确，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人当中，存在着某种内疚的感觉，因为被认为非常落后的俄国人已经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都推翻，代之以一种社会主义；而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虽比战前强大得多，但在大多数国家，取得政权却仍遥遥无期。对于克服重重障碍不顾一切地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人们加以非难，差不多等于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在这个时期——我指的是二十年代——只有少数人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正是要建立这样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都认为，在苏联存在着的专政和一党制政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新社会巩固后，即将加以取消；随着反革命的危險日趋减少，苏维埃制度的日益自由化必将出现无疑。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承认有节制的私人企业和废除农产品征收政策后，这样的希望大大受到鼓舞；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党的日益官僚主义化所提出的警告，没有被大多数的外界观察家认真对待——而由于托洛茨基本人也主张实行严厉对待农民、加紧工业化，甚至把红军当作被召募的劳动力来使用的政策，上述警

告就越发不被观察家们所认真对待。直到俄国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加速农业集体化和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加以消灭时，严重的忧虑才开始产生，认为整个趋势看来不是走向自由化，而是背道而驰；即使在这样的事态发展面前，西方的看法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许多西方的社会党人把很高的希望寄托在集体化和改进农业设备以提高产量并促使耕作方法的现代化上，而对随着消灭富农而采取的残酷手段直到后来才为人们普遍了解。

必须牢记的是：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苏联经济的突出特点似乎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方面，以及在克服内战时期各方面的严重匮乏方面获得的惊人成就；而苏维埃政治制度的那种不容不同意见存在的特点还远没有象后来，即开展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而一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做法，特别是对所谓的“叛徒”和“破坏分子”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审判时那样昭然若揭。即使当这些方面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后，许多观察家仍然误以为1936年的苏联新宪法规定了实行普遍选举权和表面上的自由选举是朝着广泛民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从而被引入了歧途。此外，在纳粹取得胜利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实际变化也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看不清它的内部情况。在三十年代中期，苏联确实在寻求一条结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道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正在设法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阵线”，在同工人阶级其他分子的关系上采取和以前相反的策略。这些步骤虽然遭到除法国和一个时期西班牙之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反对，但却使西方的许多社会党人对于他们强烈不满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不过，在二十年代，虽然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一再进行“专政对民主”的斗争，但许多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的分裂策略、并对共产国际不断攻击右派以至中派的做法十分不满的人们，在思想上

却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苏联显然能够支配，而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也确实支配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行动。季诺维也夫及其在共产国际中的同伙，被广泛认为是到处煽风点火的人，而与掌握苏联官方政策的那些比较谨慎的人不同。在原指望出现的世界革命的前景化为泡影后，苏联的政策看来已越来越集中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上。这种分歧是确实存在的，但在二十年代，与其说在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之间有什么冲突的话，不如说双方在活动范围的划分上意见还是一致的。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失败和德国共产党人的垮台，尤其是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决裂使共产国际的亚洲革命计划破产之后，共产国际就暂时停止直接推动世界革命，而成为以保卫苏联利益为主要目标的一个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机构，等待所盼望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指望它使世界革命再一次成为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路线上的这种变更，实际上完全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的压力而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如此的；它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该组织以及参加该组织的各党更加听命于俄国的控制，更加肯定地成为俄国人为增加苏联防卫力量而使用的工具。但即使在当时，连这一点也并不象后来那样明显。

我承认，在二十年代，我本人对于苏联的极权主义倾向的力量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也和别人一样相信，当苏联的经济走上正规，能够使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之后，趋势将会是愈来愈自由化。与一些从事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朋友和同事不同，我从来不向往成为共产党人，因为我的主张基本上属于多元论和自由意志论，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哲学思想是以死板的决定论原理为基础，并且不考虑时间和地点，而肯定它那整套统一的理论具有毫无疑问的阶级正确性，这与我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我相信而且将一直相信，自由的主要

基础是选择的自由。任何“好的”社会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允许并促进这种自由；在它的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自治机构，每个机构可在各机构组织起来的灵活的总结构范围内，自由制订自己的政策，各机构间可以表示真正的不同意见，并通过公开讨论求得解决。这种主张与威廉·莫里斯或皮·约·蒲鲁东甚至克鲁泡特金的主张相类似，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就必然使我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他们的大多数人的实际表现理智得多，也仍然如此。但是虽然如此，即使我对于共产党人信奉这种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的邪说的程度的认识，比我实际上的认识更加充分，我也不认为我关于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应对苏联抱什么正当态度的看法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在我看来，所有社会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依然是团结起来援助苏联，不仅反对那些仍然希望苏联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将其推翻的敌人，而且反对那些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建立一道封锁线来阻挡苏联影响的人。我过去和今天都相信，1917年的俄国革命，包括其布尔什维克阶段，不仅是世界史上一个突出事件，而且总的说来是一个有益的事件，因为它给世界各民族中人数众多的一部分人尤其是给那些遭受最残酷压迫与极端贫苦和受不到教育的人们，指出了摆脱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共产主义也许对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赢得了真实的民主自由和经济、社会、教育方面的巨大成果。但在我看来，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它仍然具有明确的启示，不过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似乎不愿意有效地加以传播，甚至不愿意正确加以评价。

即使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所有和他们意见不同或拒不承认他们的意志就是法令的人们时的残酷无情，确实引起我的反感。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似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阶级敌人”根本无人权可言，对他们可以杀掉或加以虐待而无须感到内疚，而且，究竟谁是“阶级敌人”，是可以理所当然地加在任何人头上的，包括任何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社会党人在内。我并不是说在1917年或1918年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阶段，我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态度，不过后来我体会到，这种态度一直存在着，并成为共产党人行动哲学的一个肯定无疑的部分。我想，只是在1919到1920年俄国内战期间，我才认识到这种态度，当时我9 倾向于认为这是伴随战争而来的几乎不可避免的产物，预料在内战过去后，很快就会结束。1921年初喀琅施塔得叛乱发生时，第一次出现了以社会主义者屠杀社会主义者作为布尔什维克为巩固其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公开组成部分，这在我思想上激起极大震动。但在那个时期，残酷无情地对待喀琅施塔得兵变者，恰好也正值实行新经济政策之时，而这似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势；我同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对喀琅施塔得发生的事件仅有模糊的了解，至少半信半疑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过错，把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变本加厉的迫害，解释为内战情况下的产物，并不认为它是为消灭一切可能产生持不同意见的领导集团的来源而蓄意制订的政策。列宁主义否定任何道德准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关系或态度如何，对这一点的全部含义，我简直不理解，而错误地认为那些我决不能赞同的暴行，是沙皇制度残酷统治的遗传物，由于处在半饥饿和内战的严重情况而更形加剧，一旦革命度过最危急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就会立即放弃这种态度。现在我明白，对此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这种残酷无情的做法与抵制所谓“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乃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比起今天来，在紧接着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是很不容易理解这一点的，人们很容易低估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现象，认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在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缺乏

文明的或宽容的传统的国家，这主要是革命和内战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

因此，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的看法也与共产党人迥然不同，但我同时对“伯尔尼国际”及其前身、1923年在汉堡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信条也持严格的批评态度。在我看来，这两个国际所宣扬的议会渐进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原理变得十分狭隘，似乎它只能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国家，即它们业已经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程，并已习惯于用西方议会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与此相反，我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一种十分广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足以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要求它们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的全过程，或者必须达到接受近似西欧或美国的议会体制的程度。我认为，并不是只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国人民都必须依次循之前进；而且各国人民必定要进入的社会主义，在国与国之间也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即不是仿效苏联的模式，就是仿效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老实说，我实际上对政治体制并不象对经济和社会体制那样感兴趣，认为人类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的环境，对他们的幸福与自由来说，要比对他们行使政府当局最高权力的庞大的政治结构更加重要。总之，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属于又一种人，不是模棱两可介于两者之间，而是同这两者根本不同。

我深知，基尔特社会主义，即使在它的影响的极盛时期，根本谈不上是一种被人们广泛信奉的社会主义信条。它基本上仍然是英国的一个流派，虽然在其他许多国家有与它相类似的表现：例如法国的“工业化的国有化”运动；巴勒斯坦的犹太工人总联盟的活动；美国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普卢姆计划”；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张；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俄国本身——关



于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的许许多多计划。但是，它没有强大到足以经受住随着战后的经济萧条而来的工会的失败，也未能作为第三党而有力地介入敌对的“国际”之间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它只能是一度以“第二半”国际即“维也纳国际”为代表的“中派”势力的颇不得力的盟友，而“维也纳国际”没有多久也就被两个极端派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所摧毁了。

“维也纳国际”建立的基础，实际上是承认，并没有一条唯一的<sup>11</sup>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能真正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千差万别的情况。成立这个国际是企图说服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需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并且停止对他们的分歧进行争论，而是重新建立一个共同的国际，他们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下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不管追求这种共同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千差万别。这个在适应战后时期情况的新基础上恢复以前第二国际的计划，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成功的希望。分歧太严重，不仅在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中间有分歧，他们所激起的各种情绪更加势不两立。共产党人谴责反对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叛徒”；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认为议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专政”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两派不可能在一个组织内共同工作，不管这个组织是多么松散。有些人毫不妥协地主张“国际”应由集中的权力加以控制，在“国际”中，各国的党只不过是从属的地方组织，有些人则要求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权根据当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是选区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政策，这两种人之间也不可能进行合作。维也纳国际所主张的组织上的团结虽然是一种幻想，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许多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深切感到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人阶级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既不赞同共产主义，也不赞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那种包罗万象的议会主义。中派之所以失败，正如我希望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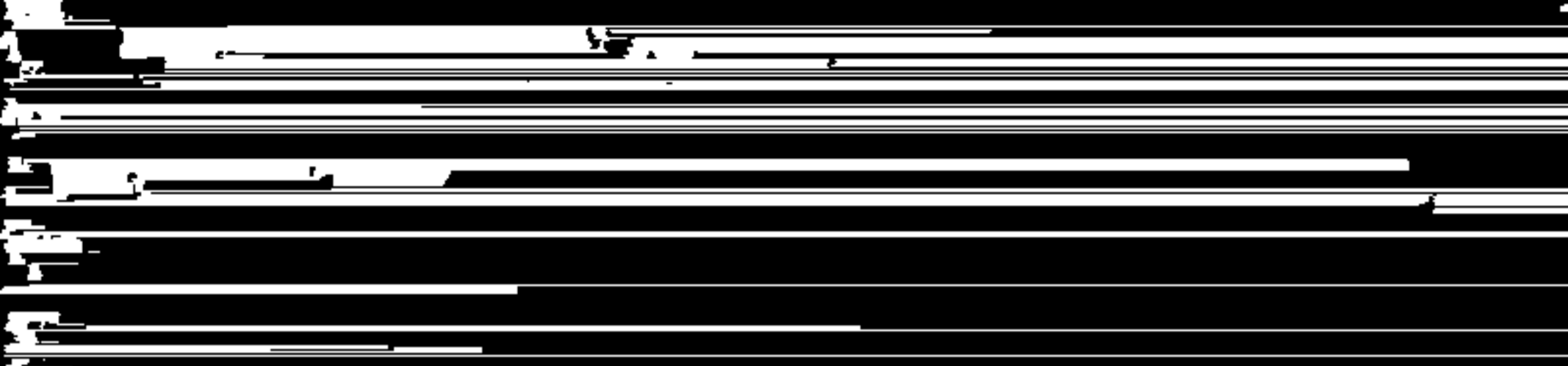
本卷中加以说明的并非由于中派的人数不多，而是由于不管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个人品质如何，他们都不可能共产国际和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之间形成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因为共产国际有苏联的实力和威望作后盾，而第二国际则可以依靠西方世界先进国家社会主义多数派中那些鼓吹议会制的人们的支持。

读者在本卷中会清楚地看到，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 12 的斗争中，我是同情中派的，不过我对他们认为有实际可能重新建立一个为敌对各派所能接受的国际这样的信念，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当团结的幻想破灭之后，维也纳国际决定并入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我不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尽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显然是为了确保右翼议会主义者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其他路线可循。与共产国际联合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二十一条”所体现该组织的态度，毫无妥协可言。而依附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则有可能在加入它的各党范围内实行比较有调和余地的改良主义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比起它所代替的伯尔尼国际来，确实是一个教条主义色彩较轻的右翼组织，尽管在任何重要的方面这一点并不十分明显。意大利社会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后，只剩下流亡者组成的一些小团体，法国社会党则由于共产党的兴起而变得软弱无力，这样，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必然为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所控制，西方一些较小国家——奥地利、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社会党人虽亦起重要作用，但居于次要地位。挪威社会党人在同共产国际最终决裂后，一度对它采取观望态度，在 1938 年方才与它发生联系。在美国，美国社会党已濒于分裂；在美洲大陆其他地方，只存在一些小的多半不起作用的社会主义派别。澳大利亚工党和新西兰工党，态度一直冷淡；在亚洲和非洲，社会党不同于那些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多半是存在不久的小团体，除在南非外几乎还没有开始形成，而在南非，“纯粹白人”

和亲非洲人的敌对两派已经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实质上是西欧各党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党主要属于一些议会机构根深蒂固、共产主义号召力很小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sup>13</sup>和英国，或者一些议会主义者反对正在抬头的强大的反动势力、维护议会制度而进行斗争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对参加它的各党的政策的制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它几乎也不打算这样做。它的代表经常在全体代表大会和各局的会议上会面；然而除抗议东欧和南欧的反动暴行，或起草一些关于裁军和加强不起作用的国际联盟的毫无结果的计划之外，他们所做的几乎不外是就各成员国国内运动的命运交流交流经验和整理一点资料而已。

与此相反，共产国际对凡是它能渗透进去的每个国家的事务，都不断进行活动，即使那里它的拥护者很少。它主要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缺少真正代表性的外国“阵线”组织进行工作。这种活动常常被引入歧途，甚至造成危害；因此它往往招致镇压，镇压范围远远超出共产党队伍。但是，它明显地表明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在许多地区的非共产主义运动和党派是决不能与之相比的。它的缺点之一是，它动辄对它的支持者提出肉体难以承受的要求；另一个缺点是，它总是过多地吸收一些仅仅是心怀不满的人，这些人不久便又转而支持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运动，例如德国以前的共产党人，在希特勒得势的几年期间，大批地转向了纳粹主义；又如中国的蒋介石，在利用共产党人为他的目的效力之后，对他们大肆搜捕，一时几乎把他们在城市的势力彻底摧毁，只剩下毛泽东，他主要在农村重新建立了共产党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的政策也始终由俄国人加以控制，俄国人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看成而且当作只不过是他们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中的附庸。起



15 达到危急阶段，西欧一般说来仍象十年前那样，距离社会主义很远；而共产主义虽然已在苏联巩固了它的权力，但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情况来，世界革命似乎更加遥遥无期。

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确实是最令人沮丧的，只有那些由于共产主义在巩固新建立的苏联，以及在阐明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执政这些概念的实际含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而欢欣鼓舞的人们例外。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开始运用的一般基本理论，是列宁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早已创建的，1917年以前已具备了主要的纲领。在列宁的继承人特别是斯大林手中，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无论如何认为不可能把这些进展看成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不错，除了在仍占绝对优势的农业部分之外，经济已大体上社会化，在计划经济和国家统计的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完成恢复和扩大工业生产，至少是在重工业和电力发展方面，总的看来，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才能。然而，这些成就是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产党在开始时具有的内部民主愈来愈遭到破坏；官僚主义势力大量滋长，随之而来的是千方百计地否定各种平均主义观念，把它们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并且几乎无限制地使用金钱刺激手段，在这方面斯达汉诺夫运动是突出的象征。苏联的新制度使苏维埃的权力不断缩小，与此同时，愈来愈不容许反对意见存在，愈来愈实行集权制的共产党的权力则不断扩大。这种新制度还导致工会完全从属于党，取消城市合作社，移交给国家；系统地消除任何有可能成为公开批评统治核心所奉行的政策的工具的

16 团体。而且，这些情况虽然当俄国在内战期间仅仅为生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并不严重，但是当战争过去，甚至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明显的自由化期间，却日益增多起来。斯大林主义的新政策虽然只是在后来才达到压制一切的中央集权的顶峰；

但是，从打斯大林开始巩固他控制党的机器的权力，并着手逐步清洗他以前的同志中那些不愿放弃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而唯唯诺诺地听命于他的人的时候起，就已经牢牢地播下了种子。清洗托洛茨基是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过程的第一个公开的信号，而托洛茨基能够获准活着离开苏联，他的遭遇比起后来的受害者来总算好些。

这里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列宁在他的直到1917年的著作中，对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际遵循的政策的基本原则，究竟制订了多少？很明显，列宁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其基础并不完全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思想，而是把这个概念同一个受极严格的共同纪律约束的职业革命者集团所组成，或至少是所控制的党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就包含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萌芽，即全党必须严格执行党所决定的政策，少数必须完全服从多数所作出的决定。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是：根据这些概念，中央执行委员会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可以作为党的意志权威性解释者，从而使得中央委员会可以强迫推行各项政策，而不是由各支部通过自由讨论结果形成政策，中央委员会只是党员的意见的解释者。毫无疑问，根据1917年和以后的几年内战期间的情况，要想经过充分民主协商和自下而上的过程作出有效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在1917年，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毕竟还是同莫斯科和其他可以取得联系的地方的党的核心，就直到夺取革命政权等问题进行了协商。但是，布尔什维克一旦变成了政府，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就不得不主要由自己来决定如何行动和制订政策了；看来，意味着由中央委员会实行权威性统治的“民主集中制”概念，即使不是完全基于这种必要，实际上也主要受其影响，结果使党内民主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为斯大林后来把共产党的机器官僚化铺平了道路，并且起了把已经大为扩大的党的一般成员排除在外，使之不能有效地起到参加制定

党的政策这样的作用。这种毫不“民主的”集中制，实际上在它形成为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一部分之前，就在很大程度上发展起来；在把它作为禁止党内出现“派系”的正式手段，和取缔并镇压“工人反对派”的办法而加以采用之前，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民主，即使在它执政的最初各阶段，也几乎不超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范围；但在这些阶段，这仍然是出于实际需要，还不是公认的党的教条。斯大林只不过是加强和巩固了列宁生前即已实行了很长时期的实际作法，不过甚至就连这种“中央委员会民主”也实际上遭到破坏之前，也几乎从未公开宣称它是一种原则。

根据列宁在革命仍在进行时奠定的基础而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在其上述发展中我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可以适当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除非有人准备承认并产生这种思想，即有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即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必等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革命，也不必指望这些国家的工人给予实际的积极支援。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曾一致认为，除非世界革命或者起码德国革命给他们以援助，否则他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难以维持自己的政权。因此，他们几乎是狂热地在德国煽动共产主义革命，只要他们在那里找到足够的支持，即使是挑起任何大规模的政变也行。与这种态度相反，现在接受了单独在一个国家建成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即使不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起码也是实际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思想，不管这个国家是多么辽阔，可开采的自然资源多么丰富，这确实是一个思想上的真正转变。但是必须记住，这种新思想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新的创造。因为，面对着世界革命前景不可否认地遭到挫折，俄国人除了尽最大努力利用自己的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他们着手单独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不

是出于选择,而是由于舍此而外,唯有承认彻底失败。而对于那些肯定认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动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虽然可能比他们希望和估计的时间要晚一些,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出现的人们来说,承认失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坚持到底,直到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到来,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尽量使自己强大到足以抵抗资本主义任何形式的进攻和包围——就是说,他们必须倾全力增加他们的生产力,首先是那些在战争中成为力量的主要基础,在发展生产资料建设的迫切任务中成为自力更生主要基础的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重工业方面,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看来同样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尽可能使俄国农业向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形式发展,以便使之摆脱落后状态。接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作为旨在使耕作方法走向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第一步,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农业生产,同时又可使农民具有与城市工资劳动者同样的思想。

把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始的国家,靠独自的努力提高到资本主义最高生产成就的水平,而且以后还要超过这个水平这种想法是伟大的,至少是豪迈的,人们很容易认为,为实现这种想法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不管多么残酷都是正当的。如果布尔什维克<sup>19</sup>的领导人对于西方所一贯理解的“人权”有任何认真尊重的话,他们也许会被自己着手进行的事情给人类带来的直接痛苦所吓倒而向后退缩。然而他们没有这样的尊重,一方面由于根据他们的基本理论,除了与某一特殊阶级——无产阶级——利益有关的“权利”之外,否认一切“权利”,一方面由于他们从小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本身就根本不管人类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关于“权利”的概念,与个人或者具体的人本身无关,而是与整个阶级,或者甚至只是唯一的一个阶级有关,在他们看来这个阶级不仅包括其实际成员,而



且还包括那些由于尽可能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化而被罗致到这个阶级里面的人；对于“阶级敌人”，或者甚至那些不能被划入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所受的痛苦是无动于衷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动于衷的。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阶级敌人”这个概念扩大，把为了实现他们广泛社会主义化的宏伟计划而需要清洗的任何集团包括进来。这并不妨碍他们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和扩大受教育机会；因为这两件事对于他们作为目标而建设的那种社会能做出重要贡献。但是，这意味着他们把个人仅仅当作是对实现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可能作出贡献的工具，因此他们自以为完全有权使用任何手段处理任何被认为会妨碍这个计划的人，并有权把任何个人——包括无产阶级的任何成员——当作工具，用以促进他们自命为其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集体利益。

这种强调“集体”而不是强调个体的人的关于“权利”的阶级观念，对于那些接受西方“人权”思想并更注重个人权利的主张的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西方，基本“权利”的概念与下面的概念密  
20 不可分：即每个人仅仅由于他或她是人而固有的权利；和不论阶级或信念，不论人与人各不相同的任何特殊性格而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普遍的兄弟情谊。当然，我不是说西方社会实际上已实现了这种普遍的人道主义概念；但它起码已被广泛地承认，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例如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在实行普遍选举权方面，在逐步发展某些基本社会服务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因此，在西方国家，许多人包括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把权利这个概念仅仅同某一个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或者认为权利仅适用于阶级的总体而不适用于个人，简直是不道德的。但是，对权利的这种态度却似乎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团结”的态度，即否定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着什么不管阶级差别而把他们全部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如果再加上拒绝承认存在一种根据上帝或

“自然”的法则人人均须遵守的共同道德这种思想，它就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果说道德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习惯形成的，如果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习俗把一个由相互敌对的社会阶级组成的社会的所有成员联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无论在一个社会内部或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人类本身的基本权利这个概念，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承认这样的观点，是与近代西方社会的道德习俗和道德传统以及近代基督教的教义背道而驰的。人道主义者或西方基督教徒关于人权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关于阶级道德的概念这两者之间在道德法规方面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互相对抗的两个“国际”为争取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忠诚而进行的斗争，并促使它们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宣言。伯尔尼国际主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来源于所有的人不论阶级和信仰均应基本上保持团结这个观念，而共产国际针锋相对地公开主张纯粹的无产阶级权利，则出自阶级斗争至上，而道德本身只是在阶级范围内才具有意义这样的思想。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是无法调和的；因此“第二半”国际派企图超脱于这两种态度之外，是注定要失败的。

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无产阶级道德至高无上，是以把阶级斗争作为最主要的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为基础的，而这并不是俄国革命<sup>21</sup>产生的新学说。在1917年以前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提出，而即使在那时也不完全是一种新学说。实际上，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中有势力的政党的过程中不再加以强调，甚至多半被遗忘了。比起第二国际的那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它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间自然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信条。在俄国和东欧一些斗争格外激烈、维持基本的社会团结的主张事实

上几乎已没有存在基础的地区，这一信条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但是，即使在俄国，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或者象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老派人物也并没有承认这一信条。然而，它却强烈地吸引了列宁，因为他对俄国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而且主要从俄国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在他看来这一信条可以完全正确地说明事实。列宁受奥古斯特·布朗基，也许更加受主张要有一批国际革命的骨干分子这种思想的最极端的鼓吹者彼得·特卡切夫<sup>①</sup>的影响，他以最不妥协的方式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并且从1914年起，以此为基础决心向“社会爱国者”展开无情的斗争。他不再打算重建以前的国际，而是根据新的原则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些原则他曾于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提出过，未能通过，但一年后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他说服代表们接受了。就这样，在昆塔尔会议上为建立第三国际打下了基础；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宣言，从标题到内容都有意地重申了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所以，1919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共产国际政策中包含的新东西，是根据这些思想所作出的不仅要向正在复活的第二国际中的“社会爱国者”，而且甚至要更加猛烈地向那些企图把敌对的各派重新联合在一起的中派，展开无情的斗争。这就使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陷于分裂，因为它不是争取尽可能最多的人支持新的共产国际，而是以赶走很大一部分可能的支持者作为代价来确保它的原则的纯洁性。根据这种精神，共产国际拟定了“二十一条”，抛弃了它在意大利、挪威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大部分支持者，并迫使犹豫不决的中派重新与右翼占优势的反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结合在

---

<sup>①</sup> 关于彼得·特卡乔夫，见第2卷，第54页（中译本第2卷第57—58页）。

一起。我们应当记住，在最初，采取这种战略是由于认为世界革命对苏俄革命的生存来说，不但是刻不容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这些预测都落空后，仍坚持了这一战略，因为它在逻辑上是符合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因此不能仅仅因为策略形势的改变而予以放弃。实际上，斯大林的基本态度同列宁的完全一样，尽管领导易人，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由于迫切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支持者以组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十字军，似乎暂时改变了他们的方针的话，那么1939年的纳粹-苏联条约很快又表明，共产党人的态度根本上并没有变化，其基础仍旧是否认“权利”，除非同阶级连系在一起能有任何政治意义，仍旧是坚持认为苏联作为无产阶级胜利的体现，完全有权确定自己的方针，不受资产阶级是非观念的影响。

实际上，我是说如果列宁活着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他对斯大林主义在以后年代的发展会感到如何吃惊——我相信他会看到其中有许多使他自己吃惊的地方——但关于阶级道德和“阶级权利”的基本哲学，斯大林同列宁毫无二致。其实，实际情况更甚于此，因为列宁曾明确地坚信这种哲学，并竭尽全力地遵循这种哲学行事，而除了利用一切手段消灭他的敌人和竞争者这种个人“权利”之外，很难说斯大林有任何地方是任意行事的。列宁在说“阶级统 23  
治”时，意思是指由阶级来进行统治，而且实际上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他重视党内的讨论，至少是中央领导内部的讨论，认为这是决定党的政策的一种方法；他懂得必须使党同它所要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保持经常的密切联系。固然，他往往刚愎自用，不能容忍那些他认为是胆小怕事或不切实际的批评者；但是，他对接近他的同事采取说服的办法，而不是强迫命令，并且让各级苏维埃在处理政府事务中拥有实权——即使这样，如我们所知，1917年，在实际进行革命的时刻党和苏维埃各应承担什么

任务的问题上，他与托洛茨基发生了冲突<sup>①</sup>。总之，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列宁赞成“阶级”专政，而不是“党”的专政；但由此又坚信党是阶级的真正代表，并坚信党的纪律，这实际上造成了党的专政而不是阶级专政。他一定认为任何无产者，由于自己的阶级，无权背离党的决定所体现的正确的阶级学说；在党的内部，他极端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反对根据个人经验而作出的个人判断或意见；同时又极端强调在任何紧要关头或作出关于政策的重要决定时，党的领导必须把全部权力和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列宁逝世后，党的领导越来越替代整个党而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所指定的代表。列宁在世的时候，根据所谓“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这种替代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斯大林把它推向前进，并把这种做法提高成为一种教条，然后进一步由一个大权独揽的人享有至高的权威替代了集体领导，连这种教条也超越了。但是，认为斯大林是唯一的破坏共产党内民主的人，也是错误的。事实是，如果说这种党内民主曾经存在过的话，它早在斯大林取得独揽一切权力的地位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 24 如果说，在二十年代，来源于184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主义学说，比起共产党方面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更加恢复了活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社会民主主义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劳工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多少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呢？就主要的新发展来说，我想恐怕答案一定是：他们没有提出多少新思想。我不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战后年代出现过任何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经典著作”。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的《大不列颠社会主义联邦宪法》，提出建立政治的和社会的两个平行议会的主张，一般认为是他们夫妇二人最次的著作

---

<sup>①</sup> 见本卷第84—85。

之一；肖伯纳的《知识妇女用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释义》也根本不是重要的著作。此外，赫·乔·威尔斯的《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其价值也远不及他战前的著作。卡尔·考茨基后期的著作，包括他多年研究社会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成果《社会主义与战争》和他露骨地攻击共产党的专政学说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出版），没有一本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性贡献。在法国，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例如爱德华·多莱昂的《工人运动史》第1卷）之外，没有出现任何起码的重要著作。意大利由于法西斯的斗争而四分五裂，只偶尔出现一些互相争论的著作；西班牙直到三十年代几乎一无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积极拟定各种社会改良的计划，但对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没作出任何一般的贡献。美国没有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著作；拉丁美洲在二十年代后期出现阿亚·德拉托雷的阿普拉运动以前，没有更多贡献。在比利时，王德威尔得和德·布鲁克尔仍在写作，但主要只是解释战前早已提出的思想，虽然德·布鲁克尔的《工人管理》（1924年）一书中有些主张尚可认为对战后的思想真正有所贡献。在荷兰，埃多·费芒的《欧洲的选择：欧洲合众国或欧洲有限公司》（1924年）值得一提。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19年）也同样值得一提。但整个“财富”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作家已经全神贯注于谴责共产主义，而无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好的著作大部分是论述某些改良计划，有的是论述国有化计划，而不是论述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一般问题。

真正有创见的，首推主要出现在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共产党人，也不能把他们归入与共产党人对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如前所述，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有自己十分独特的观念，特别是他们在社会关系方面持多元论看法，并且坚

持认为经济力量比政治力量的作用更为重要。他们与工团主义者和产业工会主义者一样，强烈主张实行“工业民主”和直接由“工人管理”工业，但是他们承认“国家”是表达全体的利益和设法协调政治自治和经济自治者之间的要求的必要机构。我本人同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所处的地位无法客观地评价它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究竟有多么重要；但在我看来，姑妄言之，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对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确实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在1914年以前即已开始出现；<sup>①</sup>但只是在战争年代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如后面所述，它在战后的十年期间逐渐消声匿迹，当时它的追随者分裂成互相对立的集团，一方面是由于在俄国革命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上意见分歧，一方面是由于有一派成员对现在多半已被人遗忘的克·休·道格拉斯少校的社会信用理论发生了兴趣。二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也严重地破坏了它对工会的影响，并导致了“建筑同业公会”的垮台，这个同业公会是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些首要的鼓吹者的鼓舞下建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虽已被消灭，但是作为一种创新的思想依然存在。它强调必须同时实行工业自治和政治自治，强调必须把社会机构的权力分散，以便抵制官僚主义倾向，使尽可能多的人分担社会责任，即通过由面对面在一起工作的人组成的小组打下民主管理的基础。

26 就这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书所设想的世界范围来说，基尔特社会主义似乎是一件小事，甚至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它坚决主张必须在各个方面和各级的社会组织实行自治的民主方法，而以面对面在一起工作的人组成的

---

<sup>①</sup> 见第8卷第212页及以下、233页及以下、236页、242页及以下(中译本第224页及以下，235页及以下，248—249页，254页及以下)。

小组作为基础。这对协调社会主义的计划与个人的自由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在面临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和管理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民主，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问题上，我深切感到，不论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过份强调权力集中是社会主义管理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样的看法，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化和垄断倾向，就其组织方面来说，也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步骤，这样，它们都走上了歧途。如我们在本书第3卷中所看到的<sup>①</sup>，这种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在考茨基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而他的著作在1914年以前曾被作为马克思学说的经典论述而广泛地加以接受。当然，经常出现互相对立的思潮，尤其是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中间，例如巴枯宁和蒲鲁东以及后来的克鲁泡特金、威廉·莫里斯和佩卢蒂埃。但在社会民主党议会派中间，始终存在着主张中央集权和权力集中的倾向；而共产主义，由于无限强调“权力”问题，根本不考虑伦理价值，更加严重地促成了集中的纪律和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类似学说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在一个面临现代经济规模无限扩大和先是在革命的俄国、后是在极权主义信条能够以任何形式强加于人类事务的一切地方的权力惊人集中，因而比以往更加需要强调自由的时代，它们用适合二十世纪的各种方式重申了自由。

以这个导言为纲，以便以下各章分别叙述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宋宁译)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970页(中译本第441页)。



## 第二章

### 三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 昆塔尔和斯德哥尔摩

我们在本书前一卷中已经看到，1914年8月第二国际瓦解，以后再未有效地恢复。在它存在之时，尽管组成该国际的各国组织的内部和彼此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争论，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几乎全世界所有社会党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国际，并对之抱有某种忠诚。此外，由于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立了社会主义组织，由于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和关注集中到国际身上，虽然并不一定把它看成是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把它看成是可以防止战争的机构，因此，从属于它的各国组织日趋增多。在第二国际内部，关于工人为避免列强间发生战争惨剧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针，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决议，与其说是解决了这些分歧，不如说只是掩盖了分歧。因此，到需要行动的时候，它没有提供任何指导行动的明确方针。虽然，在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推进的方法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奇怪的是，在第二国际的事务中，这类问题反而不如防止战争的问题更受到重视。其原因很明显：一般说来，每个国家的组织，甚至是其中的每个派别，在国内事务的行动方针上可以自由采取自己的路线。不过，在某些国家由于政府的镇压或其他国内情况，有些方法当然在实际上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与此不同，要想采取行动有效地反对战争，显然直接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无

论如何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只有当某个国家明显是侵略者，并且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制止该国统治者推行其侵略计划，他们才有希望阻止战争的爆发。可是，即使侵略者已经很清楚，也决不等于说社会党人就能够制止它；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政治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即使可以证明谁是当前的主要侵略者，但另一方至少也应负一部分战争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阻止战争的行动就必然应当是国际范围的，潜在交战国双方的工人都应参加进来；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尽管有许多可辩解的地方，但从未想到这类行动的实际含义。他们曾讨论过同时宣布总罢工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支持；然而他们甚至从未考虑劝告他们的追随者拒绝服从召集后备役军人入伍的命令，尽管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大多数成员来说，这不可避免地是号召参加或拒绝参加战争首先必须采取的行动方式。

我并不是说第二国际应当告诉它的追随者，在任何积极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家，都对动员进行抵制。然而我是说，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旦任何政府当真下决心诉诸武力时，他们阻止战争的可能性就必定很小。因为任何国家如果要征召新兵入伍的话，必然会在一个时期内，一方面把工人运动的许多最积极的富于战斗性的分子调走以挫伤这个运动的锋芒，一方面要使许多没有被征召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觉，即必须对那些已被征召入伍的人以忠诚的支持，不让他们在“敌人”面前“倒下去”。动员肯定会加深民族的敌对情绪，几个大国的工人阶级也决不会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德国人所听到的一定是，必须抵抗俄国的野蛮主义和来自东方的威胁；法国人听到的一定是号召他们报1871年失败之仇，并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奥地利人听到的一定是消除俄国人对东南欧的威胁；英国人听到的一定是抵制德国对英帝国和对英国海军所维护的“海上自由”的威胁。只有对俄国似乎无须大力进行类似的

号召，其唯一的原因是俄国统治者会认为没有必要对他们征召的农民士兵解释他们将为什么目的而打仗。

毫无疑问，如果1914年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能够积极准备革命，并被立即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热情所鼓舞的话，形势会有所不同。然而除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着手进行任何类似的准备工作，即使在俄国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进行。在其他一些大国，虽然各社会党在某种情况下期望总有一天注定要发生某种形式的革命，但各个党和工会同样都从事于议会和劳工运动，目的是在现有制度范围内赢得个别的改革和改善，以及争取在人民中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除俄国和东欧少数几个落后国家外，真正的革命团体各处都只占极少数，即使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也是如此，根本无能力领导群众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来抵制动员和破坏战争努力。而且，各国政府也了解这一点，它们毫不怀疑：不是后备役军人服从征召入伍，就是工人的大多数坚守岗位从而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

实际上，只有在各大国政府都没有下定决心进行战争，而宁愿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愿意和解的情况下，社会党人抵制战争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到了1914年，形势已经发展到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步。诚然，没有一个大国准备宣布自己是侵略者，每个国家至少要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把罪责加在其他国家的头上。奥地利人谴责塞尔维亚人；俄国人谴责奥地利人；德国人谴责俄国人，旋而又谴责法国人；英国人谴责德国人；意大利人暂时处于局外，则谴责除自己以外的一切人——而且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大多数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赞成民族主义观点。即使在俄国人当中，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以前一直流亡在瑞士的普列汉诺夫，也支持协约国的事业，认为德国如获胜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灾难。这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可怕局

面；列强一个跟着一个陷入战前十年帝国主义竞争为它们决定的地位。

因此，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不出几天，第二国际就名存实亡了。德国侵入比利时，扫荡了它设在中立国领土上的总部；尽管它的书记卡米耶·胡斯曼为它在荷兰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但它的行动能力甚至进行讨论的能力已经完全丧失。它的领导人分散在四面八方，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愿望会面，或试图制订未来的政策。有些人很快就加入了国防联合内阁，例如法国的瓦扬和亡命国外的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以及不久以后英国的汉德逊。其他人，如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德国的艾伯特和谢德曼，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没有机会担任职务，但在国外支持各自的政府。考虑国际的前途的只有一些中立国的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美国人——而这些人中除意大利人外，没有一个人曾在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的事务中起过主要作用，而在此以后，除了站在一旁急得紧握自己的双手外，实在是一筹莫展。

这些处于大规模斗争局外的旁观者，自然要采取主动，计划恢复以前的国际。但暂时他们还无能为力。我认为，首先试图采取某些行动的是意大利人，还有瑞士人协同一起；不过，差不多在同时，美国社会党也发出号召，在华盛顿举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但未成功。1914年9月在卢加诺举行的意大利—瑞士代表会议，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卷入战争的任何政府均不能被认为无罪或可以逃脱责任。会议同意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中少数派<sup>31</sup>的看法：不应当孤立地看待萨拉热窝行刺事件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坚决认为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长期竞争和勾心斗角的结果，在此期间，列强不顾国际正义和道德的一切原则，肆无忌惮地强行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主要是德国的考茨基和哈阿兹、英国的麦克唐纳和英国民主管理联盟的领导人，以及法国社会

党的让·龙格及其少数派同伙的观点。

卢加诺会议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作为第二国际代表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应当马上召集会议。作为这个局的主席的王德威尔得拒绝这一要求。埃米尔·王德威尔得作为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无法以兄弟友好的心情会见任何对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行为表示支持或加以谴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的这一态度得到第二国际的法国和英国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如前所述，卡米耶·胡斯曼（生于1871年）没有召集该局的全体会议，而是采取行动在中立国荷兰为它临时建立新的总部；所以后来再次企图恢复第二国际的努力，是由荷兰社会党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的协同下进行的。

1915年1月，荷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的社会党在哥本哈根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他们并未企图重建国际，而是企图着重考虑提出各国社会党人有可能一致同意的和平条件。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瑞典的布兰亭是这一企图的主要人物，由此成立了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后来合并于计划召开的1917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事态发展甚为迅速。虽然意大利社会党采取了中立主义的反战方针，谴责交战双方为“帝国主义”，但党内有一派人业已开始鼓吹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加入战争。这一派的领袖是贝尼托·墨索里尼。1914年11月，他因此而被开除出党。1915年5月初，在意大利政府参战前不久，意大利社会党再次与瑞士社会党一起，向“仍然忠实于国际原有的原则”，并“愿意为反对公民和平的政治，为进行阶级斗争和为各国社会主义者采取联合反战行动而斗争的”的“一切政党、工人组织和团体”发出号召，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个号召不是向那些站在各自政府方面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而是向那些没有支持政府进行战

争的党，以及在某些交战国中已经开始组织起来的反战少数派发出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罗伯尔·格里姆(1881—1958年)是这次企图团结社会民主党反战力量的行动的主要人物。

这一行动号召的结果是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的代表会议。现在认为这次会议是后来发展成为第三国际的萌芽。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代表总数不过42人，但包括各国社会民主党派来的正式代表，不仅有意大利和瑞士，而且有西欧的荷兰、瑞典和挪威，东欧的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各国社会党，以及犹太崩得的代表。俄国4个主要的党，实际上有3个——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均有代表参加。法国和德国只派来了非正式代表——前者的代表是主要的工团主义者、五金工人联合会书记阿尔弗雷德·梅兰(1871—1925年)和社会党少数派阿尔伯·布尔德朗(1858—1930年)，后者的代表是议会少数派格奥尔格·累德堡(1850—1947年)和普鲁士邦议会的阿道夫·霍夫曼(1858—?)。这些国家的主要反对派因为尚未形成正式组织，仍没有代表参加。英国的独立工党和社会党，均从一开始就以多数采取了反战方针，也指定了代表，但由于拒绝发给他们护照，因此未能出席会议。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明确反对战争，断然谴责所有交战国政府的战争罪责，但它是迥然不同的一些成份组成的。它的极左翼是以列宁为首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这个集团认为第二国际已经寿终正寝，应以其失败而受到谴责，并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革命的新国际，并对“爱国派”发起大规模进攻。在列宁看来，这些人是背叛了国际工人运动。但是大多数代表的想法与此不同。他们要求停止战争，而不是使战争成为进行世界革命的机会。他们的希望是使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恢复理智，或者给它安排反对战争的新领导，而不是把它抛弃，完全从头开始。结果，由

法国和德国代表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它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次战争不是我们的斗争”，并保证“不倦地宣传和平，迫使有关政府停止这场屠杀”。在此之后，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全体起草了一份决议，谴责各反动的资本主义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战争罪责，谴责各交战国赞成战争的社会党人的变节行为，最后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号召各国工人“越过边界、战场、遭到破坏的城市和乡村”而团结起来。最后，会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后来通常称为“齐美尔瓦尔得委员会”，推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工作并与之进行合作，以便立即实现和平。委员会成员有两名瑞士人——罗伯尔·格里姆和沙尔·奈恩（1874—1926年），两名意大利代表——奥迪诺·莫尔加利和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的俄国人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娃。其成员没有法国人或德国人，没有荷兰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没有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直接派来的代表。实际上，它不过是意大利和瑞士人联合倡议、导致召开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那个机构的继续而已。

如前所述，在召开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那个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反战力量尚未建立起任何有效的组织。较温和的反战派仍留在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内。到1915年12月，德国的少数派才向党<sup>34</sup>的纪律挑战，在帝国国会拒绝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实际上是20人投票反对，另外24人弃权。这一挑战造成的结果，是解除了胡果·哈阿兹（1863—1919年）对德国党的领导，并单独组织了在他领导下的议会派。在法国，梅兰和布尔德朗于1916年1月成立了恢复国际关系委员会继续进行反战宣传，但赢得的追随者不多。较温和的一些反战派团结一起支持让·龙格（1876—1938年），他开始<sup>34</sup>在统一社会党内获得有力的支持。在英国，独立工党赞成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决议，推行其反战方针；但并未正式与工党断绝关系，虽然在议会中独立工党这个小派别愈来愈奉行自己的路线。

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列宁要求社会党人不仅应当从联合内阁撤回自己的代表，在所有各国投票反对战争预算，而且应当以非法与合法手段进行反战宣传，组织街头示威游行，反对他们的政府，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把经济纠纷变为政治性罢工，并尽最大努力在各个国家促成内战以便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样的政策是大多数代表根本不愿实行或认为不可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和瑞士的代表，作为非交战国人员，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不主张革命的派别，他们或许希望促使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停止支持各自国家的战争政策，并参加共同的和平十字军；但他们丝毫不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采取革命行动，或号召全世界社会党人联合一致结成大规模的革命十字军。意大利代表发现他们的国家正在卷入战争，更加专注于从事反战活动，但还没有达到试图发动任何形式的暴动的程度。至于法国和德国代表，充分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本国运动的少数派，力量十分薄弱，无法推行象列宁所提出的那样的方针。梅兰所领导的法国代表确实是主张革命的，准备进行非法的反战鼓动，但他们十分清楚，他们在法国社会党内既不代表多数派的看法，也不代表占优势的少数派的看法。在法国，少数派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而不是革命运动；领导这一派的不是工团主义者梅兰，而是马克思的外孙、议会主义者让·龙格。他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在党内愈来愈得到有力的支持，但他根本不是一个能领导暴动的人。德国的两名代表累德堡和霍夫曼，同龙格一样，都属于逐渐形成的议会反战少数派，但是他们并没有通过暴动手段进行德国革命的思想；起码说，只要得不到德国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他们是不会这样想的。采取革命手段，作为一种实际政策，只有在东欧，即在俄国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中间得到支持，而这些国家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代表，并不代表赞成一致同意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的统一

35



运动。因此，列宁的纲领没有被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接受的希望，这次会议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号召立即实现和平，抗议各交战国的社会党多数派领导人的沙文主义行径而已。

尽管如此，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是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它开始试图在交战国和中立国组织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压力集团，不仅向各交战国政府，而且更主要地向以全民团结、反对“民族敌人”、保卫各自国家的名义而支持这些政府的社会党人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直接效果很小，因为比较温和的反战少数派大部分仍然没有组织起来，也不愿意与它们依然与之正式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党和工会的多数派分裂。况且，这些少数派即使已经组织起来，也绝不会在西欧任何国家遵循列宁的革命政策。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所追求的，并不是把战争转变为世界革命，而是设法结束战争，以便获得机会重新执行以前进行宣传鼓动和选举斗争的政策，希望把不仅仅是大多数工人，而且还有全体选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当然，在所有交战国都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革命分子，他们指望能有“一天”工人起来一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除东欧某些地区之外，这种革命分子只占反战少数派中的少数，当时没有希望能够取得领导地位。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之后，会议所成立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工作，并争取对迅速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政策的支持，以竭尽全力实行会议的决议，但是没有起什么作用，特别是由于意大利的参战，尽管并没有妨碍意大利社会党人继续进行反战宣传，但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只剩下瑞士人来负责了。1916年初，委员会决定在瑞士的昆塔尔召集另一次代表会议，与会者所代表的派别，大致与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相同；但是这些代表的态度已决定性地向左转。列宁发现自己在呼吁必须与两个阵营中赞成战争的社会党人断然决裂方面已不再

居于少数派地位；以前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所坚持的以和平为首要目的，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一种新的信念所代替：除非进行国际社会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使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缔造者，否则就不会实现可以接受的和平。在昆塔尔会议上，“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的战争贩子”同样遭到严厉谴责，并宣布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是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交战国政府之间实现和平。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决议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承认民族自决权，但关于社会主义，则除了用极一般的词句并作为最终目标提及外，几乎没有谈到；而在昆塔尔会议上，则声称除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并占有资本”，否则这场冲突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真正持久的和平将是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

因此，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不久建立的革命的新国际其真正的先驱，不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而是昆塔尔会议；然而在1916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西欧各交战国中日益强大的“少数派”所奉行的方针，肯定最多不过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主张。它们要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和承认各民族的权利要求，但肯定不主张进行革命，或与主战多数派决裂，认为这派人已是不可挽回或绝对不能改变的了。他们无意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国际；相反，他们一方面指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不采取行动，一方面希望能推动它采取行动，不久能争取各国的大多数工人支持他们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要求。尽管他们拒绝服从他们各自的党的主战多数派的纪律，而且单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仍然是议会主义者而不是革命派，仍指望在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之时重新建立社会党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团结。

西欧社会党反战派的各主要集团确实极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建立单独的少数派党，致使他们的党在战争问题上正式分裂。在德

国,虽然“独立派”早在1916年3月就单独组成了议会党团,但直到1917年4月才正式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因为到那时,少数派在老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已达到简直无法忍受的程度。在英国,独立工党虽一贯采取反战的方针,它的国会议员小组实际上完全是作为自己的党行事,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仍保持其与工党的从属关系,未企图正式与之分裂。英国社会党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后身,也采取了反战态度,击败了它以前的领袖海德门;海德门不久就脱离该党而成立了一个小党国家社会党,但追随者为数不多。<sup>38</sup> 社会主义工党主要在苏格兰活动,从未隶属于工党;它采取了坚强的反战方针,但除了在克莱德赛德外,影响很小;在克莱德赛德它同革命工长运动的左翼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法国,以让·龙格为首的少数派的大多数人,一直留在统一社会党内,致力于赢得该党所赖以建立的各个地区联合会的支持。1917年,由于以马塞尔·加香(生于1869年)为首的中派的加入,该党增强了力量;这一派人一方面致力于维持党的团结,一方面致力于逐步使党的方针向左转。在此之前,1914年第一批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茹尔·盖得(1845—1922年)与马赛尔·桑巴(1862—1922年)辞去了职务,使在政府任职的主要社会党人只剩下了阿尔贝·托马(1878—1932年)一人。直到1918年7月,即战争进行3年后,法国少数派才由于在党的全国委员会获得多数,而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1918年10月在党的代表会议上以1528票对1212票肯定了这一胜利。即使在这时,获得胜利的也并非革命主义,而是龙格的左倾议会主义,它和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独立工党的主张十分相似。不过,在支持龙格的人中间,属于革命少数派的人要比德国或英国多得多。法国少数派的这次胜利为法国社会党人后来决定与第三国际共命运铺平了道路。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曾在1914年追随维克多·阿德

勒并支持战争。然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生于1879年)领导的少数派却采取了反战的、国际主义的路线；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派的影响愈来愈大。1916年,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刺杀了首相施蒂尔克伯爵,以抗议他拒绝参加为重建宪法政府而召开的各党会议。<sup>9</sup>阿德勒利用审判他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谴责政府的战争政策,坚定表明了他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此,反战派的实力稳步而迅速地增强,终于导致1918年1月的总罢工以及一系列宣传鼓动,包括部队中发生的兵变。这时,奥匈帝国已处于即将土崩瓦解的阶段,为1918年11月皇帝的退位和各继承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39

最后谈一下比利时社会党人的情况,他们的国土于1914年遭德国人蹂躏,因此他们的许多杰出政治领导人都亡命国外。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比利时工党领袖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成为战时联合政府的大臣；该党的大部分成员,就所知道的他们的观点来说是支持他的主战政策的。这些逃亡国外的比利时人,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中最不妥协的分子,坚决反对在战争仍在进行之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面。战争爆发时,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休会期间行使其职务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掌握在比利时人手中；这是使它的行动瘫痪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它的办公处所已由它的书记卡米耶·胡斯曼转移到荷兰的中立地带,而且不久就由荷兰社会党人代替比利时人组成临时的执行委员会。在比利时国内,在德国占领下几乎不可能有机会讨论社会党的政策,但毫无疑问大多数比利时社会党人同意王德威尔得对战争的态度。1918年12月,比利时工党召开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表示充分支持王德威尔得的政策及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可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直到1917年,除意大利外所有西欧的交战国,都有参加政府的社会党和工党支持各自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不能给自己一

方带来胜利的经过谈判而达成的和平。与这些多教派相对立，除比利时外所有国家都有组织起来的少数派，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仍属于各主战的党，但是在这些党内进行斗争，争取他们的观点的追随者。在每个国家，这些少数派主要是由那些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人组成，既包括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人数不多），也包括  
40 对互相敌对的列强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这些人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胜利，认为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达成和平，最有希望重新在宪政社会主义方面取得进展。这些议会主义少数派的左翼是一些比较革命的派别，大部分仍然人数不多，有时同追求和平的少数派一起行动，有时单独行动，特别是在昆塔尔会议之后。在西欧各交战国中，只有意大利社会党有着旗帜鲜明的反战多数派。

东欧的情况完全不同。就俄国人来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还有社会革命党的多数派，都正式派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只有以社会民主党老前辈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857—1918年）和以社会革命党好斗的和恐怖主义派的鲍里斯·萨温科夫（1879—1925年）这二人为首的一个小的派别，在沙皇统治依然存在的时候支持过战争。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是反对战争的。保加利亚和波兰的社会党则陷于分裂：在保加利亚，“广义社会主义者”主战，“狭义社会主义者”则反战；在波兰，皮尔苏茨基的波兰社会党同奥地利社会党合作，但其左翼从该党分裂出去。与之相对立的罗莎·卢森堡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从革命的考虑出发，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并充分准备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推翻沙皇统治。

下面谈一下没有卷入欧战的各国的社会党和各派别的态度。前面已经谈到，差不多在战争一爆发，这些党派中就有一些开始强烈要求采取国际行动。在美国社会党于1914年9月号召在美国举

行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未能如愿之后，紧接着意大利人（那时还未参战）、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相继提出同样的行动要求。1914年之后，实际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于1915年1月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次大会只限于来自中立国的——实际上是只限于来自荷兰和挪威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人。这次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行动甚为慎重，仅仅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一旦情况许可之时”立即召开会议，无论如何“不能晚于和谈开始”。它提出许多建议，其中第一项是：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应当与旨在恢复和平的政府间会议同时举行，目的在于使工人阶级向政府间会议施加压力。2月，在伦敦召开了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党，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派别参加了会议，但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因为他们都同样拒绝参加。会议宣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在第二国际之下争取结束战争，但对采取什么行动来结束战争并未提出任何建议。两个月之后，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社会党在维也纳开会，宣称它们对继续保持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和对各党在战时的活动表示赞成，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调解互相对立的各派之间在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只局限于讨论战后社会主义者之间国际关系的前景。在这之前1915年2月，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作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和劳工组织妇女国际委员会的书记在瑞士的伯尔尼召集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交战双方各国以及中立国都有代表出席。象这样的妇女会议虽是战前第二国际正式组织的一部分，但在1915年能召集会议却是不小的功绩，尤其是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的一位卓越的人物。

在中立国、协约国和同盟国各党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个间歇时期。在每个国家，对立各派之间仍继续进行斗争，由于少数派比战争初期几个月有了组织而且态度更加明确，因此整个

说来各主战派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瑞士的格里姆和意大利社会党人<sup>42</sup>继续努力动员反战舆论；在荷兰，胡斯曼和在荷兰新成立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执行委员会，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继续劝说各交战国社会党，希望能促使它们恢复关系。在1916年7月终于在海牙举行了中立国社会党人第二次会议，主要参加者中有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瑞典的布兰亭和美国社会党的阿尔杰农·李。这次会议要求尽早召开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全体会议，并让胡斯曼和荷兰委员会着手进行工作，以便说服交战各国的社会党同意参加一次试图在它们中间就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的会议。但是，协约国各社会党还不准备参加这样的会议。它们在当时更倾向于试图拟定一个大家同意的协约国社会党人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以便它们能够向各自政府施加压力，并在适当时机提交和会，作为各协约国、至少是西欧各协约国社会党的共同方针的体现。

1917年初，在英国当权的是劳合·乔治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工党参加的人数增加，因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看来依然不太可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促使战争结束，更不可能有任何作为来贯彻昆塔尔代表会议提出的国际革命方针。但此后几个月的时间，由于俄国爆发了革命，形势完全改变。沙皇统治在战争的紧张关头被推翻，实际上既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马上能取得政权，也不意味着俄国立即退出协约国阵营。虽然如此，沙皇制度的覆灭和共和国的建立，只能是受到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以及许多认为新俄国将会成为自由民主队伍的成员的非社会党人的热烈欢迎。然而，其他协约国的社会党主战派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担心俄国人会<sup>43</sup>被迫与德国单独媾和，从而使德军把全部兵力压向西线与协约国作战。因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努力劝说新的俄罗斯共和国继续进行战争，甚至不顾俄军已经精疲力竭，使之发动一场大规模进

攻，以便缓和对西线的严重压力。1917年俄国两次革命之间接连嬗递的新政府，决不会愿意放弃它们的盟国或单独媾和，因为鉴于俄军的软弱，和平的条件势必是十分苛刻的。只要它们能有办法，是愿意进行战争的。但是情况十分明显，士兵最大的愿望是回家，特别是革命的爆发引起了他们分田的希望，除非及时返回自己的村庄，否则就会失去得到一份土地的机会。何况大多数军事领袖不仅不忠于取代了沙皇及其大臣们的新政府，而且对之极为仇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更想同革命作战而不愿去打德国人。

从沙皇退位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其间俄国愈来愈没有有效的政府，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土崩瓦解。在首都，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新成立的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逐步成为与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正式机构互不协调的平行的权力机构，而且权力壮大，足以否决政府部门采取而它不赞成的几乎任何行动。除非能够选出并召开某种形式的立宪会议，否则正式政府等于悬在空中，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也没有力量实施其法令。但是，尽管苏维埃自6月以后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仍然不具备作为一个替代的政府的基础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和集中协调的权力，而且远远没有为俄国各民族的前途制定出共同的和明确的政策。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中仅占极少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sup>44</sup>仍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且在1917年4月列宁抵达俄国之前，布尔什维克甚至在他们将来的行动方针上根本没有明确或充分的一致立场，或者说，甚至没有同孟什维克坚决划清界线。但是，在一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是一致的，这就是迫切需要和平，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影响。

俄国发生革命时，卡米耶·胡斯曼和战时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的荷兰成员，仍在继续与各交战国社会党进行商谈，



目的在于劝导他们同意参加一次该局的全体代表会议，或一次有所有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党人全体代表会议，但由于各协约国社会党反对与各同盟国社会党人举行任何会议，他们的商谈很少有进展。俄国革命的成功，对胡斯曼和荷兰人来说似乎成为一个极为有力的新理由，使所有社会党和所有派别聚集在一起，一方面强烈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拟定出大家同意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和平条件。如前所述，荷兰社会党人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时把这种合作更加正式化，似乎是可取的。但严重的困难在于，战时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包括在战前组成该局的比利时人和该局书记处迁到荷兰后加入的荷兰人。因此，荷兰人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比利时同事的同意和合作，他们不能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名义采取行动。而这一点是做不到的：王德威尔得当时在勒阿佛尔，并且是一个大臣，路易·贝特朗和爱德华·安西尔在比利时，无法离国参加国际会议。而且，这三人中只有安西尔赞成召开一次德国代表以平等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

荷兰社会党人选择的解决办法是，他们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45 的代表不是代表该局，而是以荷兰社会党的名义行事，该党应采取主动，同斯堪的纳维亚各党一起，成立一个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争取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处的协助，召开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为能达到这个目的，荷兰代表于1917年4月从荷兰来到斯德哥尔摩会见他们的新同事，决定把斯德哥尔摩作为会议地点。部分原因是为了俄国人容易到达，因为他们是否参加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同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处将其临时总部迁至斯德哥尔摩，并于4月22日由第二国际荷兰支部向一切属于国际的党派发出明确的邀请，请它们派代表参加于1917年5月15日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在5月初尚未完全组织就绪，成员中有荷兰的彼得·特鲁尔斯特拉、J. W. 阿尔巴达和亨·范·科尔(W. H. 伏列根和弗·马·维博为候补代表)；瑞典的亚尔马·布兰亭、古斯塔夫·莫勒和恩斯特·索德伯格；丹麦的托尔瓦德·斯陶宁格(尼娜·班格为候补代表)；以及挪威的雅·劳·维德内斯。它任命比利时的卡米耶·胡斯曼为书记，以瑞典的阿尔图尔·恩格伯格为助手。这个委员会马上发现，要想召开一次全体参加的国际会议，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它决定不仅推迟会期，而且开始时先单独与每个国家和派别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议，要求每个党派就召开全体会议的条件和它所主张的和平条款提出各自的意见。委员会明白表示，它认为这些双边会议只是全体会议的预备会，认为全体会议是早已在原则上决定了的；而比利时人和其他一些派别的人虽同意派代表参加这些预备会议，但仍保留拒绝同“支持同盟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党人一起参加任何会议的权利。

当这些关于双边会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之际，俄国人出人意料<sup>46</sup>地插手进来。他们从彼得格勒向各国社会党人发出自己的呼吁，呼吁他们参加将在一个中立国举行的未定日期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早已同俄国人通信，希望他们参加该委员会的各项计划，这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单独行动，除非把俄国人吸引进来，否则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显然要遭到破坏。5月18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打电报表示愿意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同时附有一份转交给各社会党的简短声明，敦促它们参加会议并认为必须同时包括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代表，<sup>47</sup>这样，才算避免出现上述危机。尽管如此，这两种计划仍然未能完全协调一致，俄国人也没有参加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或该委员会同各国代表举行的预备会议。各国代表5月到6月间陆续抵

达斯德哥尔摩；协商实际上从5月到7月之间举行，8月底重新恢复，一直继续到11月。这些会议并没有充分的代表性，有一些党虽提出了备忘录，但没有派出有代表性的代表团。最充分的要算是委员会同德国代表进行的协商，德国代表中有代表多数派的艾伯特、谢德曼、莫肯布尔、萨森巴赫、列金和理夏德·费舍；代表新近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是考茨基、伯恩斯坦、哈阿兹和累德堡。奥地利社会党人也派来一个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强大的代表团，成员有伦纳、埃伦博根和工会领袖许贝尔。以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同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另一个派来强大代表团的国家是匈牙利；王德威尔得和路易·德·布鲁凯尔代表比利时多数派；比利时少数派另外派来了两个代表团。其他派来代表的国家有亚美尼亚、波希米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广义”社会主义者）、克罗地亚、芬兰、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派）、波兰、塞尔维亚（杜尚·波波维奇）、土耳其和奥属乌克兰；还有欧洲以外的埃及、印度、巴勒斯坦、波斯、美国和来自高加索、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土耳其斯坦的一些穆斯林党派。来自英国的只有一个不甚知名的代表（J. 韦斯特），法国则无任何人参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或英国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更恰当地说，意味着他们宁愿采取别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法国人对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态度十分冷淡，怀疑它是在德国人的间接影响下进行活动，因此他们对俄国人采取的任何主动行动更感兴趣。在前一个时期，法国党曾派遣马塞尔·加香和马吕·穆特（1876—？）衔命前往俄国，他们从俄国回来后就竭力鼓吹召开一次国际会议。5月27日，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在听取了他们二人的报告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注意到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并欢迎俄国人为召开国际会议而采取的

主动行动。决议接着宣布，派代表团去斯德哥尔摩，表示法国社会党人支持“将会为根据俄国政府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宣布的原则实现和平而采取的共同行动。”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法国人对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发出的征询意见书所作的答复，并提出举行拟议中的国际会议的条件。这样就拖延了时间，但英国社会党人的行动更加迟缓。5月，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问题上意见尖锐分歧，决定在收到即将前往俄国与俄国社会主义者进行协商的代表团的报告之后，再答复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后来派出的代表是主战派极端分子、在政府中担任低级职务的G. H. 罗伯茨(1869—1928年)、矿工联合会的威廉·卡特(1862—1922年)和代表少数派的独立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但是，英国政府起初拒绝发给代表团护照，并决定自己派遣在战时内阁中代表工党的阿瑟·汉德逊衔官方使命前往俄国。当时在彼得格勒，克伦斯基的半社会主义政府新近执政，汉德逊抵达该地后打电报给国内促请政府发给代表们护照。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是麦克唐纳和他的同事们被阻于阿伯丁，因为那里的海员和司炉工会不允许麦克唐纳启航。

6月，当汉德逊正在俄国时，克伦斯基对德国人发动了倒霉的军事攻势，立即遭到失败。俄国军事崩溃时，汉德逊已在回国途中，他确信这次攻势必败无疑，除非西方社会党人表明他们准备实现全面和平，以此援救俄国人，否则俄国人将被迫单独媾和。因此他极力赞成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英国人也应参加；但当他向工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他的意见时，仍然有许多人反对，因此决定在汉德逊和麦克唐纳前往巴黎与法国社会党人磋商之前，暂缓作出任何决定。在以下问题上也有很大的争论：如果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它是否有权作出对派代表参加会议各党有强制性的决议，还是仅仅能作出协商性的决定，汉德逊采取后一种看法，并说服法国社会

党人同意他的看法；他从巴黎回国后决心不顾内阁同事的反对，要求作出支持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决定，并早已表示，如这些人反对他的态度和作法，他就辞职。在他的影响下，1917年8月10日工党举行了特别代表会议，投票表决结果以三比一强的多数赞成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英国代表团成员只限于工党和职工大会的代表，从而否定了作为少数派观点代言人的独立工党的代表权，尽管独立工党也是原来的国际的英国支部的成员。

49 这种排斥异己的作法直接违反斯德哥尔摩会议邀请书的条件，该邀请书明确规定要有代表少数派观点的代表参加。这引起了正在这时抵达英国的俄国代表团的强烈抗议。但是几天之后，传来了汉德逊由于对斯德哥尔摩会议所持的立场而退出战时内阁——或被排斥出内阁——的消息，这场争论才算得到解决。人们本来猜想，这样对待工党的领袖，工党会退出联合政府；但事实并未如此。主战分子G. N. 巴恩斯工程师在战时内阁中代替了汉德逊的职务，从表面上看，联合政府一如既往。

8月10日会议的决定，使赞成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人陷入困难；因为如果独立工党或其他社会主义团体愿意派代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而且如果政府同意他们前往的话，工党是无权加以阻止的。因此，特别代表会议休会，以便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有时间考虑这种局面，如果可能的话，设法摆脱困境。到8月21日特别会议复会时，出现了极大的压力，反对该党决定派代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被广泛地指责为德国人玩弄的手段；反对者坚决主张重新讨论整个问题。这一次，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提案，勉强以3000票多数——即1,234,000票对1,231,000票通过；并且重申排斥独立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附带条件。这实际上破坏了英国代表参加会议的可能性。当英国工党于8月28日与其他协约国社会党会见，以便统一在斯德哥

尔摩代表会议上所采取的主张时，其他各党都坚决主张少数派应有代表参加，并决定将英国工党起草提请协约国批准的关于战争目的一项声明，提交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审议，而这个代表会议何时召开，尚无确定日期。这样就排除了即时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可能性，而且实际上使整个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计划一开始就陷入了停顿。

在谈到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在各协约国所遭受的命运时，我不得不先叙述一下这项计划在另外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进展情况。由于俄国事务情况复杂，而且面对着正式政府与苏维埃都行使权力的双重政权局面，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或西方各社会党很难知道应把哪个团体看成是俄国工人阶级或俄国革命的实际代表。如前所述，5月18日表示愿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派合作的信件发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实际上意味着来自依然处于支配地位的孟什维克。但从6月初起，主动权转到了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之手，它于6月1日向所有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会的中央机构发出呼吁，号召它们为实现“以各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而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接着回顾它以前发出的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采取行动的号召，和它为迫使历届临时政府同意它的方针而采取的步骤。它指出，新的联合政府在苏维埃的压力下，已不得不按照苏维埃政策声明中首先提出的方针来寻求和平。彼得格勒苏维埃接着表示：“除非各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团结一致、意志昂扬地展开有力的斗争，反对这场全世界的大屠杀”，否则所要求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它呼吁召开一次会议，组织这样的国际运动，并提出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代表中达成一致意见，以彻底清算与各国政府和帝国主义阶级实行民族团结的政策”。它说，这样的清算，是大规模地、在国际基

础上组织这场斗争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宣称，这样的方针只不过是贯彻实施以前各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亦即第二国际所制定的政策。决议接着表示“坚信”，响应它的呼吁的一切组织，将“保证坚定不移地执行拟议中的国际代表会议所作出的一切决议”。最后，它号召响应它的呼吁中提出的邀请，于7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代表会议，但只字未提及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

这样，彼得格勒苏维埃就自行其是地采取了行动；在俄国人的倡议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的倡议之间实际上仍然没有协调一致可言。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号召的当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打电报给阿克雪里罗得和俄国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们，未免有些过早地声称：所有属于第二国际的党和工会，现在都赞成它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而为了“起码的慎重”起见，会议必须在某个中立国举行，并声称俄国如果派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来，将会尽快地解决仍未解决的各项问题并“着手进行共同的工作”。在拖延了一些时候以后，一个俄国代表团于7月初到达斯德哥尔摩，7月11日达成协议，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改组为俄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把互相矛盾的两项倡议统一由这个新机构来处理。

从此，委员会除原有成员外（只有丹麦的斯陶宁格因加入了丹麦内阁而由柏格别尔格代替），又增加了5名俄国人：H. 埃利希、G. 哥登别尔格、W. 罗扎诺夫、N. 鲁扎诺夫和E. 斯米尔诺夫。此后，当俄国代表团回国后，俄国人由哥登别尔格和阿克雪里罗得为代表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与此同时，俄国人离开斯德哥尔摩，衔使命对各协约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目的在于为召开全体代表会议铺平道路。以后，活动的中心便转移到伦敦和巴黎，如前所述，英国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正在就应对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展开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汉德逊与

俄国人会面,并得到俄国人的同意后,发出电报,建议代表会议延期到8月22日举行,以便能有时间使各协约国社会党人举行会议,就他们的方针取得一致意见,并由英国工党再举行一次代表会议 52 批准它们的会商结果。在发出这封电报后,英国人和俄国人同法国人举行了会议,接着于8月1日又发出一封电报,联名表示同意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提出少数派应与多数派一样参加会议,并应要求各国工会中央派遣代表;此外,建议斯德哥尔摩会议应延期到9月9日召开。但几天之后得到通知,各协约国政府已决定拒绝发给各自国家的代表团护照。拒发护照发生于汉德逊8月13日辞去英国内阁职务之前。在对他的辞职进行的辩论中以及在许多协约国的报纸上,都明确否定俄国政府还继续赞成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几天以后,克伦斯基又否定这一否定,重申俄国政府继续支持该计划。但是,事情很显然,除非各协约国社会党人能够出席会议,否则召开会议丝毫不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英国人又于8月21日重申拒绝英国少数派派代表参加会议,由此又造成了一些困难。

俄国代表团游说后于9月10日回到斯德哥尔摩,两星期之后,俄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于9月25日发表新的宣言,宣布召开会议的计划并未放弃,不过,会议何时举行,这时仍无法确定。宣言指出,“斯德哥尔摩会议”不仅仅是一次代表会议,而应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委员会将继续同各党进行商讨,并将在各党有关政策和战争目的的几次声明的基础上制订自己的“初步计划”,以便提交各党批准,一旦有可能举行全体代表会议时向该会议提出。这项声明引起了一些非难,说委员会篡夺了全体代表会议的职能,但该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工作,于10月10日发表了它的“初步计划”。“计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概述了各个党派的代表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委员会阐明的观点,另一部分则试图按照全世界社会党人都 53



能接受的方针概要提出一个全面和平的解决方案。这项计划在阐明了战争不可能解决国际纠纷已为事实所充分证明之后，认为仲裁乃是剩下的唯一能解决纠纷的手段。它要求普遍裁军，停止使用暴力和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它还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立即发动斗争，反对一切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和兼并主义。

当主要依靠俄国人的支持而制定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由于俄国爆发了第二次革命而实际上被弃置一旁时，情况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人们一直把他们当作是以俄国革命名义发言的俄国代表们，完全丧失了权威，从而使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委员会无权再为代表会议作任何事，于是着手编辑它的全部会议记录，由卡米耶·胡斯曼写了序言，对委员会的宗旨作了说明。这部文献于1918年1月发行，收入了委员会与接待过的各国代表团在斯德哥尔摩进行商谈的情况、各党派的声明，以及委员会所作的分析和所拟定的“初步计划”。有一个时期委员会仍然企图把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看成仅仅是延期举行，但实际上整个计划已寿终正寝。

我比较详尽地叙述了准备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经过——尽管省略了许多细节——因为这次会议虽根本没有举行，但建议召开这次会议一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后几个月的关键时刻，成为西方社会党人活动的中心。在这几个月中，协约国有许多人始终认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基本上是德国人玩弄的策略，尽管尽人皆知布兰亭是支持协约国的事业的，而且甚至任何想入非非的人也不会认为俄国代表会站在德国一边。事实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是赞成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的，因为在中欧强国的工人中间，要求和平的心情日益抬头；而这就足以在那些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并摧毁德国军事力量的人中间激起强烈的反对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情绪。此外，在对沙皇制度的覆灭普遍热情地表示欢迎之余，由于

愈来愈担心俄国人单独媾和，在协约国中人们的情绪又有些低落。这种担心很可能——而且在某些地区确实——促使人们更加支持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把它看成是可能促成全面和平的手段；但是在协约国的多数派领导人中，有更多的人依然赞成将战争进行到底，而且反对任何同德国人谈判的主张，除非和直到德国人完全准备承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并且以哀求者而不是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谈判。即使那些十分清楚俄国已完全没有能力继续有效地进行战争的人，仍然倾向于认为单独媾和是对协约国事业的背叛，并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明确声明，绝对不会单独媾和。那些参加或支持克伦斯基政府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多半同意这种看法；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追求的是全面和平，因此也反对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甚至迫使俄国人保证不搞这样的和平。因此，斯德哥尔摩会议便主要成为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与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人之间争论的问题；尽管汉德逊在英国作出了努力，法国少数派的力量也日益增强，但事实证明，要想使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党人团结一致支持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是根本不可能的。两国少数派的压力虽足以避免使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完全遭到反对，但尚不足以把法国和英国的运动联合起来坚决支持这次会议。

因此，虽然阿瑟·汉德逊退出了政府，可以放手集中精力重建工党组织，以便在战后加强其地位，但工党仍然有代表参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直到战争结束；在法国和比利时，阿尔贝·托马<sup>55</sup>和埃米尔·王德威尔得以及其他社会党人所处的地位与汉德逊相同。法国少数派直到1918年7月才变为多数派。意大利社会党是反对战争的，所处的地位不同，而且仍然未因在政府任职而受到影响；但它的主张却很少受到其他协约国社会党人多数派的重视。

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斯德哥尔摩会议问题上，主要情况是，争论的双方在改良还是革命这个总的问题上是站在一边的，只是，或者至少可以说主要是，在将战争进行到底还是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俄国人的情况则不完全是这样。直到1917年第一次革命以前，他们当然几乎都是革命者。但是来到斯德哥尔摩的俄国人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进行过了。他们不再认真考虑进一步的革命，他们的主要愿望是结束战争，以便能集中力量巩固已赢得的一切，并打败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他们不同意列宁的观点：即认为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去完成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世界革命。他们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党人根本不想去推翻本国政府或参加总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结束战争，以便获得机会解决国内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严重困难。因此，他们很容易赞同基本上是不革命的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的目的，并同那些被昆塔尔代表会议斥之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社会爱国者”合作，争取实现不兼并不赔款的和平，即使他们同这些人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或者对西方的议会主义气氛不能够适应。他们虽意识到俄国军事力量已经崩溃，因此需要和平以拯救俄国革命，使之免遭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但他们还是

56 不愿同德国人单独媾和，因为他们料想到加在俄国身上的条件很可能会是十分苛刻的。这就使他们更加渴望全面和平，只要能使俄国第一次革命成为既成事实，几乎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则完全不同；因为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德国的革命，俄国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俄国革命在这一阶段只不过是世界革命风暴的开始时期。除非德国发生革命，他们看

不出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德国人蹂躏他们的领土，并吞波罗的沿海各省，甚至乌克兰，或者至少到处建立傀儡政权，从而使俄罗斯共和国无法站得住脚，并使他们无法抵挡的反革命势力抬头。此外，除当前来自德国的威胁之外，他们确信资本主义强国将会结成联盟反对他们，或瓜分俄国领土，或复辟沙皇统治。基于这些理由，他们迫切需要竭尽全力在西方，首先在德国，煽动革命，认为这是挽救俄国革命的唯一办法。

然而，布尔什维克对单独媾和也有疑虑。单独媾和可以使德国腾出在东线的军队，这就会造成加强德国现政权，而不是帮助德国革命的危险。正是列宁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接受德国可能强加给他们的甚至是最不利的和平条件，因为他看到，要想继续进行战争，而又想保证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不至获胜，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虽然完全知道，根据德帝国主义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与德国媾和是绝对不利的，但他也看到这样做还有一线希望，即同意这样的和平，然后呼吁德国广大群众加以谴责，并起来暴动，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正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意见相反，坚决主张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认为这起码可以暂时在有限的领土上维持革命，虽然他认为，除非西欧或至少中欧迅速爆发革命进行支援，否则即使在这有限的领土上进行的革命，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sup>57</sup>

因此，列宁和这时在他的高明手腕支配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不遗余力地按照昆塔尔会议确定的原则行事，设法使布尔什维克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前奏，而这个革命只不过得到西方国家一些小的革命团体的支持。因为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协约国反战少数派虽迅速壮大起来，但多半仍由一些不赞成列宁所鼓吹的革命理论的人领导，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深为疑虑，他们所考虑和计划的是在自己的国家通过立宪会议的途径来夺取政权，或者至

多是进行一种“革命”，其结果将是建立责任制议会政府而不是建立任何形式的阶级或一党专政的政府。

无疑，在这些大都是人数不多而观点非常革命的少数派团体中，以及在少数派的一般成员中，许多人根本不清楚自己是站在哪一边。但是这些革命团体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控制即使是要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少数派的党派。各国的社会党少数派——实际上还有社会党多数派——要想对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做出任何确切的估计，或者对俄国第二次革命所提供的教训在西方社会党的政策上的影响做出任何评价，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时刻起，尽管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呼声继续变得更加响亮而广泛，但是恢复战前的国际，把它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或作为和平解决的促进者这样的企图，在实际政治领域中已不复存在。试图举行一次既是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同时又是正式和平会议的努力毫无进展。各协约国的社会党继续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俄国人除外——以确定自己的<sup>58</sup>“战争目的”；在中欧强国，对现有政府的挑战也更加严重。但是，企图恢复国际的努力一直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才重新进行，这时表现为三派人之间的斗争：一派人希望主要在旧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一派人支持在俄国领导下新建的第三国际；第三派——起初人数众多——则是一些受到两面夹攻、设法使主要的争论双方达到某种团结的人。

各协约国的社会党人企图就战争的目的确定一个一致同意的定义，是出自种种考虑和动机。一方面，它是由于对战争厌倦，或由于在领导人中间已有人意识到交战双方各国政府实际遵循的政策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批评而产生的直接后果。因为这种政策将会使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方大获全胜，从而能把自己的条件强加在战败一方。即使那些支持战争的社会党人，其中大部分

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政府会在这种情况下本着正义行事，因此准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宣布自己的战争目的，以便让批评者相信，它们不会利用胜利而恣意妄为。另一方面，从俄国第一次革命时起，俄国人就强烈要求立即实现和平，以之作为拯救革命和挫败两个敌对阵营中极端主战分子的手段。此外，在提出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明确要求各交战国社会党人毫不含糊地宣布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愿意采取步骤以结束战争；每个国家的党在答复斯德哥尔摩会议邀请书时，都感到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确切地表明迄至那时为止自己的态度。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英国工党首先拟定了一个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由汉德逊、麦克唐纳和悉尼·韦伯起草，并征询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卡米耶·胡斯曼的意见；这项声明于1917年12月，也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提交给代表工会和工党的一次特别会议审议并经批准。前面已经说过，这项声明的初稿曾经在1917年8月由英国工党提交给协约国社会党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考虑如何答复斯德哥尔摩委员会所发出的请求而召开的。接着，各协约国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反对任何意在准备与中欧强国进行谈判以谋求和平的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然而，到了12月，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不仅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由于《消息报》刊登了秘密和约，根据这些密约协约国政府将采取完全非正义的兼并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工党代表会议批准了汉德逊、麦克唐纳和韦伯起草的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并决定将这项声明提交各协约国社会党，作为宣告它们的共同目的的一项一致同意的声明的基础。稍经修改之后，它接着便得到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赞同，从而成为协约国社会党人共同的政策宣言，要求各协约国政府无论在目前还是在开始和谈时均加以遵守。

59

1

英国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在提交各协约国社会党之前印成小册子，在美国以及欧洲都受到广泛欢迎。印发这个声明之后，接着威尔逊总统就宣布了他的“十四点”；它和“十四点”有许多相同之处，不过它比较更详细，更明确，涉及的范围更广。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件。它体现的关于和平条件的概念，即使那些由于秘密条约的揭露而义愤填膺的批评者深为满意，也使那些主张在世界范围实行一种旨在消除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解决办法的人深为满意；它提出建立一个拥有实际权力，能够在世界事务中伸张正义的超国家权威机构；主张在自决的基础上促进普遍福利；主张采取国际行动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发展。它也使大多数主战的社会党人感到满意，因为它包括了关于完全恢复比利时独立，按照当地居民的愿望解决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以及关于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各族人民实行自决权等项规定。这样，它就拒绝了为和平主义者所要求的“不兼并不赔款”的和平主张，明确主张必须把战争进行到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为止。但是，对此它企图把“兼并”只限于必须根据民族自决的理由；它允许索取有限度的赔款以赔偿战争损失，但不允许一切形式的惩罚性“赔款”。此外，关于帝国主义，它甚至提出应拟定计划，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对热带非洲实行统一的管理和开发；对于国联，它强烈要求必须建立在使之既能防止未来战争，又能在发展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它主张，国联应坚决反对以保护关税和资本主义垄断为手段进行的经济战。它要求采取国际合作行动，保证本着“有饭大家吃”的原则分配世界上的食品和原料供应；它并且主张，对战争损失的赔偿要求，必须由一个国际委员会估价，各国政府应将各自国家人民遭受的损失提请该委员会审定。

这样，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难以达到的目的：使西方各协约国主战的和持中间立场的各社会主义派别的

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当然，这两部分人中间的极端分子不会感到满意。它和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一起，对于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和美国的舆论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加强了各种目的在于求得公正和平的运动，并迫使那些鼓吹战争的人最终不得不缓和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与此同时，它特别对那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谋求和平的人是一次打击，并且使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因为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和平只能是世界革命的副产物，因此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把它看成是社会党人对那些支持各自政府事业的“社会爱国者”的正确回答。如果说可以为协约国社会党人中的“社会爱国者”提出一个理由的话，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就明确而充分地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它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除了那些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外，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这当然也使布尔什维克及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的支持者所更加不能接受。 61

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对事态的发展不可能立即产生任何影响。它通过后不出两个月，俄国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退出了战争；在德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军事上取胜的一切希望之前，要它接受该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各协约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的前景亦属渺茫，因为尽管有“十四点”计划，但就它们来说，除非放弃了把德国彻底打垮的希望，否则也是不会接受上述条件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军由于得到东线结束战争后腾出来的军队的增援，在西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希望在美国能有效地支援西欧强国之前击溃协约国的抵抗；只是到这最后的猛攻被击败，而且加强了潜艇战也受到遏制之后，才真正出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当1918年夏季达到这样的阶段时，“十四点”计划加上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这二者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奥匈帝国崩溃；而德国人民之普遍希望这两个声明有助于使



他们得到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也加快了接着而来的德国的垮台。但德国人民的这个希望由于各协约国政府对德国新建立的共和国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很快就落了空。

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参加起草协约国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这个联合会在塞缪尔·龚帕斯领导下，采取了强硬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通过谈判而取得的和平，并拒绝参加各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所举行的各种商讨活动。协约国社会党人的意图是，他们的代表应当被承认有权参加和谈，并且应当通过与政府<sup>62</sup>间正式和会同时召开的一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由他们的代表将该声明提请和会予以接受。但是当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各协约国政府根本不准备同意工人运动有权参加和谈的要求；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劳工代表会议只能把它的意见向各国政府的代表陈述，而这些代表连这些意见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也断然加以拒绝，答应劳工组织只能参加最后导致建立国际劳工组织的那些专门讨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和平条件和在凡尔赛会议上建立的国际联盟的组织，与各协约国社会党人所要求的毫无相似之处。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在团结协约国社会党人于战争最后一年继续支持——虽然也带有批评——协约国战争努力方面起到了它的作用，但对于在德国军事崩溃后强加给它的那些条件方面，则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李鹏远 译)

## 第三章

63

### 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

俄国于1914年8月作为法国和联合王国的盟国参加了与中欧强国的战争，但是西欧许多人对这样一个盟国只能觉得可耻，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数对这个联盟感到高兴，希望利用它作为使俄国的行为自由主义化和西欧化的工具。米留可夫一派的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热衷于支持这次战争，支持高度沙文主义的战争目的，包括由俄国并吞君士坦丁堡。不仅比较温和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也支持进行战争，但同时反对并吞土地的沙文主义计划，并要求政府应停止迫害政策，使政府具有更能代表政治舆论主流的特征。只有在列宁影响下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革命失败主义”的明确反战态度，号召应利用战争局势来加强革命活动，使之成为实际革命的基础；他们希望这次革命将在所有交战国发生，使无产阶级成为欧洲社会的主人。即使在1914年，当时在布尔什维克中普遍的看法是，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不论将来的俄国革命是属于哪一种性质的革命，他们毫不怀疑，无产阶级将被唤起，在这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应首先把战争看作是实现这次革命的一个机会。

比布尔什维克人数多得多的孟什维克，也不相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认为在俄国所期待的革命，暂时应采取资产阶级的形式。他们同意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经

64

阶段这种看法，不过，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在俄国经济发展足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前保持与资产阶级合作时，无产阶级究竟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关于社会党人对战争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前辈格·瓦·普列汉诺夫（1857—1918年）为首的一派，热烈地站在协约国一边，极力主张必须打倒中欧强国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解放奥匈帝国属下的人民，并把俄国人民在民主主义和西方“进步”的事业中团结起来。尤利·马尔托夫（1873—1923年）领导的另一派，则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认为所有进行战争的国家，都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共同罪行，主张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首要义务，就是努力早日实现尽可能建立在社会正义和承认一切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利的基础上的和平。多数孟什维克在这两种看法之间犹豫不决，或者由于俄国军队遭到一次接着一次的惨败，以及社会结构在战争的重压下明显地开始分崩离析，被迫趋向于第二种观点。

普列汉诺夫支持协约国的事业，是对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元老”，并且作为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受到高度的崇敬。况且，他是一个这样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中受到极大的尊敬，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极密切的联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极为尊重的。作为列宁早年的老师和《火星报》初期最杰出的合作者，他在布尔什维克以及孟什维克中，尤其是在那些仍然希望社会民主党的裂痕能够得到弥合的人们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

社会革命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纯的一个派别，而它的全部追随者，比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农民政党，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虽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虽然直到最近他们还采取了与个人恐

怖主义一致的政策<sup>①</sup>，但他们许多在社会和经济愿望方面也拥有许多温和的追随者，并且与在地方自治局中积极活动以及促进合作社活动的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有着联系。但是在另一个极端，他们中间还包括许多近似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社会革命党组织十分涣散，它比社会民主党的两派都拥有多得多的广泛分散的追随者，而且发展到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每个地区。它的大部分追随者，对当地问题要比对全国或国际性的问题更加清楚，他们是一群永远在骚动中的群众，而不是一个能够制订出共同政策的紧密团体。战争之所以对这些人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大批的农民不断应征入伍，离乡背井去为战争服役，还由于农村在供应城市和军队以粮食方面，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固然，他们的领导人大部分是一些对全国和国际性的问题都有见地的受过教育的人，但是追随者们并没有或很少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具体采取什么态度。而实际上，党内一直存在着最广泛的分歧。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尽管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人数很少的劳动团同他们极为密切，可是正如少数其他代表所说的他们没有或看不出是从属于哪个党那样，他们并不代表一个政党。他们大部分人在地下进行活动，竭力注视农民的不满情绪，做为进行社会革命的手段。他们希望这种社会革命以农民群众为基础，工业无产阶级则起着虽然重要，但只是属于第二位的作用。

从1914年起，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同他们松散地联合的团体，比大多数孟什维克更加热情地 and 一心一意地拥护协约国的事业。特别是围绕在老资格的尼·瓦·柴可夫斯基（1850—1926年）和费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1846—1914年）周围的各民粹派 66

---

<sup>①</sup> 从1906年起，社会革命党人正式禁止党中央当局同意在具体事件中采取恐怖主义，并且拒绝了一些党的地方组织煽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行动。

团体，以及其他许多在巴黎和伦敦避难的流亡者，情况更是如此。但有的社会革命党人走向相反的极端，他们象任何布尔什维克一样强烈地反对战争，同样准备利用战争作为采取革命行动的机会，包括使自己的国家在战争中失败。如前所述<sup>①</sup>，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时候，社会革命党就已经分裂为最高纲领派和最低纲领派。当该党大多数人停止采取恐怖行动后，他们的左翼仍继续鼓吹采取恐怖主义。1914年没有再发生正式分裂，然而，该党的左翼，尽管同布尔什维克的动机不同，但采取了同布尔什维克相同的反对战争的革命态度，在十一月革命<sup>②</sup>之后，曾一度同布尔什维克联合在一起。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还有许多中间派，从追随者主要是农民的维克托·切尔诺夫(1873—1952年)一派，到克伦斯基的劳动团；在对战争的态度上，则从支持协约国，到采取与马尔托夫的“国际主义”相似的立场。

在1911年9月斯托雷平被刺后的一段时间，沙皇政府坚持采取反动的方针。斯托雷平的继任者弗·尼·科科夫策夫伯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官吏，他求宠于宫廷，即使对国家杜马中占多数的保守分子，也丝毫不设法与之合作，使杜马与他完全对立。在他的统治下，沙皇皇后得以把她的反动观点强加于人，而且任命一些死硬的反民主分子担任重要职务；可憎的拉斯普廷的罪恶影响，也才得以迅速增强。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最终也许会出现少数生活比较充裕、技术进步和反对革命的农民，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农民身上；另外也许会有一部分土地采用改进的、更接近资本主义的耕种方法，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但是，在眼下，大部分农民由于人口愈来愈增加，他们所持有的有限的土地更加难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境况是越来越坏。斯托雷平在摧毁旧的集体所有制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471页(中译本第481页)。

<sup>②</sup> 这里按公历称“十一月革命”，即“十月革命”，下同。——译注

和耕种制度，以及把一大部分土地转为个人所有方面，大体上是成功的。然而在当时，这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大多数农民对于采用这个较好的方法既没有必要的知识，又没有必要的财力，而且他们所持有的那些小得可怜、往往又十分分散的地块，都是些不毛之地。结果，在政府对1905年革命进行残酷镇压后出现暂时宁静之后，农民骚动马上又开始高涨，而且后来又遭到象以前那样的无情镇压。在城市、在产业工人中间骚动也迅速扩大；对这种情况也是一样，把越来越多的罢工和骚动的罪责都加在工会和进行鼓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头上，对他们采取了凶暴的镇压手段。从1912到1914年，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工业中心，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在战争爆发之前，事态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一场新的革命。

这几年，在高级官员中，特别与军事当局有关，由于贪污腐化而发生了一些情节严重的丑闻。在国外，俄国企图奉行帝国主义政策，这就引起了沙皇政府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在巴尔干问题上。俄国人从旁煽起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希望这次战争能增强他们在整个近东的影响而从中得利。但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列强举行的谈判中，他们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保加利亚走狗们的失败，在外交上遭到严重的挫折。当时，沙皇政府知道，不从西方盟国得到支持的保证，它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战争的。它想到的只是失败的痛苦，并不甘俯首贴耳地任凭奥国或德国进一步进行侵略。因此，1914年在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俄国竟采取冒险的步骤，站在支持塞尔维亚人的一边，把德国卷入冲突，从而把法国以及不久把英国都作为它的盟国而拖入战争。俄国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一场世界大战的，可是它对这次战争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不仅因为它的军队的情况极糟，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它的生产资源和运输工具完全不能适应紧张局势下的

需要。俄国人不仅缺乏持久力，也缺乏迅速调动军队的手段。他们能做的只是把一大批训练很差、装备低劣、服装褴褛、粮秣不足<sup>68</sup>的新兵送上战场，而无法使他们得到足够的供应。这些乌合之众，靠协约国支援的供应，可以靠人海战术取得一时的军事胜利；但是，尽管士兵个人在战斗中非常勇敢，还有不少有能力的军事领袖，然而他们不得不对付在组织和供应方面优越得多的军队的持久对抗时，他们是无法坚持到底的。

俄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设法同各个愿意在战争努力中进行合作的党派和团体共同分担责任，反而利用战争作为加强镇压的时机。1915年春遭到惨败之后，军事形势和国内情况都迅速恶化。固然，曾经试图团结各个较富有的阶级支持国家的努力，并临时组织志愿军，以便在国家危急时刻协助国家；由李沃夫公爵领导的地方自治局，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包括专业阶级的一些人的支持下，做了一些工作，组织医院服务和必要的供应。但是，由于政府和宫廷麻木不仁，这些努力多半毫无成效。在宫廷中，拉斯普廷比以往更加得宠。不久，沙皇前往前线亲临指挥，更主要的是为了逃避首都令人窒息的气氛。但这丝毫未能抑制政府的行为，或挽救行政管理工作的垮台。1916年期间，不断有士兵从前线逃回，饥饿的士兵开始流窜到农村搜寻食物。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被政府用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下去。从战争爆发即停止工作的国家杜马，在1916年重新召开，处理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它关于建立一个较负责的政府的要求，却无人理睬。军队和半饥饿的城市居民，差不多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越来越临近，可是似乎没有人来领导。各派的杰出社会主义领导人，大多数被关在监牢，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流亡在国外。各反对派资产阶级政党，除米留可夫及其在立宪民主党人中的追随者外，<sup>69</sup>大多数对领导一场革命没有准备，认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掌握这样

的革命。特别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在战时进行革命难免不背叛他们所支持的国家事业。而且，一旦革命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就有与俄国赖以得到战时供应的盟国发生决裂的危险。因此，月复一月，除了军事上遭到新的失败和国内情况愈益急剧恶化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其结果，革命没有计划，没人领导，而径直地发生了。革命是由于面包引起暴动而形成的。军队本来是被派来对暴动进行镇压的，但实际上，是士兵进行了暴动，不是在前线，首先是在彼得格勒（战争爆发后圣彼得堡改用这个新名称）。1917年3月以前，就已经发生多起兵变，但都是偶然发生，而且都被镇压了下去。沙皇军队中最可靠的哥萨克部队，仍然忠于他们的军官。突然之间，并没有特殊原因——苦难、挫折和感到受了一个无能和残暴的政府的愚弄并作了它的牺牲品，这些几乎算不上是什么特殊的原因——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拒绝服从命令，并开始向该市附近进军，几乎不知道要做什么。各工厂的工人拥向街头，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一些领导人站出来，根据他们个人的倾向，发表热烈的演说。士兵本来是调来驱散市民的示威游行的，但他们拒绝服从命令，举行哗变，很多士兵把他们的武器交给徒手的工人。叛变的士兵占据了主要建筑物，但仍然是没有计划，没有领导中心，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办。国家杜马完全被这场暴动惊呆了，不知所措。它的成员大半是维护君主制度的反动分子，其中有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那些主张立宪的地主所有制拥护者和大的金融界；立宪民主党则是由较进步的地主、实业家、商人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阶级组成的政党；这两个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比右翼党派要少。剩下来仍然在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团分了仅占有极少几个席位。但是，总得要做点事，而即使在这样一个国家杜马里，对

70



沙皇政府的愤怒情绪亦甚强烈。当从各方面传来政权已整个垮台的消息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认定除了沙皇退位之外，已别无他途，为此派密使到陆军总部提出这一要求。然而他们所希望的是废弃这个君主而保留君主政体。沙皇在密使的坚持下同意退位，并指定他的儿子为他的继任者，旋又改变主意，代之以米哈伊尔大公爵。参加国家杜马的各政党成立了临时政府，以地方自治机构的首领、温和派贵族李沃夫公爵为总理，十月党领袖亚·伊·古契柯夫为陆海军部长，立宪民主党人巴维尔·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代表左翼的亚力山大·克伦斯基（生于1881年）为司法部长。这个内阁（最初没有克伦斯基），实际上是在沙皇退位前一天仓促组成的。之所以要急速组成一个内阁，是因为在同一天出现了一个敌对的机构，唯恐这个机构会向国家杜马的权威挑战，并把革命推向前进，而不是把它阻止在已经达到的阶段。这个新的机构就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的成员是由它在团队和工厂的小组的士兵和工人中直接选出来的，选举他们的小组随时可以把他们免职和更换。

在危急的8月的日子里突然出现的苏维埃，自然使人回想起1905年伟大的日子，那时一个类似的工人代表组织（没有象苏维埃那样以团队的支持为基础），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在革命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sup>①</sup>正在努力发出命令和指示以纠正暴动的完全无组织状态的工人领袖们，自然一定会想起这个先例并加以利用。这样一个机构的出现，自然也一定会在国家杜马中的各党派领袖的心中产生强烈的预感（无论他们是想摧毁革命，或仅仅想防止革命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并利用它作为工具，在改头换面的沙皇制度下面建立一种立宪政体。在国家杜马的核心政党十月党人、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464页（中译本第474页）。

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进步派看来，马上需要进行的是建立某种能够使广大文职机构和军事领袖继续效忠的立宪政体，来管理国家，并继续进行战争。新政府最好是在一个新沙皇统治下进行上述工作。这个新沙皇准备作一个立宪君主，并承认革命为合法。但是，米哈伊尔大公爵比政治家们更加了解人民的心情，拒绝继承皇位，使李沃夫公爵的政府在没有他的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应付未来。

于是，新政府发现自己违反原来的愿望而成为一个共和政府，它的权威不得不依靠革命所产生的力量来维持。它暂时做到了使文官们继续效忠，使军队的指挥官们给予支持；而且经过一个星期的忐忑不安之后，也得到各协约国政府的承认。各协约国政府焦急地注视着俄国事态的发展，担心俄国新的掌权者会拒绝继续同德国人作战而单独媾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东线的德军将可调到军事压力已经十分严重的西线；美国若不参战，中欧强国肯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即使美国人参战，他们是否能及时赶到，挽回败局，尚在未知之数。因此，西方协约国政府认为，只要能使俄国继续进行战争，其他考虑都是次要的；只要是继续承担沙皇对三国协约所承担的义务，什么样的俄国政府均可接受。他们一直以沮丧的心情注视着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和极端恶劣的弊政而日益分崩离析的俄国，他们肯定不喜欢那种腐败、无能、反动透顶的沙皇制度。但是俄国革命也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唯一的想法是使这场革命停止在一点上，即让俄国人继续承担义务，进行与中欧强国的战争。

在法国和英国，不仅工人阶级，而且最开明和进步的人士，长期以来就对俄国这个盟国存在着种种担心。而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更使它在西方政界不仅是进步分子，而且是较保守的分子中，十分不得人心。各国的工人阶级，都热情洋溢地欢呼俄国

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也对它表示欢迎，希望俄国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又有一个新的大国站在议会民主事业的一边。只有极端反动的人才对俄国革命的胜利表示反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包括协约国政府多数领导人，他们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因为他们担心俄国革命的胜利将影响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些人，不管他们的感情如何，在公开场合都不得不对俄国新政府表示欢迎，希望能劝说它继续作战，甚至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以便减轻西线受到的严重压力。

西方各国在彼得格勒的大使馆的人员主要是同反动分子来往密切，很少了解俄国各族人民的感情，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消息十分闭塞，对于俄国国内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对俄国甚至早在沙皇制度出人意料地消失以前，已经混乱到何等地步，几乎毫无了解。它们相信，俄国新政府既已得到军事当局和文职部门的效忠，一定能够控制那个国家的形势，至少不会比它以前的那个无能的政府统治得更糟。最初，他们对俄国出现了一个敌对的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没有十分重视，因为它还没有声称自己就是政府，或夺取权力来反对李沃夫公爵及其同僚。他们不了解，在彼得格勒，军队的命令除非得到士兵选举的他们的代表的赞同，各团队是服从的；或者，类似彼得格勒那样的苏维埃，不仅在工人和农民的集体中，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军队中，均已到处出现。诚然，这许多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样，都还没有声称自己拥有政府的权力，或完全清楚地知道它们要做些什么。然而，它们合在一起却构成革命所产生的真正力量，而临时政府，即使苏维埃还没有正式向它的统治权提出挑战，但只是空有权力，没有苏维埃的支持，就无法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在1917年的俄国形势下，苏维埃确实是一种极为有力的革命工具。它直接产生于每个地区的劳动者中间，这些人曾受独裁政

府的严重压制，现在正热心地学习如何为自己谋利益。此外，它完全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天天在根据工人群众的态度或意见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取得了信任，因为它的每个成员如果不能反映他的选民的看法和要求，就不能确保自己的职位。它完全不象议会或任何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有法定期限的机构，因此它可以暂时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做，即使违反选民的意见亦可。这无疑意味着，只要它保持本来的性质，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但是在当时不得不面对的形势下，这种不稳定正是它的力量的根源。

起初，在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地方新成立的苏维埃，大部分由一些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无名分子所组成。但是，在成员中自然也出现了一大批在当地积极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不断从西伯利亚返回的流放者或从国外返回的流亡者，特别是在农业地区，一些跑回自己村庄的新兵——通常都是些逃兵——更加强了上述好斗分子的力量。开始并没有协调一致的中心组织。每个地方苏维埃都是独自进行工作，对别处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但很快开始建立了联系，不久便出现了某种中心组织。先是大小不同地区范围的地方代表大会，接着就同时出现了俄罗斯帝国各地的代表组成的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整个三月革命<sup>①</sup>的初期各阶段，各个苏维埃，包括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内，都是由一些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着——在 74 大的城镇，特别由孟什维克控制着。来自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领袖尼·谢·齐赫泽（1864—1926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布尔什维克只不过占少数。这是列宁4月初从瑞士回国后面临的形势，一个月后托洛茨基从美国回来时，局势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此外，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些集团既拒绝同

---

<sup>①</sup> 这里按公历称“三月革命”，通常称“二月革命”，下同。——译注

布尔什维克派站在一起，也拒绝同孟什维克派站在一起。在这些集团中，有围绕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和他的报纸《新生活报》周围的一派，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更加重要的还有区联派，这个组织是由托洛茨基在国外支持下于1913年建立的。区联派中有一大批在革命前即已闻名的杰出领导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年)、达·波·梁赞诺夫(1870—1940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阿·越飞(死于1923年)、德·曼努伊尔斯基(生于1883年)、莫·乌里茨基(1873—1918年)和弗·沃洛达尔斯基(1881—1915年)——另外一些人后来则成为新的苏维埃国家的卓越工作者，如列·加拉罕(1889—1937年)。这个派别实际上主要是由一些演说家和领袖人物组成的集团，它没有很多的或明确的群众追随者，但它却产生相当可观的影响。它是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之后(那时他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倾向的一个集团。在它同布尔什维克合并之后，托洛茨基不久就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在列宁的支持下，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及领导十一月革命的主要人物。不过，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之后，有一个时期区联派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派别，对列宁为争取犹豫不决的布尔什维克党而采取的新政策，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但不同的是不准备马上把孟什维克多数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而开除出党。

在列宁回到俄国的当时，对布尔什维克来说，重大问题是他们的任务是推进什么性质的革命。根据传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样还有孟什维克，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俄国经济极不发展，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必须暂时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社会党人不应企图成立政府，而应为了工人的利益独立地向政府施加压力。然而，从李沃夫公爵组成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基础的75 第一届政府起，事实已经很明显，这两个政党缺乏行使真正权力

所必需的群众支持；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成立初期起就决不仅仅是一个从外面影响政府，向它施加压力的集团。不久，苏维埃实际上已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作为独立的政权行事，例如，在政府发布命令时，如果不得到它的批准，团队和工厂的工人是不会服从的；又如它可以迫使政府发表与自己的真正观点完全相反的声明。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权力机构并存的局面，至少到6月间已变得非常重要，这并不是因为苏维埃有意造成这种局面，而是因为掌握权力的现实状况，已使得这种局面成为政府继续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一届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完全不准备接受任何使苏维埃永远分享权力的局面。特别是十月党人，反对承认苏维埃有任何独立的权力，希望回到以前的国家杜马，给予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以某种合法性。他们的领导人古契柯夫，作为陆海军部长，决心要恢复军队的纪律，取消团队的苏维埃，因为没有它的同意，士兵拒绝服从军官的命令。他失败后辞职，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的地位难以维持下去。

但是，对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最后打击，来自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他作为外交部长，对协约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时竟宣称：新俄国将继续完成旧俄国的战争目的，并恪守体现了这些目的的各项条约。这一声明将使俄国承担义务，拥护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而将战争进行到底。它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回轮到米留可夫不得不宣告下台，整个政府亦随之而解体。接着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政府解体后用什么来代替？资产阶级政党，没有社会民 76  
主党人的支持，显然不能再组织政府，那么，社会民主党人能同意和它们成立联合政府吗？或在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辞职后同剩下的人组成联合政府吗？唯一的代替办法看来是成立一个完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或者完全没有政府，而完全没有政府将意味着苏维埃将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苏维埃并不是

按照它们能承担这种权力而组织起来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社会主义政党丝毫还没有打算成立政府，因为军队领导人和文职官员们有可能拒绝承认或服从这样的政府。诚然，布尔什维克这时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且也拒绝同资产阶级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小的；真正考虑如何应付这种局势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他们之中多数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这并非因为他们喜欢联合政府，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另外的办法。实际上，他们决定支持一个仍旧由非社会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领导的新的临时政府，阁员中社会民主党人占少数。确实，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觉得接受这样一个联合政府，要比接受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占领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容易。这有几条理由。一个在他们看来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一个主要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几乎不可能不遵循广泛的社会主义方针，而孟什维克却无论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坚信，在俄国实行这样的方针，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有一个能促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政府。第二个理由是，政府需要得到武装部队的继续服从，即使不是忠诚的拥护，而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三个理由，我认为是，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害怕在他们不得不遇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行使权力；他们许多人还希望有这样一个政府：苏维埃能够对它进行批评，必要时能对它实行强制手段；而不希望有一个他们不得不作为自己的代表而加以承认的政府。

77 无论如何，第二届李沃夫政府总算组成，有8名非社会主义者阁员和6名社会主义者阁员。社会主义者阁员中，克伦斯基任陆海军部长，维克托·切尔诺夫(1873—1952年)任农业部长，马·伊·斯科别列夫(1885—1930年)任劳动部长，伊·格·策烈铁里

(1882—?)为邮电部长。这些人中，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是社会革命党人，策烈铁里是一个主要的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以前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作为孟什维克曾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积极进行活动。

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紧紧控制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当新的临时政府上任时，尚未召开；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交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决定。经过辩论，绝大多数同意参加，在辩论中，托洛茨基(在他回到俄国的第二天)表示，他觉得这种联合存在着危险，他坚信，下一步骤必须是将全部权力掌握在苏维埃手中，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表。他说，联合政府并不是结束两方面控制权力的局面，只不过是把这种局面转到政府本身的内部。托洛茨基就这样第一次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同盟者公开出现，不过他还没有充分理会到这一点，因为他尚未发现列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朝着以前托洛茨基自己的政策的方向转变。在过去，列宁坚持认为俄国革命首先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托洛茨基，如前所述<sup>①</sup>，则辩称，事态发展本身的严重压力，将迫使工人挑起领导的责任，使革命成为他们自己的革命。这时，列宁也转变到这种观点，于是不顾加米涅夫的反反对，说服他的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意味着向临时政府宣战。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已经完全转变到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党的正确组织形式的问题上和对待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他们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列宁已经改变了他对俄国本身的这场 78 革命的性质的看法，主要因为他看到，由于战争，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使革命倒退的正当理由，因为不应再把俄国革命看成是单单依靠自己，

---

<sup>①</sup> 见第8卷下册，第955页(中译本第427页)。



而应看作是由战争提供机会而将发生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宁认为,即使俄国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但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则是已经成熟的,他认为,俄国人所处的环境,促使他们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驱,并唤起较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学习他们的榜样,推翻自己的统治者,自行夺取政权。这是将 1916 年昆塔尔代表会议通过的政策应用于 1917 年的俄国。俄国无产阶级尽管落后,但要是这样有利的环境下,把俄国革命只看做是自己的革命而停步不前,这将对世界革命的背叛。虽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循序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现在这应当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控制下来完成。这将需要有一个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由无产阶级代替资本家作为控制和领导的力量。

不论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在当时都还是无人理睬的主张。当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6 月初召开时,六分之五的代表不是孟什维克就是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左翼团体只占全部代表的一小部分。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告诉代表大会,作为由苏维埃所体现的工人权力的直接表现,社会民主党人成立自己政府的时刻已经到来,但他们的话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托洛茨基在大会上说,立宪民主党人和其余的资产阶级派别,已不再拥有任何重要的追随者,现在是把它们清除出去的时候了。当然这样作将会意味着,如果大会接受他们的意见,政权就不会落到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盟者手中,而是仍然落到已在政府中有代表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各温和派别的手中。但是,这还将意味着,阁员们将明显地变得适应苏维埃的目的,而苏维埃的组织成分将要不断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愈来愈迫切地要求和平,而且由于士兵和农民不同意把解决土地问题留待还没有进行选举的立宪会议在能够处理的时候去

处理，阁员们将不可抗拒地被迫向左转。任何拒绝同意随便哪一个要求的阁员，很快就会被一些比较能适应工人和农民的情绪并满足他们的愿望的人所代替。

不仅社会主义者阁员们，而且支持他们的各政党，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因此，鼓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一些人落选，临时政府得到代表大会的赞同。左派的处境确实困难。在大会上，列宁要求社会主义者阁员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成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这样将意味着它是一个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政府，向这两个政党占压倒多数的机构负责。对这样一个政府，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支持者只有继续进行反对，但是只要它具有得到苏维埃的支持这个牢固基础，要反对它是很困难的。但是，在那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再提不出其他任何方案，因为列宁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完全反对在他们得到苏维埃，至少是主要中心城市的苏维埃的多数人的支持之前，去夺取政权的任何企图。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要求马上采取行动，用暴力推翻政府，即使它有苏维埃的支持。这些分子辩称，尽管苏维埃投票拥护政府，但各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对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政府同协约国联合继续作战的政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的，谁答应给他们以和平和土地，他们就会一致支持谁。另一方面，列宁知道，虽然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意见正在急剧向左转，并且完全有可能通过政变推翻政府；但是各省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彼得格勒举行政变成功，只能使首都孤立而使其他地方的反革命势力抬头。因此他坚决主张停止前进，因此当左派计划举行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完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政府，遭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制止时，他说服他的党同意大会这个决定。于是，苏维埃的大多数人着手组织自己的群众示威游行，队伍将通过大会会场。示威游行于6月18日举行，当时，使

组织者感到惊讶的是，示威游行群众，或大部分示威游行群众，竟举着旗帜，要求非社会主义者阁员辞职，由苏维埃取得全部政权。但这次示威游行秩序井然，并没有人企图把它变成一次革命政变。它只有助于表明，在彼得格勒，人们的意见，同不久前被选举出来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态度，已有多大的距离，也说明联合政府地位是多么不稳定。

李沃夫政府，在社会主义者只占少数的情况下，从6月末一直持续到7月。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发动了一次考虑不周的军事进攻，这次攻势马上就显示出从沙皇政府接管过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已所剩甚微，后方分崩离析的情况也愈来愈严重，而社会主义者阁员继续表现出他们的无能。接着在新的一个月的月初，便发生了“七月事变”，关于“七月事变”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的争论。士兵和工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根据统一的命令行动，再次拥上街头，要求——并没有明确的中心——面包、和平、政府辞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当时不少人，包括许多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说（也许是相信），“七月事变”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阴谋夺取政权而造成的。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证据，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相反，事实似乎十分明显，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未能或许是不愿意阻止示威游行，他们尽可能地防止这些示威游行导致一次革命政变，因为列宁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些比较慎重的成员，觉得局势尚未成熟。士兵和工人中发生了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运动，其基本的原因似乎是：粮食和其他供应品日益严重不足；物价不断猛涨；以及彼得格勒的居民由于军事攻势失败所增加的额外军队需要而更加普遍贫困。由于贫困，就愈来愈迫切希望和平，谴责继续进行战争来支持英国和法国，谴责俄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同时愈来愈感觉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一个仍由立宪民主党为主要政党的政府，

丝毫不起作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时存在，但后者在促进群众运动发展方面，似乎更为重要。属于不同集团的示威游行者的无目的和不协调的行动，似乎说明并没有任何统一的领导，而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不知道该做什么，当士兵返回营房，工人回到工厂后，运动也就销声匿迹了。但是“七月事变”尽管没有达到高涨即宣告结束，然而在许多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形势；而且，由于几乎在它结束的同时，传来了军事进攻完全失败的消息，就更加如此。接着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不仅谴责他们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起义，而且谴责他们是德国的代理人，应对军事上遭受惨败负责。不仅列宁，而且还有托洛茨基和其他许多人，都被公开指责为德国间谍。据说列宁曾乘坐一列密封的火车通过德国，而且从德国人那里拿到金钱来瓦解战争努力，这种说法广泛流传，证明对他的指责是有根据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列宁确实从德国人那里拿到过钱，并且德国人曾帮助他回到俄国，他也尽可能地阻止进行战争，并在武装部队中煽动叛变，不过他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推行他自己的革命宗旨。但无论如何，这些指责一时曾大大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名誉，并缩小了它得到的支持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大批被捕入狱，不久，逮捕就扩大到被认为是同情他们的另外一些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即使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也不得不从政府辞职，因为他参加过1915年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尽管实际上他是极力支持战争努力的。反对左派的叫嚣甚嚣尘上，但是，与此相比，李沃夫政府的地位也由于军事进攻的彻底失败而最终摇摇欲坠。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被迫退出政府，但克伦斯基当上了新联合政府的总理，在这个新政府中，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首次担负了重要的职务。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经过一番踌躇，并在他们党内同事的压力下隐蔽了起

来。剩下来好由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来试显身手，驾驭这场风暴了；但他们可能得到的任何机会，都由于他们继续在政府中与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并坚持继续进行战争而受到致命的挫折。

立宪民主党人方面，则因为他们政府在政府中的作用每况愈下而极为不安；在“七月事变”之后出现的反左派狂潮中，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开始以反革命的主张哗众取宠。这些人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投身于伙同协约国继续进行战争，深信西方的议会制度是俄国政府唯一的正当基础，他们看到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走向按照德国的条件同它单独缔结蒙受极大损失的和约，走向由苏维埃统治国家。他们虽然与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主张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决定俄国将来政体的立宪会议，但他们又不愿意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因为他们知道，在选举中他们本身的力量是薄弱的，担心立宪会议的组成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之中许多人开始认为，恢复正常状态——即回到自由的议会政府——的唯一办法，也许在于通过一场他们希望不致发展过火的反革命，并企图以此破坏整个革命。

83 然而，反革命只能来自军队的将军们和军官们，而且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即使这些人带头这样做，士兵们是否会跟着走。而即使他们愿意跟着走，对战场上的将军们来说，要命令他们的军队离开前线，掉过头来对付他们自己的民众，也是不容易的。政府可选择的较好办法，并非公开进行反革命，而是支持一些可靠的军队，来反对构成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主要部分的怀有不满情绪的团队，可能的话，把这些分子从首都调走。但是，卫戍部队各团队拒绝调动；于是，克伦斯基企图从前线调回更加“可靠的”部队，而这只不过是给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乱铺平了道路，在他失败以后，又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

当然，不是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想都转向反革命。他们之中不少人赞成社会改革，并不希望看见又退回到以前腐败的沙皇专制制度。有些人甚至成为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同时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以及由苏维埃统治国家的威胁。但是在那些感觉到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垮台而向左转的人们中间，大多数继续支持俄国参战，并把战争联盟看得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把俄国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以此为典型，重建沙皇政体的国家。这些人依次支持每届临时政府，对武装部队受布尔什维克立即媾和的颠覆性宣传的影响而愈来愈四分五裂的情况，摇头叹息。

当时，构成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并由于拒绝对示威游行采取行动而导致二月革命的士兵，是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同盟者不断进行宣传的目标。这些士兵以自己的行动推翻了沙皇，而且建立起他们的军官不敢不服从的苏维埃，因此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即决定应接受什么样的命令，拒绝什么样的命令，特别是，究竟是听任自己被调离彼得格勒去参加新的军事进攻呢，还是坚持自己的任务是驻守首都，以便在必要时保卫它；如果德国进犯，就抵御德国人，如果反革命进犯，就打击反革命，甚至如果临时政府企图用暴力镇压工人，就对付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设法把这些卫戍部队的士兵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具备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些士兵中间，几乎没有人愿意积极参加作战，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宁愿待在彼得格勒，因为这里军纪松弛，并且由于他们在革命中的行动，在群众中享有威信。为了对付德国的进攻而必须保卫彼得格勒时，他们是准备去作战的，但不准备为了他们不相信的事业而被送到前线去吃苦，或者被反革命阴谋家或可疑的政府利用来镇压工人。这种态度使他们愈来愈对彼得格勒苏维埃派来的使者表示同情，愿意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但对布尔什维克则

不是这样。当苏维埃逐渐倒向布尔什维克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各团队才同布尔什维克趋于一致，直到在准备十一月革命的最后阶段，其中大多数响应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参加了反对克伦斯基的政变，使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同盟者取得了政权。但是，当科尔尼洛夫叛变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事实上，在科尔尼洛夫叛变前，克伦斯基企图把比较“可靠的”的部队从前线调回首都，和以后发生的叛变本身，在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队转变为第二次革命的帮助者和煽动者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我所知，导致科尔尼洛夫企图发动叛乱的原因，从来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当时布尔什维克指责克伦斯基纵容了这次叛乱。但不容怀疑的事实是，当科尔尼洛夫真地扯起反对克伦斯基的叛乱旗帜时，克伦斯基求助于他能够号召的一切援助来镇压这场反革命。自从“七月事变”以来，克伦斯基就极积地迫害布尔什维克，  
85 并解除工厂工人赤卫队员骨干的武装。但是当科尔尼洛夫一宣布打算进军彼得格勒并扑灭革命，政府不得不马上呼吁苏维埃阻止科尔尼洛夫前进，并呼吁卫戍部队和持极左态度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团结一致，保卫政府。当时，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者，在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上有些为难。虽然他们根本无意保卫克伦斯基或他的政府，但是他们更不能容忍以武力扑灭革命。当喀琅施塔得水兵派代表团到监狱会见托洛茨基并征求他的意见时，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是保卫革命，反对革命的敌人，即使这意味着在紧急关头帮了克伦斯基的忙。水兵们响应了他的号召，各团队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也是如此。科尔尼洛夫并不是在战场上失败，而是由于主要由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者进行的宣传而失败的。科尔尼洛夫的士兵，在推进到差不多接近首都边界之后，没有进攻首都，而是四散而去，使克伦斯基名义上取得了胜利，然而实际上几乎丝毫没有办法对付迅速增强的左翼

力量。留在政府里的立宪民主党人部长们辞去了政府职务，抗议克伦斯基求助于左翼“叛徒”来对付科尔尼洛夫的叛乱；社会民主党人部长们也辞去政府职务，因为他们对据说克伦斯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前曾与之同谋表示不满。克伦斯基无法组成一个孚众望的内阁，在一个代表性非常小、几乎得不到民众支持的小小“执政内阁”的帮助下，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尽力设法进行统治。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真正性质和意义是什么？毫无疑问，它的目的是消灭在彼得格勒占优势的反战分子，并使俄国在独裁政权的领导下重返战争，但并非一定要恢复沙皇统治。科尔尼洛夫似乎相信独裁统治更甚于相信沙皇专制政体。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得到萨温科夫的支持。萨温科夫以前是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派领袖，当然不会赞成沙皇统治，因此克伦斯基无论如何是反对他的。事实似乎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失败，大大增强了布尔什维克，使所有右翼党派失去信任，不管他们是否真地与叛乱者有牵连，甚至不管他们赞成与否。克伦斯基明白（如果说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明白的话），倘若科尔尼洛夫占领了彼得格勒，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内战，而在这场内战中他的政府以及他维护的中间道路均将被清除，因此他向左派求助来对付叛乱。然而其结果是，左派击败科尔尼洛夫之后，获得了民众极大的尊敬，而克伦斯基却几乎一下子就把他作为军事进攻的鼓吹者在军队中明显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丧失殆尽。直到叛乱发生，克伦斯基一直受到一种爱国情绪的支持，但军事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几乎在同时遭到失败，使他既失去了右翼对他的支持，而又未能在叛乱过去以后，得到左翼对他的任何继续支持。切实而论，这些正是从8月以后人们的支持转向左翼这个大转变的直接原因。科尔尼洛夫和战争努力的失败，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扫清了道路。

科尔尼洛夫失败之后，迄至那时为止一直由孟什维克控制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态度上有了巨大的改变。11月4日，托洛茨基被保释出狱，5天之后他在苏维埃提议，作出对孟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主席团不信任的决议，使很多人惊奇的是他的提议竟获得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终于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由他们控制的新主席团代替了以前的主席团；9月23日，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为主席，从而又把他提到他12年前曾颇为令人注目地担任过的职位。此后不久，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效法彼得格勒的作法。“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于是“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及其亲密盟友！”，而不再是“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不同，他还无意要求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是通过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的合并而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一名党员，同时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的。他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坚决主张在新的苏维埃主席团中，应  
87 根据每个党派的人数来确定其代表人数。他不象列宁那样，准备把所有反对过布尔什维克和主张全部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温和政府或甚至主张再设法组成联合政府的人，都作为反革命叛徒而加以清洗。列宁从他隐蔽的地方，连续向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提出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看法，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已经到来。但是他仍然要求由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负责来组织新的革命，并在苏维埃中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追随者，以便把新的秩序直接建立在苏维埃权力的基础上。根据这种主张，他着手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组织成一种既是民政的、也是军事的政权机构。10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实际上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主要组织者，虽然在开始时它的主要目的是保卫首都，抵御德国可能发动的攻击。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在寻求一种代替办法，以苏维埃为外表，在这个外表下面政府继续进行工作。9月14日，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召开了一次“民主会议”，代表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性的，成分极为复杂的团体（包括地方自治局和合作协会），商讨应当怎么办。左翼的代表在托洛茨基发表了挑战性的讲话之后，退出了会场；从这次会议产生了所谓的“预备国会”，宣称它是尚未选举的、将决定俄国前途的立宪会议的先驱。在左翼退出之后，民主会议经过表决以微弱的多数赞成组织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但同时拒绝再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因为他们之中许多人与科尔尼洛夫事件有牵连。克伦斯基不顾上述投票结果，着手组织了一个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新政府，但它的权威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一旦苏维埃准备推翻它，它将任由苏维埃摆布。

9月21日，当新政府开始执政时，无论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还是布尔什维克，都还没有完全下决心将其推翻，尽管列宁坚决主张推翻它。两天之后，托洛茨基才成为苏维埃的主席；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则由于内部分歧而严重分裂。其成员中与列宁一起隐蔽的季诺维也夫和未被捕的加米涅夫，都强烈反对马上举行暴动。季诺维也夫请求执行委员会允许他不再隐蔽，以便出来反对列宁的方针；加米涅夫则一贯地对马上采取革命行动表示反对。当时确实有理由再稍微等待一下。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最近即将召开，布尔什维克满怀信心地期望在这次大会上能有多数人赞成他们的方针。他们是不是应当至少等到大会开过，或在开会期间再采取行动呢？列宁说不应再等待，因为他预料，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宁愿推迟大会的召开，而不愿让大会声明反对他们；还因为他特别担心再次发生计划得更周密、比科尔尼洛夫叛乱更加危险得多的反革命运动。托洛茨基倾向于短时间、仅仅是短时间的推迟，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因为在以上两个问题上，他都没有象

列宁那样担心。结果托洛茨基得以按自己的意见行事，并不是由于他的论点被接受——因为他受到了两面夹攻——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下不了决心。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的意见分歧是属于原则性的。在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方面，他们二人都主张号召进行暴动；至于一个人主张以苏维埃为主要工具，另一个人主张以党为主要工具，则似乎属于次要问题。对列宁和象斯大林那样的“老布尔什维克”来说，忠于党是一条基本的信念，而托洛茨基是没有这种信念的。托洛茨基充满了对1905年的记忆，在他看来，苏维埃是劳苦大众真正的革命工具，能够把许多工人吸引到它一边来，而纯粹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只能使这些工人疏远。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都决心发动起义，这使他们二人具有联合在一起的理由，胜过由于在暴动组织方法上的意见分歧而使他们分裂的理由。他们是同盟者，不是敌对者。托洛茨基可以公开出面活动，以及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享有的地位，使他比列宁具有很大的优越条件，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尽管有些对他迅速跃居<sup>89</sup>领导地位感到不满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表示怀疑。列宁实际上无法亲自出面推行他的方针，也无法用书面劝告的方法说服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因此，在克伦斯基组成最后一个徒有其名的政府之后的关键时刻，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只是在多年以后翻起旧账来，这个问题——即究竟革命应由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还是应由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才被说成是至关重要的党纪问题，而被那些对托洛茨基是否忠于共产主义表示怀疑的人用来反对他。托洛茨基没有认识到党应当指导全部行动的问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是刚刚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而且曾有多年时间与它存在极大的意见分歧。此外，他参加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相信，在1917年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大致是

正确的，而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以前的分歧中是错误的。实际上，他可能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事态发展的压力下正在放弃他们以前的某些宗派主义，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一些布尔什维克的老卫士，对托洛茨基这种思想状态和由此而形成的举止行为是无法容忍的，都把他看做是混入布尔什维克的局外人；他们虽然需要他的帮助，但同样对他取得的声望感到不满。斯大林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他在革命初期是在彼得格勒居于领导地位的最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发现，由于一些流放者回到俄国，由于党吸收了一些来自区联派和其他派别的、他认为“不可靠的”新党员而遭到“削弱”，他的地位下降了。

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应在组织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统治俄国方面起关键作用，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争论不在于主要应在谁的正式领导下进行革命的问题，而且也不仅仅是正式不正式的问题。托洛茨基要求把苏维埃放在最前面，不仅因为他相信这样会得到更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因为他十分希望把积极从事活动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尽可能多地吸引到苏维埃一边来。他虽然也很同意把那些在关键阶段没有站在新的革命一边的人斥之为叛徒，但他不象“老布尔什维克”那样动辄把一些经过劝导还有可能加入左翼的人排除出去。他过去的经历是一个“调和派”，表现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就象他的一些生来好吹毛求疵的同事总是抱怀疑眼光而采取排斥别人的态度一样是很自然的。在这方面，他同列宁和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

应当进一步想到，布尔什维克的“老卫士们”在要求马上采取革命行动方面也并非团结一致支持列宁，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也极不一致。不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且有一个时期斯大林也对列宁提出的党应当毫不犹豫地决定举行武装暴动的意见表示不同意。直到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才在一次

列宁经伪装后参加的会议上，以 10 票对 2 票决议宣布采取革命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属于少数票。即使这样，也还没有最后解决问题，因为这两个反对者拒绝让步，呼吁广大的党组织反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执行委员会暂时除了任命它的第一个“政治局”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实行这个决定。“政治局”的成员中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S. N. 索科利尼科夫(1888—1937年)和安·谢·布勃诺夫(生于1883年)。这样一伙人，当然不能共同计划一场革命，因为其中有两人是根本反对革命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舞台的中心，仍然掌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托洛茨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军事委员会的建立，表面上的目的并不是计划发动起义反对政府，而是确保首都的军事防御，对付策划中的反革命活动，或前线进一步惨败后德国进犯首都的威胁。当时纷纷谣传政府打算离开彼得格勒，并把卫戍部队的革命团队派往前线；人们感到至关重要的是防止首都落入德国人手中，或被在抗拒革命宣传方面比科尔尼洛夫的军队表现得更加野蛮的反革命力量所占领。在10月的前半月，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代言人和组织者，曾尽最大努力为即将发动的政变创造条件，不过没有十分明显地说明他的意图。就当时来说，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使受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委托负责的、由孟什维克控制的执行委员会，马上召开已经允诺召开的另一次代表大会；其次是确保卫戍部队的各团队在克伦斯基企图命令它们离开首都时会听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命令，留在首都不动。他确信，在一次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者将会占明显的多数，因此大会将会宣布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如果革命已经发生，它将会予以承认。他并且希望确保卫戍部队不仅会拒绝离开首都，而且会响应苏维埃的命令，起

来反对政府，当苏维埃准备行动时，占领重要据点。在第一件事情上，当他未能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时，他便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行事，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无线电报，号召所有苏维埃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第二件事情上，10月16日他收到卫戍部队的决定：他们将拒绝服从政府将它们调离首都的任何命令，并将留在首都保卫革命，反对不论是国外的或者是国内的敌人。这个决定至关重要，因为它尽管丝毫未提到即将到来的暴动，但它实际上意味着，一旦发出号召，卫戍部队准备站在苏维埃一边，反对政府。同一天，托洛茨基命令军火库将5000支步枪发给工人赤卫队，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采取的行动。

这些发展，促使列宁再次在伪装的情况下出席了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与会的还有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的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坚持要求确定起义的日期；日期暂定为10月20日，即预计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一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表决时再次遭到失败，虽然其他的人对工人和士兵是否会响应号召也表示怀疑。但是，甚至在这时，这两个为首的反对者仍然拒绝同意多数的决定，竟然在高尔基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观点；这篇文章已经泄露了秘密，从而大大破坏了托洛茨基不露声色地准备发动政变的巧妙手法的效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行动，当然使列宁怒不可遏，他谴责他们犯了等于“破坏罢工”的罪行，马上要求必须把这两个罪犯开除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他的建议并无人支持，当加米涅夫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辞职时，仅仅以5票对8票通过；仍然在隐蔽中的季诺维也夫，甚至连他在执行委员会中的地位都没有变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极端害怕自己队伍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即使托洛茨基也反对把不同意见的人开除出党，虽然在加米涅夫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辞职时，他投票表示同意。

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在究竟政变应以党的名义来发动，还是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来发动的问题上，仍然拿不定主意；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反对列宁的意见，认为最好是以后者的名义发动。实际上，由于党的动摇与犹豫，这个问题以主张由苏维埃发动而得到解决。但是，起义并没有在临时确定的那一天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期拖延了几天，因此发动革命的日子也相应地往后推迟了。直到这最后的时刻，政府和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仍然令人不可思议地没有发觉革命已迫在眉睫。正当主意未定之际，克伦斯基于10月23日封闭了《工人之路报》编辑部，以此来进行反击。《工人之路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在7月被查禁后改用这个名称重新出版的。托洛茨基进行反击，派革命的军队揭去门上的封条，保卫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这次对政府的武装挑战，促使起义提前发动。克伦斯基宣布他打算逮捕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并打算派部队对付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水兵。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10月24到25日的那个夜间，赤卫队和士兵们占领了首都的重要据点，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天亮以前，克伦斯基逃出彼得格勒，他的阁员们在冬宫白白地等待着他，不久就被包围。

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摩尔尼学院<sup>①</sup>召开，革命胜利后，这里已经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超过三分之二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加上支持他们的社会革命党左派，大约4个代表中有3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大会一开始，相互间进行了激烈的互相指责。右翼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谴责政变之后，退出了会场。反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和中派，留下来要求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当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也退出会场，于是革

---

<sup>①</sup> 斯摩尔尼宫原为贵族女子学院所在地。——译注

命的多数派占领了整个会场。在辩论中，可以听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弹轰击冬宫的炮声。列宁已经不再隐蔽，出来承担新制度的领导。加米涅夫几乎是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他的反对态度，参加了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组织了全部暴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立即把政权移交给新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新政府——第一个人民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列宁邀请社会革命党左派参加政府，但他们比较愿意暂时留在政府外面，尽力把社会革命党大部分人中的动摇分子吸引到新的革命一边。

就首都本身来说，暴动者的胜利已经完成，但是还得在全国其他地方取得胜利。而且，克伦斯基就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加契纳，与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部队一起，准备进攻彼得格勒。接着出现一段不可思议的插曲。哥萨克部队向彼得格勒推进，托洛茨基命令卫戍部队开赴市外进行抵抗。可是，双方军队都无心打仗，在革命军队进行炮轰和发生了一次小的接触之后，克拉斯诺夫的军队便如鸟兽散。不过这还算是打了一下才走。哥萨克部队没有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队那样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就落荒而逃，革命军队也不是轻易就听从劝导进行击溃哥萨克部队所必须的即使是小规模的战斗。克伦斯基差一点没有夺回彼得格勒，不过即使他在第一个回合中获胜，他也几乎无法守住该城或重新组成任何形式的政府。形势改变后，托洛茨基希望能把他抓到，但是他再次逃走。克拉斯诺夫被俘后，宣誓不再反叛后获释，但很快他就违背他的誓言，组织新的叛乱。

当彼得格勒城外的战斗正在进行时，城内的士官生企图发动一场反革命暴动，并逮捕新任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苏维埃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弗·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884—1938年)等人。但是士官生们很快就被镇压并被俘，首都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其他地方并非如此，那里革命的命运仍在成败两可之间。例



如在莫斯科，战斗了一星期，才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权。但是此后，不但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革命迅速而广泛地取得成功。早在第二次革命以前，许多地区的农民就已经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意见，自行夺取并分配了土地，没有等待仍然还不存在的立宪会议为他们的行动规定出合法的根据。从部队逃跑而成群结队地回到农村的士兵，在这一行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许多大庄园被焚烧，地主的地契被销毁；得到土地的农民决不会听任自己再失去土地。彼得格勒的胜利者，为确保得到无地和贫穷的农民中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只好宣布土地归他们所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

然而，土地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胜利的巩固。和平是更加压倒一切的要求，不仅来自城镇，同样来自农村；不仅来自士兵，同样来自平民。对新政府来说，宣布土地属于农民是比较简单的问题，虽然认可把土地分割成归农民个人所有的小块，是与布尔什维克政  
95 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实现和平则是困难得多的问题，无论是单独与德国媾和，或是劝说极为敌视俄国新革命的协约国政府马上举行全面和平的谈判或同意停火，都是如此。但是，总得想办法实现和平，而完成这个任务，是革命遇到的所有迫切问题中最艰巨的一个。

当布尔什维克着手组织自己的政府的时候，列宁提议作为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的托洛茨基应当领导这个政府。但是其他所有的人，包括托洛茨基，都认为列宁是唯一可能的领袖，列宁勉强同意这个事实。于是他提议托洛茨基应任内务人民委员，任务是完成国内革命，并镇压反革命，但是托洛茨基拒绝接受，担心他的犹太血统会严重损害他成功的机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他改任外交人民委员，从而担负了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实现和平。

回顾 191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仅仅几个月

的一段时期，最突出的是这两次革命之间巨大的不同。在前一次革命中，沙皇被迫退位，但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意味着他没有继任者。不仅十月党人，而且还有许多立宪民主党人都是君主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西方类型的君主立宪政体比共和政体好。他们一时所以未能做到，是由于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准备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条件下登上宝座。如由沙皇太子继承皇位，他还年幼，这就难免要有一个摄政者或摄政委员会；而且被废黜的沙皇拒绝接受李沃夫公爵的特使向他提出的条件。当时被提出来继承皇位的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此项棘手的使命；第一届临时政府只好在暂时没有君主的情况下执政。但是它的领导人并不因此就成为共和主义者。他们继续坚持将来俄国政府的形式，应当由一个立宪会议未决定。然而他们并不急于选举出这个立宪会议来，因为他们担心在国家处于动乱之际，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将会过于革命而不合他们的口味。主要的立宪民主党人，包括米留可夫和纳博科夫，仍然表示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将会根据西方议会道路，采取君主立宪政体，有一个根据宪法设立的君主，辅之以一个民主选举的议会和一个负责行政的责任制政府。但暂时由于既没有君主，又受到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采取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方法，尽管他们尽量避免采取会使自己承担义务正式承认共和政权的任何行动。

与支持李沃夫公爵政府的各政党的态度相反，所有政党和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自然都是共和主义者，但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他们都希望马上明确地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之中许多人热中于支持协约国的战争努力，唯恐公开宣布成立共和国会损害俄国作为一个盟国的地位，失去西欧对俄国的帮助。此外，他们之中有些人从议会意义上说作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者”，主张整个问题应当留给通过正当手续选出的立宪会议去解决，完全寄希望于这样

一个机构会宣布赞成共和政体。

应当记住的是，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还有大部分不完全依附于以上两党的派别，都仍然按照他们正式的理论认为：由于俄国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俄国革命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确切的意义是什么，可能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一般认为这意味着革命政府应当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将与某种议会或国家杜马协力治理国家，而在这个议会或国家杜马里，多数派暂时将是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策的支持者。虽然在社会民主党人是否  
97 应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问题上意见极不一致；可是大多数孟什维克比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更加激烈地反对组成联合政府，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从外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保卫资产阶级革命，但应保持独立，以便坚持工人阶级的要求，并确保资产阶级不致于因为害怕革命走得太远而背叛。

对俄国革命必须局限于资产阶级性质这个概念持异议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任何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人物，而且他早在1905年就提出了这一点。是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将必然在任何真正的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因此他得出结论：革命一旦以无产阶级作为推动力而开始，实际上不可能停止在资产阶级阶段，而势必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本书前一卷已经讨论过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石。<sup>①</sup>无论是布尔什维克或是孟什维克，都不接受这个理论。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派别中的大多数人，在1917年最初几个月里仍然受着革命必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一信念的支配。在这一时期，主要的争论不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关于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政党究竟应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什么性质的压力

---

<sup>①</sup> 见第3卷上册，第452页（中译本第462页）和下册，第956页（中译本第427页）。

和在多大程度上施加这种压力的问题。

社会革命党的情况自然是完全不同，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不但  
不强调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且，即使他们强调  
这一点，也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布  
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致希望看到俄国尽可能快地发展高度的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必要步骤，因为他们认为  
越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能的。社会革命党人则根本  
不承认这种必要性，不认为俄国必须先成为工业化的或资本主义  
的国家，然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希望俄国的社会主义建<sup>96</sup>  
立在农村生活和土地所有权中的村社因素的基础上。他们基本上  
是一些农业社会主义者，反对西方化，因此仇视社会民主党关于资  
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是为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准备道路的的必要  
手段这一理论。他们中间固然有形形色色的主张，从一个极端的恐  
怖主义者和准无政府主义者，到另一个极端的温和的土地改革派，  
但他们都是地方分权主义者，并且鼓吹革命应在很高的程度上以  
自发的群众行动作为基础。在理论上，他们大多数准备跟随群众  
革命运动，而不管它的自发性会把他们引向何方，绝对不排斥一  
下子从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实践上，他们在是否  
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实际上也包括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来处  
理面临的紧迫问题方面，以及在使用正式的民主方法究竟有多大  
重要性方面，意见分歧甚大。例如，有人主张通过普选选举立宪会  
议，有人则要求全部政权应由只代表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的苏维  
埃来接管。社会革命党左派主要由于这样一些意见分歧脱离了大  
多数，在他们中间最引人瞩目的派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准无政  
府主义。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暂时看起来是同盟者，因为  
他们一致蔑视资产阶级民主，并支持苏维埃控制政府的要求。但  
在这个表面上的一致后面，在信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一个主张

集中的党的纪律，一个则主张自由，即通过少数具有战斗性的分子的自发行动来影响普通人民中动乱不安的群众。

社会革命党左派对于把革命推进到尽可能最大的限度，丝毫没有有什么疑惧，所以，在最初他们构成极左翼的主体，而布尔什维克则采取了谨慎得多，实际上是不确定的路线。在列宁 1917 年 4 月到达彼得格勒以前，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第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的问题，尽管他们当然从一开始就赞成由苏维埃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正是列宁显然同他早先所主张的革命应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的观点相反，在回国后立即开始要求的实际上不是马上进行新的革命，而是决心试图通过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通过把苏维埃争取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创造条件，以便实现把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由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居于控制国家的关键地位。所以，为了了解列宁从抵达彼得格勒到十一月革命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了解究竟是什么使列宁改变了他自己的思想。

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当列宁同意在俄国只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仅仅是根据在俄国进行革命，或者不管怎样是完全根据俄国的条件来考虑的。但在 1914 年 8 月之后，他不再是根据这些条件进行考虑或争辩了。这一点他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都说得很清楚，在前一次会议上他的意见遭到否决，在后一次会议上，他的意见获得了赞同。当战争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之际，列宁思想上就认为战争的必然结果将是世界革命或至少是欧洲的革命，而且这也是实现可以接受的和平的必要基础。因此，他蔑视控制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进程的那些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激烈反对支持本国政府战争努力的“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叛徒”；他拒绝接受恢复旧的国

际或与仍然支持战争的各社会党的旧领导人和解的一切建议。列宁不仅仅是希望战争的结果会引起普遍革命，而且对此确信无疑，特别是认为德国即使不是首先爆发革命，无论如何也将是把从资本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开始的革命传到西方的主要媒介。

托洛茨基对此亦确信不疑，不亚于列宁；而且他们二人还共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发生，除非它扩及西方较先进国家，否则它是支持不住的。在那样的情况下，随着战争为全面革命扫清道路，俄国的经济和政治落后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俄国革命仅仅是更广泛的欧洲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较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来帮助俄国人，使他们能够立即开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作为一个基本上国际范围的新社会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否“成熟”的标准，不是指的俄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成熟程度，而是指的把欧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成熟程度。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战争的爆发已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不可能在欧洲重建资本主义秩序，而绝对需要用社会主义来加以纠正的地步。因此，任何单纯根据俄国一国的成熟程度来考虑问题的学说已经过时。战争改变了整个形势，在俄国，或者说实际上在欧洲任何地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种对欧洲革命充满自信的预测，结果证明落空了，但它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态的发展。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是相信欧洲全面革命已迫在眉睫的话，他们一定会发觉，即使说服布尔什维克领导进行俄国第二次革命，也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列宁完全有可能根本不希望那样做。列宁和托洛茨基正是由于把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即将发生革命的期望灌输给他们的同僚，才得以最后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彼得格勒苏

维埃转向左翼后新选出的主席团中多数人的支持。即使是布尔什维克也并非都被说服，因为如前所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直到最后也属于怀疑派，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他们担心在俄国夺取政权失败，而是他们对在德国或任何其他地方很快就会爆发  
101 革命缺少信心。相信国际革命肯定将会到来这一信念，是使俄国1917年第二次革命成为可能的大神话。

有人也许会反驳上述观点说：即使没有这种信念，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几届联合政府的斗争中，也会被迫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但是，即使情况会是这样，他们肯定要用长得多的时间才能鼓起力量做到这一点，而且很可能是，到他们能够作到这一点时，已经是为时过晚。彼得格勒会轻易地陷入德国人手中，或已被反革命攻下；俄国会容易地四分五裂，陷入极端混乱，布尔什维克或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再把它统一起来。列宁了解这一点，因此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之后，他便竭尽全力地主张，即使拖延片刻也是愚蠢的。这也许会用来说明，他内心里对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可避免这一点的信心，并不象他自认为的那样充足。但这实际只能说明，他唯恐俄国会失去领导革命的机会——他是强烈希望俄国这样做的。列宁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种观点，同那种对俄国在进行这场革命中究竟将起什么作用十分没有把握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列宁和托洛斯基不是把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俄国革命，而是把它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行为的一次国际暴动的开始来加以推动的。只是当更大规模的革命显然不会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重新考虑，并决定在俄国革命已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情况下，如何来挽救它。在1917年，这种考虑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当时唯一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最好的办法坚持

下来,直到获得援助,并为此而采取给予俄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土地与和平,并尽可能给予已经陷入半饥饿状态的城镇以面包的办法,来对付反革命。

(李鹏远 译)



## 第四章

### 战时的德国(1914—1918年)

1914年8月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即团结一致支持帝国政府。在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在党的会议上，110人中有少数派14人主张弃权，但表示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因而党的领袖胡果·哈阿兹(1863—1919年)，尽管个人是少数派之一，但正式发表讲话，赞成多数派的意见，暂时仍保持了领袖地位和党的主席的职务。在国会外，社会民主党，包括帝国各邦的派别，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自从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工会，其领导人中只有极少数持不同意见。甚至连那些不赞成党的路线的人，目睹拥护战争的群众情绪的强大力量，多半认为在那个时候提出抗议是不会有任  
何效果的。只要德国国防军一切顺利，而且多数德国人仍然相信德国肯定会胜利，那么，他们除了更加情绪高涨地支持战争外，态度是不会有有多大变化的。

根据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的经历，说明这种态度并不困难，但也有说明的必要。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包括不久前代替奥古斯特·倍倍尔成为党的领袖的哈阿兹，1914年以前左翼中的卓越人物如罗莎·卢森堡(1870—1919年)、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年)，而且包括二十世纪初  
103 些使党陷于分裂的党内在修正主义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中两方面的理论骨干。在这新的危急关头，标榜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和鼓吹修正主义的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

1932年),发现他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但是,正像他们以前因害怕分裂党而退缩回去的情况一样,这次也退缩了回去。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遭俾斯麦迫害的时候起,已经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纪律的机器,忠诚的概念居于很高的地位。党的政策已明确规定,它的伟大目标是社会主义和摧毁现有的社会制度,它的短期纲领是政治和经济改革,它把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争取全国人民大多数站在它这一边作为它的目的;它的领导人把团结一致推进这些目标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sup>①</sup>,这实际意味着,党内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党决不能把任何足以构成另立敌对政党威胁的持不同意见的集团清除出去,它最多只能做到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党的组织或党的刊物中难以得到或保持有影响的关键职位。它能够做到因为卡尔·李卜克内西进行反军国主义活动而免去他领导青年组织的职务,并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来代替他。它能够做到为罗莎·卢森堡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设置障碍,虽然这并不能使她保持沉默;它还能够做到大力在党的本部及其官方机构中安置“可靠的”人员,但是,它无法压制少数派在党内发表意见,而不致损害在将来的选举中继续取得进展;它也不得不容许在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邦的党的组织拥有相当的自由。

至于党内的少数派,在很大程度上,也相信需要团结,除非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达到绝对无法容忍的地步,否则是不想决裂的。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也相信,党在1912年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注定要愈来愈强大,直到它能代表全国人民明确的多数,从而通过民主的方法取得要求组织政府的权利,以结束君主政体与统治阶级不负责任的政权。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除了以诗人古斯塔夫·兰道尔(1870—1919年)为首的极少数准无政府主义者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303页(中译本第316页)。

外，都具有这个共同的信念，并一起期望着民主胜利“日子”的到来。无疑，在这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and 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上，他们在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党的正式看法是，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后，接着将担任政府职务，将是“革命”，或者至少是立即着手进行革命。修正主义者则不主张谈论和想望“革命”，而是设想将进行一系列渐进主义的改革，认为虽然取得政治权力可以大大加快这些改革的步伐，但是甚至在社会主义者成为人民的大多数以前，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些改革。大致说来，这两个主要派别，都仅仅是从选举和议会的角度来设想即将来临的胜利，即使考虑其他途径，其程度也微乎其微。两方面都设想，只要选举人中社会党人占多数，德皇和统治阶级的不负责任的统治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无需经过激烈的抵抗，或无论如何无需必然经过真正的残酷的内战，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权就会取而代之。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如罗莎·卢森堡，不仅同伯恩斯坦或格奥尔格·福尔马尔，而且同考茨基和倍倍尔几乎同样有争论；他们构成社会民主党极左翼的第三个派别，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意见影响极小，而且由于右派和中派在1905年受到激励后紧密靠拢，他们的影响实际上在每况愈下。

早在1914年以前，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实际上已经无足轻重，在党的事务中，国际政策已成为愈来愈加重要的问题。如前所述<sup>①</sup>，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况，促使卡尔·列金（1861—1920年）领导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坚决宣布反对罗莎·卢森堡竭力鼓吹的政治总罢工政策；此后在第二国际的多次讨论中，德国人始终强烈反对该项政策，虽然他们最后在某些压力下，接受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加以确认的关于社会党人在面临欧洲战争威胁或实际发生战争时应采取的态度意思含糊的决议。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312页（中译本第324—325页）。

如前所述<sup>①</sup>，这些讨论部分地转向了参加“保卫国家”的问题上；德国代表团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德国遭到攻击，社会民主党应承担参加保卫国家的义务。饶勒斯在法国代表团部分代表的支持下，表示法国党也采取同样的方针，但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或者说，它根本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德国人在为自己的态度辩护时，总是以德国有来自东方的威胁或受到来自东方的真正攻击作为例证，并常常提到保卫德国文明，防备“沙皇俄国的亚洲游牧民族”的野蛮侵略。尤其在普鲁士，在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支持德国现行政权的人们中间，反俄情绪一直极为强烈；1905年之后俄国反动力量的胜利，更加强了这种反俄情绪，并且使这种情绪很容易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情绪一致起来。多半由于对俄国的憎恨，促使德国社会主义的许多领导人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中，对作为俄国盟国的法国和英国采取了愈来愈仇视的态度，从而使这些人在殖民政策和在通过东南欧“向东方挺进”这些问题上，更加愿意站在德国一边。

毫无疑问，尽管在战前年代此起彼伏的国际危机中，支持德国政府的倾向越来越增强，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依然诚恳地希望列强间避免爆发战争，并且尽最大努力采取宪法行动阻止德国的侵略。的确，当1914年7月危机真正来临时，他们尽力对德国政府发挥遏制影响，并且只要他们看到有使冲突局部化的机会，就阻止德国政府保证以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如果奥匈帝国得以自己放手处理同塞尔维亚人的问题，而没有其他任何强国的干预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会感到十分满意的；而且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试图劝说奥地利政府不要过于采取不妥协方针——因为奥地利社会党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奥地利本身好战情绪的强大

108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61页（中译本第72页）。

力量面前，是无法试图施加这种压力的。但是，当俄国政府明确表示它打算站在塞尔维亚人一边进行干预时，德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情绪很快发生了变化。无论德国政府已经给了奥匈帝国什么保证，如果德国政府表现出德国只是由于俄国的侵略政策才被迫卷入冲突之中的，这显然对德国政府是有利的，因为俄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威胁着德国在东欧的整个地位，甚至德国本身也会直接受到攻击。这就是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的一系列事件在德国人民面前造成的形势，由于这种形势，德国统治阶级得以玩弄种种手法激起德国人民的反俄热潮。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时已最后确定了对政府的战争预算要求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在国内已经面对着这种情况：任何企图反对战争的行动，都可能使他们失去德国人民中大部分人的支持，而且或许会使党陷入分裂。

我指出这点，并不是为了替德国社会民主党开脱，而是为了说明在西欧真正发生战争之前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胡果·哈阿兹在1914年7月28日和29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党人时，似乎十分诚恳地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绝不会违反它的传统到那种地步，竟至于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并且仍然希望党的议员至少会决定弃权。这是哈阿兹作为一个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强反对者希望党所做的；因此他仍然相信，党会坚持拒绝支持帝国预算的既定政策，即使党的成员中有许多人希望，在对抗“俄国野蛮主义”的斗争中，他们自己的国家会取得胜利。对于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广泛流传的关于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德国作为主要的文明势力负有控制欧洲的使命这样的信念，或对于更加广泛流传的关于德国已不得不对本身进行防御以反对俄国侵略这一信念所产生的影响，哈阿兹几乎都认为没有考虑的余地。要不是德国文化优越和俄国落后这种“神话”早已

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部分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的话，上述第二种信念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哈阿兹一回到德国，就碰到爱国情绪十分高涨的局势，并且发现自己已成为为数不多的少数派中间的一个，这些人继续认为，德国政府由于支持奥地利的不妥协政策，在造成欧战不可避免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此后，他和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就不得不在两种态度中作出十分困难的抉择：或者是接受党内多数同事和德国国内大部分公众舆论的意见；或者是坚持他们认为既在客观上正确，又与党的传统实践，与忠于第二国际的精神相一致的行动方针。第二种方针将意味着愚弄党的纪律，从而违反党内团结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同时不仅会在大多数同胞中大大失去人心，而且实际上肯定会遭到政敌的迫害与镇压。如果笼统地说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失去了勇气，是不公道的，说得正确一些，是他们觉得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把忠于党置于忠实于个人信念之上，并且首先是主张团结这个具有极大威力的党的传统，促使他们这样做了。实际上，他们的作法就是伯恩斯坦当他的修正主义理论遭到党的断然拒绝后所采取的作法；他们接受了多数派强行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要求，但是拒绝抛弃自己的信念，或放弃他们试图使多数派转到他们的观点上的努力。哈阿兹本人暂时实际上保持了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取得胜利的多数派暂时也克制自己，没有把胜利推进到将少数派驱逐出党，或甚至禁止少数派继续发表他们不同意见的地步。甚至比哈阿兹左得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也承认作为帝国国会议员，在这一点上必须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在1914年8月这个阶段，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主党议员，110人中只有14人在党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少数派；而且所有这些人，除了或许有一人在帝国国会进行表决时缺席外，后来都投票赞成战争预算，从而牺牲了党的国际誓约而保全了党的团结。即使这14

人也并不是主张投票反对战争预算,而仅仅是坚决主张弃权,作为有一线希望使全党保持一致意见的最大努力。毫无疑问,除这14人之外,还有少数人是因为担心才勉强投票赞成,这或者是由于他们了解一些事实,说明德国在引起战争方面起了主动作用,或者是由于他们是十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打破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德皇政府和德国统治阶级这个悠久的传统。但是,在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的几个星期,随着德国军队在西线迅速向前推进,显然可以看出战争很快即将胜利结束,这时,少数派不但根本没有增加新的追随者,实际上已失去存在的依据,而多数派热衷于德国胜利的情绪更加趋向极端,使得他们对于党内的反对意见愈加不能容忍。于是开始了一场斗争,目的在于把少数派的支持者从在党的刊物和地方组织中所占的优越地位上赶走,并清洗工会中制造麻烦的分子。只是在德军的前进被阻止在巴黎城前,严重地面临两条战线持久作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少数派才稍稍鼓起勇气,争取到一些开始犹豫不决最后转而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人。军事上遭到挫折之后,1914年12月再次提出战争预算问题,这时在党的会议上,反对的人数增加到17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终于下决心藐视党纪,在帝国国会独自投了敌对的一票。李卜克内西陈述自己立场的声明,被拒绝收入官方纪录,因此他不仅投票反对战争预算,而且把他的论点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从而在党内掀起了大量印发小册子的运动。他的论点,概括说来就是: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它只会有利于支持战争的帝国主义势力;战争将会被用来摧毁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交战国的工人运动;战争是德国发动的,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达到兼并别国的目的。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强烈抗议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抗议对德国人民强制实行戒严状态和军事独裁。这是一份具有很大的打击力,持极端态度的宣言,它引起多数派的代言人对李卜克内西的激烈谴责,指

斥他的行动使他成为既是卖国贼，又是党的叛徒。这本小册子远远超过少数派中多数人准备坚持的一切主张，是少数派分裂的开始，这种分裂在以后一个阶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并不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站在协约国一边。如果说他认为首先应号召同自己国家的战争贩子进行斗争，并指责战争是奥德帝国主义阴谋的产物，他同时也攻击了俄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呼吁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与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决裂，并维护人民的权利。他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设法使敌对的资本主义者之间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他是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的反军国主义立场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从他采取这种立场的时候起，有一个由战前左翼分子组成的小派别，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等杰出人物，便团结在他的周围；开始为后来的斯巴达克派，以及再后来德国共产党的核心组织打下了基础。这种态度同以哈阿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著名领导人的主要反对派的态度，有极大的分歧；这些人尽管同意谴责德国在促成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注意到协约国方面的资本帝国主义倾向，但他们主要是议会主义者，希望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而不是仅仅向工人发出呼吁。他们的目的，甚至就他们自己所明确的来说，并不是煽动无产阶级举行群众罢工或武装暴动，而是使各交战国的社会党恢复理智，从而着手发动一个强大的运动，支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使社会主义重新开始已被打断的向着用政治手段夺取政权前进的步伐。这样说或许过于简单化，因为少数派里有些人在议会主义者与彻底革命者两者之间，持折中态度，希望战争以推翻引起战争的经济、军国主义的和政治的势力而告终，并准备采取革命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是使改造收到效果所必需的话。格奥尔格·累德堡（1850—1947年）是这个中间派的主要人物；但是在这个比较早的阶段，反对派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明确形成，



整个少数派之所以能走在一起，是由于多数派企图压倒它而对它进行了广泛的指责。

在这个多数派中，杰出的人物有党的官僚机构中的首要人物、马具工人出身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0—1925年)、能言善辩的政治家菲利普·谢德曼(1865—1839年)和多年来用铁的纪律统治“自由”工会的权势人物卡尔·列金(1861—1920年)。不过也有一些比这些人较次要的人物，他们都属于社会主义的极右翼，大肆叫嚣，在支持德国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战争目的方面超过了前者。在这些人中有一个突出的人物是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他长期以来以属于党的改良主义派而著称，并且在第二国际两次代表大会上积极主张承担“保卫国家”的义务。其中的沃尔夫冈·海涅(1861—?)也属于战前的右派；康拉德·黑尼施(1876—1926年)战前在殖民政策和帝国政策问题的争论中，也是主张维护德国扩张权利的主要人物。与这些人不同，保罗·伦施(1873—?)直到1914年还是左派的一个活跃的主要角色，只是在战争实际爆发之后，才突然改变立场，马上成为德国扩张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所有这些人，尤其是黑尼施和伦施，极力宣扬这样的观点：正是德国的扩张主义，而不是英国的“自由主义”，才是进步事业的象征，并且指出了在德国领导下欧洲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竭力鼓吹这样的信念：通过并吞奥地利，战争为德意志人民的彻底团结扫清了道路，这将确保德国文化在欧洲发扬光大，并在德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使欧洲成为一体。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战派的这些和其他主要角色，大多数都表现出十分傲慢自大，坚持德意志人的优越性和欧洲其他部分已经颓废的论调。1914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德意志文明与俄国野蛮主义之间划清界线，并坚持战争对德国来说完全是为了自卫，来抗击俄国的无端侵略这样的论调。在1914年8月，这实际上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典型路线；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德国入侵比利时，几乎没有使这条路线有任何改变。国会党团最初在决定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时候，并不知道入侵比利时实际上已经发生，虽然许多人肯定知道这已在策划之中。德军进入比利时，只是到首相在帝国国会作要求通过战争预算的讲话时才对国内公开宣布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关键性决定之后；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使党在匆忙磋商之后改变它的态度。实际上，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德国军队有权通过比利时进行辩护，理由是，由于比利时同法国进行军事协商，已经丧失了它要求尊重其中立地位的任何理由；还有不少人甚至撇开这一点不谈，坚持认为德国有权对比利时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借口是这样做可以有更好的机会给敌人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从而可以缩短战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比利时问题微不足道，不足以影响他们的总的态度。

然而，在最初这个阶段，还听不到像在德国军队首次遭到严重挫折后马上就听到的那种反对法国或英国的“仇恨赞”大合唱。确实，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心抓住德国政府关于它不是为了并吞才进行战争，它的目的严格限于防御这个声明不放；该党正是根据对德国政策的这种解释才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他们谴责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应参加战争，并且没有让德国放手对付俄国。但也表示希望：当法国人得到教训后，胜利的德国和战败的法国之间可以根据不太使法国人民受辱的条件，建立起友好关系。对英国的干预则更加恼火；认为英国的行动起因于帝国主义动机，尤其是起因于它想要保持它在贸易和殖民主义方面的世界垄断地位，并破坏了它最大的挑战者得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前景。不过在战争开始阶段，这种谴责还没有大量出现，像保罗·伦施这样的作者的激烈反英谩骂，主要是在1915年或1915年以后才出现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指责他们不忠于国际社会主义，并违背了他们自己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的诺言这一点急切进行反驳，他们连忙派代表团到中立国解释他们的行动。这些德国使者争辩说，当一个国家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的时候（这里指的是俄国的侵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条款显然不适用。德国代表们可以指出这样的事实：德国代表从倍倍尔以来，在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上一再明确表示，德国社会民主党承担保卫国家反对侵略者的义务；而且一贯反对建议举行的国际性群众反战大罢工，其理由之一是，不管这种罢工的目的多么高尚，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宣布这样的罢工，而同时能确切保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或者如果其他国家不这样做，自己也不会遭受失败。这些代表团是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派出的，它们闭口不谈德国想统治世界的问题，而是

113 坚持这样的论调：德国进行战争是出于不得已，完全是为了自卫，而且他们只是在德国首相作出这个保证后，才予以支持的。但是，他们发现很难使外国社会党听众信服：德国的战争目的真象他们所说的那样丝毫不懈可击，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背叛它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及以后的各次会议上所同意的观点。

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俄国参战已迫在眉睫的时刻，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真诚地希望避免发生这场大冲突的。它强烈抗议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中的条款，并做了它所能做的事（但做得不多），来加强奥地利社会党人为缓和奥地利政府的态度而进行的软弱无力的努力。此后，它曾尽最大努力阻止俄国和德国卷入战争，以便使冲突不致扩大。只是在它的领导人终于确信俄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进行干预，他们才开始动摇；只是在这些领导人确信俄国人已着手进攻德国后，除少数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外，他们才全体转而支持战争。诚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不希望战争的，他们在根据宪法采取行动和在全德国举行群众示威游行的范围

内，竭尽全力阻止战争。但是，当群众的反俄情绪已达到沸点时，他们马上就面临这样的局势：如果他们坚持反对战争，他们就会失去对人民，包括工人大多数的掌握，并有可能遭到对他们的党的镇压和毁灭性打击。他们绝对不能面对这种危险。他们自认为是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群众意志的代言人，因此完全不能与群众情绪的明显趋势背道而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当然不能不受在8月初笼罩全德国的强烈恐俄病的影响。各国社会党人长期以来几乎普遍存在憎恶沙皇政权的情绪，认为它是所有政权中最反动的一个；长期以来把拒沙皇游牧民族于西欧之外作为神圣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如何呢？然而在德国，这种并非社会民 114  
主党人才有的情绪，又具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因为它同那种认为德意志人不仅对俄国，而且对西欧各国来说都具有优越性的强烈意识结合了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被看作，而且自己也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首领和先驱，他们组织良好和发展迅速的党也被看成是第二国际的向导和哲学家，其它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以可望而不可及的尊敬态度来效法它和追赶它。对它们国家的军事和外交势力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就是对他们自己在国际社会主义中优势地位的威胁；而且他们无法想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竟然要义不容辞地听任俄国“野蛮人”入侵他们的国家，不仅摧毁他们一直反对的德国政治制度，而且也摧毁他们为反对这个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力量。

在讨论造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1914年所采取的态度根本原因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是以他们的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的著作，至少可以说有力地助长了把德国看作是欧洲文化的领导者和反对“野蛮的”斯拉夫人的欧洲文化战士这样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在与普鲁士控制的德意志帝国进行合作的问题上，站在反对拉萨尔的

立场,但他却赞成这样的想法:即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比斯拉夫人优越,作为一种权利,应把捷克人也包括在大德意志之中。在1870到1871年,他还赞许德国战胜法国,不过,反对德帝国并吞阿尔萨斯-洛林。所以,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包括很大一部分反斯拉夫主义和坚持认为德国文化占优越地位这样的成份在内;这种传统态度,无疑在1914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决定政策时起了作用。在以后一个阶段,人们曾企图把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态度中的沙文主义成份,归因于继续受拉萨尔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但事实似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二人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拉萨尔派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愿意接受由于支持战争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与德帝国政权中的统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上所造成的后果而已。

其结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国权力体制的整个结构所抱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社会民主党人在此以前几乎都是被宣布为非法的,管理德国社会根本没他们的份,而这时发现自己突然被邀请参加为适应全国动员和国防的需要而组织全民的工作,并且被告之,如果他们响应这个号召,他们将不再被看作是奴隶,而被看作是在共同事业中有组织的合作者。他们肯定,追随他们的群众指望他们接受这一点,而且对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是,他们要接受,就不得不对他们在同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进行斗争时所坚决采取的态度来一个影响十分深远的大改变。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恪守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必须避免与现存的国家政权有任何牵连,只有在他们夺取了政权,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联合,即便是同资产阶级左派的联合,都因被看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戒律而排斥在外,而且在文化上以及政治上,他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与现行制度积极

作对的社会主义机构。现在，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超越阶级的和政治的分野的全民共同事业中的合作者，他们就必须彻底改变上述政策。阶级斗争将不得不打入冷宫，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在为应付“国内阵线”的战时紧急状态而临时设立的国家机构中，同他们昔日的敌人并肩效劳。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以前几乎像它自己表白的那样坚如磐石的话，那么在态度和行动上如此剧烈的改变，简直是难以做到，而且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实际上，大多数领导人所实行的不参加政府活动的作法，早已被党的一些派别所破坏，尤其是在德国南部，当这些派别在德国的一些邦中与资产阶级和农民政党合作时，它们仅仅受到谴责，并没有受到纪律处分；更加严重的是各个工会，它们由于成员增加，愈来愈采取同雇主进行和平的集体谈判的办法。在执行新的任务时，对工会领导人和总的说来对南德意志人来说，所费的气力要比普鲁士人或萨克森人所费的气力小得多，因为普鲁士人和萨克森人一直在同反动势力进行着更尖锐和更困难的斗争。在德国宪法中，至少有一点民主成分，即帝国国会是在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如没有国会的支持，帝国首相是不可能管理国家的，尽管由于普鲁士控制的上院为反动势力所盘踞和由于国会不能控制政府的行政权力，因此它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则连任何形式上的民主政府都没有。普鲁士的邦议会，是根据三级投票制选举出来的，这就使社会民主党人除非得到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帮助，是甚至连一个席位也得不到的；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不久前才放弃了抵制普鲁士选举的政策。在1914年，他们为改革普鲁士宪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继续要求实行这一改革。只是在得到待战争过后一定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的含糊承诺，并同时发表声明，声称值此国家为生死存亡而进行斗争之

际，无法处理这样一个有很大争论的问题之后，才放弃了上述斗争。这种情况，使普鲁士人——实际上还有萨克森人，因为在萨克森情况极为相似——特别难于团结在政府周围支持战争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来自俄国的威胁，在普鲁士的边界地区感觉最为敏锐，而且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普鲁士是德国抵御来自东方的危险的伟大堡垒。因此，即使在普鲁士和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的大多数也赞成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所确定的政策。

阵线的变化一旦发生，就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上以及当前的行动上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由于已经走出了这样远，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感到再向前进就容易了，并确信德国的胜利包括摧毁各协约国对手的帝国主义，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将最符合社会主义的真正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将能够领导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向民主和社会主义前进。

这种向德国帝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在多数派与不接受这个新福音的少数派的斗争过程中，迅速得到加强。如前所述，少数派中包括一个革命的少数派，他们根据斯图加特决议的最后一段话，极力想通过鼓动群众暴动，利用战争作为结束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机会，而不管这将对战争努力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个集团人数很少，在开始时他们指责反对派中其余的人是极左派的帮凶，从而主要起了败坏整个反对派名声的作用。实际上，少数派的大多数人并不支持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而是支持哈阿兹和考茨基；后者不主张无产阶级暴动，而是主张尽快实现两方面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和平，即主张这样的和平：它将证明战争毫无益处，而且由于不割地不赔款，从而将导致在国际冲突中普遍接受仲裁，导致裁减军备，同时使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名声扫地，赢得民主政治的胜利。要建立这种新秩序，在某些反动派不甘失败的国家里，也许必须进行革命；然而它的实质不是革命主义，而是安

定以及理智战胜暴力。在接着而出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冲突中，正如多数派由于同统治势力发生牵连而不得不向右转一样，这一派也不得不向左转。但是，在俄国1917年两次革命之前和之后，该党的大多数成员不再相信整套的暴动说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其中以考茨基为首的一派人，憎恶列宁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物而坚持的独裁政策，从而作出了急剧向右转的反应。

我并不想说，即使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已经完全忘却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或者已转变成一心一意地支持兼并主义者。有些人是这样，但他们依然只是少数，党从未正式表示赞同他们的态度。它在用激烈的词句斥责法国和英国以及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同意必须让德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同时，继续谴责军国主义者的过分要求，并坚持它所要求的“公正的”和平，至少在口头上大谈其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尽管它在解释这些原则时，往往反映出它主要还是坚持德国的利益，例如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和在有关波兰和比利时的一些问题上。应当承认，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确信德国主要是为了防御而战，它也确实作了一些努力，企图防止它变成一种可耻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战争后期各阶段，由于胜利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不得不严重地面临彻底失败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通过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样的政策不仅愈来愈吸引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而且也愈来愈吸引资产阶级政党的许多人。帝国国会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反映了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反对1917年1月进行的招致美国参加战争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并从此越来越对帝国的战争政策持批评态度。当然也可能会争辩说：态度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军事形势更加恶化，和德国人民由于严重缺粮而日益困苦不堪，而且在总体战的压力下，国内阵线极端军国主义化而引起的反应而已。但是，要说态度



的转变完全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也并不十分公道。在整个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中有些人由于本身牵连在他们本来只能加以反对的帝国战争政策中而良心感到不安，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保卫国家的事业中，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行事。我认为，菲利普·谢德曼就应当属于这一种人。

119 我不想在本书中讨论究竟德国人对 1914 年的战争要负多大的责任，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把罪责归咎于各协约国战前的外交才算恰当。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争论而且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我提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我只能回顾一下在当时我的心情和见解。1914 年 8 月，我尚不满 25 岁，尽管我已经是个活跃的有名的社会党人著作家，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工业问题，对于外国政治，现在看来知之甚少，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但是，我天生是个和平主义者，把战争看成是一种恐怖，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辩解，并认为各国工人阶级紧迫的任务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战争。因此我以深切的同情赞成社会党人发表的各种反战声明，以及在萨拉热窝发生谋杀事件，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发出的要求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呼吁。我十分坦率地承认，我实在难以相信战争真会到来，我也对阿斯奎斯和格雷的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政策十分不满，认为如果付诸实行，大部分罪责将落在英国政府身上。甚至当事实已很明显，战争即将发生，而且不仅俄国和德国，连法国也将被卷入的时候，我依然希望英国不要参战。当德国入侵比利时，而且大肆宣扬时，我深为震惊；但即使在那时我仍然反对英国干预，尽管我觉得德国的作法很明显是错误的。虽然我认为破坏比利时的中立是犯罪行为，但甚至连这也没有动摇我那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想。从战争一开始，我就希望它以双方都没有获得胜利，尽可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告结束。我实际上是列宁所鄙夷地称之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那

种人，而我却始终抱这种态度。从内心里讲，我那时是个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拥护者，而不是昆塔尔会议的拥护者，当然我也就积极拥护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计划。1917年，我对俄国的两次革命都表示欢迎，但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或希望英国照俄国的样子进行革命。因为在俄国，除了布尔什维主义之外，任何社会主义者均无法存在；但是我仍然希望，起码在英国，社会主义可以不经内战或专政而获胜。总而言之，我仍然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社会党人，我之所以没有更进一步，不仅由于我本身的和平主义思想，而且由于我相信信仰自由和选择自由这样的价值准则，因此没有加入革命的极左派，但我对革命极左派的同情，远远超过我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严格的宪政主义右翼的同情。当时有人诙谐地说我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灵魂和一张费边主义的嘴”，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的灵魂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而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我的嘴不是“费边主义”而是一半和平主义，一半对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信仰。

上面我尽量如实地说明了我在1914年及其以后几年的主张，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感情势必要影响我对必须叙述的事件的解释，和对这些事件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的评价。我觉得我自己同各协约国多数社会党人在十分强烈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态度方面，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不像他们那样决心要把对德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并拒绝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条件。同所有交战国的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当战争继续进行，毫无结束希望时，我自己愈来愈强烈地“反对战争”。如果一定要有一方战胜的话，我仍然宁愿协约国取胜，而不愿德国取胜；但我越来越加强烈地希望实现双方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和平，并希望把社会主义重新建立成一支国际力量，尽管我承认，在许多国家，首先

是德国，有那么多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完成这种重建工作，我完全心中无数。

关于我个人的态度就说到这里为止，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德国社会主义在战争的压力下所发生的情况。由于德国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开始消失，在德国国内，反对派开始集结力量，其中  
121 不仅有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有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越来越反对那些控制着社会机构，并把越来越严格的纪律强加给平民的军国主义者。然而，最初积极进行反对活动的，既不是一些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不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极左派，即追随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一些人。在1914年12月投票反对战争预算之后一个月，李卜克内西发行一本小册子，重印了他严厉攻击社会民主党“既不值得信任，也不配受尊敬”的一次讲话，从而在党内引起一场大论战。1915年3月，议员奥托·吕勒（1874—？）同李卜克内西一道投票反对当时作为总预算一部分的战争预算，在投票时，另有31个议员弃权。可见，帝国国会的议员中，拒绝追随党的正式路线的，绝不止这两个人，虽然其中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反对战争预算，而是反对完全改变投票反对政府预算这一党的传统政策。

在1915年其余的日子里，社会民主党各派之间进行了言词越来越尖刻的激烈论战。8月，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发表了一个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引起了以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国际”派的严厉驳斥。这一派印发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战争与无产阶级》，猛烈攻击企图在战争期间停止阶级斗争的作法，并坚决主张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同各交战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进行斗争。与多数派的意见针锋相对，它认为德国无权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奥匈帝国的二元君主政体应当摧毁；只有国际工人阶级采取行动，才能够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但是，这个极端派

仍然只有寥寥无几的追随者。反对力量增强的一个有力的信号是1915年6月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千名职员签名发表宣言。宣言主要攻击多数派同意停止阶级斗争，从而默认国家的“军国主义化”，并否定党的根本目的。它没有涉及战争目的问题；但此后不久，哈阿兹与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一起发出一份呼吁书，指责所谓的防御战争已堕落，成为侵略战争，声称这将使少数派不可能再服从党纪，投票赞成战争预算。1915年12月，31名议员在党的会议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其中20名议员态度坚决，在国会投了反对票。<sup>122</sup>

这个挑战使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危机达到了顶点。1916年3月，多数派决定把少数派开除出国会党团，但无权把这些人驱逐出党，因为它不能召开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代表大会。就少数派来说，他们不愿退出社会民主党，认为他们在党内已逐渐加强了力量。一直到1917年1月以前，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任何正式组织。1917年1月，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联盟”，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社会民主党。然而这激怒了多数派，他们进一步采取行动，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开除了大量的人。1917年的复活节，少数派终于采取断然手段，成立了一个完全新的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差不多与此同时，1917年4月，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极左派成立了斯巴达克同盟，它虽然松散地附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着单另的组织和独立行动的权利。

这时，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已经退位，由李沃夫公爵的政府执政，虽然它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当然，俄国革命对德国人的看法有极大影响。俄国新政府企图联合西欧盟国继续进行战争，然而俄国军队早已有土崩瓦解之势，他们的军事形势十分恶劣。俄国人民，不论是农民和工人，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达到什么样的和平呢？在这个阶段，俄国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它们深深地依赖与西欧的联盟，并没有放弃它们侵略战争的目的。

123 的。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新建立的苏维埃，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控制，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者仍然只占极少数。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还没有回到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在对战争的态度上陷入分裂。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坚决支持战争的，其中大多数人十分不愿意同德国单独媾和，认为媾和条件很可能将是极为不利的。但无可怀疑，他们的追随者，尤其是普通的士兵们，热切地希望迅速实现和平；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是，究竟有无希望通过所有交战国参加的谈判取得全面和平；或者，西欧列强是否会拒绝谈判，从而使他们不得不在单独进行和谈和试图继续作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就西欧各政府来说，极怕俄国人单独媾和，但是也下决心继续作战，希望赢得胜利。它们于是向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不仅继续进行抵抗，而且有可能的话发起攻势，以便挽回东线的军事形势。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问题取决于德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人们知道，德国人民的贫困情况十分严重，他们中间许多人存在着不满情绪。1917年4月，大规模罢工此起彼伏，新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逐渐得势。斯巴达克派和其他左翼分子利用1916年出版的《政治书简》和同年9月开始出现的《斯巴达克书简》开展了有力的宣传运动。在俄国和西欧，不少人怀着这样的希望：德国由于国内困难重重，局势一触即发，继俄国革命之后，很快会发生德国革命。如果这些希望有任何根据的话，俄国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进行战争，至少是再继续一个短时期，以便能够以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和平。然而，无限制的潜艇战刚刚于1917年2月开始进行，美国也只是到了4月初才明确地参加了战争。英国仍然有可能等不到美国能动员足够规模的援助，就被饥饿所迫屈服投降。因此，整个说来，战争的结果究竟如何，还完全难以逆料；究竟哪个国家首先支撑不住，尚属疑问。

随着岁月的流逝，事态变得很清楚，尽管德国人加强潜艇战，然而他们想在英国农业收成之前以饥饿迫使它投降的希望将要落空；德国人赢得胜利的机会取决于是否能在美国军队到达欧洲之前，在西线取得军事突破。但是，情况也变得比以前更加明显，俄国人的抵抗力量几乎已经完全丧失。5月，彼得格勒苏维埃为声援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发出召开社会党人和平会议的呼吁，以便为实现全面和平铺平道路；6月，俄国政府被迫发出呼吁，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平。7月，一直再没有前进的德国人，在东线发起强大攻势，使他们前面的俄国人狼狈溃退。8月，德国人攻入罗马尼亚，9月初占领里加，差不多已经到了彼得格勒的附近。7月，临时政府孤注一掷发动了无法实现的反攻，顷即遭到失败。到8月底，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未遂反革命行动，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

在这紧要关头的几个月里，德国的和平运动继续加强。7月19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要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著名决议；8月1日，罗马教皇向各交战国发出和平倡议。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少数派各向俄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战争目的的互相对立的声明。双方都声称自己主张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主张各民族享有普遍的自决权，然而他们在解释这些原则方面却有极大的分歧。多数派的总方针是恢复战前状态，但应当承认芬兰和俄属（但不是普属或奥属）波兰有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波兰国家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范围内只享有过某种程度的自治。多数派进一步声明，阿尔萨斯-洛林必须永久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设立内部自治机构；它承认恢复比利时的主权，但要受到保护，防止该国成为任何强国的卫星国。最后它要求归还战争期间从德国夺走的殖民地。从实质上看，它所要求的是一种丝毫无损于德国实力，并保证德国拥有继续

扩张的手段和平；它完全拒绝德国应对其军队在战争期间侵入比利时或任何其他国家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要求。多数派实际上是一方面反对德国极端军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一方面却无意承认德国要比协约国对战争负任何较大的罪责。

少数派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方针。它明确声明主张立即结束战争，并把民族自决原则应用于尽可能最广泛的范围，但这不能意味着为了这一目的继续进行战争。它号召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摆脱同帝国主义政府的牵连，实现人民的和平。在比利时问题上，它主张完全恢复其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并赔偿其在战争中的损失；它敦促阿尔萨斯-洛林的前途应由当地居民通过公民投票解决，所有国家均应保证接受该项解决办法为该问题之最终解决。它以强烈的词句声明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并表示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但不主张以这种支持——或者实际上任何借口——为理由而继续进行战争。总的说来，它的态度是应立即实现和平，在将来应把战争看做非法；和平条件应由工人制订，强制政府实行。关于“战争罪责”问题，它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它暗示，  
126 德国政府犯有错误，要求它予以纠正，虽然它决不是说协约国政府对战争丝毫没有责任。只有累德堡走得更远，他号召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促使战争结束。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就全体来说，并没有要求进行世界革命，只是要求马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但是，实现和平的条件并不具备。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和工人运动中的多数派依然支持各自的政府在战争中取胜，反对任何无损于德国实力的解决办法。在这两个国家，还有比利时，人们不愿意以平等身份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甚至在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也是如此；德国多数派固然十分愿意同协约国人会见，但不准备接受任何以意味着德国负有“战争罪

责”或以德国战败为基础的讨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的愿望已经渺茫，除俄国外，各国都在加紧动员，准备在明年进行决战。1917年接近年底时，德国采取了在军事管制下工业总动员的兴登堡计划，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控制的德国工会委员会同意进行合作；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裂痕愈加扩大。在此之前，斯巴达克同盟及其盟友于1917年10月着手在军事工厂中组织革命的工人委员会，并把许多斗争性很强的分子派到军队中，一方面削弱了工业战线，一方面对在这些军队中扩大骚动起了主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解决了主张单独媾和的问题。12月3日开始停战谈判，12月15日签订停战条款。同日，布尔什维克解散了俄国立宪会议。一周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谈，俄国人十分痛苦地得知，德国当局企图向他们提出苛刻的条件。

在德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国内形势。极左派表示 127  
热烈欢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一派人则极为仇视，他们强烈谴责解散由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这实际上是极少数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对社会民主原则的背叛。作为许多被罢黜的孟什维克领导人的老同志，并强烈同情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党国际主义派的考茨基，很快就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在他的影响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议会派开始急剧向右转，其他一些人，如果德堡等，采取相反的路线，逐渐和产业工人左派发生密切关系。1918年1月至2月间，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迅速强大起来的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很快地就从这一城市扩大到另一城市。担任柏林工人委员会主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里夏德·米勒，成为这一运动最突出的领导人。俄国人曾暂时中止和谈，但由于列宁坚



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和平，于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根据条款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与资源，包括承认德国占领的乌克兰独立以及把芬兰、波罗的海各国与俄属波兰从新建立的俄罗斯国家分割出去。3月，德国人因东线的压力由此而得到缓和，并且可指望从乌克兰得到供应而使粮食情况好转，于是在西线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使协约国军队濒临惨败的边沿。直到6月他们的进攻才被制止；甚至在7月，又重新恢复了几夭，协约国的反攻方才开始。战争终于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奥匈帝国企图在6月发动的进攻早已破产。就在6月，维也纳发生了面包暴动；整个奥匈帝国在波希米亚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显然正在土崩瓦解。早在5月，劳合·乔治即已宣布：  
128 布：协约国击沉德国潜艇的速度，已超过德国建造潜艇的速度，而协约国建造新军舰的速度已超过德国击沉它们的速度。7月底以前，德军已经在法国撤退；从8月到9月，它们连续遭到惨败。9月24日，陆军总部通知德国政府必须要求停战；3天之后，兴登堡防线崩溃。在美国远征军的支援下，协约国军队势如破竹，通过法国和比利时，侵入德国本土的威胁已迫在眉睫。10月3日，德国政府倒台，巴登亲王马克斯被任命为首相。第二天，德国和奥匈帝国照会威尔逊总统，要求在他1月8日宣布的“十四点”的基础上实现停战。

战争终于结束了，但不是以通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平局，而是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尽管俄国军事上崩溃了。但是，德国人民仍然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什么地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已在战场上最后被击败；多数人在“十四点”的鼓舞下，依然希望实现这样的和平；德国将仍然是个大的强国，同时给它带来一个民主的立宪政权，使他们能够恢复战前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宣传鼓动。然而威尔逊总统和欧洲协约国一样，无意同一个仍在军国主义者和

容克地主控制下的原封不动的德国达成协议。他对马克斯亲王的答复，表明他坚持要德国投降。马克斯亲王在绝望中问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有希望继续作战以便争取较有利的和平条件，得到回答的是，继续作战已不可能，彻底崩溃随时均可能出现。军事形势已经绝望的消息透露出来之后，人们开始谈论，说服德皇退位以便求得威尔逊总统的谅解；已经同意参加马克斯亲王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开始要求实行这样的解决办法。德皇早在10月3日已经离开波茨坦，逃往陆军总司令部，以后的几个星期他一直留在那里。马克斯亲王深知，在德国，随着广泛传播，知道灾难即将来临，群众的情绪愈来愈转向反对威廉二世，他希望德皇能自愿退位，但拒绝逼迫这位不甘心下台的“至尊”放弃他的权威，仍然指望能保全君主政体。然而，德皇拒绝退位，而由于政府仍然犹豫不决，不愿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形势继续恶化。10月24日，海军当局命令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一直被禁锢在港口中（主要在基尔）的德国海军，准备出海与敌人最后拼死一战。早已骚动不安的水兵，拒绝服从命令；逮捕他们的领导人只不过促成了暴动的发生。11月3日，基尔的水兵哗变，选出水兵委员会负责领导，其他港口很快也都发生兵变。在这以后几天，德国普遍发生暴动。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宣布革命，主要以工人士兵委员会为基础的临时政府，暂时掌握政权。11月7日，革命扩大到巴伐利亚，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艾斯纳（1867—1919年）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两天之后，柏林本身已宣布革命，并由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发表一项宣言，要求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哈阿兹、累德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同一天，马克斯亲王辞职，并把首相职务交给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导人中最右翼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年）。艾伯特接受了这个职务，尽管从宪法上说，他的地位并不明确。德皇不顾从柏林连续派到陆军总司令部的使者的

劝告,直到最后仍然拒绝退位。而且,差不多直到最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虽然认为德皇必须退位,但拒绝为此发出任何公开要求,因为担心这样会使革命激情更加高涨;实际上,他们似乎抱着这样的希望:如果能把德皇和不得人心的皇太子这两个障碍清除掉的话,人们还可以接受立宪君主政体。只是到了最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唯恐他们的追随者大批投向独立社会民主党,才向马克斯亲王提出最后通牒,表示除非德皇于第二天退位,否则他们为了自卫,将不得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即使这个于11月8日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未能迫使德皇屈服。德皇退位这个“事实”,只好不得他同意就代他宣布;甚至到了这个时候,艾伯特似乎还希望有可能维持一个立宪形式的君主政体。最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不是艾伯特,而是谢德曼;这样做是为了抢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前面,据说李卜克内西即将宣布的不仅仅是“共和国”,而是以一年前俄国的作法为榜样,宣布成立“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共和国”。谢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他宣布任何形式的共和国,艾伯特对他大发雷霆;但事已如此,而且由于威廉二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逃往荷兰,等于批准了共和国的成立。退位问题马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整个德国,国王们、大公爵们和小的统治者们都几乎毫无抵抗就滚下了他们的宝座。

在最初这个阶段,德国革命几乎完全是不流血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除了拒绝进行任何企图镇压革命的行动,在有些场合公开同聚集在大街上示威群众表示友好,被动地起了一些作用外,并没有参加进来。许多团队退出了士兵委员会,离开前线后,军纪多半已荡然无存。但是,不论在停战谈判进行期间以及以后,还是在德国军队撤出依然由它占领的领土,有条不紊地撤退到11月11日确定的防线以外的時候,前线依然保持着秩序和纪律。只是在筋疲力竭的入伍士兵接近家乡急于回家时,他们的军纪才最后

涣散。他们大多数渴望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生活，而根本不想望什么革命。战争已经过去，德国无论在革命方面或反革命方面，几乎都没有武装力量。即使以其起义揭开革命序幕的基尔水兵，也接受了在发生叛变的第二天前往基尔用好话约束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7年)。实际上，他们表现出更热心于纠正他们自己感到不满的弊端——伙食太坏、条件恶劣以及无法忍受的严格纪律——而并不热心于目光更加广泛的革命事业。权力从原来的帝国政府，既不是落到革命军队手中，也不是马上落到任何新的权力中心手中。政权暂时广泛分散在各地方或各地区临时组成的政府手中，这些政府的组成情况极不相同，在德国大部分工业区或起码是在大城市，工人士兵委员会似乎是构成政权的主要基础。 131

协约国和威尔逊总统要求废黜德皇并结束军国主义统治，实际上是希望德国发生暴动。虽然如此，他们又非常惧怕德国革命走得太远，最终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有些人主张协约国军队开进德国，在柏林强制对方接受和平条款，一举清除德国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因为，如果把原来的政权和它的对立面同时摧毁，那么还能建立什么样的新政府呢？这个新政府又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呢？其中多数人似乎认为最好是让德国军队自行复员，暂时站在一边，必要时，可利用保持封锁的办法，用饥饿迫使革命屈服。他们还不准备宣布和平条款。当时口头上还必须大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因为德国是根据这个“十四点”才接受停战的。经过几个月的争论，才就如何能最好地使美国总统的话不致束缚手脚，而向德国政府(不管当时是什么样的政府)提出一项可强迫它接受而不再有任何争论的和约，达成了一致意见。1918年11月，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没有会想到，和平是这样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他们为本身的问题忙

得焦头烂额，而且已经是一败涂地，无暇考虑什么和平条款。

因此，1918年11月德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某些能够在国家处于灾难的情况下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计划好的，而是由于过份紧张的战争使德国的军事力量终于崩溃，加上德皇的顽固不化，为时太久，妨碍了试图以建立本可以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以及左派和中派资产阶级政党完全满意的立宪政体来防止发生革命的一切努力。尽管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极端害怕革命，并尽量阻止其发生，但它仍然发生了。它的发生，是因为愤怒的人民对把灾难带给他们的军阀们憎恨到极点，所以，在他们一出现在街头，旧政权就土崩瓦解的时候，在沮丧的军队毫不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时候，在政权似乎随时等待第一个能够充当群众首领的人伸手来夺取的时候，他们只好起来革命了。不久就完全可以看出，德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德国工人的大多数——发动革命只不过是推翻名声扫地的王朝和它的那些反动的寄生虫，至于以后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革命者完全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但他们寥寥无几，而且受纪律约束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和资产阶级与反动的容克地主和军国主义分子一样反对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关于它失败的经过，将在下一章叙述。

(李鹏远 译)

## 第五章

133

### 1918—1921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1918年11月初，霍亨索伦大帝国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社会民主党人着手建立政府以收拾残局，因为老实说，再没有别的政党会掌权了。在这样的绝境中，两个尖锐对立的社会民主党携手，但不同心，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以原马具工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担任总理。新政府开始时包括三个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兰德斯堡——和三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果·哈阿兹、威廉·迪特曼（1874—1954年）和保罗·巴尔特。他们六人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及时签署已商定的停战协定来结束战争。这一点马上就做了。他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其紧迫性不亚于第一个问题，这就是决定他们的政府是什么性质。德国依旧是一个君主国呢，还是应当变成共和国？如前所述，谢德曼公开宣布（这使艾伯特很恼火）共和国已经建立；而德皇逃往荷兰就等于是在这项宣告上盖了印。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德国究竟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因而必须在同旧制度迥然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崭新的制度呢，还是继承旧帝国的行政机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许许多多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中有关于国家的联邦体制问题。由于诸侯统治已在德国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崩溃，因此必须马上决定是否仍旧让旧的地区划分保持原状呢，还是新的共和国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二，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军队问题，即必须将撤其回国内并设法加以复员。为此目的，应该使他们继 134

续受现存的参谋部的领导并服从原来各级军官的指挥呢，还是应把权力交给士兵，而由已经在一些部队（不是所有部队）选举出来的士兵和水兵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来执行？第三，对文官和政府部门应该怎么办？他们是继续保持现有的官阶，象以往那样照旧任职，仅仅指示他们执行新政府的命令呢，还是把他们赶走，而代之以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批不懂专业的社会党人，让这些人尽最大努力学会所担任的工作？第四，对法官和法庭怎么办？是不管他们是由一些臭名昭著的人所组成，而在还没有时间和机会更换之前，继续让他们掌管现存的法律机关呢，还是将他们清除而临时拼凑一批新的审判人员来掌管将代替旧法庭、但是还不存在的新的司法机构？

这些就是全部的难题。总之，这些问题加在一起就是，革命是意味着制度的彻底改变呢，抑或仅仅是君主的下台和对旧的国家机器加以改革，而不是摧毁？当然，毫无疑问，在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看来，象普鲁士的三等级选举权这种极为反常的东西应予清除，并实行其他许多民主改革。但是，在那些想要以革命的名义立即实现剧烈的体制变革的人们，和那些认为这类问题应尽可能留待一旦可能实现最广泛的选举权时就将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去解决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实际的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们辩称，只有后一道路才符合民主，一些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赞同他们的见解。可是，大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则不然；他们要趁热打铁，在号召人民选举他们的议会来批准这种变革并使之具有宪法形式之前，先尽可能牢固地建立新秩序的基础。一些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极左团体，当然包括斯巴达克派和革命车间代表组织，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希望胜利的无产者工人、士兵和水兵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而充当德国民主的真正代表，并将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些人则希望由一批革命的

骨干掌权,即使委员会不支持他们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少数人奋勇当先,大多数人就会跟随。可是,在革命胜利的时刻,既没有任何统一的委员会代表大会,以便能将权力交给它去行使,又没有任何能够在全国范围掌权的有组织的革命骨干。当时既没有任何机构相当于批准发动俄国 1917 年 11 月起义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没有任何党的组织相当于使那次起义得以发动的那个久经锻炼的革命政党。

这样就有了三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又没有一种完全符合某一政党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起码他们的领袖们,一致主张现存的国家机器能有多大用处就尽量使用,只要用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当总统以代替皇帝,一直到能够召开立宪会议起草一部新宪法,并使法律适合新秩序的需要为止。大多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虽同意他们关于需要一个立宪会议的主张,但是对于在眼前通过旧的国家机器去行使职责这一点,则十分踌躇。大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权力暂时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手中,马上召开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政府对之负责,而且在立宪会议选出之前就实行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上是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三种倾向则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内和党外一部份团体为代表,认为立宪会议在任何时期都根本无用,把它斥之作为一种陈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但这些人又分成两派(虽然还不明显),一部分人鼓吹实行工人的“群众专政”,一部分则鼓吹由少数革命骨干来掌权。这两派人自然都说自己遵循俄国的榜样,都说自己是主张进行“苏维埃”式的革命;在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可以看到早先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专政方式问题上的分歧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在更早的时候布朗基的追随者和马克思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的影子。

新政府必须作出决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政府各部



门和文官们。如果为了满足人民的愿望并使国家完全团结一致，似乎就迫切需要让文官和行政机构继续工作。但是，除非对之牢牢地加以控制，就无法完全相信它们不破坏革命；而新的六人执政集团又没有自己的班子去替代旧日各部的长官。他们决定留用各部部长为首的旧的行政官员，但每个部都派一名由各派选出的社会民主党人来监督他们，保证他们奉行政府的命令。这是一个将会带来致命后果，但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因为其结果是把那些几乎普遍抱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情绪的旧官僚们引入了新秩序之中。与此相似，虽然许多人，甚至连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内，都希望摧毁普鲁士的霸权地位而将共和国建成为一个统一的德国，但这样大的变动看起来一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通过决议之前是根本无法改变联邦体制的。法官和法庭也被留下来继续行使职权；军队的复员工作仍然由军事部门和兴登堡将军领导的最高统帅部负责进行。

这些安排有的使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深感忧虑；但他们又不知所措。从一开始，旧的行政官员和军事首领同意和艾伯特以及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共事，而不同意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共事。在名义上，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平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只能提抗议，象他们一再所做的那样，但如果提不出他们自己的明确的替代政策，他们的抗议就不会有什么效果。然而，他们却制定不出这样的政策。一方面由于他们自己彼此之间意见不同，但更主要地

137 是由于他们在各工人士兵委员会中不拥有明确支持他们掌权的多数。当工人士兵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2月16日召开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控制了大会，几乎立即决定在尽可能早的时刻把权力交给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这就使得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再也没有提出另外一种方针的牢固基础，除非他们准备追随极左派

发动一次武装起义以便建立少数人的专政——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准备这样做的。

即使在柏林，左派在工人士兵委员会中也未能掌握多数。革命期间在德国各地和军队中普遍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员会，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倾向。一般地说，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极左派在大工业城市里和在国内的军队中是极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则控制着大部分较小的城镇，在前线和后方的军队中也占据着优势。但也有许多例外。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影响一贯微弱的某些地区，例如在大部分人信奉天主教的鲁尔地区，这时却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巴伐利亚这个农民委员会有相当规模发展的唯一地区，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地方政府的整个时期，独立社会民主党都占据着上风。巴伐利亚的确是一个充满极端行为，政治上极不稳定的地区，在几个月以后，它就变成内战的主要中心，这时就很快地看出了这一点。不来梅在波兰人卡尔·拉狄克(1885—?)的鼓动下，成为极左派活动的著名中心，萨克森也是左派的一个堡垒。在柏林当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革命车间代表组织主席里夏德·米勒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从一开始就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斯巴达克派密切地合作，但是不久，由于斯巴达克派和革命车间代表组织之间在左派对工会和对政治行动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产生分歧，便出现了危险的裂痕。的确，这两个问题在左派力量的团结上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德国的自由工会运动在熟练的老工会工作者卡尔·列金的集中控制下，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战争，并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紧密合作。138 尽管它的影响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相当大，但却是有限的。在革命发生前，铁路职工作为国家雇员都不准加入该工会；在信奉天主教的地区，面对着和中央党有联系的各个独立的天主教工会的竞争，它的力量也相当微弱。即使在它的势力强大的地区，由于

它对战争所抱的态度，也妨碍了它有效地参加推动战时罢工运动或左派的政治鼓动，而这些罢工运动除了在一些地方是受极左派的影响外，大部分是在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下发展起来的。甚至连斯巴达克派直到发生革命为止也大部分不太紧密地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当革命爆发时，左派很自然地就把正式的工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看作是他们的敌人，并考虑自行组织一个与之对抗的群众运动。工会意识到这种危险，于是就在革命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事实之后，赶紧参加了革命。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对工人作出让步——提高工资以适应物价的上涨，八小时工作日，有组织各工种的工人的自由；而临时政府没有等待立宪会议就急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因而，工会会员的人数飞速增加，战前属于自由工会委员会的成员大约是200万人，而革命尚不到一年时，就增至约800万人。工会正式表示继续不参与政治，而把自己局限于单纯争取实现工人的要求。它也不去要求国有化。因为由于战争结束后工业处于混乱状态，人们普遍认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竭尽全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不但反对极左派，而且也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

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而不管它在政治上同情哪一方，因为工会是为他们当前提出的要求而斗争的。这使左派感到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一条方针是切实可行的，那就是接受这一现实，鼓励工人们参加工会并在工会中起积极作用，同时<sup>139</sup> 尽力争取他们转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边。但是也有不少的极左分子认为现有的工会十分反动，已无可救药。他们主张同工会决裂，而以战争时期的革命车间代表组织作为核心，在阶级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对抗的群众性的产业工会运动，使这种新的工会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行这一方针的困难在于：实际上这样一个运动决不可能使旧工会的大部分会员脱离

该工会，结果只有少数人脱离，要想靠这少数人来有效地谈判争取当前对大多数工人有利的让步是不可能的。希望由少数革命骨干迅速掌权的极左派，没有因为害怕出现这种前景而裹足不前，但是大多数忠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则不敢造次行事，只有在那些工会力量特别薄弱的地区除外。大多数人，甚至连革命车间代表组织的大多数人拒绝追随那些不妥协分子的领导，而继续留在现存工会里。即使在斯巴达克同盟左派中，连仇恨宗派主义并把希望寄托于群众的革命潜力的罗莎·卢森堡，也未能阻止那些不妥协分子，而不得不在行动方针上勉强地追随他们，而她明知这一行动方针很可能要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第二个分歧——关于议会方面的政治行动问题——也使左派陷入严重分裂。实际上，整个左派在下面这些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无须等待召开立宪会议，就应该着手巩固革命，办法是：摧毁容克贵族和军国主义的基础；分解东部地区的大庄园，使文官和司法制度民主化；将警察置于新秩序的牢固控制之下；建立革命工人的武装小分队；工业和财政必须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工人管理的统一公共法规的管制。然而，他们对于德国的新的政治体制应采取什么形式这一点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在主张积极行动的人们当中暂时占多数——主张实行某种“委员会”政府的形式，即主张政府长期从属于代表工人的各委员会而排斥旧的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另外一部分人，虽然也认为政府暂时从属于工人士兵委员会是对的，但希望建立一个民主选出的立宪会议，而由该会议在普遍的公民投票的基础上通过正当的手续决定德国未来的体制。后面这些人大部分还希望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直至革命已经进行到能够防止旧制度的复辟并能确保接替它的政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样一个阶段为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则主张，尽可能快地选举立宪会议，新制度应是什么样

的性质则应该留待该会议来决定。当在工人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决定立即加紧进行选举时，左派不得不决定他们对此应采取什么态度。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虽曾希望推迟选举，但是，对他们应参加选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极左派却陷入严重的分裂。斯巴达克派及其同盟者知道得很清楚，在一次以普遍的公民投票为基础的选举中，他们得不到多少代表席位。他们不仅要求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而且主张完全取消该会议而支持“委员会政府”；他们决定抵制选举，而不愿仅仅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去参加选举。临近12月底时，斯巴达克派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意见，脱离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自行建立德国共产党，决定抵制立宪会议的选举。斯巴达克派在作出这些决定时，无疑地确信他们是在忠实地遵循俄国人的榜样。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希望在德国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然而，布尔什维克是直到他们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以及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保证得到多数支持时才这样做的，而斯巴达克派却甚至在柏林也没有这样的多数。他们着手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布朗基主义式的政变而已。

141 然而，在他们看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理由。俄国人在一个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衡量根本无条件实现任何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里赢得了革命胜利，这证明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至少在西欧取得统治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使俄国也不能与之相比；而且大战注定要以一次大规模的欧洲革命而结束，德国将在这次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这些都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显然，德国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并非俄国人所指的那种革命；它充其量只不过是第一阶段，相当于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必须进一步进行一次相当于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起义那样的革命。

这不仅因为德国作为工业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已具备了这种革命的前提；而且因为如果不进行这样的革命，等于是背叛了俄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使之失败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敌人之手。布尔什维克自己也持这种看法，而且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走向注定要发生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第二步。德国的左派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得不到大多数德国工人的支持就畏缩不前，简直等于是背叛行为。拯救俄国革命使之免于失败，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历史使命；如果说广大的德国工人还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应该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少数人采取坚决行动来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并不是只有斯巴达克派被一种把德国革命从尚未完成的第一阶段推向前进的责任感所策励，或者想要设法援助受到重大压力的俄国人。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强加给俄国政府头上的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也是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赢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整个独立社会民主党都认识到，不向现存的秩序发动坚决的进攻，并有效地将各级权力转到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就不会取得真正革命的胜利。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他们所得到的支持太少了。面对着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工会，而且还有那些渴望解甲还乡的多数军人的敌对态度，<sup>142</sup>他们是没有力量发起第二次革命的。因此，临时政府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如坐针毡，无法阻止他们同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千方百计地妨碍革命并维持旧的国家机器，直到新宪法起草和通过为止。

如何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革命左派，是这个阶段的一件至为重要的事。然而，不管是政府或是其反对派，实际上都没有多少可依靠的军队。在革命初期，一些小的军人团体曾经参加保卫共和国，但这些团体的忠诚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在柏林，虽然社

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奥托·韦尔斯(1873—1939年)担任了卫戍司令,但警察却掌握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埃米尔·艾希霍恩手中,而且占据城堡的水兵师成员中左翼分子占有优势,随时准备作乱。不少从前线撤回来的团队驻扎在柏林周围,但是,他们是否会接受命令去反对左派,殊难料定。政府,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都想遣散水兵师,至少把它削减到有名无实,但该师表示反抗,并公然提出讨价还价,而当局则表示除非接受它的条件,否则没有还价的余地。争论的结果,水兵师采取了行动,在韦尔斯的办公室里逮捕了他,而且,当艾伯特拒绝接见代表团时他们就占据了总理府。

艾伯特随即打电话给陆海军部长格罗纳将军,召集军队解放总理府。格罗纳调动士兵进入城市。准备同叛变的水兵师作战。政府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设法阻止这样做,而且在军队表示将要炮轰水兵师指挥部的城堡时,连艾伯特也退缩了。但是他屈从了陆海军部军务局的意见,或许是默认了上述决定。12月24日黎明,炮轰开始了——反革命的第一炮打响了。然而,士兵们却不愿战斗。当水兵师的士兵们释放了韦尔斯,并答应与政府达成协议时,格罗纳将军的部队开始撤离,停止同仍占领总理府的水兵师作战。这时刻或许是左派夺取权力的最好时机,但它却毫无准备。相反,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令人厌恶地从政府辞职,就这样把权力完全交给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反动派的支持下,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借口而自由行事。

但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对军队(艾伯特曾乞求军队给予援助)所采取的行动大为震惊。由于他们设法寻找一支能够赖以反对左派的军队,他们无奈而采取了一种造成灾难后果的权宜之计——组成了“志愿军团”<sup>①</sup>。该军团主要由旧军队中即将复员的军

官和士官组成。这些“志愿军团”的部队（其第一支部队在城堡作战后一周到达柏林附近）以后几乎立即就成为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突击队。虽然他们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政府效力，但是，他们除了把这个政府当作在眼下提供工作和工资，并使反叛的无产阶级就范的工具之外，也就再没有什么可利用它的地方了。革命初期由于在基尔平息了水兵的哗变而显示出能力的古斯塔夫·诺斯克，作为新成立的由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组成的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成为对此举负责的首领。他以惯用的粗鲁方式替自己辩护说，总得有人承担作为“警犬”的丑名。与此同时，没有作出什么值得夸耀的成绩的韦尔斯的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被名义上是方济各会修道士的安东·费舍尔所取代。于是首都的右派和左派都在为重新展开斗争作准备。

前面已经一再说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离开临时政府而铸成了灾难性的错误，从而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大权独揽。确实很明显，这极大地帮助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控制在革命期间取得权力的各地方和城市政府。不过，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究竟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也很难看出。如果他们仍然留在政府中，那他们就得同 144 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共同为当局反对左派的行动承担责任，因为，不管他们提出多么强烈的抗议，他们也不能阻止艾伯特和谢德曼以他们的名义采取行动。如果出现了各种命令互相冲突的情况，陆海军部和文官们也一定是听从多数派部长们的命令，而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实际上被迫处于要么辞职要么投降的境地。而仅仅辞职还是不够的，如果他们打算有所作为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转而采取坚决而积极的反对态度。但是，这意味着与极左派妥协，并准备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上。他们之

---

① 实际上就是雇佣部队。——译注



中有些人，如一开始就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结成联盟的格奥尔格·累德堡，就已经准备这样做了。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仍踌躇不前，这主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追随者有很多人要和平，不要内战，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他们的主张。因为，如前所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不过是一个形形色色人物的大杂烩而已，从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到热烈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从议会主义者到那些认为代议机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的人，应有尽有。

这样，当新的临时政府继续准备对左派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清算的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只能是提出抗议。此后，事态急转直下。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共产党；1919年1月4日，政府免除了艾希霍恩柏林警察局长的职务。次日，反对政府的群众游行示威在首都风起云涌。示威者很少遇到抵抗就占领了警察局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主要报纸《前进报》的报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最初在因艾希霍恩被撤职而提出的挑战面前举棋不定，这时则随着号召进行总罢工而投入斗争。1月6日罢工开始，得到了相当多的群众的支持。第二天，诺斯克加入政府任国防部长，担负了镇压暴动的任务。左派看到：妥协的时候已经过去，便对政府宣战，成立了由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保罗·朔尔策联合担任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强有力的革命车间代表组织的领袖里夏德·米勒却没有参加。米勒的确象其他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样，对整个事态抱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故意挑起的。在诺斯克调动其志愿军团对左派的据点发动进攻之时，曾有短暂的停息。接着志愿军团就开进市区，炮击并摧毁了由装备很差的起义者所占领的建筑物。政府的这支新军队当然是不会拒绝作战的：他们热中于袭击那些造反的贱民并无恶不作。被占领的建筑物又被夺回，市中心被廓清。然后，志愿军团转而攻击曾想坚持斗

争的郊外工人区。双方作战的人数甚少，柏林大部分居民只是袖手旁观。1月13日，战斗结束，失败了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取消了总罢工。左派的领袖们藏匿起来或逃离柏林。两天后，志愿军团的一支部队捕获了仍留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未提交审判就把他们杀害了。此后不久，卢森堡多年的最亲密的同事利奥·约吉赫斯也同样被杀害了。

这些人的死对德国的极左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一下子失去了主要的领导人。诚然，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理论家，但他却是左派的一位杰出的鼓动家，由于他具有彻底而热烈的忠诚和对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深恶痛绝而深受人们尊敬。早在1914年之前，在他父亲的名望的支持下，他激烈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国民族主义倾向，而且被罢去了该党青年运动领导人的职务。战争期间，他不屈不挠地进行他的反军国主义运动。1915年，他被征召入伍，在士兵中进行鼓动，因其活动而被捕入狱，直到革命前夕巴登亲王马克斯的政府宣布大赦才获释。不久他又重新成为主要由他发起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后来他虽被该组织中一些更激进的领导人所压倒，但他认为在危急关头他有责任同他们一起行动。也许，他并非一位英明的领导者；的确，他是一个不善于谋划和缺乏组织才能的人，可是他忠心耿耿，真诚无私，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他的地位。

约吉赫斯与李卜克内西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在幕后出谋划策的人，而不愿为此而求得荣誉。他作为一个波兰人，在左翼的波兰社会民主党里长期同罗莎·卢森堡一起做地下工作，他是卢森堡的情人，同时又是她的忠实助手。他虽然没有什么著作，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实干家，更不如说他是一个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的著述大都归功于他的思想。在战争的年代里，他把他的精力献给了德国左派——特别是斯巴达克同盟的活动。他的死对革命的社会主

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最大的损失还是罗莎·卢森堡的死。她的经历和她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战略的看法，在本书的前一卷中已作了论述，在这里无须重复。<sup>①</sup>在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只有罗莎·卢森堡堪与列宁相比。多年来，她同列宁在民族主义和革命战略这两个问题上有过分歧也有过一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她反对列宁所坚持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她反对波兰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宣称波兰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把反对沙皇制度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在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基本上是国际性的斗争中，必须超越民族的界线。列宁认为应该对被统治的民族要求独立和建立自己的政府的要求让步，她拒绝这样做，因为在她看来，世界革命决不意味着划分新的界线，而是清除现有的民族界线。她至少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地怀疑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奉行的政策；因为，虽然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她所主张的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而不是一个自诩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集中而独裁的政党对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和列宁不同，罗莎·卢森堡不信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经过训练的骨干分子。她相信群众的革命精神，相信群众自己有能力进行并完成革命。在1917年11月以后，她曾担心俄国会出现以革命的名义把群众置于自己奴役之下的一种新的职业官僚制度。直到1921年保罗·列维(1883—1930年)出版了她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她的这种担心才广泛地为人所知；即使在当时，人们对此暂时仍然未予以注意或未能理解。

即使卢森堡对党的“集中制”感到担心，但是她对她为之而生存的革命事业总是满怀信心。在德国，她是革命方面的一个伟大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11章。

的智慧力量，也是年青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人物。她除了<sup>148</sup>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外，还是一位在文化方面学识渊博、造诣颇深的妇女。她曾是饶勒斯的亲密朋友，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尽管她身体畸型——她是一个驼背——但她具有极大的魅力。她的被害，在整个欧洲都认为是残暴行为。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死，发生在1月19日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前仅4天。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虚弱，他们只获得占总数5%的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则获得总席位的39%。但是，这也表明这两个社会民主党即使联合起来仍是少数。重新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党，虽然他们彼此分裂，但仍是一支能够在新的德意志国家的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面对这样的结局，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联合在一起，也不能再要求以议会民主的名义来统治这个国家了。何况他们不但不能联合，彼此之间的斗争还愈演愈烈。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3,000万选票中获得近1,150万张票，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得到了600多万张票，民主党人获得550万张票，甚至连极端的保守党人还获得了300万张票，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却只获得最多不过225万张票。除了同不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似乎已别无他途；于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同意与民主党人和天主教中央党共同执政。这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议会中拥有相当大的多数，但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再拥有代表社会主义的权力了。对这样一个联盟，充其量也只能指望它确认共和国，并且按照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它制定一部代议制宪法，同时对极左分子进行某种控制。

然而，鉴于新政府在同左派进行斗争中所依靠的力量的性质，要做到最后这一点，也并非容易。无论柏林的失败或是选举的结

果，都没有使左翼反对派消失。工人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固然已仓卒地把它认为应该对政府行使的权力交给了国民议会手中，但是更多的左翼地方工人士兵委员会仍坚持反对态度；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也由于吃过失败的苦头，又日益受到诺斯克志愿军团的威胁，而急剧向左转。1919年3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声明，支持工人士兵委员会，反对议会政府，从而大部分站到革命的一边。

在此以前，在德国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在革命者的大本营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在2月初被推翻。在巴伐利亚，在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斥责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后刚刚返回来的库尔特·艾斯纳，于2月21日被一个狂热的反动分子——阿尔科伯爵所暗杀，这使温和的左派失去了为数甚少的杰出领袖中的一位。巴伐利亚在传统上是天主教和反动势力的一个堡垒，它之所以很早表态支持十一月革命，主要是由于那里的人民憎恨普鲁士人，为普鲁士独裁统治的塌台而欢欣。如前所述，巴伐利亚乃是德国唯一的一个以相当广泛的规模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的地区，艾斯纳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但他在一个时期使他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牢固地掌握了权力。可是，巴伐利亚人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忠诚。他们只是比以往更加急于要保持他们地区性的独立和使他们自己摆脱普鲁士的灾难。艾斯纳的死，使他们失去了唯一的一位能够把政府团结在一起的人物。支持他的左翼分子冲入艾斯纳被害的地点议会，杀死了两个资产阶级的代表，重伤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部长E·奥尔（1874—1945年）。议会被解散了，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市政府。但是，巴伐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一个“委员会”政府，巴伐利亚工人士兵委员会的一次代表大会拒绝这样做，两个社会民主党在压力下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阿道夫·霍夫曼为首的新

的社会民主党内阁。这个政府当时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纲领,其中包括一些不但遭到资产阶级反对,而且也引起农民反对的社会化措施。在压力下,它被迫同意重新召集被解散的巴伐利亚议会。在这个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只占少数。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员会由于害怕议会将推翻内阁,所以表示支持由“委员会”进行统治;而内阁则惊恐万状,终于同资产阶级政党妥协,首先使自己从慕尼黑迁到纽伦堡,然后又迁到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在这里左派的追随者寥寥无几。慕尼黑的反叛者后来建立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委员会”政府,因为它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而共产党人则拒绝合作。但是,这种奇怪局面维持不久,它自己的“共和国近卫军”就试图将它推翻并恢复霍夫曼政府。这样一来,就使迄今为止站在一边的共产党人加入了战场。以俄国犹太人欧根·莱菲内(1871—1919年,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位有经验的革命家)为首的共产党人不但打败了共和国近卫军,而且赶走了“委员会”政府,代之以在他们自己控制下的新的苏维埃政府。他们建立一支小型的“红军”,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青年知识分子,当时25岁的恩斯特·托勒(1893—1939年)担任指挥,并着手在该城市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而,支持他们的人,即使在慕尼黑工人中也寥寥无几,而在巴伐利亚其余部分则几乎连一个也没有。霍夫曼政府十分软弱,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进攻慕尼黑,于是求助于符腾堡政府和帝国政府,这两个政府都派兵前往援助。这两支军队迅即向该城市进击,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该城。在最后阶段,虽然以托勒为首的第三届苏维埃政府已经赶走了莱菲内而掌握了权力,但是一当进攻者到达该城,它就垮台了。

后来许多人说这几届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在短暂的执政期间都犯下了野蛮屠杀资产阶级的罪行。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直到他们进行抵抗的最后时刻为止

曾经杀过甚至一个人。在此期间，只有七八个人质确实被红军的散兵游勇所枪杀。除此之外，屠杀是后来由敌对一方进行的。得胜的反革命分子用大屠杀来庆祝“赤色”慕尼黑的陷落，甚至连举行一次纯粹非政治性的社交集会的21个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以及其他无辜者也未幸免。接着进行处决，其中包括莱菲内。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古斯塔夫·兰道尔(1870—1919年)死于战斗中。托勒逃走了，后来成为著名的左派剧作家。

慕尼黑革命者的被一网打尽，以及继之而建立的军事统治，摧毁了巴伐利亚的社会主义，并使这个城市变成了极端反革命的据点。慕尼黑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温床，4年以后，希特勒作为鲁登道夫和民族主义极右势力的同盟者，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企图夺取权力而未能得逞。慕尼黑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只不过是荒谬可笑的，如果说不是一场悲剧的话。因为，事实上，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在人民当中根本没有基础，没有通过革命的政变而建立政权的任何机会。兰道尔和莱菲内的冒险行动仅仅有利于反动派，给诺斯克手下那些嗜血成性的暴徒们提供了血腥屠杀的大好机会。

当慕尼黑的悲喜剧正要收场时，在德国的其它地方也在发生惊人的事变。其中最惊人的是1919年3月的第二周在柏林重新爆发的战斗。2月份，在德国很多地方已发生了大规模罢工，特别是在鲁尔煤矿，矿工们组成了强有力的新工会。该工会要求承认工人委员会，为此它要求参加管理企业的权利。在其他工业部门和地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总罢工席卷了德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有一个时期实际上孤立了国民议会，以后又在魏玛开会起草新宪法，并草拟对德国现行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所必需的措施。3月初，在由里夏德·米勒任主席的柏林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罢工延及柏林。由于罢工，但并非是罢工领导人的命令，人们成群结伙走上街头，在水兵师残余分子和其他一些左翼派别与柏林警察——这时

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欧根·恩斯特(1864—1954年)指挥——之间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诺斯克志愿军团奉命增援柏林警察，起义者被迫撤出市中心，竭力死守东柏林。当诺斯克的军队攻进工人区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虽然无疑双方都有暴行，但在1,000多被杀者中，10人中无1人是士兵。多数被杀者是被发现拥有武器的工人，即使并非企图使用这些武器也不能幸免。有30名水兵师的成员虽然并未参加战斗，被俘后也由一个军官下令而被残忍地枪杀。曾经流传和发表了许多硬说是起义者所犯罪行的道听途说，但是后来的调查证实，其中许多纯属虚构。军事当局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消灭“赤色”柏林的肇事者，残酷无情地进行镇压，而大多数居民站在一旁一筹莫展。

引起这次战斗的责任在谁，始终弄不明白。无论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指挥这次罢工的工人委员会均与此事无关，共产党与它的发生也毫无关系。就暴动者方面来说，它似乎是一次自发的起义，幕后并没有真正的组织支持他们，起初只是少数骚动分子的行动和重新组成的警察为镇压他们而采取的手段所引起的。真正的暴乱分子只是少数，也很容易受到决定性打击，主要的死亡是由诺斯克的志愿军团所造成的。

在柏林悲剧之后，罢工逐渐平息下来，因为对要求承认工人委员会一事作出了让步，虽然还没有答应依法允许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要求，也没有同意特别是由鲁尔区矿工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如前所述，在十一月革命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包括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鉴于德国的经济状况和迫切需要维持生产稳定，曾反对立即实行工业社会化这种不切实际的主张。这种观点也许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它不一定就妨碍临时政府立即采取一些一般性的管理措施，以便建立切实可行的临时性的劳资关系体制，并迫使雇主们适应公众的要求。可是，实际上



除了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在工会委员会和一个代表雇主的中央机构之间签署一个承认工会的协议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更大的问题被束之高阁，等国民议会能够有时间时再去处理它们。这种拖延引起了极大不满，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企业重新恢复，把许多工人委员会在十一月革命时期所掌握的权力拱手  
153 让人。然而，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手中，他们很快就默认了政府的决定。规模越来越大的抗议，主要来自革命车间代表组织和工人委员会，而革命期间，特别在矿山涌现的新工会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

抗议的声势甚至在1919年3月的罢工以前就已经十分浩大，使政府意识到：除非对必须承认工人委员会这一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否则将在工人中失去拥护者。但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则完全反对允许工人委员会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力应全部属于国民议会和各州所选出的议会。因此，他们便退而求诸这样的办法：在经济权力方面作出有限度的让步，以满足工人的要求；并答应依法建立一个经济委员会的机构，使工人得以通过该机构而在各级参加决定劳动条件和福利以及解决经济政策问题，以此来平息罢工的浪潮。1919年3月15日在魏玛达成的协议，规定了根据新宪法在工厂和其他企业中建立具有代议制性质的工人委员会，还规定了在较高级的组织中组成联合委员会来讨论和管理生产事务，并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工业社会化和管理的各种计划。的确，在魏玛共和国宪法中及时写上了一条以此协议为基础的冠冕堂皇的条款；但是，如果不同时通过实施这一条款的法律，则该条文等于无效。计划的一部分——即建立拥有解决诸如劳动条件、车间纪律和解雇工人之类问题的有限权力的法定的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已作为法律被通过；而且这些委员会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始终存在着。计划建立的更高级的委员会则始终没有

完成立法手续，因此从未建立。在社会化方面，虽曾通过法律规定将煤矿和电力工业社会化的原则，但实际上煤矿一直未实现社会化。唯一的变化是：战前有国家股份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加，被改组成为依然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德国煤炭工业的总协调机构。整个社会化问题由国民议会通过建立一个向它提出报告的社会化委员会来处理，并任命社会民主党和中等资产阶级各政党的大多数主要经济学家为该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及时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对十分有限的一批所谓的“已成熟的”工业实行社会化，要求的条件是，这些工业必须是既属于垄断控制之下而又不大需要进一步发展技术，或寻找新的市场或新的材料来源——这个条件实际上使所有各重要工业都不会入选。这些建议自然是毫无实际效果可言。只有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律有一点实际作用；而即使它的作用，对政府来说，也不过是防止工业中发生骚动，而并不是对工人参与管理工业的要求作出了任何真正的让步。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19年对社会化和工人管理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左翼，包括大多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感兴趣的是取得控制工人委员会的政治权力，而并不是工厂委员会法所涉及的那些事情。他们大喊大叫要实现社会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设想的并不是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而是意味着工人在某种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接管工业，以免被官僚机构或议会所控制。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则斥责这意味着每一个工人团体将会任意利用公众，并且将导致工作无效率和通货膨胀，因为物价将被迫上涨，以便增加工资。他们说，这样一来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的德国，将会因为产品价格过高而失去世界市场。不过，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同样反对以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而变相出现的那种社会化。他们争辩说，国家不是管理工业的合适机构；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进而极力吹嘘资本主义企

155 业和自由放任政策的优点。固然，他们也并非一下子就采取这种立场，他们开始时主要是争辩说，经济形势太坏，太严重，立即实行社会化是行不通的。但很快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反对意见远远超出了这一点。如本书在以前曾论述过的<sup>①</sup>，在1914年以前，德国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总是把社会化看成是一旦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取得多数后马上就会到来的事，而拒绝讨论社会化将采取什么形式。他们敌视“革命”前的社会化，因为这将会加强现存国家，即他们的敌人的权力；他们认为一切试图推测未来社会结构的作法都是“空想”而拒绝加以考虑。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例如当时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经常撰文论述社会主义的作家的奥地利人阿道夫·布劳恩——这时的说法是：马克思从未预见到社会化是什么样子，他只是设想那时将有生产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随时可以接收过来，而在1918年的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处于崩溃境地，将会向国家提出难以解决的重建问题，如果在这时接收过来，只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声誉。考茨基在他于革命前写成、到革命后才出版的一本书中声称：社会主义“改变不了由于社会上普遍匮乏而造成的贫困。它只能改变在富裕之中出现的匮乏。”这就是他反对任何过早实现社会化的企图的理由。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既不实行工人管理又不实行国家经营，那么除了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以外，他们就丝毫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1919年初任经济部长的鲁道夫·维塞尔（生于1869年）确实曾试图制订过一个以政府计划为基础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计划。但是他任职为时不久，他的继任者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罗伯特·施密特（1864年—？）上台后，他的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

---

<sup>①</sup> 见第3卷上册，第267页（中译本第279—280页）。

当魏玛国民议会建立它的社会化委员会并听取维塞尔阐述他的计划时，政府和左派之间的内战也在迅速地进行着。萨克森和鲁尔仍然是左派的主要堡垒，其中鲁尔地区曾由于达成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三月协定而暂时得到安宁。在萨克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主要政党。诺斯克的军队借口萨克森政府执行独裁政策，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出现了严重的骚乱，而在1919年5月进驻萨克森，占领了这两个城市。在革命初期，萨克森曾经由一个完全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基础政府所统治。1月，那里出现了严重的骚乱，这个政府就让位给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所控制的政府。因此，左派在整个萨克森组织群众性抗议活动，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零星的战斗。4月，在莱比锡宣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政府，这给诺斯克所要进行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借口。他派遣梅克尔将军去镇压左派，由国防军接管该地。以后几个月，在克姆尼茨和其他地区继续出现骚乱。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一直维持到1920年4月，即由于卡普暴动结果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并组成联合政府为止。1919年夏天以后，诺斯克的军队转移到其他“有不满情绪的”地区。

当国防军在1919年5月进入萨克森的时候，德国政府恰好接受了由协约国的部长们在巴黎起草的和约草案。条约草案是在一片嘲骂声中接受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大喊大叫地加入了这个嘲骂行列。人们谴责提出的条款公然践踏了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而德国政府是根据这“十四点”才提出和平要求的。确实，在许多方面条款是违背了“十四点”的精神，但抗议远远超过限度，无法再以此而自圆其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全力支持关于保留阿尔萨斯—洛林，归还德国殖民地，确定承认德意志民族完全统一的边界等要求。人们迫切要求政府拒绝在该条约，或任何给德国加上“战争罪犯”罪名或把德国当作败敌看待的条约上签字。有人

157 大喊大叫地断言说，德国军队在战场上根本没有被打败，而是由于国内战线的崩溃而被从“背后戳了一刀”。不仅军国主义者，而且某些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都指责是左派造成了国内的崩溃。谢德曼自己也宣称，无论什么都不会引诱他签署象凡尔赛条约这样一种无耻的投降条约。政府拒绝了提出的和约条款，并向协约国提出了反建议。大部分反建议立即遭到拒绝，虽然对原条件也作了某些修改；德国政府确实也曾考虑恢复战争的可能性，只是兴登堡和其他将领告诉政府说，任何军事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机会了。有些人仍然坚持宁愿进行一场无希望的战争，也不愿接受“可耻的”和平，但对大多数领导人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除了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已再无其他真正选择的余地。但是谢德曼坚持拒绝接受该条约，于6月20日辞去了总理职务，而由工会领袖古斯塔夫·鲍威尔(1870年—?)所代替，鲍威尔同样不喜欢该条约，但采取了比较现实主义的路线。不久以后，谢德曼脱离了政界，回到他的故乡卡塞尔，在那里担任市长，一直到1933年为躲避纳粹而逃往国外为止。条约在6月28日签字，最后于7月9日获得批准；协约国在此以前对德国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封锁，于7月12日解除。

在战争停止后持续很长时间的对德封锁，在革命的连续几个阶段，都是悬在德国人头上的持续不断的威胁。早在军事崩溃的时候，粮食和原料的缺乏已极其严重，德国人民一直经受着十分严重的困苦。撤出军事占领区使局势更加恶化，而由于铁路设备和车辆的损失以及军队复员的沉重负担，运输和分配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在战争结束时，德国急需进口食品和在和平时期的基础上使工业开工所需要的原料。然而，在和平条款拟定并被接受之前，胜利的协约国却无意允许进口这些必需品来减轻德国人的困苦。此外，拒绝提供物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它不仅作为一种

158

手段迫使德国人接受胜利者可能决定强加的不管任何条款，而且迫使德国政府考虑：如果在德皇被推翻后德国人着手采取旨在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基础的措施的话，那么，协约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来阻止德国的革命。譬如说，如果对资本家的财产，或者即使是对大地主阶级发动任何进攻的话，难道协约国不会寻找借口进军德国，以便镇压布尔什维主义并恢复旧日统治阶级的权威，或者至少是建立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吗？人们应当记得，这时协约国正打算干涉俄国，反对布尔什维克，因此人们担心：要是德国革命采取社会主义形式的话，各协约国政府是不会区别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革命把他们推上台的时候起，就面临着一个极端艰难的局面。鉴于国家的形势，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来使封锁结束，要达到这一点，最大的可能在于：尽量不要由于打击私营工业或与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交往而冒犯各协约国政府。人们广泛地用这个论点以及在本章中所提到的其他论点作为理由来解释在当时，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实现工业社会化或鼓励工人要求掌管工业。诚然，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虽然这样谨慎小心地行事，然而直到接受和平条约之前都没有使封锁解除，但是谁敢保证说，如果听任德国爆发革命的话，各协约国政府又会采取什么手段呢？我并不是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1918年采取不同路线的话，德国人民实际上会站到布尔什维克，或者甚至会站到社会民主党人一边；但我是在论证：在德国之所以对社会主义缺乏热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德国人担心，任何企图通过强制行动建立社会主义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协约国的严厉干涉，包括入侵德国，因而可能会大大增加本来已经难以再忍受的种种困难。

在协约国，特别是在英国，有一些人强烈抗议停战以后仍然继

继续进行封锁，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呼吁采取行动，一方面减轻当前的苦难，一方面帮助德国人尽快恢复生产。但是，普遍的情绪不是如此，普遍的情绪是主张对应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的德国进行严厉的报复，坚持德国人不仅在财政上应对他们过去的罪行作出赔偿，而且应为此而遭受苦难。对待奥地利和匈牙利，也采取了与对待德国一样的威胁办法，这给匈牙利的卡罗伊政府和新建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造成极大的困难。如果说那些拥护凡尔赛条约而同时又整天害怕革命从俄国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家全都持这种态度，这也不足为奇。但是，继续进行封锁，则意味着不顾人类正当行为的准则而无情地同战败国的人民大众为敌；因此，西方各社会党很快就开始抗议封锁。虽然它们并未能使抗议取得什么效果，但它们这样做是值得称赞的。

我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1918—1919年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并不是为了替他们的整个行为进行辩解，只是因为出于一般的公平，在评价他们的过错时，应考虑到他们的这些困难。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可以有种种借口和理由不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但是我想，即使不存在这些理由，他们也会找到——事实上他们也在寻找——别的借口和理由。对于德国的革命，虽然他们期待已久，但一旦革命到来，他们又感到意外，由于没有任何实际可行的计划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措手不及。尽管他们很久号称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艾伯特却说他“痛恨革命”，这不过是表露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这样说，意思是指任何不是严格按照宪政形式进行的改革。此外，在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曾大力支持侵略、兼并，甚至泛德意志政策，这就使他们而对德国彻底崩溃这一现实而无能为力。他们的这种态度虽然并不能替协约国开脱责任，或者说说明继续封锁是正当的，但却的确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踌躇不前，未能试图通过革命来为一种真正的德国社会新秩序奠定基

础,并不仅仅是由于害怕协约国会采取什么行动。

无论如何,在不可抗拒的协约国的压力下,德国政府最后接受了凡尔赛条约,但对其条件却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后几年中,历届德国政府都尽力回避付诸实现。在德国,这些条件被称之为凡尔赛的“强制条件”,社会民主党人签署该条约的行动,先是受到了军国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后来又受到纳粹分子的反对。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于是,菲利普·谢德曼这位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比艾伯特更加积极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离开了政界。在那些最狂热地支持战争和在革命期间最强烈地反对左派的人们中间,他总算还是一位十分憎恨德皇及其周围的军国主义集团的人,而且按照他的主张来说,他是一位坚定拥护民主的人。他很不喜欢艾伯特,但又不得不同艾伯特紧密共事,甚至在他最右的时候,仍然比艾伯特要左得多。他对诺斯克和他的志愿军团表示怀疑,但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他又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去战胜左派。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一样,他极端厌恶布尔什维主义,他坚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当做的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按大多数人投票所决定的去行事。在他看来,民主就是建立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上的议会制度,而再无其他。作为一个热烈赞赏德国和德国文化的人,他简直不可能设想,德国理应得到一切,却单单不能在战争中获胜,或在它失败以后有任何理由把惩罚性的条款强加给它。作为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和充满活力的人物,除了这种民主的德意志精神以外,他并没有什么自由的鲜明主张;他根本没有能力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任何贡献。作为总理,战后的内部斗争迫使他一步一步地向右转,他的某些更加右倾的同僚的行为至少使他感到某种不安,但是他又没有决心加以反对,因为他的第一个信念是: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哪里抬头,就应在哪里加以粉碎,只有这样



才能拯救德国。当他宁可辞职而不愿在“可耻的”条约上签字的时候，他就让位给那些同他抱完全相同的态度并准备对德国左派进行同样残酷战斗的人。

在关于和平条约的争论正在进行之际，魏玛国民议会正在民主党人胡戈·普罗伊斯教授的领导下忙于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最后于8月11日颁布。魏玛宪法规定新的德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保留各邦的原有疆界，一些战前的小邦则合并成较大的单位。这个宪法就形式而论从议会制的意义上说是高度民主的，因为它规定了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实行普遍选举权和比例代表制，并规定了建立责任制政府。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明确地放弃了由他们单独执政的主张，除非他们能把绝大多数的选民争取到他们一边——考虑到他们不但自己四分五裂，而且未能把足够多的农民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一点就是绝非偶然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把比例代表制看成是一种民主原则，它意味着共和国应由政党联盟执政，不管有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意味着，政府将是软弱无力而又动摇不定的，而当时急需的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意味着德国的革命毫无疑问未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秩序。

那么当时究竟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可能呢？几乎没有；而且除非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好在1918年11月立即不顾一切地抓住他们所获得的机会，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可能。他们的唯一机会是利用当时的危机，不仅废黜德皇和宣布建立共和国，而且撤销  
162 陆军司令部——号召东德意志的农民和劳动者夺取土地，号召整个德国的工人去占有并管理作为公共财产的工厂和矿山——撤消高级官员的职务，任命不管是多么缺乏经验的新官员来代替他们——同时迅速建立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新军队，以保卫革命，反对国内敌人——此外还要防止协约国有可能不顾停战协定而进

军德国，以摧毁革命并同时消灭其国内反对派。我们列举的上述这些必要的行动足以说明，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按这种方式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完全做不到的。他们虽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首先是德国人。他们认为德国军队的失败并不是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而是一场灾难。此外，他们还是严格的宪政主义者，坚信即使革命也应该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而且只有靠投票箱，即通过多数的选票才能决定由谁来执政。纵然他们已经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何况他们并没有——那也必然是一种无法在1918或1919年实行的计划。甚至当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并支持他们发动政变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当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各委员会中也没有那样可靠的多数的時候，他们难道会试图独揽大权吗？他们的回答必定是大声说“不”——而且因为文明的德国人决不应去仿效野蛮的俄国人所采取的方法，他们就更不会这样做。结果就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在甚至连布尔什维克直到最后时刻也认为只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俄国，却使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事实；而在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祥地的德国，却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甚至不久以后更从资产阶级革命倒退了。在俄国，资本主义太软弱了，因而资产阶级革命站不住脚；而在德意志帝国，立宪社会主义运动太强大了，因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发生。

在这一点上，确实应该考虑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及其在建立基本上是进行议会斗争的组织方面所取得的十分明显的成就，是否适用于去进行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实际上在迄至1914年存在的所有政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组织得最好的，不仅在完成选举任务上，而且在给它的成员的生活和态度方面以强有力的影响上，均属如此。在这方面，只

有奥地利党堪与之媲美，而奥地利党只不过是代表奥地利帝国各个不同民族的各个政党的松散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而已。德国人则在德意志帝国建立起了一个以广大的成员为基础，以在帝国国会中赢得社会主义多数，并使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紧密地团结一致反对德国的帝国主义统治为目标的坚强组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党的出版机构、许多办公大楼和会议厅等等，并经营着大量的企业。所以，维持正常的情况对它至关重要，它也就明显地倾向于谨慎从事，以免把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吓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条件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在合法的、实行宪政的情况下进行宣传鼓动的规模较大的党，当然是适用的。很久以前，一些杰出的革命家如巴枯宁等就争论过：由于这一原因，所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政党必然不会执行真正的革命路线，即使他们卷入革命，也会由于害怕丧失他们既得的地位和搞垮他们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机构，而在关键时刻退缩不前。很明显，即使这种推断不能为人们所完全接受，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再标榜它具有基本的革命性质，但在该党内阻止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倾向是特别强烈的。我在这部思想史的前面的一卷中已相当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sup>①</sup>。从1918年德国革命一开始，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核心就极不愿意鼓励那些要求将革命一直进行到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而是在合法和严格的宪政改革的范围内，把它进行到实际可行的最大限度。他们采取的这种态度，得到工会领袖的完全赞同，因为这些工会领袖更加关心的是在同雇主进行合法的集体谈判方面如何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任何旨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措施。

---

<sup>①</sup> 见第8卷，下册，第28章。

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在他们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态度；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中有许多成员与他们的态度有所不同，也只在于这些人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者应对造成灾难负主要责任。这些人不可能同样具有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接受协约国的和平条款时的那种真正义愤填膺的心情，但是他们同意：任何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尝试，都必须在正常的秩序下和严格按照议会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大多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成员大概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他们已作好充分准备在没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在“委员会”政府的基础上前进。但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显然无法单独地采取有效行动；而当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多数以后，它可能采取行动的唯一基础已被铲除。剩下的只有由少数革命骨干分子发动某种布朗基主义式的政变的可能性，而这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或多数成员甚至连考虑都不愿考虑的政策。它成了由斯巴达克同盟所形成的新的共产党的政策，对这一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只有该党一些认为这种冒险毫无成功希望的领导人；后来这又成为相继出现的一些感到失望和愤怒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他们眼看革命遭到失败，无法忍受这种连一拳都没有还手（不管多么粗野）就遭到的失败。

在1919年最初几个月的罢工和战斗以后，共产党人似乎接受了教训。在该党领袖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之后，保罗·列维（1883—1930年）当了领袖，他决心改变政策。他要求共产党放弃拒绝参加议会选举和拒绝设法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做法；他还敦 165  
促该党放弃把工会当作反动堡垒而加以敌视的态度，而应着手去掌握它们。在1919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突然向代表们提出一系列体现新政策的论点，并获得了相当多数人的赞成——对此持相反意见的人谴责这多数人是背叛革命的机会主

义，他们退出了大会，企图建立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共产主义劳动党，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已向左转，在此过程中清除了诸如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一些右派成员，但随着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很快又得到许多成员。在这年年底以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不仅重申它支持“委员会”政府而反对议会制度，而且拒绝参加恢复第二国际，并为参加新建立的第三国际而开始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在这以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失去了它的领袖哈阿兹，他在1919年10月初遇刺受致命伤，一个月后逝世。

胡果·哈阿兹是一位正直而又明智的人，但不是一位伟大人物。他曾在德国国会担任议员二十多年，1912年在倍倍尔患病期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国会领袖之一，也是该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在战争期间，他曾和艾伯特一起担任党的主席，尽管他持反战观点，但仍是国会党团的领袖，直到1916年被开除出党为止。他主要是一个议会主义者，本能上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比较温和的一派，但形势迫使他进一步向左转，成为“委员会”政府的支持者，不过他始终未站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一边。作为理论家，他虽没有什么重要成就，但他受到了广泛的尊重，他的死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能使党保持团结的领袖。累德堡是该党剩下的领导人中最著名的一个，但已经年迈——革命爆发时他已68岁——而且太左倾，为人们所不能接受。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也已60余岁，并已经与共产党人共命运。艾斯纳已死，  
166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2年）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财政专家和考茨基又太右倾。剩下的还有恩斯特·多伊米格（1868—1922年）、威廉·迪特曼（1874—1954年）和阿图尔·克里斯平（1875—1946年），而前两人都不是杰出人物，因此在由于该党企图同第三国际达成协议而产生的整个危机期间，领导党的任务就落到了克

里斯平身上。

和平条约在 1920 年 1 月生效，但在这月稍后一些时候，荷兰政府拒绝把前德皇交给协约国审判。德国处在另一次风暴之前的间歇。这次来自右翼的风暴是诺斯克，确实也是整个政府都没料想到的。3 月 13 日，爆发了卡普暴动，这是一次诺斯克的新军反对政府的暴乱，而正是这个政府为了镇压左派才组织起这支军队的。部长们仓卒从柏林逃到斯图加特；在首都，吕特维茨将军宣布政府已被废黜，而把极端主义的祖国党的创始人、臭名昭著的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扶上了台。德国工会右翼多数派老资格的领导人卡尔·列金仍在柏林，于是发出总罢工的号召。这一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短短的几天内，卡普暴动便在罢工面前彻底垮台。列金对政府的胆怯无能深恶痛绝，呼吁两个社会民主党摒除分歧组成联合政府，甚至还要求共产党人给予支持。在鲁尔，工人们纷纷起来打败了军队并缴了他们的械。在克姆尼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共产党在一个“委员会”政府中联合行动，这个政府由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881 年生)领导，他因而在该党内跃居显要地位。在莱比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一年以前军事占领的仇。在汉堡和其他许多地区，社会民主党人未放一枪就赢得了胜利。德国革命似乎奇迹般地第二次获得了成功的机会。

但是，在两个敌对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感情上势不两立，要维持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列金的建议，结果，未能组成包括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天主教中央党结成联盟，由赫尔曼·米勒(1876—1931 年)代替古斯塔夫·鲍威尔担任总理。新政府没有打算惩罚暴动的领导者，而是让他们逍遥法外，而且实际上让大部分军队中的罪魁 167 祸首当上了指挥官。在米勒任职以后仅仅一周，国防军就进入鲁尔，镇压在暴动期间敢于抗拒它的起义工人。当时，鲁尔区主要由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所控制，他们在暴动期间组织了一支“红军”，但是某些地区，包括埃森和杜伊斯堡则掌握在极左派手中。米勒政府首先呼吁工人解散他们的军队并放下武器，经过谈判，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终于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认识到抵抗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他们也得到保证不会受到报复。鲁尔西部的极左派则表示拒绝；于是军队进入该地区，为他们早先遭到的失败而进行了报复。一切抵抗都很快被镇压下去，“赤色”鲁尔被粉碎了。诺斯克本人随着政府的变动而被撤换，他太不得人心，已经再没有用处了。但是，卡普暴动尽管遭到失败，其最终结果是把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一步推上反动道路，使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刚刚表现出大团结的时候就更加进一步四分五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6月的代表会议上决定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并决定派代表团——其成员是克里斯平、迪特曼、恩斯特·多伊米格和海伦妮·施特克尔（1869—1943年）——去莫斯科谈判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到达莫斯科，作为观察员出席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大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0年2月所提出的十八条变成了二十一条，这时包括以党的领导成员的名义开除那些被认为是属于反共的右派或中间派，因而被斥之为“社会叛徒”的成员。这次至关重要的代表大会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后还有一章要进一步对此加以论述。在这里，我们只谈它对德国运动的影响。

168 在代表们归国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来听取他们的报告，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了这次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多数票决定全部接受二十一条。这当然意味着分裂：反对派退出大会，并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改组成为一个独立的党。原来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约

80万党员中，约30万党员成为新合并而成的共产党的党员，约20万党员参加了新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其余的或脱离了党或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那里。德国共产党第一次具有了群众性政党的性质，从而再次幻想发动一次群众起义，认为这次起义将会带来以俄国为样板的真正的德国社会革命。

当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会之际，俄国军队正向华沙进军，其如意算盘好象是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将使他们得以给德国共产党的起义以强有力的援助。但是在8月间，俄国人被受到法国人援助的波兰人击退，这一希望也就落空了。就在哈雷代表大会开会的同时，波兰人和俄国人缔结了停战协定，这一协定于10月12日签字。共产国际转而去完成它的下一个任务，即促使意大利社会党接受二十一条；德国共产党人则从事吸收和教育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该党的成员的工作。与此同时，俄国人正在消灭弗兰格尔将军在克里米亚的军队，从而使内战告终。德国政府已经和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几个月的时间，德国国内出现了似乎是平安无事的假象。

到次年初，这种暂时的平静突然告终。1921年2月，意大利社会党人开会决定是否接受二十一条；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由匈牙利的马加什·拉科西和保加利亚首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托·卡巴克切夫代表参加，他们竭力要求开除屠拉梯和其他领导人，但未能成功。于是意大利党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sup>169</sup>拉科西在归途中来到德国，要求德国共产党人支持他在里窝那所采取的行动。参加了里窝那代表大会曾试图调解双方之间的争论的保罗·列维反对拉科西，克拉拉·蔡特金和大多数转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一起反对。拉科西在中央委员会得到微弱多数的支持，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则辞去了在中央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



在这时候，法国正确地指责德国没有执行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而进军鲁尔，占领了迪塞尔多夫。共产国际派贝拉·库恩作为它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8月初，在共产党的据点普鲁士萨克森的曼斯费尔德铜矿爆发了严重的骚乱，该省省长、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赫尔辛(1874年—?)派警察占领了该地区。矿工们奋起反抗并占领该矿；紧接着，哈雷附近规模巨大的洛伊纳工厂的化学工人也参加了暴动。新的共产党领导，在贝拉·库恩的怂恿下，认为发动总起义的机会已经来临。它号召进行总罢工，并鼓动无产阶级在全德国夺取政权。发生了几起局部起义——例如在汉堡——和许多零星的暴力和破坏行动——如炸毁建筑物、破坏铁路交通等等。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罢工，因此政府很容易就将这次运动镇压下去。曼斯费尔德和洛伊纳工厂被军队占领，一切均告失败——德国共产党也因之失去大量党员，在几个月之内35万追随者就丧失了一半多。共产国际最初是完全支持贝拉·库恩的，但是克拉拉·蔡特金去到莫斯科，在那里设法见到了列宁，使列宁相信这次起义是犯了损失重大的错误。但当时实际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列维并没有再得到信任，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道路》，极力攻击党的整个策略不是在团结，而是在分裂无产阶级的力量。他攻击的主要一点是：德国共产党煽动失业者围困那些没有响应罢工号召的工作场所，而与在业工人对立，这种方法在工人之间导致互相残杀，并且严重丧失了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支持。

170 保罗·列维这位德国共产党领袖中最有才能的人，就这样离开了运动。他在这个运动中一直未能获得个人声望。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和有艺术修养的人，由于他的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感而同人们格格不入。然而，他是一位诚实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对德国国内社会力量的真实情况了若指掌，对为害德国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深恶痛绝。他的领导职务由在前一

年领导克姆尼茨暴动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881年生）所替代，而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883—1948年）和热烈崇拜罗莎·卢森堡的保罗·弗勒利希（1884—1953年）作为主要的助手。

共产党人的困境并没有随着策划中的起义遭到镇压而告结束。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机关报《前进报》掌握了大量的文件，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暴力行动的计划，并陆续将之公开发表，以败坏该党的声誉。由于遭到这些意外打击，德国共产党书记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1889—1953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退出了党，那些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的人则临时改变了他们的政策，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样保持了两年，直到1923年鲁尔危机时期才来了一个大转变。在此时期，俄国也随着1921年4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改变了它的路线，从而在加速西欧革命步伐的企图方面也后退了。

在1920年末和1921年初的仅仅几个月之内，德国共产党接收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只有在这时它才接近于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但他们却愚蠢而大意地坐失了这次机会。这主要是由于受到当时抱着毫不妥协态度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季诺维也夫、拉科西和这二人之间的贝拉·库恩在给这个突然扩大了了的党带来灾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企图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部分敌对的群众，而他们这样做，只不过在 171 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分裂了左派，以致使之毫无作为，在群众中几乎毫无任何影响。迄至这时为止，共产国际的政策——其实也就是俄国的政策——一直受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即尽管从外表上看起来情况相反，但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有了一往无前的领导，他们肯定会随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无疑是根据主观愿望而产生的一种想法，因为俄国人一直受到内战和国内巨大的经济困难这双重压力，也许只有西方的革命才会使他们得到解救

和帮助。抱着这一希望，列宁曾竭尽全力去战胜波兰人，以便俄国人能援助德国的革命者；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在设法使西方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接受全部布尔什维克福音。但是，在1921年头几个月在彼得格勒发生骚乱后，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和共产主义在德国遭到惨败后，就不得不承认俄国人的首要任务是应付他们国内的困难，立即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希望也就不得不予以放弃。俄国人仍然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发生，但是他们再也不能指望靠世界革命来帮助他们立即解决他们自己的迫切问题了。

(廖洪林 译)

## 第六章

172

### 1917—1921年俄国的革命和内战

1917年俄国的两次革命，从表面上看来都是城市革命。两次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都发生在彼得格勒。在这里，当士兵们拒绝把枪口转向示威群众之后，组成了第一届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也是在这里，不到9个月以后，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政权。但是，不论就哪一次革命来说，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件当然都不是决定因素。首都发出了信号，而在别处，在城镇、在农村、在军队中发生的事情，才是决定结局的。在1917年2月和以后，在整个广袤的俄国领土上，旧秩序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虽然在10月以后，在秩序已荡然无存的这块领土上建立新秩序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很快就处于苏维埃统治之下，而且在大部分地区，即使列宁的法令尚未付诸实施，权力也很快转入一些无意将新分得的小片土地归还原主的机构的手中。

在俄国大部分地区，革命首先是土地革命。这是必然的，因为尽管截至1914年为止的二十多年中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俄国在最大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有地的或无地的——无论如何是最大的阶级。除开了农民，在俄国就无革命可言。这不仅由于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而且由于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要是军队镇压革命的话，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样，农民如果离开了城市的人，也根本无法进行同一类型的革命，这无疑也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如果第一次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的话，它

173

虽然很可能摧毁沙皇统治，但是它同时也会毁灭俄国，使之四分五裂，无论如何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政府。当然，如果让农民自行其是的话，也就根本不会发生第二次革命。发生的将会是一场农民起义，各地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即使不签订和约，也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单独媾和，因为军队一定会由于纪律荡然而瓦解，士兵们各返乡里。不过，这也就不会出现几个月时间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种政权并存的那场悲喜剧，而在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后，也就不会建立起一个能够恢复统一并创立一个足以震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俄国的新的中央政府了。

然而，首先在一点上，农民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这就是他们夺取了土地，而不是期待一个立宪会议按正常的方式把土地交给他们。毫无疑问，如果允许立宪会议继续开会的话，它一定会同意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因为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农民已经夺取了土地，仅仅根据这一事实，它也会同意这样做的。由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立宪会议是决不愿采取其他任何步骤的。但是，即使立宪会议真的召开了，或者选出了，而农民在月复一月地等待落空后，难道就不会自行其是吗？的确，在农民面对着很大程度上已经既定的事实以前，临时政府无论如何是不急于召集立宪会议的。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后来使反革命的各种机会归于破灭的，正是农民这种不容许他们已经获得的土地再被人剥夺的坚强决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当时凡是由一位反动将军占领的每一个地区都丝毫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军队实际上无法控制这些地方，而且他的供应线被切断，无法完成维护秩序的任务。农民不是共产主义者，除非是反动的入侵者逼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和本能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是革命者，反对旧的统治和旨在恢复旧统治的任何企图。

174 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红军是不可能在内战中获胜的。

诚然，在农民中几乎没有为新秩序提供任何著名的领袖人物。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也不是由农民，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例如切尔诺夫、阿夫克先季耶夫以及极左翼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和施泰因贝格。凡是由农民领导的地方，这种领导都是地方性的，不出一个或几个村庄。即使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团队的代言人也主要来自工人或小资产阶级成员。农民和农民士兵知道他们需要的是土地与和平，当他们在军队中的时候，则是吃的面包。他们痛恨专制政权、整个地主阶级，以及对他们进行横征暴敛，迫使他们离乡背井去充军，并且鄙视他们的那些官吏。除去这些要求和怨忿之外，他们再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见解了。但是，这些就足以使旧秩序一旦被摧毁后再也无法恢复。

任何政府，如果想代替已经不复存在的沙皇专制统治而建立起来，它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农民站到它一边，至少也得让农民默认它的权威。然而，事实上，没有一届临时政府敢于尽量满足农民的愿望。它们都承担了继续进行战争的义务，或者拚到底，或者起码战到它们能设法使协约国同它们一道媾和为止；而由于协约国不会同意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所以这就意味着所有临时政府实际上不得不把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或者说是战到最后—兵—卒为止。各届临时政府既不会带来和平，甚至不会许诺和平。而且它们甚至不会答应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条件给农民以土地，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会破坏它们本身赖以勉强存在的基础；因此在李沃夫和克伦斯基领导下的相继两届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连仅仅让农民自己分配土地这一点也肯定不会同意。历届临时政府能够答应的最多只不过是等到立宪会议召开时将把土地问题按正常手续提交该会议去解决；而甚至这一点对政府的某些人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将来立宪会议究竟由哪些人组成。至于说到面包，不管怎样总算是给军队和城市供应了足够的食品让他们生活下去；但即使这一点，临时政府也只有在实际掌握着供

175

应活动的苏维埃和工会的合作下才能做到。事实上，临时政府已无法进行统治——无论如何从6月以后是如此——它们只能依靠请求苏维埃副署它们的各项法令来保持表面上的权威。

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加入临时政府以后，这种情况实际上毫未改变。被选择到政府任职的都是那些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并且为此目的而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共同阵线的人。除非与他们的同盟者决裂，建成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否则他们既不可能媾和，也不会承认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然而，他们根本不愿这样做。这不仅因为他们不打算在势必是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单独媾和，更因为他们积极反对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他们反对这样做的理由是各不相同的。政府中的孟什维克成员在原则上对此抱敌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主张在此条件成熟前必须有一个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时期。这并没有妨碍孟什维克赞成土地社会化，但他们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一致反对让农民将土地归为己有并加以分配。同列宁一样，他们不准备放弃社会化而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赢得农民的支持。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虽不象孟什维克那样由于认为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而束缚住了手脚；然而他们或者是墨守于按照正常的民主程序、通过立宪会议实现伟大变革的主张，或者由于害怕在战争仍然进行之际与资产阶级决裂而畏首畏尾。同样，他们害怕造成建立一个纯粹社会主义政府的必要条件，即同那些反对战争并准备不惜在任何条件下结束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结成联盟。从2月到10月的几个月期间，社会民主党人个人和派别之间的对立加深并大大激烈起来——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被捕或转入地下，“卫国派”和“国际派”之间已经营垒分明的“七月事变”以后——而即使在这个时期，马尔托夫和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仍然不知如何是好地徬徨于

对立双方之间。由社会民主党所有派别产生一个全体社会民主党在临时政府中的代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根本没有实际可能。在“卫国派”心目中，列宁是头号卖国贼；而在列宁的心目中，“卫国派”没有一个不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和内奸。

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处境最不幸的是那些既不是布尔什维克又不是“卫国派”的较小派别，如马尔托夫、苏哈诺夫（他曾留下关于这几个决定性月份的生动而令人难忘的第一手记载），甚至还有切尔诺夫（他虽然进入政府任农业部长，但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在社会革命党中居于中左地位）。马尔托夫真实的姓名是尤利·奥西波维奇·泽杰尔包姆（1873—1923年），他在孟什维克中是仅次于普列汉诺夫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公认为是该党的领袖，这时他处境特别困难。他身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首领，强烈反对大多数孟什维克的“卫国派”政策，但仍然不愿使他的党陷于分裂，并且完全反对布尔什维克所举行的在他看来是进行派别活动的政策。他主张结束战争，但同列宁的观点大相径庭。列宁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进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他不相信这是实际可行的。由于他不相信世界革命指日可待，使他更加坚信俄国革命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不过他也同意孟什维克的一贯见解，即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去进行资本主义革命。因此，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政府，但应由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联合反对派加以监督和控制。这种态度结果使他和他的集团既孤立于“卫国派”之外，也孤立于布尔什维克之外。<sup>177</sup>而且，由于这样一种政策不易令人信服地解释给普通群众，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如说是一伙著名的理论家。在名义上仍然联合在一起的孟什维克党中间，他们虽仍算是一个派别，但在该党中不断被其他派别的票数所压倒，对事态的发展发挥不了什么影响。特别是马尔托夫本人，虽然在分析形势的能力上很少



有人能胜过他，但往往在行动上优柔寡断，很少能给予其追随者以明确的实际领导。原为社会革命党人，此时加入马尔托夫的国际主义集团的尼·苏哈诺夫看到了该集团领袖的这一弱点，也认识到建立任何社会民主党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卫国派和国际派之间的鸿沟太宽，已无法弥合，他所希望的是全体“齐美尔瓦尔得派”联合起来反对卫国派。然而，除非将布尔什维克吸收进来，这是无法实现的，而自从列宁回到俄国以后，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列宁，虽然也许会劝说布尔什维克重新同意联合起来在苏维埃中建立一个“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的任何尝试，但在列宁回国以后，除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否则他们是不会同意采取共同行动的，而他们的条件必然离不开用一个直接对那些由工人和士兵、以及明确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农民团体所组成的群众组织负责的——实际上就是由他们自己的党所控制的——苏联埃政府来代替临时政府。这将会意味着直接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在马尔托夫看来，这一步骤是不可能的。诚然，布尔什维克同其他左翼派别一样，坚持不懈地呼吁召集立宪会议，因而似乎他们也赞成新俄国的结构应按照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仅仅按照工人的意志来决定。但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立宪会议与其说是民主的议会制度的先声，不如说是打击临时政府的一条棍棒。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主张——是工人阶级专政，即在贫农协助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把其他

178 阶级完全排斥于一切政治权力之外。毫无疑问，他们设想这是一种多数人对那些声名狼藉的少数人实行专政的阶级统治，而马尔托夫和苏哈诺夫则同样担心这实际上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对广大工人群众的专政。

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国际派或其他打着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招牌，但不主张直接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

命，或者不主张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其他主战国迅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之间，根本没有实行共同政策的实际可能。但是，另有一个集团，即区联派（即“区际组织”之意）是布尔什维克可以与之妥协的，因为这一派人正好准备接受上述行动原则。区联派同马尔托夫派一样，是没有多少群众追随的一伙领袖人物。如前所述<sup>①</sup>，其中包括象卢那察尔斯基、乌里茨基和沃罗夫斯基，特别是托洛茨基（他在来到彼得格勒后立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个有着巨大影响的集团，最初是同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因为它认为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方法宗派性太强。它同意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目标，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相信世界革命即将爆发，并希望革命立刻由资产阶级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在七月事变以前，它就已经达到了决定是否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关键时刻。如同我们在本书前面所看到的<sup>②</sup>，该集团的领袖托洛茨基在1914年以前曾长期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不合，因为他不赞成列宁所奉行的极端排他的党的政策，并作为一个“调和者”而设法在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之间建立桥梁。如前所述，托洛茨基还是“不断革命论”的主要鼓吹者，他反对列宁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画出明显界线的做法，而坚持认为：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想在俄国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不得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和负责。到1917年，在这两个问题上，他同列宁在看法上的分歧已经大体上消除。在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的问题上，列宁实际上已同托洛茨基的意见趋于一致；而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也由于卫  
179  
国派和国际派之间的决裂而不复存在，他在这个问题上已完全站在列宁一边。如前所述<sup>③</sup>，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是：列宁在策

---

① 见本卷第70页。

② 见第8卷上册，第462页（中译本第472页）。

③ 见本卷第84页。

划二次革命时强调党的作用，而托洛茨基则强调苏维埃的作用，将之看作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代表和预计中的执行机构。这个分歧虽然在以后的阶段将会变得非常重要，但在当时看来并不致使他们长期分裂。不管将来新的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究竟是苏维埃抑或是党，他们二人都认为迫切需要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以便进行这场革命。就这样，区联派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党连在了一起，托洛茨基也在8月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深受众望的著名代言人。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得以把别的力量吸收进来，但就其他任何条件来说，他们是根本难以合作一致的。他们无法同拒绝与孟什维克卫国派最后决裂的马尔托夫合作；他们也无法同围绕在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的《新生活报》周围而追随他的那些人合作。而对他们来说，要同即使是社会革命党中的极左派达到任何真正的谅解，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联合政府中，他们确实曾同这些极左派共同执政了很短的几个月时间，并且在处理土地问题上实际上也曾暂时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政策而采取了社会革命党的传统政策。在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弥补的鸿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也是一样——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先实现工业化，以便为之铺平道路，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反对工业化，或者至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秩序的手段。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在1917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这一思想——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开始认为这两次革命很可能是一次革命运动中急剧转变的两个衔接在一起的阶段——而社会革命党人则不承认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而是认为只有一次人民革命，通过这次革命农民将成

为新社会的统治力量。诚然，社会革命党中的各个集团对这种一次革命的设想也是大不相同的。早在1906年它们就已分裂成为最高纲领派和最低纲领派<sup>①</sup>，占多数的最低纲领派认为革命是分阶段进行的，其中前一阶段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仍甚遥远。但是，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最低纲领阶段与社会民主党人所设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却是迥然不同的，他们认为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土地革命，根本谈不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就连最高纲领阶段也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共同之点。因为，虽然在社会革命党1906年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设想：为了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将会有有一个农工专政的过渡时期，但他们非常强调这样一种专政的过渡性质，而且认为不言而喻，在新社会建成后，将会实行一种在普遍民主基础上的高度分权的政体。

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最高纲领派与最低纲领派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敌对的两派。在该党1906年代表大会上，它们曾一致认为，它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和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土地的管理和国家的整个统治，主要交给拥有基本行政权力的地方公社去施行。国家将是一个建立在这种公社基础上的组织松散的联合机构，整个行政机关将认真防止出现官僚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危险。就社会革命党人的理想目标来说，他们基本上是继承了巴枯宁和民粹派的主张，而不是马克思的主张；而且不论对他们之中的左翼还是右翼来说都是如此。他们的最低纲领拟订得相当详细。它并非是代替最高纲领而提出的另一纲领，而只不过是最高纲领的一部分——与其说是阐明了两种相对立的主张，不如说只是说明首先应当做什么而已。两个纲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471页（中译本第481页）。

领基本上都是革命的。在社会革命党中没有一派不认为，只要沙皇制度继续存在，任何有价值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一致认为，首先的目标是进行一次推翻沙皇的社会革命，以便有可能召开一个通过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制定一部新的、民主的联邦宪法，并让农民拥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这部宪法将体现出承认俄罗斯帝国一切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并规定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除上述体制改革外，最低纲领规定实行发表政见的完全自由以及同样的结社自由——这些权利将由宪法保证其不可侵犯。在经济领域，纲领规定鼓励工会的发展，并规定工会得以参加制定民主管理工业的各项计划。它还要求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以及制定保护性的产业和社会立法；但是最低纲领不包括工业国有化，理由是这只有在国家权力从反动的统治形式改造成为民主的管理形式后才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国家仍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就应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最重要的是最低纲领中有关土地问题的部分。私有土地将全部予以没收，不给原主以赔偿。土地，包括已属国家所有的土地，均将由普选产生的地方当局实行集体管理，由地方当局将其分配给个体佃户或合作团体，以此来保证每个农户均有足够的维持生活的手段。为了帮助佃户最好地利用土地，将充分发展合作信贷机构；其他形式的合作活动——如必需品的供销与收购以及实际耕种方面——也将给予最充分的鼓励。消费合作亦将予以发展。该纲领的另一特点是禁止一切土地交易，以便防止出现富有的阶级，即雇用劳力租种邻居土地的农民，以致破坏乡村生活的平等。此外，为了保证这种平等，地方当局将对占有较好土地的人征收租税，将此项收入用于公共开支，例如改良土地等。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最低纲领。显然，除非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革命，否则是无法实现的。然而，不论从任何通常意义上

来说，它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它规定继续保持个体农民的耕种，只是辅之以一个合作机构网，期望以此为充分社会化的制度奠定基础。最高纲领派不赞成这一最低纲领，不仅因为这一派的信徒们主张立即实行更深远的社会化，而且更主要地是因为他们要求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实行更加激烈的斗争政策来反对现政权，并坚持认为必须建立农工专政的过渡制度，以便彻底铲除旧的社会结构。在1906年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赞成这种意见：即这样的专政很可能是必要的；但人数相当可观的少数派投票反对作出这一让步，因此多数派没有超出这一有条件的赞同而走得更远。

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一个既包括最低要求又包括最高要求的共同纲领，但会后不久，一些更加极端的集团开始纠集成一个最高纲领派。这一派主张：而对1905年革命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反动，必须坚持一种积极的恐怖主义政策；它并且还拒绝接受党的领导成员们在要求召开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时所表现出来的所谓“议会主义”。党的领导在1906年开除了那些拒绝接受代表大会正式决定的最高纲领派分子，而进行了反击。随后，被开除的最高纲领派分子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极端主义的小党；这个党直到 183 1917年仍然存在，不过没有多大影响。在这年的第二次革命中，最高纲领派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但随后不久，他们主张在工业中通过工厂小组来实行工人自我管理，而同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所主张的集体管理相对立。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初期，他们被容许存在，得以出版一个刊物《最高纲领主义者》，他们的少数成员并被选入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地方的苏维埃中。但不久他们内部发生激烈争论；1920年4月，他们经多数决定将他们的组织并入共产党。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主要人物后来或离开俄国，或遭逮捕，这一派的运动遂告终止。

最高纲领派自始至终不过是社会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的派别。在该运动的另一极端,有另外一个集团,即民粹派。它最著名的领袖是流亡者尼古拉·柴可夫斯基和费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死于1914年)。民粹派在战前的杜马中形成一个特别的集团,在杜马中代表着广大的社会革命运动中最温和的一派。1914年以后他们强烈地拥护战争;在柴可夫斯基的领导下,他们后来在1918年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的阿尔汉格尔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不过,民粹派站在社会革命运动的主流之外,从来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社会革命党中派的主要人物中,化学家格·安·格尔舒尼(1870—1908年)死后,首推知识分子维克托·米·切尔诺夫(1873—1952年),他是沙皇手下一个官吏的儿子,从学生时期即已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切尔诺夫与大多数社会革命党领袖不同,他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精通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前他长期流亡国外,主要在瑞士,1905年革命前在那里主编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机关报。在流亡期间,他认识到指望在古老的公社基础上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旧理论已经陈旧过时。他也放弃了反对发展工业的立场,不过仍强烈反对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方法推广到农村。他甚至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将在未来的革命中起先锋队的作用,在他看来,在这场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将主要起指导作用,而由农民组成进步大军的主体。他还认识到应放弃民粹派那种将全体农民看成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想法。他说道:在革命中,贫农将同乡村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城市无产阶级则将对付城市的资产阶级。至于说到资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将来的事,而切尔诺夫则认为已经过去,因为当农奴获得解放,农村地区可以为工业提供工人后备军时,就已经是进行这种革命了。因此,不可能再进行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了。但是,切尔诺夫认为未来的革命将分为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将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将

土地分给农民；而在第二阶段，将要按照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农业社会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切尔诺夫相信他的这种“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结合了起来。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同西方社会党人接触而形成的；但他仍然确信，必须通过贫农的胜利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同那种认为俄国农业应当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是完全对立的。

大多数社会革命党领袖人物，主要是一些行动家，对他们来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然而切尔诺夫却主要是一位理论家，而不是一位行动家。由于他同西方的接触，他的政治见解比起大多数社会革命党领袖来也更具有国际主义倾向。在大战爆发后，他根本没有站在“卫国派”一边，不但坚持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路线，而且积极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并拥护会议关于实现人民的和平的要求。但是他站在占多数的和平主义者一边，而没有站在列宁主张的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结束战争的少数派一边。在二月革命时，他仍侨居国外。他在4月初返回彼得格勒后，发现社会革命党已四分五裂，其右翼护国派倾向于支持克伦斯基，<sup>185</sup>其左翼积极反对政府，而来自军队和知识分子中间的那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广大党员则由于局势混乱而群龙无首，无所适从。他试图把这些中间派领导起来，用他的某些国际主义思想去影响他们。但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当米留可夫倒台后，他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接受了农业部长的职位，他这样做无疑是希望从两方面影响该政府，即立刻向协约国提出和平建议，并开始采取步骤召集立宪会议，以便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然而，作为一名部长，他对他的同僚们似乎没有产生有效的作用，而他在政府任职一事却对他以后是否能获得广泛的支持有着致命的影响。他希望和平，却不得不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他诚心诚意地希望农民得到土地，而作为部长，却不得



不尽力阻止农民不待立宪会议给予他们土地之前就自行取得土地。他发现自己既由于曾经支持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立场而受到右翼的攻击，又由于追随资产阶级和抵制苏维埃的影响而受到左翼的攻击。他显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已无法对他的党起任何有效的领导作用。在七月事变中他实际上被反对政府的示威群众所逮捕并拘押起来，托洛茨基冒险在人群中救出了他，才将他释放并让他安全逃脱。当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组成第三届联合政府时，他又成为该政府的一员，从而卷入随后几周所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大迫害。不过，他仍然是社会革命党公认的领袖，在党内仍保持着中心地位和作为该党社会理论的著名鼓吹者而原来享有的威望。在十月革命期间，他当然是反对者，但已经没有机会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十月革命后，他继续发表自己的主张，直到1918年1月16日立宪会议开会为止，并没有受到干扰。立宪会议选他担任主席（他击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候选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他准备致开幕词，阐述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布哈林代表布尔什维克给他以粗暴的回答，质问他所主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并说道“一种需要花费二百年时间才会实现的社会主义”简直等于根本不要社会主义。布哈林说道：工人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告诉他们现在如何行动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仅仅许诺理想的未来。切尔诺夫没有得到机会在立宪会议上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因为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封闭了该会议的会场并告诉会议成员们回家转。切尔诺夫的某些同僚曾呼吁他召集他的支持者援助立宪会议，但他拒绝了，说他不参与社会主义者自相残杀的流血事件。

立宪会议被解散后，切尔诺夫仍住在俄国。后来他到了萨马拉，在那里社会革命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少数孟什维克聚集起来，企图建立一个由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成员组成的新的临时政府。

这个政府还没有建立，捷克军团就占领了鄂木斯克、萨马拉和其他一些城市，于是切断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同西伯利亚，以及同俄国东欧部分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在混乱之中，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出现了其他一些临时政府。新成立的西伯利亚政府，最初由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但很快就被右翼反革命分子夺去。7月间成立的乌拉尔政府，则虽然有少数孟什维克的支持，但从第一天起就由民粹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所操纵。9月，在乌拉尔地区的乌法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全俄临时政府，并指示在第二年初重新召集立宪会议。乌法会议由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尼·阿夫克先季耶夫（1878—1943年）担任主席，他后来成为新政府的首脑。另一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弗·米·津济诺夫（1881—1953年）为其主要同僚。切尔诺夫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支持下，反对组成乌法政府，因为它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又包括立宪民主党人，而且直接听命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指挥的反革命军队。该政府组成不久，红军就收复了萨马拉。乌法政府名义上存在到1918年11月高尔察克将其推翻并宣布自己是“全俄最高执政”为止。阿夫克先季耶夫、津济诺夫和其他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逃亡国外，定居巴黎，在该地继续进行激烈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宣传运动，并支持协约国的干涉。剩下的一些社会革命党领袖仍留在伏尔加地区，但多半已放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抵抗。切尔诺夫宣称他将继续对左右翼极端分子进行非武装斗争，但社会革命党则继续迅速地土崩瓦解。1919年初，以弗·卡·沃尔斯基和尼·伊·拉基特尼科夫为首的一派到莫斯科同政府讲和；同年2月，彼得格勒的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正式宣布放弃武装抵抗。作为对这些表示的回答，苏维埃政府允许已在前一年6月被取缔的社会革命党恢复合法地位。切尔诺夫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同意阿夫克先季耶夫的观点，也不同意沃尔斯基的观点，但他同意沃尔斯基关于放弃武力的

主张，因而得以作为宣传家而继续活动。6月，他在莫斯科召集余党举行代表大会，会上同时谴责了沃尔斯基和阿夫克先季耶夫，于是沃尔斯基派脱离了该党，以后便无足轻重并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迫害。切尔诺夫留在俄国的时间稍长一些，后来逃亡国外，在国外撰写了他的经历。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俄国似乎是在1920年5月，当时他化装抵达俄国，并曾在主要是由孟什维克组成的出版家联合会组织的一次同当时访俄的英国工人代表团会见时发表演说。孟什维克领袖费·伊·唐恩(1871—1947年)也曾在会上讲话。社会革命党寿终正寝是在1922年，当时它仍留在俄国的一些领导人以叛国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埃米尔·王德威尔得曾作为辩护人被派往俄国。王德威尔得和同他一起充任辩护人的俄国人穆拉维约夫都对这次审判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188 并且在判决前退出法庭。被告们虽被判决，但并未执行，因为政府曾答应西欧社会党领袖们将保留被告们的性命。他们被囚禁后命运究竟如何，我想至今不明。其中有些人常常被用来作为三十年代大叛国案的证人，并被要求提供这些案件的被告的罪证——有些人这样做了，但其余的人则大胆拒绝这样做。在首要的人物中，阿布拉姆·拉斐洛维奇·戈茨(1882—1937年)终于在1937年被枪决；弗·亚·卡列林则大约于同一时期死去或被杀害。另一位，以前杰出的评论家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则幸存下来，1941年在立陶宛被德国人俘虏，两年后死于柏林。其遗著回忆录后在纽约出版。这部回忆录生动地记载了他被监禁时的经历和一些在1922年被判刑的他的社会革命党同伙的命运。

在审判期间，起诉书力图证明这些主要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战中曾与“白卫分子”合作并参与协约国干涉，但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受审者的罪行——虽然，要证明许多未受审的社会革命党人，如阿夫克先季耶夫和津济诺夫，曾犯有上述罪行，显然是

很容易的。

就这样，一度曾规模很大的社会革命党终于不复存在了。社会革命党始终是一个许多派别和倾向的混合体，它之所以曾经在理论上取得一致，在绝大部分程度上完全归功于切尔诺夫。他尽管明显地缺乏实际能力，但他几乎是该党1906年纲领的唯一擘划者，并一直保持领袖地位，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领袖，但其中没有任何人曾制订出一贯的政策。社会革命党最初是作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农民运动的代表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地方农民运动所关心的主要是当地的问题。它表达了农村中的不满情绪这一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渴望得到土地和对整个沙皇地主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极端仇恨。在1905—1906年它曾得到极大的发展，随后又迅速缩小并在恐怖政策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分裂局面。后来由于成立了一个自治性的秘密恐怖组织，允许其自行其是而不过多地牵涉到党的大多数人，这个问题才算勉强得189到解决。但是，在揭发出阿捷夫<sup>①</sup>与沙皇警察有联系的案件后，恐怖主义就名誉扫地，并且为党的领导所正式摒弃。早在1914年以前，该党就已开始分裂，因为其右翼越来越寄希望于合作事业，而大部分人则保持其基本上是革命的观点。如前所述，战争问题使该党进一步分裂，结果在“爱国派”和反对战争的左翼之间造成更深的裂隙。1917年在二月革命期间及其以后，该党曾经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吸引地方农民运动和主要是农民士兵的主要中心。它也吸引了一大批迄至当时仍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这些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但看到一切支持革命的政党的大多数俄国人都赞成它。这样一来，新党员大量涌入，而无论从哪方面说又缺少可靠的领袖，社会革命党也就无法具有任何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449页（中译本第459页）。

贯彻始终的政见。总的说来，它支持历届临时政府，特别是支持在革命爆发后实际上加入该党的克伦斯基。但是当看到历届政府既没有给人民以面包，也没有给人民以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允许农民占有土地以后，这种从来就不很牢固的支持很快就减少了。事实上，早在1917年10月以前，社会革命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其追随者大部分转向一个左翼，这个左翼虽在名义上仍属于原来的党，但已经同布尔什维克采取联合行动，来进行第二次的，即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了。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到十月革命伊始才成为一个充分有组织的政党。他们同前面已论述过的在11年前从社会革命党大多数中分裂出去的最高纲领派完全不同。他们是由十月革命产生的一个新的派别，最初是包罗万象的社会革命运动中一个并没有明确主张的左翼，但在态度上不仅同该运动的右翼，而且同切尔诺夫的中派都有尖锐的分歧。切尔诺夫回到俄国参加临时政府，是导致他们组成一个独立派别的重要因素，虽然尚未作为一个政党而同社会革命党人正式分裂。

在这个新派别的著名人物中，有老牌的民粹派领袖马尔克·安·纳坦松(1850—1919年)，亦即众所周知的博勃罗夫。他长期接近社会革命党，曾积极参加1905年的革命。1917年，纳坦松反对以任何方式同资产阶级合作并反对任何支持战争的主张，而站在社会革命党极左翼一边。他是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极左翼，期望通过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战争。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信奉彼得·拉甫罗夫的学说——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相信群众性的农民起义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的农民领袖。第二个著名人物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885—?)。她是一位出众的群众鼓动家，由于在1906年曾暗杀一个不得人心的省督而名噪一时。其他杰出的领袖有属于该运动极左翼的波·

卡姆科夫(化名卡茨)和弗·亚·卡列林,以及伊萨克·纳奇曼·施泰因贝格(1888—1957年),他曾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短命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中任司法委员,该党崩溃后,尽余生力量主要从事在西欧安置犹太人流亡者的工作。此外还有曾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彼得格勒契卡的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在由于另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勃柳姆金(生于1898年)刺杀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而引起的骚乱之后,于1918年7月被枪决。勃柳姆金则幸存下来为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工作,到1929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枪决。

总之,从1917年5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这个左翼就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要求立即媾和,要求立即将土地交给农民;在随后几个月内,其成员在地方上那些不等政府分给就自行夺取土地的农民中起着带头作用。随着切尔诺夫对社会革命运动的控制的削弱,这个左翼的成员却增加非常之快。他们不仅在农村,而且在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水兵中,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产业工人中赢得很大支持。他们反对同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他们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以及他们反对卫国主义,这些都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十分接近;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反对建立一个集中的、纪律严格的党,而希望尽一切可能争取各社会主义党派支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参加的革命十字军。到8月,彼得格勒的社会革命党组织差不多已牢固地站在他们一边,使正式的社会革命党领导在首都濒于孤立;此外他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和省的苏维埃中也拥有大量支持者。随后在10月,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会议,拒绝给多数人主张的卫国主义政策以任何支持,此时他们同社会革命党大多数已明显地决裂。在托洛茨基所组织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他们虽拥有

很大的代表权，但即使在10月，他们似乎仍反对立即举行暴动。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在策划暴动时并没有同他们协商；他们在暴动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是经过安排的话，也是由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安排的。但是在暴动的次日，当社会革命党为抗议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退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追随它，从而与该党最后决裂。两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了他们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批代表来自各省，正式组成单独的政党。起初他们拒绝列宁提出的同布尔什维克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而试图谈判结成一个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但在这样做毫无结果后，在12月初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就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开除了持敌对态度的社会革命党分子而选出了一个新的亲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执行委员会。紧接着这一行动，他们又决定参加人民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农业专家安·科列加耶夫任农业委员——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施泰因贝格任差不多同等重要的司法委员，亚历山大罗维奇则在新成立的契卡中担任要职。

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为时不久。造成这一联盟告终的是布尔什维克决定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则谴责这是背叛革命事业。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他们如此，不过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中的少数派不同，而是在1918年3月的第四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拒绝多数意见而坚决投票反对该和约。这导致他们退出政府，从而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党尖锐对立。他们的要求是俄国政府不应接受德国人的条件，而应采取革命游击战争的方式对德国人进行群众性的抵抗。他们主张号召农民和工人起来，在德国人所到之处破坏交通，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使德军片刻不得安宁。在这种英勇的主张被拒绝后，他们仍不让步。1918年6月，他们公开主张组织恐怖活动反对德国人，

并尽力鼓动在德军占领的地区举行起义。7月6日，他们的一个属于契卡的成员，年青的雅各布·勃柳姆金在德国大使馆暗杀了新任大使冯·米尔巴赫。由左派社会革命党指挥的一部分士兵将费·埃·捷尔任斯基（1877—1926年）和契卡的其他领导人监禁在他们的总部中，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这些士兵被赶走，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并没有企图占领其他公共建筑或策动全面起义，所以参与此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究竟目的何在不得而知。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和其他人断然否认曾制订过任何策划起义的计划，因此看来很可能是少数人自行其是而并没有该党的普遍支持。但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则对授权暗杀米尔巴赫承担了责任，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曾支持对德国人实行恐怖政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出人意外的是，就布尔什维克以后的做法来看，在此次事件<sup>193</sup>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大部分得到特殊的宽大处理。诚然，亚历山大罗维奇由于参与契卡的骚动而被枪决，但勃柳姆金在暂时逃走之后，仍允许继续在托洛茨基手下任职，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则仍允许自由进行其宣传鼓动。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知德国人极端不得人心，而斯皮里多诺娃本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反对此后数月中德国人进一步提出的苛刻条件，则是大得人心的。另外一个毫无疑问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想趁此有利机会争取大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站到他们一边，并且在1918年年中那种危殆的形势下，经不起再树敌更多。因为就在发生左派社会革命党骚乱的时候，捷克军团占领了鄂木斯克、萨马拉和其他城市；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其他人建立了几个敌对的临时政府；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成为反革命武装的强有力的领袖；协约国开始了严重的武装干涉；而且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威信也大大降低了。左派社会革



命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疑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政府也经不起把他们队伍里的人逼向群众暴动。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只是着手将比较活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从有影响的职位上和从地方苏维埃中清除出去，而并没有明确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为非法。普遍的看法是：虽然该党的中央委员会，起码是其中的一部分成员深深地介入暗杀米尔巴赫事件和契卡骚动事件，但其中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参预这些事件，甚至可能是不赞成这些做法的。因此，尽管德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惩办肇事者，但布尔什维克由于前述原因不愿采取严峻措施。1918年11月受审的几位社会革命党领袖只受到温和的判决：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虽被判处一年徒刑，实际上很快就在一次大赦中获释。

194

尽管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温和的措施，但他们的党很快就开始分裂。一些小的集团按照指示对德国人组织了游击战，当德军在这年下半年开始进犯后，增加了他们占领中的种种困难。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共产党，站在苏维埃政府一边参加了国内战争。其余的人则尽一切力量展开宣传运动，主张民主管理工业，并反对政府征收农民的粮食。1920年春季，甚至允许以施泰因贝格为首的一派人在一个时期内出版他们的期刊《旗帜报》，该报要求由工会管理工业，由农民协会管理农业，由合作社管理分配，政府实行分权，并就在允许的范围内利用暴力和恐怖行动作为政治手段的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旗帜报》终于在1921年5月被查封，翌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仅存的一些领袖有的被除掉，有的如施泰因贝格，被迫逃往国外。将近七十岁的纳坦松在1918年的几次骚乱后获准移居国外，次年即死去。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在1919年初再度被捕，被送往一处疗养院，但不久她逃出该院。她隐藏起来，仍保持自由，直到1920年又一次被捕。她此后的情况不得而知。卡姆科夫被监禁入狱。1938年曾让他出面为布哈林

的罪行作证,据说他在二十年前曾同布哈林合谋杀害列宁、斯大林等人,以便组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政府——卡姆科夫拒绝证实这种无稽之谈。

在1917年所有的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是最富于理想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说是最吸引人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渊源于民粹派,主张俄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间无须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阶段。他们不是计划者,强烈敌视任何类型的集权和官僚制度;像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一样,他们首先相信群众中固有的创造力,相信群众有能力抛弃他们的领袖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社会。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使命在于千方百计地提高群众的权力,不惜采用农民暴动或有助于事业的恐怖主义暗杀行动,但是反对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诸如过多地采取纯粹匪徒式的暗杀手段或放肆的暴虐行为。直到战争来临之前,他们同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尖锐的分歧,与其说他们反对大多数,不如说他们是设法促使他们采取更大的行动。但是,他们是一些毫不调和的人,因此,当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中派为保卫祖国而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时,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并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历届临时政府及其战争政策。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和二月革命以前同样是自由的敌人;因此,他们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它进行斗争。从成功的革命行动的观点来看,他们的错误在于未能区别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既不会妥协,也不会伪装,又只限于在地方范围内组织行动。大体说来,他们虽不是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方法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的话)却同无政府主义者有许多共同点。布尔什维克在夺得政权以后很自然会发觉不可能同他们共事,但又不能马上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在农民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单靠他们似乎就能够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吸引到第二次革命的一边

来。在1917年以后的危急时期，列宁引导他的党所采取的土地政策，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当时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告诉农民可以夺取土地而无须等待任何人的同意，并且违背他们自己的理论而默认了个体农民经济的建立，因为他们深知，任何立即实行集体化的企图，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而断送革命。然而，布尔什维克仿效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政策来应付紧急情况，并不是完全皈依了该党或者准备同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分享权力。他们只不过是暂缓消灭左派社会革命党，而且只愿接受该党中那些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并协助他们消除老社会革命党影响的皈依者，因为老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在内战中或者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或者，这算是最好的，不愿同他们共同反对“白卫分子”。

科列加耶夫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时期曾担任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在他任职的短暂时期内，主要负责制定有关土地政策的明确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力从特设的土地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联盟前这个委员会受权分配土地）移交到当地苏维埃的农业部门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因为土地委员会一直是由老社会革命党控制着，而新的制度则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整个苏维埃。土地法本身基本上是根据老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制定的，规定土地的分配旨在保证每个农户享有生活手段。但是它也十分强调采用改进了的生产方法，并鼓励实行在经济上优越于农民个体耕种的集体耕种。在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的法令中，没有包括有关集体耕种的条文，当时他们为了首先保证最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他们夺取政权，所以把这件事搁置起来。在一位不属于布尔什维克而属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民委员的主持下，把主张集体耕种的声明写入法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

表明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准备暂时对农民作出很大的让步，但这绝不是准备放弃它在尽早的适当时机不仅将把土地社会化，而且连农民也将加以社会化的意图。这也似乎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尽管无疑曾强烈反对强迫的集体化，但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上述意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许多老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不同，他们是态度鲜明的社会主义者，不会不知道在一种个体耕种的制度下，农民会很容易转变成一种非常保守的势力。他们一方面反对强迫的集体化，一方面希望主要通过尽可能充分发展合作社的方法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反对这一点，理由是自愿组成的合作社很容易变成对富裕农民最为有利；根据这一理由，他们常常指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站在较富的农民一边反对贫苦农民。然而，在事实上，对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支持来自较穷苦的农民，而他们最不希望出现的是鼓励农村生活新结构中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合作耕种抑或个体耕种，而是在于强迫地抑或是自愿地发展集体耕种的方法。 197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其影响极盛时究竟有多大实际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在1918年1月的立宪会议中他们仅有40名代表，而老社会革命党却拥有370名。但这并不能说明实际的影响有多大，因为选举是在公开分裂以前举行的。在农民代表大会中，他们拥有人数多得多的代表，这使他们得以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把老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赶下台，而代之以他们自己指定的人选。到1918年初，他们在苏维埃统治地区的群众中的影响，确实已远远超过老社会革命党人，但这部分地是由于有那么多老社会革命党领袖已被从有权力的职位上赶走。如前所述，他们在水兵中影响也根大；而且在城市中，由于他们主张工人实行民主管理，因而同迅速发展的工会合作得很好。如果说，在1918年七月事变之后，他们的追随者迅即风流云散，这主要是由于内战和战时共

产主义的紧急局势同他们的自由主义原则大相牴牾，迫使许多同情他们主张的人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

十月革命以后，当社会革命党人分裂成完全对立的单独政党之际，相反孟什维克却出现了重新联合的倾向。马尔托夫的国际派的追随者由于反对战争和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而被排斥在多数之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几个月中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单独的政党。实际上，这两个争论的问题中的第二个，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而暂时消失，而第一个也随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而不复存在。在些以后，鼓吹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意味着对苏维埃政府的公开叛变；而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如果不同时主张对德国人进行革命战争或呼吁协约国进行干涉的话，也就毫无意义。然而，只有极少数孟什维克准备采取任何这些方针。结果，孟什维克互相敌对的各派发现他们又被一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立场吸引到一起，不过采取了克制态度而不使他们的这种反对立场走向极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马尔托夫的国际派已经成为占优势的集团，而且在苏维埃统治的俄国各地区，那些仍然站在老的右翼多数派立场上的人们很快就接受了他的领导。

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孟什维克在这些地区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合乎宪法的反对政策。马尔托夫和唐恩说：他们不会参与任何企图以武力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活动，但他们要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各种机会来要求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工会和合作社的自由和独立，以及保持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享有有效的权力，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专制行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要求召开一次新的、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主张：只要苏维埃是通过各反对党有充分权力组织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真正自由选举产生的，那么就不反对苏维埃统治，也不反对剥夺非生产

者的选举权。他们坚持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篡夺了权力来推行强制性的法令，而不管苏维埃是否赞同，工农专政正在遭到破坏和歪曲；苏维埃本身也是精心选择的而不是自由选举的；而且尽管这样，还在强迫苏维埃放弃它们的实际权力而交给布尔什维克认为更加容易控制的、更加精心选择的执行委员会和各个委员会。他们还坚持工会必须实行自治，不受党的控制并有权在制订工业政策时发挥主要作用；他们还要求在凌驾一切的国家计划控制制度之下给私人企业以有限制的自由，这同在列宁的提议下于1921年实际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十分类似。 199

实际上，在十月革命的几个月中，重新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党，竭尽全力在苏维埃制度中起着一种合乎宪法的反对派的作用。而且，以这种方式行使的自由，有一个时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容许存在的。直到1918年中，它在多数大城市的苏维埃中拥有许多代表，并且得以出版大量的党的期刊和报纸，利用它们激烈地批评政府违反民主的做法。随后，在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由于面临德国的重新侵略、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不满和反革命内战的爆发而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困难而突然改变了路线。孟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并发出命令把孟什维克的代表驱逐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公职。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均被宣布为非法，积极活动的孟什维克开始被大量地逮捕，不过其中多数人不久均获释。次月，禁令扩大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集团，《新生活报》被封闭。

但是，在1918年11月，这种政策部分地改变了，这时对孟什维克党的禁令予以撤销，该党重新获得了有限制的活动自由，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此后，又有许多孟什维克被捕，不过并没有重新颁布全面的禁令。1919年夏季，孟什维克发表了一个党的宣言，重申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要要求，同时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在内战

中参加并支持红军。孟什维克虽然被逐出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但并未被逐出各个工会，在1920年4月召开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们仍拥有相当数目的代表（在大约1000名代表中有70名代表），并在许多单独的工会中有着更多的追随者。不过，绳索已经拉紧，而在1920年一年之中，由于马尔托夫对共产国际分裂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绳索就更加拉紧了。尽管马尔托夫进行了这些抨击，但他仍获准在1920年秋季前往德国出席哈雷代表大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大会上辩论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他在会上作了攻击二十一条的讲话，但由于已离开俄国而且健康情况不佳，因此决定不再返国。相反，他在柏林创办了一个孟什维克期刊，在次年或以后的时期，该期刊曾有许多份秘密送入俄国。唐恩代替他成为俄国国内孟什维克的领袖，在以后的几个月内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接着，在1921年初，又开始了一轮新的逮捕，该年2月唐恩也决定移居国外，他和他的一些同事获准平安离开俄国。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和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对留在俄国的孟什维克进行了变本加厉的迫害，而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他们并未参与。至于新经济政策，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同他们多年来的主张十分相似。与喀琅施塔得暴动或在此次暴动前和暴动后随之发生的工业中的骚动比起来，新经济政策大概更加是导致孟什维克党于1921年上半年最后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布尔什维克越是不得不出让让步以挽救俄国的经济局势，他们就越是不能容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的批评。

就这样，孟什维克党在革命爆发大约不出4年之后终于告终。然而，在1917至1921年期间，它为布尔什维克党输送了许多个人成员，包括不少身居要津的人物。在1917年，左翼孟什维克越来越多地投向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而在第二次革命后，这种情况继续不断。无疑，在后来共产党的历次情况中，这些成员往往比一般人有

更多被清除的危险——他们之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过程中也确实被消灭了——但是他们之中不少人曾长期在苏维埃政府中，特别是在外交界任职。在内战期间，许多人成为布尔什维克，极少数成为反革命；更多的人虽未成为共产党员，但放弃了他们的反对立场而在较低的非政治机构，特别是经济工作中成为雇员。所有这些意味着有组织的孟什维克反对派被继续不断地腐蚀瓦解。不过他们几乎直到最后仍然在某些工会——主要在印刷工会——中保持着相当的力量。在工会中，孟什维克经常与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不满分子联合一起，要求更大的自治与更多的工人管理。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如果无法用其他手段驱逐他们，就诉诸于关闭那些难驾驭的工会或支部，而代之以新建的工会或支部。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孟什维克在他们被赶下苏维埃要职之后，仍得以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他们在工会中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对待孟什维克的态度不同于他们对待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孟什维克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是比布尔什维克要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指责布尔什维克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是革命斗争中的老同志——例如马尔托夫就曾同列宁很密切地在一起工作过。此外，即使在1917年，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之间仍无明显的分裂界线。在俄国境外，直到革命爆发，一直有一些设法使对立的两派合作的“调和派”——如托洛茨基；而在俄国境内，在某些地方仍有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组从来就没有承认分裂。再则，战争问题的争论使孟什维克陷入分裂。普列汉诺夫及其“爱国派”从右面与之决裂，而在左面，马尔托夫的国际派中反对同克伦斯基及历届临时政府合作的那一派，其行动越来越象是一个单独的政党。



孟什维克普遍所持的观点是：落后的俄国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而且在将来一定时期内也不会具备这种成熟条件。孟什维克在农民中几乎没有什么追随者，他们对农民的革命能力也不抱什么希望，除非是从破坏的意义上来说。农民也许会帮助推翻旧秩序，但是在孟什维克看来，在创建所需要的新秩序上——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是发展资本主义来作为经济进步的手段——几乎或者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业无产阶级来创建，而工业无产阶级除非等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大成长起来，否则是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与此相关，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之后，必须建立一种允许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民主政体，从而使无产阶级得以达到作为统治阶级而出现的成熟程度。孟什维克的共同愿望是让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并且认为过早地把它推向社会主义阶段势必会导致对革命事业的灾难性的背叛，导致内战，导致暴政，导致饥荒和经济崩溃。

在1917年2月，这种认为必须使革命暂时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的观点，依然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共同持有的官方观点。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孟什维克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者在帮助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必须避免同资产阶级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并且必须作为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要求实现在资本主义下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时不应过份，以免这种要求达到使资本主义无法进行工作的程度。而布尔什维克，由于更加意识到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为了保卫革命，必要时甚至准备同资产阶级结成暂时联盟来反对专制统治——当然，其目的只是准备以后当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再反对他们。它们之间还存在另一分歧，即大多数孟什维克认为：为了给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准备道路，需要一个较长的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经济发展时期。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

则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应是比较短的。然而，直到1914年，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他既非布尔什维克，亦非孟什维克），几乎没有任何人得出结论认为这两次革命会是一个单一的、连续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紧紧连接的，或者甚至是重叠出现的阶段。

如前所述，<sup>①</sup>托洛茨基派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认识，并且认为，由于这种软弱性，工业无产阶级甚至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就不得不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列宁也是由于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才使得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可能需要分担政府职责，以便保证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专制统治的胜利。但是列宁直到1914年仍然坚信，必然会有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有一段间隔时间，而反对那种认为两个革命将联接在一起的一次革命思想。但是，在1914年以后，列宁相信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已经扫清，而不管某个国家的条件成熟与否。这使他同托洛茨基尽管所持的根据不同，但达成了事实上的意见一致。但是，孟什维克（他们并不同意列宁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的观点）的主张则原封未动，即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统治来代替专制统治，而只有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的国家才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实际上是一些西方化的人，他们全盘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把它作为不论在俄国或其他国家都应遵循的行动模式，即认为社会主义注定要通过民主夺取政权的途径来达到，而这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他们在将此理论运用于俄国的条件时，对俄国资产阶级不<sup>204</sup>论在摧毁沙皇统治或者在沙皇统治被胜利推翻后治理国家方面

---

<sup>①</sup> 见第3卷下册，第955页（中译本第426页）。

都毫无能力这一点丝毫没有估计到。二月革命以后出现的形势表明，俄国资产阶级既未能在发动这次革命中发挥任何真正作用，而且在专制统治丧失权力后又未显示出任何驾驭风云的能力，这就清楚地说明孟什维克对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估计是多么地错误。这也表明孟什维克不仅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能力，而且同样大大地过低估计了农民的作用；而列宁却不仅清晰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无能，而且清晰地看到了农民必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在1917年2月以后，孟什维克就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在历届联合政府中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或者避开当前的斗争——除非他们准备放弃自己的信念：即认为任何使这次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图都为时过早。由于对他们的多数领导人来说这种信念是根本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即或者是先后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或者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以策烈铁里为首，选择了前者；而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国际派则选择了后者，并因此而丧失了使自己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一切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不幸的孟什维克倒向布尔什维克阵营；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瓦解日益明显时，布尔什维克一定会满怀希望地（虽然还抱有怀疑）寻找来自孟什维克的皈依者。在十月革命之前，之所以没有更多的孟什维克转向布尔什维克，我想主要是由于列宁和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在接受可能的皈依者时对之抱有极端的怀疑，并且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已经成为具有高度纪律的组织所致。这种宗派主义使许多孟什维克成为徘徊不定的动摇者，并使那些左翼孟什维克领袖们由于个人的原因和思想上的原因而裹足不前。但是马尔托夫一派人，毕竟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要他们接受任何投向反革命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这派信徒们或者追随他们的领袖在拥护内战的同时试图组成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合乎宪法的民主反对派，或者以个人身份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任职，成为布尔什维克行政机构的成员。他们在这些行政机构中后来多半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深怀疑，并且在许多案件中以叛国的罪名而最终被清洗或处决。

在论述孟什维克的态度时，本书至此尚未述及外高加索孟什维克十分特殊的情况。他们的历史沿着一条不同的进程而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时期他们被从新建立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割裂出去，从而成为自己内部倾轧以及先是德国、土耳其，后是英国的强权政治的受害者。十月革命时期，除老的革命风暴中心巴库一地之外，布尔什维克在外高加索没有什么追随者；在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除巴库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力量甚弱，尚未发展起来，而民族对立却很强烈。除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外，还有许多小的民族集团；此外还存在着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尖锐宗教分歧。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在梯弗里斯<sup>①</sup>建立了一个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控制在格鲁吉亚人手中，十分含糊地承认它将归顺于由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所建立的新的俄罗斯国家。这个人民委员会并非社会主义的，它同一个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所控制的地区性工农兵苏维埃共同行使职权。1917年12月，该人民委员会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后来，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俄国人并未同外高加索当局协商，就同意根据和约交出某些地区——将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交给格鲁吉亚，将亚美尼亚的阿巴丹区交给土耳其。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强烈反对这项决定，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外高加索联

---

<sup>①</sup> 1936年改称第比利斯。——译者

邦共和国作为报复。这个联邦共和国几乎马上就陷入四分五裂，  
206 1918年5月成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巴库，则单独宣布成为一个苏  
维埃共和国。不久，土耳其人征服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他  
们各自的共和国随之崩溃。格鲁吉亚只是由于同德国人签订了一  
项条约，允许德国人在战时控制其资源，并在德国人的协助下与土  
耳其缔结了和约，才告幸免。于是，德国人迫使俄国在布列斯特一  
里托夫斯克和约的一项附约中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格鲁吉亚的  
孟什维克这时势力已经强大，替代以前的政府而自行掌权，由在  
此以前一直担任格鲁吉亚苏维埃主席的诺阿·约旦尼亚（1869—  
1953年）任总理。

在此期间，英国人已从波斯进军阿塞拜疆，并推翻了巴库苏维  
埃共和国；到1918年秋季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失败后，英军即占领  
了外高加索全部主要城市，只留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在他  
们的监督下继续任职。英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格鲁吉亚的独  
立要求，但俄国的白卫分子——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拒绝同意。  
到次年年底，英军已撤出外高加索（只留下巴统，至1920年7月  
方才撤出）；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失去依靠，不得不面临在内战中获  
胜的布尔什维克日益强大的势力。在英国人支持下继续掌权的阿  
塞拜疆政府在1920年4月被巴库的一次共产党人暴动所推翻，宣  
布成立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俄国人这时忙于进行波兰战  
争，尚无余力在外高加索其他地区建立政权。相反，他们同格鲁吉  
亚共和国签订一项条约，重申承认其独立。在亚美尼亚，共产党人  
曾试图夺取政权，但遭到失败。1920年8月签订的塞夫勒条约承  
认亚美尼亚独立，但凯末尔的军队侵入该国，将亚美尼亚政府推  
翻。只是到了1920年11月俄国人才进军亚美尼亚，并宣布成立亚  
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证明离开俄国人的帮助它是无法

存在的。后来曾发生一次起义，但被红军平息下去，苏维埃政府又恢复了权力。

至此，只有格鲁吉亚尚勉强保持着独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设法取得西方社会党人的支持以挽救自己；一个社会党人代表团，成员包括拉姆齐·麦克唐纳、王德威尔得和考茨基，曾于1920年9月访问了格鲁吉亚，带回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报告。接着格鲁吉亚政府申请加入国际联盟。申请虽未被接受，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于1921年1月承认格鲁吉亚独立。在此期间，1920年9月在苏维埃指使下召开的东方民族巴库代表大会上，指责格鲁吉亚人迫害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的暴行，格鲁吉亚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因此迅速恶化。最后，红军在一支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军队的配合下进占梯弗里斯。孟什维克政府被推翻，宣布成立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曾指示对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要宽大对待，并宣布对他们赦免，但斯大林无视这项指示，对他们进行了粗暴的镇压。但是，大多数孟什维克领袖逃往国外，定居巴黎。有些人留在原地同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妥协。

除了巴库杂处的各民族外，只有格鲁吉亚人单独一个民族在这种混乱的事态发展过程中还能起点作用，但他们先后沦为德国、英国和俄国的傀儡，而一旦俄国人结束了内战和波兰战争，得以腾出手来干预他们的事务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是落入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之下。格鲁吉亚人不足200万人；离开外来的援助显然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自立，注定要成为这个或那个强邻手下的牺牲品。诚然，确曾有些人数不多的民族得到俄国人承认，他们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资产阶级统治下保持独立的权利，但这些小国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协约国的支持，一方面是由于俄国需要一个“西方的窗口”，以便打开贸易关系。格鲁吉亚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只有当俄国人在其他地方腾不出手时

才能幸存。然而俄国人处于困难境地，因为格鲁吉亚人如果要求民族自决的话，他们同芬兰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一样有权这样做，而俄国是几乎无法拒绝的。可能是由于他们顾虑到这一点，也许是由于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是格鲁吉亚人的缘故，所以俄国人才在1918年和1920年承认格鲁吉亚共和国，而且列宁在1921年主张赦免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多灾多难的当权期间，实行了公认的孟什维克政策。他们并未企图使落后的格鲁吉亚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他们竭力鼓励资本主于的发展，并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政体，鉴于该国在经济上的落后，而且在孟什维克当权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依靠一些肯定不会容忍完全社会化的政体的国家给予支持，事实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所能做的也只不过如此。

同孟什维克密切合作的是犹太崩得。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自称是整个旧俄罗斯帝国犹太工人的代表，但其主要力量在波兰和立陶宛。如前所述，<sup>①</sup>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反对它自称是犹太工人代表这一点。主要因为这一争论，崩得在1914年以前曾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后又退出。就社会学说来讲，崩得大体上属于孟什维克，它的一些领袖，包括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1879—?)在内，1917年期间曾是孟什维克党内的积极活动家，米哈伊尔·李伯尔(1880—1937年)是它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代言人。他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最后于1937年被布尔什维克处决。崩得作为独立的组织直到1921年仍然存在，由于共产国际的裁决，当时它剩下的成员最后被共产党所吸收。在前一年，崩得曾经多数投票通过加入共产党，但它的领导人们却坚持要保持一种半自治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471—483页(中译本第481—494页)。

状态，而这同共产党的集中制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由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一争论被提交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解决这一分歧时当然是主张把作为单独组织的崩得完全解散。流亡在国外的崩得分子拒绝成为共产党人，主要作为孟什维克而继续活动，直到孟什维主义不再存在为止。

为了完整地叙述俄国各反对派的情况，最后还应对无政府主义者略提几句。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最突出的人物当然首推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其思想和生平，我在本书第2、8两卷中已经述及。<sup>①</sup>克鲁泡特金主要在瑞士和英国流亡多年后，于1917年返回俄国，在俄国度过他漫长一生的晚年。由于革命的发展进程与他的希望背道而驰，他愈来愈感到幻灭。他死于1921年2月，正好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前。他的葬礼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名望卓著，所以他虽然并不掩饰他完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但这位鼓吹“互助论”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得以在俄国安度晚年。他年迈多病，在公共事务中已起不了任何作用，作为已经逝去的时代的“元老”，活到了79岁。在新俄国，他没有直接的追随者，不过许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由于离开了克鲁泡特金，所以就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思想意义来说，他们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称不上是一支有影响的独立力量。在1917年关键的几个月里，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曾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但其力量微不足道，在革命中起不了主要作用。苏哈诺夫曾谈到1917年6月彼得格勒杜尔诺沃别墅无政府主义者总部的一些情况。当时苏维埃派他前往该处，要求他们在当月18日的游行示威中不要以武装的面貌出现。他们 210

---

<sup>①</sup> 见第2卷，第12章，在第8卷中亦多处提及。



在苏维埃的代言人布莱奇曼告诉他说：他们不承认苏维埃的权威，因为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他们除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他们建议举行武装的或非武装的示威游行，随他们的情绪而定。后来，苏哈诺夫谈到在七月事变中没有经过流血而夺取杜尔诺沃别墅的情况，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已及时撤离该别墅。看来，起初他曾把他们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一批人，但是经过在他们的总部与他们会见后，大大地放了心，以后便认为他们无足轻重而置之不理。

但是，虽然公开自封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无足轻重，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一工团主义思潮却是举足轻重的，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工会中尤其如此。当然，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不是一个政党，因为这是违背他们的原则的。他们是一个派别。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则蔓延甚广，远远超出他们的队伍，不论在一些要求工人管理工业的更为极端的要求方面，或是在更大规模上农民运动的极左主张方面，都体现了无政府主义。雅罗斯拉夫斯基那本很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不真实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史》，除了对后面这一点有所说明外，实际上对这些方面毫无论述。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乌克兰农民领袖内斯特·马赫诺（1889—1934年），他的军队在德国占领和随后的内战期间，曾横行于农村，甚至占领了许多城镇。

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道，在1917年的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他们起了什么重要作用的话，也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当时他们开始渗入某些工会——特别是面包师工会——并鼓动工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即使在这时，除了在乌克兰外，他们也只是在同“布尔什维克工人反对派”和城市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起到作用。后来，在1921年，他们成为支持工业骚乱的力量之一，这些骚乱最后以喀琅施塔得暴动

而达到了顶点，他说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1918年8月召开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只是到1920年才在莫斯科建立了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当即遭到取缔。在内战期间，某些无政府主义小组曾设法获得武器，并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建立设防据点，作为抢劫资产阶级财产的基地，他们攫取到这些财产后加以分享。这听起来完全象是一些犯罪分子的劫掠行径，而不象是任何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派别的所作所为。 211

不过，在俄国也有一些真正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小组，与那些只不过是挂名的无政府主义小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警钟”小组，其成员有沃利涅（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艾琴鲍姆，1882—1945年）、乌克兰人法尼斯和阿伦·巴龙，以及P·阿尔契诺夫（1887—？）。阿尔契诺夫早年曾在乌克兰南部领导反对德国人的起义，当时团结在马赫诺周围英勇作战。马赫诺本人<sup>①</sup>原为教师，他虽然热衷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某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中享有比他的实际水平要高的理论家地位，但作为理论家是不足为道的。他基本上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和一个“嗜血成性的人”，在农村指挥匪徒四处掳掠，进行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屠杀，包括令人发指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在他所控制的地区没有建立任何固定的组织。在德国人撤走后，他也曾断断续续地与白卫分子作过战，有一个时期曾被承认是红军的指挥官，直到因拒绝将他的匪帮并入红军而被开除并作为敌人对待为止。最后，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越过边界进入罗马尼亚，遂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直到1920年他仍然是一支必须认真加以对付的力量，虽然他不顾“警钟”小组的压力，并没有真正打算将他的建立自由、

---

<sup>①</sup> 关于马赫诺，参见后面原文第608页。

无政府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付诸实行。

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亚历山大·贝尔克曼 (1870—1936年)和埃玛·戈德曼 (1869—1940年),虽然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俄国国外进行的。他们直到1920年才返回俄国,呆了<sup>212</sup>不到两年。贝尔克曼生于俄国,返回俄国前在美国居住将近30年之久,并在那里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以曾与喀琅施塔得暴动有牵连而著称,后来曾写了一本有关这次暴动的历史,宣称它是第四次(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开端。埃玛·戈德曼曾长期充当美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在“无政府主义国际”中也是一个著名人物。她在美国曾屡遭监禁。在返回俄国后,她马上发现她不喜欢新的苏维埃制度,犹如她不喜欢已摒弃了的资本主义政府一样。她参与宣传“第四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基础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它将结束独裁式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国家。她和贝尔克曼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都幸存下来,于1922年离开俄国,成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人物。在俄国本国,二人均未起重要作用。

(王丽华 译)

## 第七章

213

### 奥匈帝国的革命：奥地利、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如本书前一卷所述，奥匈帝国早在 1914 年前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sup>①</sup>。1910 年，它的 5,100 万居民中，没有一个民族集团的人口占 1/4。两个人数最多的语言集团——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分别为约 1,200 万人和约 1,000 万人——即使加在一起也根本达不到多数。有 850 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分居在这个二元君主国的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大约是 650 万在奥地利，200 万在匈牙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总计约 700 万，也是一部分在奥地利，一部分在匈牙利。几乎全部 500 万波兰人，以及 400 万乌克兰人（或称罗塞尼亚人）的大多数，均在奥地利治下。300 多万罗马尼亚人，大多数在匈牙利治下。100 万意大利人中有 3/4 以上在奥地利治下。最后，大约还有 25 万弗拉其人和吉普赛人——这两个在种族和语言上截然不同的群体，居住非常分散，多数在二元帝国的匈牙利部分。

这些民族集团的发展程度和民族意识处在各不相同的阶段。如前所述<sup>②</sup>，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寻求在不破坏帝国统一的前提下，承认各民族文化权利的办法，这并非因为他

<sup>①</sup> 见第 3 卷下册，第 12 章。

<sup>②</sup> 见第 8 卷下册，第 520 页（中译本第 2 页）。

214 们忠于帝国的现存形式,而是因为必须找到办法,使居住地区十分杂乱的不同民族的工人,能够在政治上,更重要的能够在工会工作中作为一个统一的运动的成员而进行合作。战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至少到1907年捷克工会问题的争论为止,甚至曾以“小国际”——通过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建立的广泛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先驱——而自豪。虽然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党联盟,每个党代表一个特定的民族,并对本身的事务实行自治,但所有各党都在一个“全国党”中共同联系在一起,定期举行联盟各党的会议,并在奥地利参议院中作为一个党共同行动。

然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组织。奥地利的“小国际”事实上主要由德意志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组成,其他民族仅起很小的作用。比较弱小的匈牙利社会党,其主要势力在布达佩斯,并主要由犹太知识分子所控制。它的成员极为混杂,包括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和许多其他分子,但它在创立关于工人阶级斗争中民族地位问题的任何专门理论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建树。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理论,主要是由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提出来的,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捷克民族主义日益发展的影响及其瓦解奥地利的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的威胁。奥地利的情况与二元君主国的另一部分匈牙利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捷克社会民主党与大体上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捷克民族社会党相对抗,构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但波希米亚的捷克工会的多数于1907年与奥地利总工会决裂,同捷克民族运动结成联盟。这种分裂得到安东宁·涅米克(1858—1926年)领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和鼓励,尽管该党仍然是联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但是,在摩拉维亚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捷克工人仍然属于维也纳的全奥总工会。工会的分裂在191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

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辩论<sup>①</sup>，决定反对捷克分裂主义者；但是这些人坚持不同意见，拒绝接受国际的裁决，坚决维持他们单独的工会组织。他们的论点是：在政治上各民族政党需要自治和保持一种联合体制，这已得到承认；而奥地利工会却高度集中，拒绝接受任何区域自治的体制。总工会则驳斥说：捷克人、德意志人和其他各民族的工人往往一起受雇于同一企业，所以按民族路线分裂工会而又不致破坏工会在为工人阶级共同利益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sup>②</sup> 215

波兰人的问题，麻烦要小得多，因为如前所述，加里西亚的奥籍波兰人感到他们在奥地利统治下较在俄国和德国统治下的波兰人生活要优越得多。在加里西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受波兰人压迫的人数众多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对在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人寄予同情。但是，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原始的农业民族，在他们中间社会民主主义的追随者寥寥无几。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乌克兰分部所进行的活动，比起奥地利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来，更容易吸引他们。

所以，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来说，构成了问题的核心；而且如前所述，捷克民族主义——它主要来源于一种资产阶级运动——的压力已经十分强大，足以导致工会队伍的分裂。建立已久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尽管隶属于联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坚持建立自己的单独工会运动；此外，虽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针对这种情况，把自己组成一个各民族的党的联合体，所有各党均接受共同的领导，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

---

<sup>①</sup> 原文如此，按 1910 年关于捷克工会问题的辩论，应为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第 3 卷上册，第 77 页（中译本第 87 页）。——译注

<sup>②</sup> 关于这场争论的详细论述，见第 3 卷下册，第 533 页。

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组织的工人的多数，以及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受雇的人数众多的捷克工人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但它未能防止捷克社会民主运动中与捷克民族社会党分道扬镳的严重分裂倾向。捷克民族社会党仅仅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与马萨里克领导的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行动上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中，德意志人占很大的优势，这使这些冲突无法避免——而且由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不能不受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它在欧洲社会主义和迨至1914年以前的第二国际中居于凌驾一切的地位，这样，情况就更加如此。在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队伍中，确有不少人，如恩格尔贝特·佩纳施托费尔(1850—1918年)，预见到奥地利国家将瓦解，期望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将并入德意志帝国中去。然而，这种泛德意志主义引起了同捷克民族主义的正面冲突。因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混杂在一起，要想使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合并于德国，而又不致同时将捷克人置于德国统治之下，和使他们与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永远分开(这是捷克人既不会接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多数德意志人也不会强加给他们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多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一种改革奥地利国家的主张，在这个经过改革的奥地利国家中，各民族集团完全平等，实行广泛的文化自治，但他们同时又渴望保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种基本上具有德意志人精神面貌的特点，并继续同日益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尽可能最友好的关系。这是1914年前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1851—1918年)的态度。他以泛德意志的倾向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但当他成了奥地利“小国际”的主要组织者和鼓舞者时，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德奥两国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一点也表现在奥地利出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考茨基和鲁道

夫·希法亭(1877—1942年)都是奥地利人,另外还有很多奥地利人,其中有阿道夫·布劳恩和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闻界的各方面担任着要职。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当战争在1914年真的爆发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不是在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团结在爱国派 217 一方。固然,在战争真的爆发前,它确曾强烈抗议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提出的最后通牒的条件;如果俄国和德国都同意不插手,以便使冲突局部化,得到较好的机会进行调停,而不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话,它是会真正高兴的。但是维克多·阿德勒向布鲁塞尔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报告说,奥地利的爱国情绪过于激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坚决站出来反对塞尔维亚战争;而当俄国和德国插手后,他和几乎所有其他领导人本能地站在德国一边。少数年青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里希(1879年生)则反对党的决定,但是暂时他们孤立无助,并且感到灰心丧气。

由于是一场反对斯拉夫民族的战争,所以不可能指望奥匈帝国中大多数拥护社会主义的斯拉夫人会采取同样路线。许多南斯拉夫人肯定会同情塞尔维亚人,并把俄国人看成是他们民族事业的可能救星;许多捷克人则是把战争看成是民族解放的可能机会。波兰人由于仇恨俄国并害怕乌克兰人暴动,很可能站在奥地利一边,但是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到,除非战争以迅速获胜而结束,否则很可能导致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瓦解。在1914年,没有一个民族集团强大到足以试图主动发起叛乱,即使它有心这样做。应征入伍的士兵服从号召加入奥匈军队,全国工人坚守岗位,继续工作,维持军队和居民的供应。但是,许多应征入伍者并非心甘情愿;当事实显然可以看出中欧强国不可能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后,捷克民族主义者马上就有组织地到国外去工作,以便为协约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铺平道路,从而坚决地站在协约国一边,支持他们



的是分裂出去的捷克社会民主党，而在开始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up>218</sup>的捷克分部不支持他们，因为该分部在鲍胡米尔·什麦拉里(1880—1941年)领导下，追随德意志分部支持战争的政策。

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奥匈帝国的人民蒙受了物质日益严重匮乏之苦，要求和平的愿望日趋强烈。不久，捷克人从军队开小差的日增。马萨里克和他左右的人，为了向协约国方面提出捷克独立的要求，战争爆发后即到国外，这时开始主要从战俘中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为协约国效力。定居在美国的捷克人则为流亡国外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经费。马萨里克设法逐一地从协约国政府获得承诺，建立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然而，直到1916年秋，除捷克人外，奥匈帝国还没有真正出现严重的内部威胁。以后，就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大大改变了形势。1916年10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枪杀了奥地利首相施蒂尔克伯爵，以表示反对战争，这一行动受到普遍的赞赏。<sup>①</sup>次月，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逝世，由卡尔继位，他以鼓吹改革闻名，将会给属下各民族以在一个联邦制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的较大的权利。紧接着，1917年2月发生了俄国革命，受到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欢呼，自然也在奥匈帝国属下的斯拉夫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希望。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受审时，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发表了挑战性的讲演，这是对帝国及其战争政策的强烈控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不再支持战争。在此同时，卡尔要求匈牙利政府把选举权扩大到军队服役的人员，以改革匈牙利受到严格限制的选举制度。蒂萨政府拒绝这样做，并实行辞职，接任的新政府保证进行这项改革。自19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开过会的奥地利参议院于1917年5月底召集会议，立刻就显示出气氛已经大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7页。

变，波兰人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完全独立的波兰；捷克人要求成立一个自治的捷克国家，作为以所有民族集团自由平等为基础而成立的新的联邦制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则要求所有南斯拉夫人在帝国范围内联合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虽然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但对自己的事务完全实行自治。 219

在此之前，1917年3月，新皇帝曾企图与协约国秘密谈判单独媾和。谈判破裂，主要原因是意大利拒绝对协约国为使意大利参战而达成的密约中答应它的领土要求作任何让步。于是，奥地利政府与德国接触，试图劝说德国人与它一起试探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但是德国政府予以拒绝，甚至威胁说，如果奥地利人单独媾和，将转而向奥地利用兵。同时，新组成的匈牙利政府也未能促使马扎尔人控制的匈牙利议会接受选举改革；它更为担忧的是，如果皇帝试图强行通过这项改革，匈牙利就会脱离帝国，作为协约国而同德国人继续作战。

不久，在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个月后，订立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其中包括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乌克兰代表强烈要求把奥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包括进他们的新国家中；而奥地利谈判代表被迫同意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割让一小块地区并承认在东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一个自治的奥地利—乌克兰国家。这激怒了加里西亚的波兰人，他们决心保持他们对奥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并且与俄属波兰一样，同享刚刚被承认的独立。奥地利政府被迫接受乌克兰的独立，主要是希望从乌克兰获得供应，以补偿奥地利食物的严重短缺，因为这已在1918年1月引起各城市普遍发生的罢工。但是得到的供应很少，而且实际上各乌克兰地区，以及波属加里西亚，几乎脱离了奥地利的统治。这些地区以后必然会成为彼得留拉的掠夺物，彼得留拉后来作为乌克兰领袖出现在政治舞台，同波兰人达成 220

了协议，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一点。<sup>①</sup>

在此期间，1917年美国参加战争，威尔逊总统发表了十四点纲领，这在奥地利重新唤起了和平的希望。但是政府不能在十四点纲领的基础上求和，因为匈牙利议会仍然拒绝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作任何让步。因此，奥匈帝国在日益增加的土崩瓦解的威胁下继续进行战争，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1918年初德国大举进攻的胜利。此次进攻失败后，奥匈帝国的解体已成定局。9月，保加利亚战线崩溃，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停战，于是，匈牙利直接受到协约国攻击的威胁。军队中的马扎尔部队叫嚷着要求回国内去保卫他们的本土。奥地利政府在山穷水尽之后，宣布奥地利改变体制，成为自由国家联邦。两天后，10月3日，与德国人一起要求威尔逊总统停战。波兰人在华沙立即宣布独立；已被协约国承认为共同交战一方的捷克人，在巴黎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而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捷克人自行取代了奥地利当局，未经战斗就掌握了政权。乌克兰人召集国民会议来解决他们国家的前途问题。在萨拉热窝、的里雅斯特、莱巴赫<sup>②</sup>等地也建立了其他临时政府。尽管马扎尔人继续坚持匈牙利管辖下的领土的完整，但这个老大帝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到了末日。在奥地利本土，德意志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维克多·阿德勒代表社会民主党要求奥地利作为一个联邦加入德意志帝国。

## 奥 地 利

奥地利本身在1918年10月最后垮台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221 分崩离析的过程。俄国的两次革命在激励反战情绪和唤起民族独

<sup>①</sup> 见本书原文第609页。

<sup>②</sup> 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的德文名称。——译注

立希望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受审时发表的演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早期曾支持战争的奥地利德意志人的态度。1918年1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平谈判时，大规模罢工的浪潮，从维也纳新城开始，席卷奥地利，甚至波及匈牙利，使军火工厂陷于瘫痪，并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和平、面包和改善严酷的雇佣条件。这次大规模罢工部分是由于削减已经不足以果腹的面包配给而引起的饥饿运动，但它们在各处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罢工之所以未能发展成为暴动，主要是由于调至工业区来镇压罢工的士兵，大多数是来自斯拉夫地区的农民，政治觉悟低，其中多数都不能讲罢工者的语言。只要军队的多数服从命令射杀暴动的工人，就不可能有成功的起义。在残酷的军事镇压下，罢工者被迫复工。当他们勉强回到工厂后，罢工运动又蔓延到德国，在那里也同样被军队镇压下去。但在这两个国家，罢工者虽遭到打击，他们的行动也开始了内部分崩离析的过程，然而则为后来发生的革命开辟了道路。而且，在奥地利，紧接着大规模的罢工，又于1918年2月1日发生了停泊在卡塔罗湾的奥地利舰队的40艘舰只的哗变。哗变者拘捕了他们的军官，升起了红旗，但仍然停留在湾内，暴露在岸上强大的海岸炮台的射程之内，而且有受到附近大批德国潜艇攻击的危险。由于受到炮轰和潜艇攻击的威胁，又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哗变者最后被诱劝投降。他们的领袖被拘捕，4人当即被枪毙，更多的人被监禁听候审讯。奥地利政府尽一切可能将这件事保密。但是当时驻扎在卡塔罗的炮兵军官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1891年生)设法将所发生的事情的消息通知了在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阿德勒扬言如果当局进一步命令处决人，将采取群众行动，迫使当局把进一步的判决限于有期徒刑。这次哗变虽未成功，但对奥匈帝国的瓦解也起到了作用，并有助于为以后的崩溃开辟了道路。

22

虽然奥地利帝国事实上已经瓦解,但 1918 年 10 月 21 日由奥地利参议院中的德意志议员建立的新奥地利国家,在形式上仍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只是到 11 月 12 日,即皇帝逊位的第二天,作为维也纳革命运动的结果,才正式宣布成立一个德奥民主共和国。在共和国建立的同时,大会宣称它是刚刚由谢德曼在柏林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新的奥地利共和国自己所宣布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奥地利帝国旧有的领土(由非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除外),而且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主要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各地区,而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也声称后面这些地区属于它的管辖范围。然而,协约国很快就禁止奥地利同德国合并,并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对整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领土要求,此外还有斯洛伐克、外喀尔巴阡罗塞尼亚的乌克兰人居住地区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协约国还规定,新的奥地利国家应称为奥地利,以代替奥地利民主共和国。为了补偿德意志人居住地区归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而造成的损失,奥地利可在东部扩展,牺牲匈牙利而获得布尔根兰。但是差不多过了三年时间,新的疆界才最后得到确定和占领。这样一来,奥地利成了一个约拥有 650 万人口的小国,其中近 200 万人在维也纳和紧靠它的周围地区。维也纳曾经是 5,000 多万人口的帝国的首都,转瞬间成了一个主要是农业的小国的人口极为稠密的中心。这个国家被其他国家四面包围,这些国家很快就争先恐后地对它的出口品提高关税,并以完全由它们控制的新的国家行政机构来替代以前首都的帝国文职、银行和商业机构。在经济方面,新的奥地利几乎是一筹莫展,而且在政治上也陷于严重的瘫痪。因为,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着维也纳和其他少数城市,但国家的其余部分,被历来反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宿敌、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社会党,或为鼓吹泛德意志主义的民族主义党所控制。1919 年 2 月,按比例代表制和成年人选

举权而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 69 席，基督教社会党人得 63 席，民族主义党人得 26 席。这三个政党虽然很敌对，但组成了联合政府，以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1871—1950 年）为总理，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在俄国受监禁刚刚回国的奥托·鲍威尔（1881—1935 年）为外交部长。另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赛茨（1870—1950 年）当选为新议会的议长，并因此而代理奥地利共和国总统。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不占多数，但在共和国初期是主要的力量，并无可置疑地控制了共和国在人口上占比例很大的中心维也纳。他们是在遍及全奥地利的群众骚动和反叛旧秩序的浪潮中被推上权力地位的，并且发现自己竟成了帝国解体后遗留下来的这个局面的主宰。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是维也纳当地革命的直接结果。当时在维也纳，他们想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完全可以由他们来掌握。一些工人阶级领袖期望他们以俄国为榜样，建立一个以在工厂和军队到处出现的委员会的权威为基础的工人和士兵共和国。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试图这么做，尽管他们着手进行工作，以便保证支持他们的少数军队忠于共和国。他们给予士兵以完全的公民权利，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他们谨慎地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忠诚可靠的军官；他们努力使军队成为一支受过政治教育的军队。他们还急忙宣布工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给工厂委员会以受到保证的法律地位。但是，他们没有设法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是着手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秩序。尽管在工人中间革命情绪十分强烈，但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少数左翼分子与他们决裂，建立了一个奥地利共产党；但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追随者，在奥地利议会里甚至连一个席位也从未获得。当曾经暂时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匈牙利共产党在布达佩斯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并要求奥地利人步其后尘并给予

援助时，新建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遇到了它建立初期最严峻的时刻。<sup>①</sup>但是，当时企图在维也纳发起共产党人起义的一小伙人，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并轻而易举地便被镇压下去。这次没有采取雇用反革命军队的手段，如诺斯克在德国所采用的那样，也没有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留下互相仇视的后遗症，如诺斯克所采用的方法所造成的那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情况，为什么会反对在奥地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在1918—191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毫无疑问是一个左翼政党，因为它的最积极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都是十足的左派。即使在1918年维克多·阿德勒死后的一些温和派领导人如卡尔·伦纳、卡尔·赛茨以及著名的《工人报》的难对付的主编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1862—1931年），比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来要左得多。特别是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控制极为牢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如此。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比德国人更甚。党的活动渗透到一切方面——音乐、戏剧、旅游和假期、教育和体育，而且都不亚于在政治和工会事务方面。达维德·巴赫组织的工人音乐会是举世闻名的；由奥斯特利茨主编的发行数量很大的维也纳日报《工人报》，远不只是一份报纸，而是一份每日出版的评论杂志，以高得惊人的文化和文学水平自由地讨论文化以及政治或经济等问题。从文化上讲，固然基本上是德意志—奥地利文化，党的基础也植根于人民中的德意志—奥地利部分。但在旧帝国崩溃后，这一点成为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弱点。最重要的是，如共产党人很快就发现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的控制十分牢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36—237页。

固，是无法动摇的。

另外，从权宜考虑也有许多十分有力的理由，反对任何把新的奥地利转变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已经被缩小的奥地利共和国，若无外界的援助是无法存在的。而马上能得到援助的可能来源，是奥地利曾与之作战的各国。甚至从长远看，新共和国几乎无法指望能以自己的产品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食品；而即使协约国允许输入这些东西，也没有能够用以支付进口产品的财源。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依靠协约国的承认并在其为恢复经济自立而必须进行的重新建设中给予帮助。因此，象在德国一样，对协约国政府究竟会怎么做，抱着提心吊胆的态度，这就象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因素，使社会民主党不敢采取任何可能会触犯它们的措施。而且，在国内也有充分的原因，使社会民主党不能采取估计会引起国内非社会民主党的人们反对的任何行动。维也纳必须供应粮食，而即使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奥地利乡村的农民也决不会同意被拉着—道走。社会民主党在乡村几乎得不到支持，而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政治盟友基督教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有着十分牢固的阵地。而且奥地利农民比起匈牙利农民来，一向受的剥削远没有那么沉重和残酷，肯定不会俯首贴耳地让城市的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派来的人把他们的产品征走。奥地利基本上是一个中小规模农业土地占有者的国家，而不是大地产占主要成分的国家，是以乳制品业和养牛业为主，而不是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国家。虽然，在1918年和1919年，教会的权力暂时大为削弱，基督教社会党在农民约多尔·芬克领导下，也远不象后来教会和小资产阶级从革命使他们陷入的那种恐惧状态中恢复过来后那样受到教权和反动势力的影响。但是，即使在1918到1919年，如果成立一个维也纳苏维埃共和国，那将会意味着发生内战，对城镇居民来说，则仅仅意味着饥饿；即便是能够得到奥地利的农产品供城市消费，如果没有进



口粮食，维也纳仅靠这一来源仍不能满足供应。新共和国没有协约国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正确地相信，各协约国政府是不会容忍出现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而会很快使它挨饿而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希望走苏维埃的道路，苏维埃制度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忠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抱这样希望，而是准备追随他们的领导人，寻求把新奥地利建成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尽管后来很快就可以看出，这样做就得让他们的宿敌基督教社会党，甚至反动的民族党也分享权力。无疑，很多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他们的党会有足够的力量赢得议会的多数，并把全国政府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其他政党则成为宪政上的反对派。但是大选的结果，该党虽然是唯一的最强大的党，但在新的国民议会中只占少数，他们的大多数不得不默认，唯一能代替内战的办法，就是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在一次内战中，即使他们在国内取得胜利，胜利的果实也必然要由于协约国进行干涉而从他们手中夺去。

即使不考虑这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以及许多一般成员，也都是些信奉议会民主的人，他们在旧秩序统治下，曾为此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此要求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由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相信奥地利共和国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存在，而期望它作一个自治邦而并入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此，他们就更加要求建立议会制共和国。在1918年11月以后，很快就可以看出，正在德国建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因此，奥地利除非也是同样性质的政权，否则就不可能与德国合并。虽然，暂时由于协约国的否决，无论什么样条件的合并均被排除，但人们普遍希望，这种否决态度很快将会改变。

于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宁愿与基督教社会党人成立联合政府，以便使新国家免于瓦解，而不愿建立苏维埃的维也纳，以致陷入遭国内外敌人包围的严重危险。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联合政府，或者发现联合政府容易工作。但它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保证城乡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可以在完成供应人民粮食的紧迫任务和重新组织这个被大大缩小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得到协约国的援助。

这种妥协仅仅疏远了极左翼的一些小派别，它给在革命后很快就陷入混乱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重申自己的要求，并在损害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重新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不久，基督教社会党就坚持“比例政府”——即按三个主要政党人数的比例分配内阁职位；在这种安排下，起草了新宪法，于1920年10月付诸实施。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在议会中的领先地位，只重新获得66个席位，而基督教社会党获得82席，德意志民族主义党获20席，新成立的农民党获6席。社会民主党人于是离开政府，政府则在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下改组并随着教会和中产阶级从农民领袖手中获得控制权而日趋反动。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着维也纳，由于这样，他们得以按照新的联邦宪法，保住了在一个省和一个市的地位，从而得以在维也纳推行进步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关于住房和失业救济的政策。他们已不再能在整个国家推行这些政策了。的确，尽管经济形势极端困难，他们在维也纳贯彻执行了建设性的政策，使“赤色”维也纳在全世界受到民主派社会党人的赞扬。在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共和国政府后，奥地利实际上有两个政府——一个在维也纳，另一个在国家的其他地区。在维也纳，为了支付一个真正庞大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计划，包括为大量的失业工人提供生活费用，实行了一项对富有阶级空前苛刻的地方税收制度；房租降低到很低

228

的水平；大片工人住宅区由国家花钱建立起来，成为新维也纳最著名的风景区。社会民主党的文化工作，在市政当局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在经济上有巨大的困难，城市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无愧于它所得到的这一切赞扬。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取得这些成果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依靠它的对手——卡尔·卢埃格尔领导下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帝国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因为卢埃格尔的统治，尽管反对犹太人，但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某些地方是进步的。然而，社会民主党所取得的进展，是由于他们成功地使维也纳成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自治省，这种权力远远超出以前所企图得到的；他们既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就影响了他们对奥地利政府问题所采取的总的态度。原先，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反对基督教社会党所希望建立的联邦制。但是，当它控制了维也纳后，它就不大关心这件事了。大体说来，基督教社会党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229 这样，奥地利在很多方面成为一种双重制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控制着使全国形成头重脚轻局面的首都，基督教社会党则控制国家的其余大部。实际上，无论怎样来进行统治，由于产业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因没有东西可供交换，不愿向工人供应食品，奥地利在战后岁月里若没有外来的援助几乎难以存在下去。在帝国时期，奥地利的工业大都是生产奢侈品和艺术品，这方面的市场现已丧失。由于缺乏资本以及必要的技术和物资，使它很难改变生产方式以适应已经缩小和贫困的国内市场。在帝国时期，匈牙利供应粮食，以交换奥地利的工业品，但这种贸易现已中止。供应城市粮食和养活失业人员的任务十分艰巨。不久，奥地利就不得不靠救济才得以免于崩溃，先是靠美国的饥荒救济，以后是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发行的建设债券。即使如此，问题从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

因为维也纳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城市，对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首都是无法得到充分供应的，而且它的邻国也决不会容许它重新取得作为奥匈帝国各个继承国经济和财政中心的地位。人们曾不止一次提出建立多瑙河联邦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尤以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计划为最著名，但是这些计划实际上根本没有被接受的可能性。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初期同意和其他政党共同执政，而不是企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激进立法，该党的成就也只不过是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委员会，允许工人代表参加主要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定一项比较进步的社会立法法规。从1920年起，他们作为议会反对派未参加以后各届政府，先是迈尔博士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此后是以朔贝尔博士为首的一批官员组成的无党派内阁，这届内阁延续到1922年，为基督教社会党人伊格纳茨·赛佩尔主教领导下的更加反动的反社会主义内阁所替代。在赛佩尔引退后，又由拉梅克博士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所替代。

在实行奥地利共和国宪法的年代里，社会民主党人与他们的政敌之间的关系几乎不断在恶化。如前所述，在开始时，虽然由于他们迫切需要协约国的承认和财政援助而受到种种限制，但社会230民主党人一度曾占据上风。但不久由于社会民主党几乎只限于在维也纳尚占据优势，反社会民主党势力得以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不但把社会民主党人排挤出中央政府，而且主要在农村地区开始组织强有力的反动运动，在基督教社会党政府的纵容甚至支持下，这时已处在可以依靠暴力手段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地位。这些力量中最危险的是由恩斯特·施塔海姆贝格侯爵领导的为地主们所支持的“保国军”。它着手建立半军事性的组织，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保卫同盟”。“共和国保卫同盟”在大城市以外几乎不

存在,只能用于地区性的防御;而“保国军”则拥有大量的金钱来源和很多高级官员的支持,要机动得多,能够在任何它决定诉诸暴力手段的地区集中它的力量。固然,“保国军”并非总是与政府意见一致,因为政府有时做出半心半意的努力,把它的暴力行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国军”的首领们也并非总是愿意顺从天主教会的意愿。但是当赛佩尔担任总理,开始实现摧毁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明确目标后,不论是在乡村地区和在小镇,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反社会民主党分子之间日益剧烈的冲突中,“保国军”就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而在维也纳,由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十分强大,还不敢采取暴力手段来公开向它挑战。

1927年7月,在赛佩尔执政期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遭受到后来证明是最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是由于两方面非正规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步步恶化而引起的。一方面是由农村的反动分子建立、由地主领导的“保国军”;一方面是为了自卫,由城市工人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保卫同盟”。危机是从一次斗殴事件酿成的,在这一事件中属于保卫同盟的一些工人被反动团伙杀害。<sup>231</sup> 杀人者被逮捕并审讯,反动的陪审团公开不顾事实,宣布他们无罪。次日上午,维也纳的工人自发地离开工厂,列队在议会大厦前游行示威。发生了暴力行动,司法大厦遭冲击并被焚,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不下94人。

这些事件使维也纳濒于革命的边缘。事实表明,警察是有准备的,是根据政府的指示向工人开枪的。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社会民主党召集保卫同盟,拿起武器以武力推翻反动政府。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即使他们能够主宰维也纳,象他们一直能够做到的那样,但鉴于他们在全国其他地方力量薄弱,因此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权力。于是,他们只限于号召举行总罢工,实际上获得了一致的响应。但是政府知道罢工不可能持久,拒绝作任何

让步。社会民主党仍不准备发出暴动的号召，被迫停止罢工。社会民主党尽管牢牢控制着维也纳政府，但不得不承认失败，因为，如果他们不甘失败，就必须准备孤注一掷举行起义，而他们看不到起义会有把握成功保持下去的前景。他们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坚决维护自己的阶级权利，反对民主选举的议会多数而举行起义，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即使认为胜利在握，也会拒绝这样的方针。总之，在1927年以后，反动势力的暴力行动愈来愈增多，而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但面对教会反动势力的日益强大，甚至在192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他们以进一步沉重打击以前，他们毫无疑问已在退却。民主共和国虽然在形式上延续了几年之久——直至1934年陶尔斐斯发动政变——但实际上在1927年7月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叛乱遭到挫折之时起，即已注定要垮台。一直到1934年陶尔斐斯摧毁他们的势力和1937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其间经过了通货膨胀、困难重重的稳定和1929年以后到处流行的经济危机等接连不断的几个阶段。在维也纳以外，1920年以后他们没有采取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行动的任何机会，因为他们从未接近赢得议会的多数。相反，在维也纳，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保持了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精神，而且由于做到了这一点，尽管经济状况严重逆转，仍得以防止共产党人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了反对基督教社会党，他们尽最大努力制订了一项土地政策，作为争取农民支持的基础。1925年，奥托·鲍威尔代表他们提出一项建立以公地(gemein)制为基础的地方公社的计划。这种公社包括小规模的经营乳制品业和饲养业的农民，主要依靠使用公地以及依靠合作信贷和市场，但谷物交易由国家垄断。但是他们从未得到机会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而且这项计划也没有为他们争取到很多农民的支持。他们依然是一个城市党，与工会密切联合在一起；工会虽然吸收了城镇里

几乎所有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为会员，但没有提供足够的基础在全国赢得议会的多数。

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在前一卷中已进行了论述<sup>①</sup>。在1918年后，它作为一种理论，只取得了居于次要地位的发展。民族问题曾经是鼓吹这一问题的许多主要代表人物如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等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但奥匈帝国解体后，已不复以战前的形式存在。各个独立的继承国的出现构成了新形势的主要特点，在这种形势下，鲍威尔的文化自治论已不再适用。

但是，鲍威尔不论是在他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和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斗争》月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中，还是在他为党起草的1925年的土地纲领和次年在党的林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总纲领中，都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奥地利革命》（1923年）一书，对1918年和以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林茨纲领则是以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过程的最优秀的文献之一，它着重强调实行工业民主和防止官僚主义的过分集中的必要性。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其他理论家中，鲁道夫·希法亨转移到德国从事活动，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公民；马克斯·阿德勒——与维克多·阿德勒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无关——受俄国的思想影响很深，成了左翼思想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先是致力于企图重建一个联合的社会党国际，失败后，又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up>②</sup>。在奥地利共和国时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取得很出色的实际成就，并且制订了一些精心考虑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政策，但他们在这

<sup>①</sup> 见第8卷下册，第546页（中译本第27页）。

<sup>②</sup> 关于战后新建立的“国际”的情况，见第9章。

个国家处于少数地位，因此没有机会付诸实施。

由于他们在连续几届反社会主义并日益反动的政府执政期间一直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所以他们得以始终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以及以后重新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左得多。在奥地利党内，经常有一个左翼。它批评该党的温和方针，并常常设法同人数很少的奥地利共产党进行合作；但这个左派从未十分强大过。在政治自由继续保持的时候，面对着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遭受的极端经济困难和在卡尔·赛茨领导下的维也纳省政府的斐然政绩，它还无力向该党的领导提出有力的挑战。直到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仍继续主张德奥合并，但没有力量促其实现。纳粹在德国掌权后，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倒向了奥地利纳粹党，但人数不多。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对长期居于少数党地位的情况明显地不满，他们的力量从二十年代初以来日益减弱。基督教社会党则开始在社会问题上成为比较开明的党，在教会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力下一步一步趋向右转。社会民主党人坚持政教分离，在城市工人中深受欢迎，但使他们同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矛盾日益剧烈。天主教会不论在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都越来越咄咄逼人，在劳资问题上则越来越反动，直至最后企图重新建立一种以卡尔·冯·福格尔臧<sup>①</sup>的理论为基础的一种中世纪的超阶级的工业结构，包括恢复同业公会制度，同时吸收雇主和工人为会员，以此来搞垮工会。但是，继续论述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将使我远远超出本卷所涉及的时期。

##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10月，这时奥匈帝国终于

<sup>①</sup> 关于福格尔臧，见第2卷，第259页（中译本第258—259页）。



土崩瓦解。这个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宣布了两次：一次在巴黎，是由战时在国外活动的民族委员会宣布的，第二次在布拉格，是由以青年捷克党的领袖卡雷尔·克拉马尔茨为首的国民委员会宣布的，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捷克分部——当时的领导人是弗兰蒂谢克·苏库普(1871—1940年)——的支持下，担任了第一任总理。两天后，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宣告它主张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各民族运动当即派出代表与在日内瓦的马萨里克的民族委员会的代表会晤，于是这两派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了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在这项事业中，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呢，抑或是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由于德意志人占波希米亚总人口约三分之一，占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总人口约四分之一，就全国人口来说超过五分之一以上，使情况复杂起来。在总人口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捷克人或斯洛伐克人。1918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其他一些德意志人的党一样，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要求把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划归新的奥地利，并接受德意志人的奥地利作为一个自治邦加入已在着手建立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于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捷克人分部和德意志人分部一起，还存在着一个捷克民族社会党，这个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主要从职员阶层和专业阶层中得到支持，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马萨里克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中的主要合作者爱德华·贝奈斯博士与这个党有某些联系。该党于1897年由J. F. 克洛瓦奇创建，1918年克洛瓦奇仍然是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属于它的有一个捷克民族工会运动，独立于主要的奥地利工会委员会之外，其成员包括所有各个民族的工人。

使问题更进一步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运动力量薄弱，该地区由安德雷·赫林卡主教领导的天主教人

民党所控制，肯定会拒绝接受并入一个无疑是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而且，在1918年，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捷克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很强烈，他们在这种情绪推动下愿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合作为新秩序奠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工业地区为革命掌握权力起了很大作用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全部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或者企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不顾左翼的强大压力，他们同意加入弗兰蒂谢克·克拉马尔茨博士的临时政府。虽然在17个内阁职位中，只给了他们3个，而农民党得到4个，除贝奈斯博士外，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得到3个，民族民主党得到3个，小党派得到2个，无党派成员得到2个，其中包括贝奈斯，当时把他算成是代表马萨里克的民族委员会的无党派人士。马萨里克本人任共和国总统。德国各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坚持拒绝合作并拒绝承认这个新的国家。

然而，人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当时力量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克拉马尔茨内阁和已经成立的临时国民议会中显然没有获得应 236 有的代表席位。在1919年6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得到的票数最多——93.5万张，而农民党是63.7万张，民族社会党是48.5万张，城市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民族民主党仅得到25.6万张。于是克拉马尔茨政府辞职，由社会民主党人弗拉斯蒂米尔·图萨尔（？—1924年）主持的新联合内阁所取代。新内阁由4名社会民主党人、4名民族社会党人、4名农民党人和2名斯洛伐克人组成，贝奈斯博士作为无党派的外交部长留任。这个政府在1920年4月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后继续执政，至该年9月辞职，由扬·切尔尼领导的一批官员组成的临时内阁所替代。它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内意见严重分歧，使它无法继续执政。在此时期，德意志人各党始终坚持拒绝合作。

在克拉马尔茨和图萨尔两届政府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议会制宪法，并有许多社会立法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健康和失业保险，保护不动产占有者和对资本课税；图萨尔政府还颁布了一项土地法，规定将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征用的土地一部分分配给个体农民，一部分分配给合作团体。图萨尔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矿山建立工厂委员会，给矿工以参加管理采矿工业的权利，此外还实施了调整产业工人工资和解决国内工人就业问题的各项法律。但是，由于受到在政府内有代表的各非社会主义政党和赫林卡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的反对（该党大肆叫嚣斯洛伐克在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内实行自治），以及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它本身的左翼日益不满，主张按照俄国的模式建立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图萨尔政府受到掣肘。

237 在克拉马尔茨政府和图萨尔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在这时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场主和农民的党，在乡村劳动者中间也有许多追随者。它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促进农业合作社运动和信贷银行。但它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不久，它一方面在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中开始失去支持，其中许多人投向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渗入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成员，这些人把它看成是比保守的民族民主党更可靠的反社会主义堡垒。于是，它向右转变，终于同社会民主党左翼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冲突。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党的主席鲁道夫·贝兰、合作社运动领袖、1925年成为国民议会主席的扬·马利佩特（1873—？）和斯洛伐克教授、三十年代后期任总理的米兰·霍贾（1878—？）。

1920年夏季，刚刚选出来的议会休会期间，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达到顶点。以刚从俄国访问归来的鲍胡米尔·什麦拉里为首的左翼，展开了一个以操纵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为目的的运

动。74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23名（以后还增加了几名）采取反对党的领导集团的立场，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图萨尔政府在议会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追随者，于是宣布辞职，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党内斗争。党的领导人推迟了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但左翼却拒绝等待，自行召开大会，宣告分裂，在什麦拉里领导下组成了共产党。它的追随者强行占领布拉格的人民大厦，即社会民主党的总部，并在工业区煽起了普遍骚乱。由一批官员组成的切尔尼政府，听从一个由捷克斯洛伐克5个主要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在内的代表组成的五人委员会的意见，对这些骚乱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共产党人被赶出人民大厦，于是号召总罢工，结果惨遭失败——在某些地方，只是经过武装斗争后才失败。在此同时，<sup>238</sup>新成立的共产党加入了第三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着手改组他们的党，准备参加新的和更加广泛的联合政府。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德意志人的各政党加紧了他们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活动，于1921年宣告他们退出议会，从此拒绝参与它的任何事务。

1921年9月，贝奈斯担任了由所有5个非共产党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党组成的广泛联合政府的总理，并得到赫林卡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和民族社会党均有代表参加。但前者的影响由于分裂而大大削弱，实权这时落在资产阶级分子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人手中。德意志人重返议会，但仍是反对派。贝奈斯政府对他们在文化权利方面的要求作了让步，采取了较大的宽容态度，以求安抚他们，于是德意志人集团开始分裂，不同的德意志人政党开始在社会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是德意志人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只是在1925年，德意志人集团（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除外）才同意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活动；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则仍坚持不合作政策达3年之久。不过，1925年，单独进行活动的德意志人工会与捷克斯洛伐克总工会合并。最初

支持贝奈斯内阁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党，很快在资助天主教会学校的问题上又转到了反对派一边。

贝奈斯内阁执政至1922年10月，被农民党人安托宁·斯维赫拉担任总理的新的广泛的联合政府所替代，党派的组成大致相同。该政府执政至1926年，最后由于农民党与社会民主党在农产品关税保护问题上发生争执而倒台。在它执政的整个期间，政府同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政府执行的为稳定货币而紧缩通货以及降低工资和薪金，特别是降低国家雇员工薪的经济政策方面。1923年1月，右翼分子、财政部长阿洛伊斯·拉辛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在紧接着而发生的强烈抗议声中，政府颁布了一项保护共和国的特别法令。共产党继续其反政府鼓动，翌年，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加重惩罚诽谤罪犯的新法律，但联合政府内部困难日益增加，1925年，议会终于被解散。

在以后的大选中——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分裂以来的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席位减少到29个（1920年为74个），而共产党却赢得41个席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赢得28席。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增至17席。但此后，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在1929年的大选中只获得30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则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一些阵地，不过始终未能恢复他们作为最大的政党的地位。连续几届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虽有时参加，但日益为农民党所控制。但是没有一个党能赢得独立的多数地位，即使德意志人和其他少数派也不在话下。由路德维希·捷克（1870—？）领导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于1928年参加政府，改变了先前持反对态度的政策。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虽然与同名的希特勒的德国民族社会党<sup>①</sup>没有共同之处，但也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温

---

<sup>①</sup> 亦译国家社会党。——译注

和的激进派，对国际事务持明智和节制态度，有一份广泛发行的党报。但是除了贝奈斯同他们保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外，他们未曾产生过卓越的领袖。

在1918年后的年代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同俄国靠近，并处于一个斯拉夫国家的地位，在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又拥有相当发展的工业人口，这就使它成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斗争的风暴中心。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专心致志于他们的民族问题，无暇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中心目标。德意志族工人，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工业无产者，既竭力拖后腿，反对并入一个斯拉夫人占优势的国家，又无心同本身已分裂成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社会党三个政党的捷克或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者合作。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虽然在战争时期一直未参加马萨里克的民族阵线，但准备与它合作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而采取了同民族社会党和农民党、甚至右翼的政党联合执政的政策。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同农民党取得了妥协；他们强烈支持政教分离政策，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派在反对斯洛伐克天主教时所遵循的也是这种政策。而且，他们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竭力防止实行联邦制，因为这将会鼓励斯拉夫分裂主义，而且可能加强德意志人实行某些自治措施的要求。于是他们普遍支持历届联合政府，甚至当他们不再是政府的主要伙伴，或者根本不再是伙伴——因为在1925年后，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不再有代表——时，也是这样。

与此不同，从1920年分裂时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政策的改变上主要由共产国际的影响所支配。它的第一位领袖鲍胡米尔·什麦拉里，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共产党员。在战时，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曾反对过把奥地利领土分裂成为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这样一来，他发现自己已孤立于捷克争取

独立的民族运动之外；战后，他依然参加反对党的领导集团，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后，皈依了第三国际，成为社会民主党内分离运动的领袖。分裂后，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首要人物，并顺从地追随莫斯科的路线。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左翼也退出该党并加入了共产党，于是共产党便成为唯一的一个由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德意志人按平等条件联合成的党。接着工会也发生了分裂，它分成3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即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社会党，而共产党集团在产业工人中一度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由于1920年12月他们号召的总罢工失败，他们的影响受到重大损害，不过很快就又得到恢复，如前所述，在1925年大选中获得很大成功。二十年代后期，他们再度失势，但在矿区的势力仍很强大，并在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尤其是在那些属于仇视捷克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的农民和工人中得到了支持者。但在二十年代结束前，他们的领导人因未能充分推行革命的政策而失宠于莫斯科。什麦拉里和其他人被免去了领导职务。党交给了新的领导人，其中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年)在对付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萧条中，很快成了卓越的人物。

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中，捷克斯洛伐克常被西方赞美为“民主的典型”。确实，它有一部彻底民主的议会制宪法，根据宪法，少数民族均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它的议会颁布了一部相当先进的社会立法法典。大庄园被拆散，土地主要分配给农民耕种，在他们中间合作组织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但是，得以取得这些成功的条件也正是妨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一方面具有先进工业的国家；在共和国时期取得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有广泛的小农农业，需要得到保护，才能在一个粮食价格低廉和波动的世界上站得住脚。农民的数目很多，使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制度下不可能赢得明显的多数，至少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情况

下是如此。农民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农村地区根深蒂固，没有他们的参加，国家就不可能按照议会路线进行治理。而且，虽然选举权是平等的，但占居民很大部分的德意志人对丧失他们过去的优越地位和在新国家中捷克人势必会占优势深为不满。斯洛伐克人也表示不满，并要求得到比捷克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所愿意给予他们的更加完全的自治。此外，还有相当数目的少数民族——外喀尔巴阡罗塞尼亚的乌克兰人、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西里西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波兰人——怀着与他们在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同胞重新统一的愿望。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德意志人各政党始终拒绝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在共和国的事务中拒绝发挥积极作用，这就使当权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各政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特别是削弱了社会主义运动，因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产业工人。虽然在二十年代后期，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关系有所改善，互相之间的抵制撤消了；但是纳粹在德国掌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中着手建立汉莱因的苏台德区纳粹党后，他们的关系很快又再度恶化。此外，与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和经济落后的罗塞尼亚地区的乌克兰人也连续不断发生麻烦。正是这些地区，共产主义作为超越民族差别的唯一党派势力，得以在农村赢得许多追随者。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就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景甚至比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取得胜利的前景还要渺茫。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们一度赢得多数产业工人支持的时候，力量依然十分软弱，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可能在其他所有派别联合反对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们可能不时制造很大的骚乱；但一旦进行力量的较量，毫无疑问政府有力量击败他们。但是，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从而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造成非常尖锐的分裂——这种分裂可溯源于战前奥地利社会党与在第二国际时期疏



243 远该党的捷克派之间的旧争吵。社会民主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人之间的旧分歧依然未解决，在社会民主党中形成一个处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双方火力之间的中间派。这就是在共和国成立头几年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所以缩小和在历届政府中农民党的影响之所以大大增加的原因。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应付它的许多困难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直到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它遭到破坏，和西方国家在1938年未能给它以援助，使它完全听任希特勒的摆布为止。但是就社会主义来说，同温和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截然不同，它的各社会党始终就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

## 匈 牙 利

现在我开始论述命运不幸的1918年匈牙利革命，它不到一年，即在“白色恐怖”中告终。迄至1918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甚至包括俄国——的少数民族比匈牙利的少数民族受压迫更深。乡村中的大多数贫苦的马扎尔人的生活，也远不如同他们一样处于从属地位的斯拉夫人。匈牙利议会是贵族和民族主义者的禁脔，甚至只有少数城市资产阶级和个别一、两个社会主义者得以渗入其中。这些孤立的人物中没有一个属于主要代表城市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的工业，除布达佩斯和少数矿区外没有多大发展。从事工业的人，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大都不是马扎尔族。犹太人以及一些德意志人占雇主和熟练工人的大多数。很大一部分非熟练工人是来自斯洛伐克和斯拉夫地区的移民。熟练工人相当牢固地组织在工会中，只要工会不企图把农村工人组织起来，它就可以

244 被允许存在。这些工会同社会民主党密切进行合作。在贵族中间，有很多大、小土地占有者，某些大家族拥有庞大的庄园。贵族中没

有土地的成员，主要聚集于文官队伍中，而不屑于从事贸易和工业。在某些地区，未开垦过的土地由投机商大量经营；他们经营这些土地是为了出租或转卖。大多数农民和无地的劳动者十分贫困，生活在受压迫的悲惨境地，在大庄园尤其如此。不过，农业合作社运动也取得一些进展；少数贵族，其中著名的有卡罗伊家族的一些成员，对合作社运动表现很积极。在许多地区，多年来，在农村中不满分子比比皆是，但是也受到残酷的镇压。自由主义运动的力量十分薄弱，在马扎尔人中间，民族主义情绪格外强烈。

在匈牙利议会中，几乎占有全部议席的马扎尔贵族传统地分成两个党。其中一个大致说来满足于“1867年的妥协方案”，这个妥协方案建成了二元君主政体，并赋予匈牙利很大程度上的自治；另一个则是1848年科苏特民族主义者的继承者，要求完全独立，但不一定希望脱离哈布斯堡的统治。同奥地利联合确实带来明显的好处，一方面可以为匈牙利的剩余粮食提供市场，一方面因为“1867年的妥协方案”向马扎尔人保证：奥地利支持他们对其治下各民族进行统治。但是，在“独立”党内部，1914年前出现了一个左翼，以米哈伊·卡罗伊伯爵（1887—1955年）为首，对被压迫的马扎尔农民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不时站在激进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一边，反对当权的马扎尔贵族集团。

战争期间，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努力，匈牙利的团队作战出色。但是，当奥匈帝国的困难增加后，严重的不满情绪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斯拉夫地区。1916年11月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死后，他的继承人卡尔抱着拯救帝国瓦解的希望，开始迫切要求对统治下的各民族作出让步，在斯特凡·蒂萨伯爵领导下的匈牙利政府断然拒绝同意对马扎尔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或对选举权作任何扩大，就象1914年以前在奥地利所作出的让步一样。虽然一个更加驯服的政府上台，但未能劝

说匈牙利议会让步。甚至当战争接近尾声,即1918年夏秋,军事崩溃显然即将到来之时,卡尔作垂死挣扎,企图把他摇摇欲坠的帝国改建成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一些自治民族国家的联邦,这一打算也只能限于奥地利各省,因为甚至在当时匈牙利议会仍然拒绝考虑任何改革计划,因为这将会使马扎尔贵族失去其支配地位。当匈牙利的邻邦开始向匈牙利领土进军,公然宣称其目的是从马扎尔人统治下解放其民族同胞的时候,匈牙利贵族除了要求匈牙利军队撤回国内,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其历史边界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了。

但是,到这时候,匈牙利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1918年1月,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兵工厂工人均进行大罢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从3月起,大量战俘开始从俄国返回,他们经历了俄国革命,都受到一定的影响。1918年9月保加利亚崩溃后,匈牙利的边界完全处于来自罗马尼亚和南方的攻击的威胁之下。当获悉德国和奥匈帝国均要求威尔逊总统在10月4日停战时,国内战线立即便开始崩溃。主要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开始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少数地方成立,开始听到将出现革命行动的危险。当停战谈判仍在进行之际,10月25日,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一个国民会议,由卡罗伊伯爵任主席,原来的政府实际上已被废黜。新的当局宣布对政治犯大赦,并释放了许多关在  
246 监狱里的人;它还许诺实行新的选举法,并消灭大地产。10月30日,首都的几个团的军队哗变,参加了群众在街头的示威者的行列,占领了军事总部、邮政总局和其他公共建筑。次日,布达佩斯全落在革命手里。旧政府辞职,卡罗伊被国王指定组织新政府并担任总理。在他的追随者以及奥斯卡·亚西的激进党人和作为他的主要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他做到了这一点。在骚乱期间,旧匈牙利的铁腕人物蒂萨伯爵被暗杀。面对奥匈帝国的黜

然失色和国家被决心要肢解它的敌军四面包围的局面，卡罗伊不得不着手完成媾和建立新的匈牙利国家这一极端困难的任务，而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划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在北方，斯洛伐克人要求加入新的捷克国家。在东方，罗马尼亚人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在南方，协约国扬言要割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所有其他斯拉夫人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就连敌军是否会在马扎尔匈牙利的民族边境上停止前进，也丝毫没有保证。同这样多乘胜前进的敌人谈判停战，不可能是一件简单的事；而要劝说傲慢的马扎尔统治者承认他们巨大的失败，也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的确，在以后几个月中，匈牙利政府和最高司令部就接二连三地接到重新划定停火线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匈牙利的中央平原。卡罗伊向下自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上至由弗朗歌·德斯佩雷将军领导的协约国最高司令部和各协约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达成一项总的解决方案，以求立即阻止他所有的敌人前进，但没有得到满足。威尔逊总统从开始起就坚持要完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但匈牙利究竟还要丧失多少地区，仍然没有明确的界线；而停战线的每一次向前移动，实际上是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在此同时，国内陷入混乱，旧的政府机器已被打碎，而又没有任何东西来替代；因为旧的文官对承担新的任务大都没有用处，而且他们极端仇视革命。直至11月16日，卡罗伊宣告共和国成立和旧的议会最后解散时，甚至连政体问题尚未解决。卡罗伊并许诺，一旦条件许可，就举行新的民主选举；然而很明显，这至少要等到边界问题接近解决才有可能。暂时，自封的国民会议不得不尽力而为地进行工作，尽管它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质。

这样一直持续到新年，卡罗伊才担任了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并任命了一个新内阁，以社会民主党人戴希莱尔·贝林凯伊(1871—1948年)为首，仍然以社会民主党作为最可靠的支柱。此时，由于

以贝拉·库恩为首的一批受过特殊训练的革命分子从俄国归来，奉有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示，这又使局势增添了新的因素。贝拉·库恩(1886—1936年)在战前是一名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其他报纸工作的新闻记者，同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工人友好协会的官员，在那里曾对社会主义运动起过一些作用。他回到布达佩斯后，聚集了一批左翼分子在他的周围，在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强烈谴责工会领导人因循苟且的做法，在遭受严重困难心怀不满的士兵和失业者中罗致追随者。的确，有许多令人不满的现象可以利用；但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无力改善它们，因为城镇的供应短缺，而且自从兵工厂停工后，工业已陷入混乱。市场的情况也到处是一片糟；而且在文官们基本上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也很难公平地定量分配粮食。

因此，库恩的宣传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并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吸引了大量的支持者，因为该党与政府联系在一起，因此应对政府

248 府的缺点负有责任。库恩和他的支持者也不会不利用在军队和平民中广泛存在的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方面，库恩从军官中间以及士兵和工人委员会中获得了某些支持，使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在这关键时刻，1919年3月20日，以维克斯上校为首的在布达佩斯的协约国停战委员会，又向匈牙利政府提交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撤出更多的领土，包括位于马扎尔地区内的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这个要求引起极大的愤慨。卡罗伊感到抵制这一要求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也清楚，如果他退让，肯定会引起反政府的起义。他的内阁同样进退两难；但是维克斯的最后通牒不容许任何延误。当时，内阁是一个联合内阁，社会民主党人是最坚定的成员。资产阶级成员，既不愿接受又不愿拒绝最后通牒，提出了辞职。卡罗伊只好完全依靠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于是建议以昆菲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设法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以便建立一个能够

获得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加以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内阁。因为他知道,即使他作为总统,继续给予社会民主党以支持,该党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掌握政权。卡罗伊没有象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辞去他的职务,把政权交给共产党。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说得很清楚,他期望并且打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与新内阁协力工作。但他确曾建议社会民主党设法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不过,对于他们事实上所达成的协议,他没有提到。

此时,由于在首都发生骚乱的结果,库恩和他的一些同伙被投入监狱。以过去担任过教师的、即将下台的政府成员和匈牙利社会民主运动的杰出人物佐格蒙德·昆菲(1879—?)为首的一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狱中去探望他们,仅仅经过半小时的讨论,一致同意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为一个党,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支持下共同掌握政权。次日这些囚犯即获释。工会领袖、石匠亚历山大·哈尔巴伊(1879—1947年)任新政府主席,其他主要成员有:库恩(外交人民委员)、约瑟夫·波加尼(士兵委员会主席)和昆菲等。曾在卡罗伊政府任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维尔莫什·贝姆(1880—?)任新政府马上组织的红军的领导人;另一社会民主党人、五金工人领袖约瑟夫·豪布里奇被任命为布达佩斯城防司令。其他著名人物有: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1879年生)任负责国有化的人民委员,律师尤金·朗德列尔(1875—1928年)、马加什·拉科西负责贸易,新闻记者、库恩的亲密助手蒂博尔·萨穆埃利(1890—1919年)任内务人民委员。

至于卡罗伊,他并没有辞职,而完全是被赶下台的。向他递交了一份要他辞职的文件,他拒绝签字;但是,甚至在这份文件给他看以前,早已付印,还加上了他的签字,他发现自己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谴责这份伪造文件,其结果可能是引起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他将违反自己的信念,站在反动的一边反

对共和国。面对这种痛苦的抉择，他决定保持缄默，并放弃他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已不再能够行使的权力。固然，他知道不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会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但他知道他们和他一样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如果站出来反对合并，只能是落得同反动派沆瀣一气的恶名。实际情况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如埃尔诺·加拉米和尤利乌斯·佩德尔当时都陷于孤立，无法站出来有力地反对共产党，而只能忍气吞声地加以反对，或者逃往国外，以逃避他们料到即将降临的灾难。

新的苏维埃政府立即在国内采取激烈的行动。它颁布法令，  
250 全面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甚至征用了所有库存货物，命令除杂货店、烟草店、药店外，所有商店暂时关闭，直至接收后再作安排。它还废除土地私有制；但是没有把大庄园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农业工人，而是命令将这些庄园在政府任命的经理人员领导下统一经营——这些人员大都是过去为被剥夺了产业的地主经营庄园的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极端仇视农民，认为把庄园分成小块基本上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措施，只会有利于加强反动势力。正因为这样，在卡罗伊当权时，除了卡罗伊将自己的大庄园听任公众自由支配以外，根本没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渴望土地的农民因而依然未得到满足。而不久，由于派遣讨伐队下乡为城市征用粮食，农民的不满情绪就更加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工业关闭，通货开始大幅度膨胀。旧奥匈帝国的“蓝色”钞票继续流通，但远不敷使用。苏维埃政府被迫印制自己新的“白色”纸币以应付支出费用，但这种货币大幅度贬值。农民、工资收入者——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要求以“蓝色”钞票支付，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严重的罢工。

同时发生了抗拒罗马尼亚人威胁要向有争议地区进军而造成的国防问题。史末资将军代表协约国来到布达佩斯进行谈判，并

提出只要匈牙利人不再动员他们的军队和在国外停止宣传，可将“维克斯”线向后退缩。贝拉·库恩未接受这项建议。尽管他的地位显然很软弱，他决定开战。匈牙利军队很容易就被打败，罗马尼亚人向布达佩斯挺进。匈牙利的“白色分子”已在法国军队保护下，在南方的塞格德成立了一个反革命政府。布达佩斯独裁政权的覆灭似乎已在旦夕之间。然而，在此关头，布达佩斯的人民起来，临时组成新军，有许多旧军的军官参加，为民族自卫而战。维尔莫什·贝姆被任命为总司令，由一位正规军队军官、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奥雷尔·什特罗姆费尔德上校（1878—1927年）协助。新军打败了向前推进的罗马尼亚军队，5月间，把他们赶过了蒂萨河。就在取得这次令人震惊的胜利之时，捷克人已开始通过斯洛伐克向布达佩斯挺进。匈牙利展开了反攻，打败了他们，收复了已正式成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组成部分的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方。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匈牙利西部爆发了严重的叛乱。叛乱开始于6月8日，当时因争取改善口粮分配和要求以“蓝色”货币支付而发生了普遍的铁路罢工。罢工波及布达佩斯西部，为对付罢工，不得不对铁路工人提出的条件让步，同时对拒绝提供粮食的农民采取强硬措施。由萨穆埃利率领的讨伐队被派赴受影响的地区，采取了十分残暴的行为，枪杀了许多农民，绞死了一些人质。叛乱被镇压下去，但严重地动摇了政府的地位，甚至在它的支持者中间。

此时，协约国强行命令匈牙利人撤出斯洛伐克，声称作为交换条件，罗马尼亚人将从他们仍然占领的马扎尔地区撤退。匈牙利政府勉强服从了，但罗马尼亚人没有撤退。但此时匈牙利工人坚持要求和平。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极为厌恶库恩的独裁。这一派人开始重新赢得以前跑到共产党一边的支持者。在6月召开的联合党——称为匈牙利社会党——的代表会议上，有些人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有人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将发起暴动，反对库恩及



其同伙。暴动未能举行，主要是因布达佩斯城防司令、社会民主党人约瑟夫·豪布里奇拒绝予以支持，这使与库恩发生激烈争执的军队总司令、社会民主党人维尔莫什·贝姆大为恼火。

252 与此同时，以由库恩派往维也纳的恩斯特·贝特尔海姆(1889年生)为首的库恩的党羽，想在维也纳煽动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在奥地利面对的是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牢固地掌握着首都，根本无意支持一场不负责任的暴动。在决定起义的前一天——6月15日——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均被逮捕，不过贝特尔海姆逃脱了。一批示威者企图冲击囚禁他们的监狱，但被击退，有20人左右被打死，整个事件宣告失败。几星期后，贝特尔海姆被捕获，但很快获释，共产党的危险从而完全消失。库恩在“赤色”维也纳寻求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在维也纳遭到惨败后的10天，他在国内也不得不面临叛乱。多瑙河上的海军军舰发生叛变，炮轰政府总部。在市内，军官学校的学员加入他们的行列。叛乱遭到血腥镇压，但在农村，大规模的暴动接踵而来，萨穆埃利的武装警察再次被派遣前往镇压。更多的人被处死，至少有几百人。在这期间，匈牙利的军队——或者说它的残部——再次被派去抗击罗马尼亚军队。然而，这支军队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贝姆和什特罗姆菲尔德已辞去指挥职务，应征参加红军的许多工人已回家。留下来的一些团队，或者是毫无斗志，或者是由一些只不过在等待时机，准备拉着队伍投向白军的军官们指挥。一旦实际发生战斗，一些团队将会倒向敌人，另一些团队将拒绝作战或四散逃跑。罗马尼亚人长驱直入，再次向布达佩斯挺进。

这时，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前进。8月1日，贝拉·库恩政府承认失败并宣布辞职。库恩和他的一些伙伴征调了一列火车，越过边境逃往维也纳。其他人落在后面，其中萨穆埃利自杀，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以尤利乌斯·佩德尔为总理，宣布就

职,但丝毫没有权威。8月4日,罗马尼亚未遇到抵抗即进入布达佩斯;在首都的白色分子乘机推翻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约瑟夫大公爵企图接管政权,但被协约国赶走。一个所谓“各党”的白色政府在查理·胡萨尔领导下组成,在罗马尼亚占领下继续掌权。当罗马尼亚军队在11月最终撤退后,海军上将霍尔蒂作为各主要白军的首领开进布达佩斯。此时,匈牙利革命力量已被完全肃清。在接着而来的白色恐怖中,最仇恨独裁政权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丝毫不比共产党人安全。萨穆埃利的红色恐怖遭到许多倍的报复;甚至连右翼领袖,也只有少数人好不容易才逃到了国外,其中如受人尊敬的埃尔诺·加拉米(1876—1935年)。激进党领袖、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1875—1957年)也逃到了国外,写了他对这次革命的论述,目前定居美国,任奥柏林学院教授。不仅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运动,而且匈牙利的自由主义也被连根拔掉了。库恩幸存下来,在共产国际庇护下作为职业革命家继续他的事业。我们在前一章中已述及1921年他在德国煽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情况。在匈牙利,革命遭到最终失败后,除了很少一批地下工作者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反革命势力开始消除整个革命成果。在卡罗伊政府及其继任者时期通过的法律均宣布无效;旧宪法重新实施,1920年1月,按照宪法选出了新的右翼议会。失去的只是一个统治缩小了的匈牙利国家的君主政权。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因为马扎尔贵族是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但他们不喜欢哈布斯堡皇帝,他们认为,他为了拯救王位,竟企图把他们出卖给斯拉夫人。他们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即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君主政权——挑选海军上将霍尔蒂为摄政王来填补这个空缺。1920年6月,匈牙利政府在众多的抱怨声中签署了和平条约,议会经过多次辩论,终于被说服,在11月批准了该条约。匈牙利最后失去了臣属于它的所有民族,被迫同意让大量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并入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

克。

254 事情远没有完结。1921年3月,以后在10月,前皇帝卡尔企图复辟匈牙利王位。第一次,他赤手空拳闯到首都,被劝说后离去。第二次,卡尔设法纠集了少数军队向布达佩斯进军,政府通知他,任何恢复其权力的企图均将给国家带来灾难,但他拒绝让步。协约国明确表示,他们将拒绝承认任何哈布斯堡的王权;南斯拉夫开始动员军队。卡尔仍继续前进,直到他的士兵遇到政府派来抵抗他们的军队后,几乎未经战斗就作鸟兽散。他和他的妻子被俘,当即被一艘英国战舰送往国外。匈牙利议会,在协约国的坚持下,以法律方式宣布废黜了他。在这段插曲后,白色恐怖平息下来。翌年,少数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在匈牙利议会当选,但发挥不了任何真正的力量。同年后期,匈牙利加入国际联盟。在1921至1925年间实行了有限制的土地改革措施;但匈牙利在以后的二十年仍然是极端形式的地主所有制和贵族统治的牺牲品。

人们在回顾1918和1919年匈牙利发生的一些事件时,能够很容易地看出,贝拉·库恩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没有持久地取得成功的机会,但是要认识到什么是这次革命应遵循的正确道路,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卡罗伊,不管他的意图是多么好,但他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来实现民主革命,如在奥地利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主要依靠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既在农村地区没有影响,也根本不了解农村问题,或同情农民的要求。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动摇不定,而且大都是犹太人;中产阶级也只有少数人,大都也是犹太人;文官固然都是马扎尔人,但对革命根本不抱同情。反革命力量,虽然开始时根本没有组织起来,但它始终是强大的;除非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使农民感到满足,否则反革命力量必然会重新占据优势。但是,战争接二连三地发生,城市和军队不断需要粮食,它们除  
255 了拿些毫无价值的钞票在换取粮食外,别无他物;在这样的情况

下,又如何能有效地处理土地问题呢?卡罗伊不得不设法讲和;人民需要和平,但又不会忍受那么大的牺牲,来满足唯一能取得和平的那些条件。于是,由于爱国而引起的愤怒情绪,和由于极端匮乏而引起的经济方面的不满,都转而向卡罗伊袭来。左派成了这些各种各样成分的奇特的大杂烩,他们在库恩的助手们的煽动下纠集在一起,不顾一切要搞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协约国一次又一次地逼着卡罗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他若作出这些让步,势必会引起反对自己的革命,于是他被共产党赶了下台,而过去支持过他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数默认了这一事实。

社会民主党人很清楚,他们的力量太弱,不可能单独掌权,因为共产党的宣传已使他们的影响下降。激进党人已离开了政府,除共产党人外,在政府内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而显然,共产党人只有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才会这样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佐格蒙德·昆菲与库恩拼凑了他的党的联盟,迫使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一个联合社会党中一致行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福音,因为看来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但是,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仍然敌视合并和独裁,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希望联合党迅速垮台,支持它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神志会清醒过来。如前所述,到6月间,随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方面的争吵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但独裁政权仍竭力维持下来,直到8月初,不仅丧失了它领导的红军,并即将丧失首都,而且还面对着协约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日趋强大的白军。只是到这时,它才设法让温和的社会党掌权以对抗白色势力。而到这时,佩德尔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要想免于崩溃,甚至连这样的机会的影子也不见了。

人们对贝拉·库恩的独裁政权进行了那么多的咒骂,我觉得没有更多的动感情的话可说了。但是,重要的是设法了解为什么 256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库恩和他的同僚当权后,他们未尝不希望

会得到来自俄国的援助，因为俄国人正在西乌克兰打退彼得留拉的军队；但是这个希望事实上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事实已很明显，俄国人在别处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然而，不要忘记，在1919年，共产党的领导人仍然相信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革命会很快到来，因此，不论在哪里，只要看到有机会，他们就竭尽全力进行煽动。匈牙利严重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对它的人民的残酷镇压，使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革命已臻成熟，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派遣他们在俄国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去促其实现。无论是他们，还是库恩及其同伙都没有认识到：匈牙利革命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农民和城市工人建立起某种联盟。列宁曾经十分明确地看到，在俄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告诉农民自行夺取土地，并实际帮助他们这样做。即使这样一来在农村不可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也在所不惜。匈牙利的革命者似乎根本不了解这种必要性，而且为了给城镇取得粮食，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对付农民，却没有把土地交给他们作为交换物。因此，他们的政令从未出城镇，只有在伴之以采取暴力的情况下才及于农村，这样就彻底疏远了农民，从而为反革命铺平了道路。

然而，即使共产党人在处理农民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明智，他们最后成功的机会也几乎等于零。匈牙利工人阶级，即使联合在一起，力量也太弱，而且与国内其余的人十分疏远，因此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特别是面对协约国各大国和四周虎视眈眈的各邻国的某种敌意，就更加如此。假使能得到和平的话，卡罗伊也许会在某种民主的统治下使国家稳定并通过废除大地产来摧毁贵族势力。虽然他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没有给他这样做的机会。当他落到不得不主要依靠社会民主党人，并建议他们同库恩达成协议时，他实际上是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他被扶上台的那个政府，不可能控制国家的大部分，肯定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被内外敌人所推翻。对库恩来说，这样的前景并不足以让他害怕；他的职业使命是

闹革命，即使注定要失败也无所谓。有那么多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工作者追随他进行冒险，这表明匈牙利国内局势动荡的严重和匈牙利工人阶级运动的不成熟。工人阶级运动既没有在1918年以前掌过权或承担过责任，也丝毫没有同人民的大多数相结合。1919年后，匈牙利工人阶级运动一蹶不振。直到俄国军队开进来，在1945年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才得到真正的恢复，而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决不是匈牙利悲惨历史的最后一章。

（李梅彬 译）

## 第八章

### 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希腊

本章“巴尔干半岛”是指从西面的希腊、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到亚洲边界，以及从北面的特兰西瓦尼亚和原来的罗马尼亚到地中海这一地区。包括了1914年前欧洲的希腊、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此外还有战前奥匈帝国相当大的一片土地，但不包括匈牙利本土和战后归属波兰的领土，当然，也不包括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地区。包括在这个“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国家，农业人口占压倒多数。其中大多数国家土地已归小农或中农所有。罗马尼亚的情况则不同，它在1914年象匈牙利和波兰一样，仍然是一个大庄园国家，人口中有大量无地劳动者受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沉重压迫。虽然在别处也有大庄园，尤其是在先前由奥地利或匈牙利统治的某些地区；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余地不大。特别是在保加利亚，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平均的，多数土地为小种植者所有，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发展可以作为实业中产阶级的基础。但是，即使在农民占有土地的地方，政权也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只有在少数地区，主要是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农民组织取得了实际的进展；但即使在这些地区，他们也并未获得任何可观的政治权力或影响，虽然克罗地亚的拉迪奇兄弟和保加利亚的斯塔姆博利斯基已在农

村地区拥有大量的追随者。

农民即使在他们拥有土地的地方，大多数人也贫困不堪，不仅 259 因为他们的耕种方法原始，大多数占有的土地又太小，不足以维持可以忍受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且因为垄断着政权的各个阶级把税收的主要负担加在他们身上。此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占有的地块也愈来愈小，因为按照通行的制度，土地在农户的儿子中进行分配，而且土地被分成越来越小的狭长地块，几乎不可能改善耕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农民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小的趋势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29年以后，农业产品的价格与工业产品相比猛烈下跌——这大大地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即使在有些地方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可供分配，以便农民得到好处，但也远远抵消不了生活水平下降造成的损失。巴尔干地区在1914年已深受农村人口过剩之害；而1918年后，人口过剩步步上升，情况急剧恶化，加之向外移民阻力重重。而在战前向外移民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这种压力。虽然工业有某些发展，但不论在任何地方，其发展规模均无济于大事。乡村中的大批劳动力后备军不断向城市提供非熟练的移民工人，他们在就业方面的竞争，使产业工人工资保持在仅足以糊口的低水平，只有少数熟练工人除外。这些熟练工人相对说来景况较好，在某些地区还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工会；但他们人数太少，不可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劳工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迫放弃在农村地区扩大组织或宣传。

每一个巴尔干半岛国家都有它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派系的发展方面起着首要作用。但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与其说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即使在有些地方开始时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由于受民族主义偏见的压力，而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大学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在培育知识分子的精华方 260



面起着重大作用。由于在工商业方面没有很多的职务空缺，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担任了公职；为了提供适合于受过教育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技术教育聊胜于无，法学院在大学机构中占着极不相称的比例。富裕农民家庭的很多子女进了大学，他们多数脱离了乡村生活，加入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其中一些人成了各个农民党的领导人或支持者。但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党大都急剧向右转，成了十足的政客集团，这些政客们以高谈阔论博得农民的支持，但在谋求农民的利益，致使威胁到现政权时，却表现出微乎其微的实际热情。最大的例外是保加利亚的斯坦鲍利斯基的农民联盟，其次是克罗地亚的拉迪奇兄弟领导的农民党。甚至在1914年前，一度曾是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激进主义的真正代表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即已脱去其激进特点的外衣，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顽固卫士。在扩大的南斯拉夫国家建立后，它成了塞尔维亚人统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在新的南斯拉夫社会各部分实行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的主张。战后头几年的革命运动失败后，巴尔干各国的知识分子愈来愈支持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中推翻了议会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中大多数受纳粹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组成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帮伙的大学生，在打击左派，帮助镇压罢工运动，同样，在以民族主义觉醒的名义组织残暴的反犹鼓动方面，成为镇压公众政权的重要助手。

261 所有各党派的政治家们，除了那些被迫转入秘密活动者外，都主张工业化，站在资本主义一方，既反对产业工人，又以农民为牺牲品；因为主要是农民，通过纳税，和以高价购买必须购买的工业品来为工业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了保护地方工业，就提高上述工业品的价格，而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被选择来发展的工业完全不合

需要，并且生产成本很高，情况就更加如此。保护地方工业主要是靠庇护，往往靠明目张胆的行贿。从没有人试图计划去发展为广大贫困消费者的需要服务的各种产品。无疑，实行工业化的一条有力的理由是，它可以从人口过多的农村中吸取剩余劳动力。但是，除非同时真正提高农业生产率，否则健全的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除了很少一些较大的农场主外，所有其他人都是做不到的。如果政府准备真心鼓励农业合作的正确形式的话，它本来可以做某些事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鼓励的合作形式，主要只是销售合作社或某种信贷联盟——这只对比较富裕的农场主有用，对主要依靠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对其他合作形式，可能会导致联合使用工具和机器，甚至会导致合作耕种，则不予支持，甚至因带有布尔什维主义的味道而强行制止。情况固然是有许多所谓合作社，事实上是附属于农民党的政治团体，在实践上也没有采取什么合作社的方法。但是这多半是因为没有鼓励它们这样做。只有在一两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斯洛文尼亚，合作运动才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这是因为这里的合作运动主要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不必害怕它成为潜在的颠覆性政治力量。1923年保加利亚的斯坦鲍利斯基的农民党政府被推翻后，农民运动就再也没有发展的机会。虽然在很多地区，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情绪仍很强烈，但没有统一的领导，心怀不满和受压迫的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也没有联系。城市工人一方面力量太弱，没有农民的支持，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另一方面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上相对富裕的少数熟练工人，一部分是大量的非熟练工人所构成的城市无产阶级，他们不断受到从人口过剩的农村地区流入城市的饥饿难民的竞争。

罗马尼亚在1918年是巴尔干半岛唯一的一个仍由大庄园占

支配地位的国家,但事实上,这些大庄园多数已被肢解并被分配给农民所有。在罗马尼亚进行了真正的农业革命,尽管它是在对农民来说很苛刻的赔偿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在划分土地时有很大的偏袒和差异。为什么罗马尼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对罗马尼亚农民的境况很少有所改善呢?虽然部分原因是它的补偿条件,但主要是没有给农民以采用较完善的耕种方法来提高生产率的手段。他们多数太贫困,拥有的土地太少又太分散,无法超越最原始的耕作方法而取得进步;国家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帮助,或使他们能够自助。虽然他们无论如何也逃不脱1929年以后发生的农产品价格大跌价所造成的损失,但如果能在二十年代给予他们更多帮助的话,他们本来是能够在较好的情况下应付这次跌价的。把土地分成小块是不是实际上降低了整个农业的产量,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可争辩的是,剩余下来的大、中规模的土地,其生产率比大多数小块土地要高得多。没有合作社提供信贷,并改良工具,不开展大规模的技术教育运动来配合合作社的活动,要推广比较先进的耕种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缺少这些条件,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依然和他们邻国的那些长期习惯于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

263 农民生活痛苦,而且境遇每况愈下,实际上是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普遍现象。人口飞速增加,因为向外移民的出路越来越减少。工业就业机会与农村剩余人口的数量相比仍然小得很。农民占有的土地,在占有者死亡后又重加分配,因而愈来愈小。面对警察的迫害,以及甚至连最低限制的公民权利也拒绝给予,农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实际上,整个统治阶级和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反对他们,并且动辄将任何抗议行动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一面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火山上,除非紧紧压住,否则随时可能爆发,把他们席卷而去,于是,情况就更加如此。城市无产阶级自顾不暇,对他

们毫无帮助。社会民主党人，顶多不过处于被勉强容许存在的境地，连他们也认为，为了避免招致警察的迫害，应小心翼翼地不参与农村的事。共产党确实曾设法煽动农村骚乱，但为时太晚，在关键时刻未能支持斯塔姆博利斯基，借口是说他的农民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没有兴趣参与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当他们企图改变这种鸵鸟政策时，他们已遭到禁止，只限于进行地下活动，这就严重限制了他们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在气质上和信念上十分敌视农民的主张，因此，除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潜在的革命性之外，不可能对农民有任何同情。而这种同情在当时条件下，是不足以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运动的基础的。

然而，至少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一种深厚的亲俄情绪，使苦难的农民热切地盼望苏联能够解放他们，从而使他们容易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同是受压迫的斯拉夫人，而他们相信俄国农民已挣脱了这种压迫。在保加利亚，斯塔姆博利斯基死后，其追随者大部分投靠了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农村地区也比其政敌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尤其是在以前的塞尔维亚和在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共产主义成了革命情绪的汇集点，这并不是任何理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当农民党在实际上已转变到仅仅是半心半意地批评现存的制度后，人们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其后果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看得出来，当时这种制度垮台，为共产党领导和控制下的“人民民主国家”开辟了道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第一次革命浪潮被击退后，则是法西斯主义和军人一君主独裁政权横行一时。

在巴尔干国家，当1914年欧战爆发后，仅保加利亚有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则以内部“狭义派”和“广义派”两个敌对党之间斗争之凶而闻名。在罗马尼亚，理论上产生

主要影响的是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这里的社会主义刚刚从1905年农民暴动后遭到的残酷镇压中开始恢复，基本上仍是地下活动，在城市以外很少或者没有追随者。在塞尔维亚，社会党和与之有关联的工会运动仍处于草创时期，没有什么影响。希腊和土耳其的情况可以说与此相同。<sup>①</sup>

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国家都以农业为主，仅罗马尼亚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油田。但农业的情况又都迥异。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以小农种植为主，也有少数大庄园；除了从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地区逃亡来的难民外，也还有少数无地农民。而罗马尼亚则仍由大地主所控制，它的农民比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遭受着更沉重的压迫，但1905年暴动后受到的打击太大，以致对他们的压迫者毫无抵抗之力。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农民的境况之所以比较好一些，主要是由于土地过去在土耳其人手中，当这些国家赢得独立的地位后，土耳其人已被赶走。农民受地主所有制的压迫比较少一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就高多少。因为农业生产方式大都仍保持原始状态，尤其是塞尔维亚；虽然保加利亚在1914年前的年代，烟草的种植曾因市场的需要而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1912至1914年间，这些国家的经济由于两次巴尔干战争而遭受严重破坏，这两次战争造成相当大的领土变动，特别是以保加利亚为牺牲品。在第二国际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曾起过他们的作用，并且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旨在阻止列强对巴尔干事务的干涉，但战争气氛对他们的影响起了相反的作用，而他们的影响毕竟也太小。当欧战爆发，塞尔维亚从一开始就直接卷入后，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不顾战争威胁到他

---

<sup>①</sup> 见第8卷下册，第603和605页（中译本第85页和87页）。

们国家的独立，拒绝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只是以后才卷入，但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力图使他们的国家置身于战争之外，而当这两个国家参战后，又采取了反战路线。保加利亚的狭义社会主义者和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均派代表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是参加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团体之一。

## 保加利亚

巴尔干各国的社会主义始终受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很大影响。保加利亚“狭义”社会主义者的领袖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年)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领袖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1877—?)都同俄国有密切关系。布拉戈耶夫在1886年返回保加利亚前，曾在俄国生活和工作，并参加了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sup>①</sup>他在很大程度上应对1903年的分裂负责，这次分裂最后把保加利亚的运动分成两个敌对的党。保加利亚运动的分裂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的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俄国的两派直到1917年仍保持了一种统一的局面，而保加利亚人则于1903年最后果断地分裂，并坚决抵制第二国际企图重新联合他们的各种行动。布拉戈耶夫比列宁更加具有强烈的宗派主义。另一方面“广义”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扬科·萨库佐夫(1860—1941年)曾在伦敦学习和工作，受西欧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大。他与西欧的第二国际领袖们过从甚密，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支持第二国际的和平政策，成为推行巴尔干联盟政策的著名鼓吹者。在保加利亚参加欧战后，他和他的党的影响受到很大的破坏。于是，“狭义”社

<sup>①</sup> 见第3卷上册，第418页(中译本第429页)。

会主义者在战后抬头，成为势力大得多的党，并成为鼓吹俄国共产主义的突出代表。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翼，当时比起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农民党的发展来，都相形见绌；农民党在保加利亚农民中拥有大量支持者，一度似乎将成为“绿色”国际，即“农民国际”注意的中心，大有左右巴尔干地区革命进程之势。

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1879—1923年）是山东欧农民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的儿子，开始在保加利亚受教育，以后去德国，就读于哈雷农学院。回保加利亚后，于1902年任新建立的农民联盟的一家杂志的编辑，并着手把农民组织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农业团体之中。1908年，他重新被选入国民议会，很快就成为农民党的领袖，在他巧妙的推动下，该党发展迅速。1911年，他在宪政改革的问题上，同斐迪南国王发生争执。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和以后，他猛烈地攻击斐迪南的政策；欧战爆发后，他强烈反对国王企图使保加利亚站在中欧强国一边加入战争的做法。他受到国王的召见，恐吓国王说，如果介入战争，将会丧失王位。于是斐迪南下令将他逮捕。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判处终身监禁；直到1918年9月保加利亚的军队崩溃后才获释。

斯塔姆博利斯基虽是彻底的激进派，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主张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制和个体耕种为基础的农民社会，但必须通过合作组织来加以巩固，并由真正的农民来领导，而不是由脱离农村生活的城市政客或知识分子来领导。1918年9月，他获释出狱后，被派去安抚那些正要返回家园的抱有反抗情绪的士兵，相反，他却率领他们向索非亚进军。但政府从有脱离保加利亚危险的一些地区派去马其顿部队对付他们，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军队败北。尽管如此，由于斐迪南国王丧尽人心，被迫逊位逃离索非亚，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鲍里斯。斯塔姆博利斯基于是同新国王言

和,于1919年1月参加了新政府。新政府面临着代表战败国议和的棘手任务。他被派往巴黎进行和谈,不久就遇到了协约国提出的最后通牒,要保加利亚接受规定将大量保加利亚人置于希腊或南斯拉夫统治之下的边界,这肯定会在有关地区和从这些地区逃到保加利亚本国的许多难民中引起强烈不满。斯塔姆博利斯基知道拒绝最后通牒实际已不可能,主张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加以接受,只是试图获得保证,让有关的少数民族得到公平对待和文化自治。1919年10月,他担任首相。11月签订了纳伊和约。下一步,他在1920年初解散了国民议会并举行了大选,结果使他的农民党在新议会获得明显的多数。从1920年2月到1923年6月,斯塔姆博利斯基实际上作为专制领袖统治着保加利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遇到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军官中和从“大保加利亚”逃亡来的难民中(这些人拒绝接受和约的苛刻条款)有很大势力。

在1918年革命期间,斯塔姆博利斯基曾求助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来反对斐迪南国王及其反动集团,并向唯一的另外一派左翼力量“狭义”社会主义者提出建议。但“狭义”社会主义者志在进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愿与他交往。在他们看来: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农民革命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运动,他们与这种运动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公开谴责他企图搞的政变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敌对派系之间的争吵。斯塔姆博利斯基本人掌权后,不打算再攻击君主政体,因为这时他的宿敌斐迪南已经下台。“狭义”社会主义者这时已加入第三国际,改名为共产党,他们以斯塔姆博利斯基不再攻击君主政体这一点,证明他们拒绝支持他是正确的。然而,在斯塔姆博利斯基的统治下,他们却享有公开进行组织和宣传鼓动的自由,这是其他一些未在苏维埃控制下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于是,他们得以大大地扩大他们的队伍和影响。



斯塔姆博利斯基在极其困难的国际条件下赢得政权，特别谨慎从事，避免与强行提出和平条件的协约国发生冲突，也避免与损害保加利亚而获得好处的邻国发生争吵。由于他在国际谈判中采取温和与和解的政策，他赢得协约国各强国政治家们的好评，由此而争取到他们很大的让步，包括大大削减从混乱不堪的保加利亚经济中索取赔偿的总额。但是他的和解政策，导致放弃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领土要求，也使他成了一些人的死敌，特别是在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很大影响的马其顿人中间。1922年，他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尼什协定，受到这些民族统一主义派别的公开指责，成为翌年他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

斯塔姆博利斯基从承认保加利亚是战败国这一弱点出发在国际上采取和解政策，但在国内事务上所采取的政策却丝毫不谈不上和解。他特别对那些应对将保加利亚引入战争站在德国一方承担责任的人给予应得的惩处，将战时的主要政治人物投入监狱，将许多有钱有势的人以触犯国家利益的罪名交付审判。作为农民领袖，他对律师和金触家恨之入骨，指控他们剥削农民；他要求把这些人赶出国民议会并剥夺他们的一切公职。在一个已经由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应剥夺其财产的大地主寥寥无几；但是，斯塔姆博利斯基却推行了一项农业法，规定凡这样的大庄园均须拆散，教会土地均应没收，此种土地和公有土地均应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土地很少不足以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民。军队根据和约减少到最低限度，他借此机会颁布法律，规定所有男性公民均须服一年的强制劳役。他还企图没收大的房产和资本家所有的住宅来解决住房问题。他的社会政策如此进步，致使他被资产阶级分子视为眼中钉。但是他的农业政策却被无端指责为通过巩固私人土地所有制而偏袒富裕农民。这自然是共产党人加给他的责难之一，他们仇视他的社会政策巩固了农民所有制结

构，从而妨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无视这一政策的有益的方面。

在斯塔姆博利斯基执政时期，他敢于在纳伊和约和国际联盟的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地维护受外国统治的保加利亚人的权利要求。但是，面对希腊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敌对态度，他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十分有限，因为不可能强制这两国政府遵守国际联盟规约或纳伊和约条款中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精神办事；而马其顿人和其他民族统一主义分子也绝不会默认纳伊和约所确定的边界。因此，斯塔姆博利斯基与他的敌人是无法和解的。<sup>270</sup>

1923年6月，资产阶级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与陆军军官中一些主要受马其顿民族统一主义鼓动的民族主义分子联合在一起，在索非亚组织政变，推翻了政府。大多数内阁成员被捕入狱。此时，斯塔姆博利斯基正在他的家乡斯拉沃维察。曾企图在该地抓他本人。他当时逃脱，跑进深山中企图越过国境。但几天后，他被抓获，并被马其顿恐怖分子开枪击伤，严刑拷打，砍去手脚，最后——据说是因为企图逃跑——被杀死。与此同时，在索非亚，一个以亚·赞科夫教授为首的反动政府在未遇到严重反对的情况下掌握了政权。共产党再次拒绝给予斯塔姆博利斯基以帮助。在一些乡村，农民组织曾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没有统一的领导，很快被镇压下去。只是到了9月，即斯塔姆博利斯基死后3个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才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组织他们自己的暴动，反对赞科夫政府，企图以此变理论为行动。政府事前获悉他们的计划，逮捕了大约1000名共产党人。这虽然未能阻止起义，但使之成为一些没有协调计划的地方性行动，在镇压这些行动中，约有5000名暴动者被打死。

紧接着这些事件而来的是“白色恐怖”，在这期间，对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很多无辜者未经审讯就被关押好几个月之久。

翌年，即 1924 年，尽管采取了这些残酷措施，动乱仍继续不断。但由于马其顿爆发了严重骚乱，使情况更加复杂。“马其顿国内革命组织”很有能力的领袖托多尔·亚历山大罗夫被他的对手谋杀，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行为，结果使许多马其顿人<sup>271</sup>逃至保加利亚，加剧了在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除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政府与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农民党党羽之间的冲突之外，又增加了国内动乱的第三个根源，出现了许多暗杀事件和其他暴力行动，都是这个或那个由不满分子组成的团体所为。1924 年 4 月，发生了两起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暴行，使动乱达到最严重的地步。一件是企图暗杀鲍里斯国王未遂，一件是在索非亚大教堂为刚刚被暗杀的格奥尔基耶夫将军举行葬礼时，发生了炸弹爆炸。死亡 123 人，伤者更多，罹难者包括参加葬礼的很多知名人士。爆炸案的策划者究竟是谁，始终未彻底查清，尽管政府人士普遍认为系农民党人所为。这又为更进一步的恐怖统治提供了借口，在这期间，有 5000 多人被捕，许多人被指控进行反政府活动而受审讯，一些被判处死刑，一些被流放，剥夺公民权利，监禁或罚款，也有一些人因毫无证据，无端被捕而宣告无罪。

在这个高潮之后，动乱逐渐平息，虽然小规模动乱还在继续发生。农民党和共产党继续遭官方禁止，依然只能在地下活动。只是过了几年之后，才容许一个新成立的工人党存在——实际上，主要是共产党的隐蔽形式。这个党还没有获得大批追随者，它的领袖之一 M·特莱科夫在 1933 年遭恐怖分子杀害。到 1934 年兹维诺夫发动军事政变，它也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接着，鲍里斯国王在翌年发动了法西斯政变。

在此期间，战前“广义”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扬科·萨岸佐夫继续担任着这个非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直到 1933 年解散为止。该党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继续鼓吹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但只有少数追随者,而且几乎只局限于城镇。其少数成员未经党的正式批准,就在1923年政变后同赞科夫政府发生某些勾结,因而被开除出党。在1927年的大选中,该党(这时称社会民主工党)同组成小业主党的农民党残余分子结成联盟。他们这个所谓的“铁集团”获得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和62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仅获得10席。共产党组织的工人党,在严厉的镇压下进行活动,这次选举中仅获4席,尽管它实际上无疑拥有多得多的追随者。 272

这样,在斯塔姆博利斯基死后,保加利亚经历了一连串的暴乱和白色恐怖,其残酷完全象几年前在芬兰和匈牙利那样,结果是出现了法西斯独裁,虽然它得以维持其统治直至1944年俄国人攻入该国为止,但它始终受到只不过是等待时机的强大地下力量的对抗。

1923年的赞科夫政府及其以后的各届政府,尽管都是由反动分子组成,但也未能消除斯塔姆博利斯基所取得的成就的最重要部分——土地改革——或改变保加利亚社会的基本民主基础。它们也未能废除纳伊和约或满足马其顿保加利亚人的愿望,而这些保加利亚人在斯塔姆博利斯基倒台后,曾对新政权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这些政府所能够做的或实际上做的,一方而是摧毁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恢复斯塔姆博利斯基设法加以遏制的资本主义成分,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社会不满,在地方上的骚乱中不断地爆发出来。

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倒台,不仅是对保加利亚的,而且是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激进主义事业的沉重打击。在所有的农民领袖中,他最勇往直前和最有成就,同时也是最睿智的。有一个时期,他似乎肯定会成为不仅仅是本国农民运动的领袖,这一点通过他雄心勃勃地创建的“绿色”国际即可表现出来,而且成为他扩大影

响的工具。斯塔姆博利斯基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愿意在他反对可恶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支持者资本家的斗争中，接受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帮助。他是一个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深信依靠  
273 农民民主制度，就可使农村摆脱城市人的统治和剥削。他认为应建立一种农民社会，以实际耕种土地的人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相信这样拥有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民，能够使国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并可以用合作制作为一种手段，改善他们的境况。他的思想虽不算精辟；但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农民，他的文章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的政策，他出名的著作是《权威、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和更加值得一读的《政治家应该是怎样的人》。他称不上是一个精深的理论家，但他的文章洋溢着真挚感情而有说服力。他最初是作为新闻记者而出名的。在个人接触中，他无疑给人以深刻印象——这证明为什么他能够对曾与他进行过谈判的西欧一些久经风云的政治家们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身高，体宽，黑发，表情和谈吐粗鲁而朴实，但处事能够持和解态度，具有一种既令人生畏，又令人喜欢的力量。也许，共产党拒绝与他妥协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的话，至少在1918年或1919年这样做了的话，他一定把他们吞并，而不是他们把他吞并。他的政策若在保加利亚获得成功，一定会鼓励其他许多国家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且会对共产党取得农民暴动领导权的企图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倒台，是作为欧洲事务重要因素的“绿色国际”的终结，从而也是农民的革命精神的终结。在俄国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所制服，纳入他们的中央集权的工业主义的控制之下。我认为，这种农民革命精神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机会取得建设性的成就；但是，如果有任何这样的机会的话，斯塔姆博利斯基一定是它的领导人。

## 南斯拉夫

欧战刚刚结束后，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的建立，结果使并入这个新国家的各地区的社会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这些党在1914年没有一个 274 是强大的，但是战争年代的动乱——首先是俄国革命事件——使它们得到大大增强力量的机会。但是，各党有着不同的传统。塞尔维亚社会党是一个左翼马克思主义政党，类似保加利亚的“狭义”社会党，但教条主义色彩较淡。如前所述，它在1914年曾拒绝投票赞成战争借款，结果受到迫害，沿着革命的路线发展下去。而克罗地亚社会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小党则有很大一批成员是更接近于西欧的，特别是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人不容易同塞尔维亚人联合在一起，塞尔维亚人则成为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一部分，1919年8月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4月，塞尔维亚社会党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左翼团体联合组成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党，翌年，改称共产党。右翼团体拒绝加入新的社会主义工党，建立了与之相抗衡的社会民主党。1920年12月大选中，在国民议会414个席位中，共产党获58席，社会民主党获10席。工会主要追随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支持的对立的工人联盟只有很少会员。

1918年后，南斯拉夫面临的主要迫切问题，是草拟新国家的宪法，而它面对的尖锐意见分歧，不仅包括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且包括实行联邦制抑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问题。总的来说，塞尔维亚人代表主张中央集权的力量，要求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他们希望在这个国家中，他们的影响居主导地位。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大部分强烈坚持实行自治。在马其顿，互相对立的各民族

主义派系之间，以及对合并到南斯拉夫感到不满的马其顿保加利亚人与主张南斯拉夫统一的亲塞尔维亚分子之间的斗争正在发展。战后，南斯拉夫议会中势力最强的党是由尼古拉·帕西奇领导的激进党，帕西奇认为新国家只不过是战前塞尔维亚的扩大，强烈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制。塞尔维亚激进党人，在20世纪初期，曾经是真正的激进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农民的支持，采取强硬的民主路线。但甚至在1914年前，他们就已发展成一个保守政党，主张发展工业，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出身于城市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人所控制。1918年后，他们最大的要求是在塞尔维亚人占优势地位的统治下，统一这个扩大了许多的王国。这使克罗地亚人和其他一些曾受匈牙利或奥地利统治的民族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文化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都比塞尔维亚人优越。

在议会中差不多与激进党人一样多的，是民主党的追随者。该党由塞尔维亚人中的反对派与来自这个扩大了了的王国的其他地区的一些派系组成。塞尔维亚民主党在社会政策方面要比激进党进步，但大部分人同样坚持塞尔维亚人的统治地位。民主党中其他许多成员则倾向于保持一定程度的区域自治，但在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明确形式的问题上，甚至在应把国家划分成哪些区域的问题上，意见又不一致。这两个党——激进党和民主党——差不多是势均力敌，拥有的议席均在90到100个之间。其次势力最强的是共产党58席，斯捷潘·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53席。

克罗地亚农民党由拉迪奇兄弟——安特·拉迪奇和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年)创建于1914年以前。安特·拉迪奇是它的主要理论家和精神领袖，但在战争期间死去。幸存下来的弟弟，虽是深孚众望的演说家，但没有明确的政策，宁愿扮演鼓动家的角色，而不愿作一个阐述自己的条件并达成协议的谈判者。在战后的形势下，他要求的不仅是一部联邦宪法，而且是一个共和国，对

此,塞尔维亚的主要政党是根本不会同意的。他在选举中获胜后,号召他的追随者拒绝参加新议会的任何议案的讨论,以进行抵制。这样,他就把制订新宪法的工作听任由激进党和民主党去做,而这两个党如没有彼此的支持,是不可能制订出宪法来的。两党于是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不顾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激烈反对,强行通过了一部主要体现中央集权制的宪法。新宪法于1921年6月正式实施,但在举行仪式时,有人投了一颗炸弹,企图杀害首相和摄政王。暴行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所为。为了镇压一次所谓的广泛的恐怖主义阴谋活动,政府通过了一批紧急法令。而内务大臣M·德拉什科维奇又因此而被一个波斯尼亚共产党员谋杀。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非常严厉的紧急法进行报复,包括撤销58个共产党议员的授权书。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在此期间,拉迪奇的农民党继续奉行它的弃权和消极抵制的政策,在议会中,由于不存在任何有力的反对派,联合政府本身两党之间的争吵日益激烈。1922年底,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激进党人组成残阙政府,决定举行新的选举。选举在1923年8月举行,结果激进党的力量略有增加,民主党则损失惨重。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从50席增至70席,但仍拒绝出席。激进党企图同拉迪奇谈判,但谈判破裂。拉迪奇在开展了一场反对政府的激烈运动后逃往国外,先是在伦敦,后在维也纳,设法劝说西欧列强进行干预,支持克罗地亚自治。最后,在1925年初,他同民主党反对派达成协议,本人仍留在国外,指导他的追随者出席斯库普什蒂纳(议会),目的是将激进党政府赶下台。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政治危机,直至7月间,民主党在拉迪奇的追随者的支持下执政为止,但拉迪奇的追随者仍未参加政府。拉迪奇访问了莫斯科,并不是很认真地讨论了他的团体加入在俄国影响下计划成立的“农民国际”,之后,他回到克罗地亚,继续从事他的自治运动。他的活动导致国王、军



队和中央集权主义者要求将他逮捕。民主党政府垮台，由一个激进党占优势的内阁所代替，这个内阁受到民主党内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的一些持异议者的支持。拉迪奇被逮捕；他的农民党宣布解散。政府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中该党获得微弱的多数。拉迪奇改组了他的党，更换了新的名称，并在狱中同民主党和其他反对派团体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政府撤销了大多数农民党议员的授权书。

接着，阵线发生突然变化。拉迪奇的侄子帕维尔·拉迪奇代表克罗地亚农民党发表了一个接受宪法的宣言。拉迪奇本人则同激进党达成协议，放弃了他同民主党的联盟，在激进党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联合内阁里任教育大臣。但是，这个独特的联盟为时不久。1926年，激进党的老领袖尼古拉·帕西奇死后，与之相对立的各塞尔维亚人政党达成了协议，克罗地亚人被迫退居反对派的地位。此后，1928年6月，一个门的内哥罗的激进党议员，就在议会会议厅里枪杀了两个克罗地亚议员，重伤拉迪奇，几星期后死去。这导致了一场尖锐的危机。克罗地亚人在拉迪奇的继承者弗拉迪米尔·马切克领导下退出议会，在萨格勒布建立了自己超越法律的议会。几个月后，1929年1月，国王亚历山大宣布废除宪法，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此，南斯拉夫陷入独裁统治之下，直至1934年亚历山大在马赛被一个克罗地亚的密探暗杀。此后，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克罗地亚的自治最终在形式上经过修改后被承认。

在1923年以后的南斯拉夫局势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被解散的共产党改称独立工人党后恢复了合法活动，但继续遭到迫害，不可能取得多少成果。在1925年的选举中，它只得13,000票，两年后只得25,000票，甚至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赢得。它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其杰出人物为吉弗科·托帕洛维奇），

情况稍好一些。1925年获25,000票,但亦未赢得席位;1927年,它获23,000票,赢得1个席位。它还设法争取到先前追随共产党的一些<sup>278</sup>工会。但工会运动依然力量微弱,并分裂成忠于阿姆斯特丹和忠于莫斯科的对立派别。在选举中,特别是在1925年,两党都是在十分严重的困难条件下斗争。暴力和恐吓层出不穷,不少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受重伤,少数人被杀害。社会民主党从成立时即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人数太少,仅有1票,而罗马尼亚人有4票,保加利亚人有3票。它在农民中没有追随者,因为克罗地亚的农民继续追随拉迪奇和他的继任者,尽管他的党对支持农民的利益愈来愈采取消极态度。1923年后,除克罗地亚外,农民在政治上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 罗马尼亚

在“旧罗马尼亚”——即在1914年战争以前存在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力量很微弱,而且还受到残酷的镇压。社会党在1907年的动乱中几乎被完全消灭;1911年,才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重新组成。该党反对罗马尼亚干预欧洲战争,并派代表参加了1915年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1916年8月罗马尼亚成为交战国后,该党坚持其反对态度;在德国占领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它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它的著名领袖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在俄国,积极参加了俄国革命(特别是在乌克兰),并积极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建立。俄国革命爆发后,骚乱迅速蔓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不同,它是一个以大庄园为主的国家,只有很少独立的自耕农,对贫困和无地的农村居民,采取极端残酷的镇压政策。在战争局势的压力下,迄至那时为止只限极少数人享受的选举权,在1917年大大扩大。政府答应将相当多的土地重新加以分配,被

279 废除的庄园的主人将得到充分补偿。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俄国军队崩溃，使德国人得以全歼罗马尼亚军队。中欧强国着手将和平条件强加给它，包括领土的丧失和把罗马尼亚经济置于德国控制之下。接着，有一个时期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其困难。随着德国失败的指日可待，革命情绪迅速高涨。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使罗马尼亚的领土缩小，反而扩大了许多，大都是靠牺牲匈牙利而得，但也是由于合并了比萨拉比亚（迄至那时为止在俄国统治下）和以前与保加利亚有争议的地区。由科恩达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着手采取步骤巩固新国家。该政府实行了男性公民选举权制，后让位给扬内尔·布勒蒂亚努领导的所谓自由党内阁。1918年12月，动荡的局面最后发展到总罢工。政府把社会党和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执行委员逮捕，并对罢工者进行无情镇压后，罢工遭到失败。这就是为维持“秩序”而出现的恐怖时期，以致在1919年由临时的“军人内阁”主持进行的大选中，社会党撤回它的候选人以示抗议。选举结果，由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结成联盟，击败了自由党。亚历山大·瓦伊达—沃耶沃德领导的一个比较温和的政府执政，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这是反动派无法容忍的。瓦伊达—沃耶沃德被迫辞职。1920年3月，战后罗马尼亚的“铁腕人物”阿维雷斯库将军替代了他。阿维雷斯库在士兵中享有威望，从而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并得到有明显法西斯倾向的所谓人民联盟的支持。1920年6月举行新的选举，阿维雷斯库赢得大多数，社会党改变了他们的弃权政策，赢得20个议员席位。

280 社会党在新并入罗马尼亚的地区的势力比原有各省要强大，此时在政策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1921年2月，它的执行局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但除赞成的18票外，有12票赞成加入“第二半国际”即维也纳国际，8票赞成加入伯尔尼的第二国际。反对共

产主义的成员主要来自新省份。随之发生分裂，持不同意见者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着手加入维也纳国际。

1921年5月，多数派在改组成共产党的过程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代表大会。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准备叛乱，逮捕了全体代表，以叛国罪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并提出了一项新法律，将工会置于一个调解劳资纠纷的国家体系的管辖之下，不顾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而强行通过了这项措施。然而，它一方面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工人阶级运动，一方面又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实现战时作出的进行土地改革的诺言。但是，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十分强大，足以保证做到土地分配只能是在给与失去土地的原业主以大量赔偿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挫败了将地下主要石油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提案。但是，尽管土地改革法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它确实使罗马尼亚从一个以大庄园为主的国家变成以自耕农为主的国家，从而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土地分配在比萨拉比亚和其他新并入的地区尤见成效，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靠主要牺牲外国（即匈牙利）所有者的利益来进行此项工作。

在此同时，1920年曾发生了主要由共产党控制的第二次大罢工。政府将铁路工人重新征召入伍，并实行野蛮的镇压政策，破坏了罢工。1921年骚乱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在1922年大选中未能提出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议员当选，即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代表雅各布·皮斯蒂纳（？—1930年）。皮斯蒂纳保持他的席位直到1926年按照选举法条款被剥夺为止。按照这个条款，任何政党在全国所得票数达不到总票数的2%，在议会中就得不到代表权。但罗马尼亚的选举没有什么意义：它实际上可由政府在办公室加以操纵，以便使选民明显表示出来的意愿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在农村地区，反对党的候选人往往甚至不能与选民见面。即使在城市，也不断发生干预集会和讨论的权

利的情况。接着,在1926年,“自由党”领袖扬内尔·布勒蒂亚努强行通过了一个新选举法,根据这个法律,获得总票数最多的党,只要它获得全部票数的40%,就可以得到全部席位的50%,多于按它实际所得票数应得的比例。这样奇特的制度,再加上当权的政府经常采取的恐吓手段,使得本应成为立国基础的宪法民主变成纯粹空谈,并且使任何社会党想在大选中争取赢得哪怕是少数几个席位,也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种制度实施后的次年,扬内尔·布勒蒂亚努死去。他死后,一个农民党政府在尤利乌斯·马尼乌领导下执政。布勒蒂亚努的自由党主要以商业阶级为基础,一直试图按照民族主义路线发展罗马尼亚工业,而不依赖外国资本家。马尼乌政府改变了这一政策,以后几年,外国资本家的投资纷纷涌入,结果虽带来繁荣,但在三十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开始,迅即消失。马尼乌政府虽然比起自由党政府来,对农民有好处,但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敌视有过之无不及。在繁荣时期,工人阶级争取让步的努力遭到无情的镇压。

实际上,罗马尼亚在整个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一直处于独裁政治的统治下,不管党的名称或联合政府的名称怎样变化,情况毫无二致。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论是自由党的布勒蒂亚努,农民党的马尼乌,保守民主党的塔凯·约内斯库,抑或是人民联盟的领袖阿维雷斯库将军任政府首脑,情况毫无区别。在这些人领导下,几乎同样是,共产党遭到禁止,温和的社会主义,甚至工团主义都遭到迫害,作为政治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

## 希 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欧洲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发

展的条件没有比在希腊更不利的了。在希腊，一方面是亲德的国王康斯坦丁与以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为首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领土调整问题和由于战争而引起的吸收移民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压过了社会问题。1912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希腊的领土扩大了许多。大陆上，在伊皮鲁斯和马其顿扩大了版图；在海上则获得了克里特岛和大部分爱琴海岛屿，“古老的希腊”的人口几乎由此而增加一倍。由于世界大战，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又获得一些土地，而且暂时还在小亚细亚的土麦那及其周围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但希腊人于1921年被凯末尔的军队赶出小亚细亚；这样，除了为使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两个人口混杂的地区达到较大的民族同一性，而大规模交换居民所造成的安置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大量安置难民的问题。除非在国际联盟的赞助下，依靠国际上的财政援助，否则要解决交换居民和安置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难民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都必须在希腊本身政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伴随而来的是一连串根本性的混乱和政治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1914年欧洲战争发生时，维尼泽洛斯是希腊政府的首脑，他主张站在协约国一方进行干预，至少在一旦遭到保加利亚的进攻时，可以帮助塞尔维亚。另一方面，国王是亲德的，决心为了德国的利益而使希腊保持中立。1915年4月，当英国要求希腊帮助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时，国王免去了维尼泽洛斯的职务。8月间，维尼泽洛斯在大选中获胜后又重新执政，授权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登陆。但 283  
在10月，他再次被免去职务，决定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次，维尼泽洛斯抵制选举；接连出现了几届应国王邀请组成的软弱内阁。1916年9月，维尼泽洛斯逃到萨洛尼卡，在协约国保护下在该地建立了一个敌对的临时政府，并组成一个敌对的国家，它的士兵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但协约国拒绝承认他的政府。康斯坦丁仍然控制雅

典,直到1917年6月协约国最后强迫他让位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为止。维尼泽洛斯返回雅典,任新政府首脑,重新召集1915年国王违宪解散了的议会,向中欧强国宣战。从此,希腊作为协约国正式参战,并在和会上根据纳伊和约和塞夫勒和约得到了报酬。这两个和约签订后,维尼泽洛斯于1920年8月回到雅典,但他发现在国内遇到了强烈的反对。1920年10月,亚历山大国王去世,出现了要求恢复康斯坦丁王位的呼声。在11月举行的大选中,维尼泽洛斯遭到惨败。他辞去职务,同他的许多大臣离开本国。经公民投票,康斯坦丁恢复了王位。

接着,在小亚细亚进行了惨遭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敌视康斯坦丁的各强国没有给予希腊以任何支持。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集结在希俄斯的后撤部队宣布革命。康斯坦丁逃离雅典,几个月后死于国外。内阁的领导成员被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并被枪决。接着出现了一个混乱时期,在此期间,革命政府曾企图建立一个宪法政权,但未能成功,而仍在国外的维尼泽洛斯代表希腊进行了谈判,结果1923年7月在洛桑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

284 这时,究竟是保留君主政体,抑或是建立共和的问题仍未解决。1923年10月,梅塔克萨斯将军企图发动一次保王派的反革命,但很容易就被击败。12月,国王在压力下离开希腊,同时国民议会辩论了未来的政权问题。次月,维尼泽洛斯返回希腊,再次担任总理,但共和党人反对他关于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他几乎立即就辞去职务。军官同盟恢复活动,要求马上成立共和国,维尼泽洛斯再次离开本国。1924年3月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对新宪法进行了长时期的辩论。当辩论仍在进行时,1925年6月,潘加洛斯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但他迅即被推翻,经短时期的混乱后,维尼泽洛斯又返回希腊,领导了1928至1930年的政府。接着,又进一步陷入混乱,最后,

1935年国王乔治回国，1936年梅塔克萨斯将军建立了独裁政权。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社会主义政党只起了无足轻重的作用。欧战期间，人数很少的希腊社会党——1911年由一批人创立，其中包括这时已成为希腊民主社会主义元老的古拉奥斯·伊安尼奥斯（生于1885年）——支持维尼泽洛斯，反对康斯坦丁国王。1920年维尼泽洛斯垮台后，它也一起受到惩罚。它的老领袖普拉通·德拉库利斯（1860—1941年）已于1915年被开除出党，再也找不到卓越的领袖可以代替他。但如前所述，由于巴尔干战争而在并入希腊的萨洛尼卡，形成了一个相对抗的社会党活动的中心。属于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的萨洛尼卡劳工联盟奉行反战路线。在1915年，它是新成立的泛希腊的社会主义工党的主要推动者，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加入了该国际。在早期工会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总工会成立于1918年，1920年加入赤色工会国际，但由于它的领导成员被逮捕和放逐而严重削弱，而且它的力量也不足以起任何重要作用。在希腊，有从小亚细亚和其他地方涌入的大批饥饿难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破坏罢工者，工会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活动。

A·西泽里斯领导的老希腊社会党虽仍然存在，但缩小到几乎等于没有。在1923年的选举中，它仅仅能竞选3个席位，但一个都没有当选。6个当选的激进党议员后来加入了社会党，在议会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派。与该党相对立的共产党虽获得了相当多的选票，但1923年也未能获得一个席位。然而，在1926年，它获得的选票几乎增加了一倍，赢得10个席位。在此同时，议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却不复存在。1928年，召开了一次劳工代表大会，讨论改组社会主义力量的问题，结果导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分裂。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人新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工党，制订了一个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但是，这种寻求团结的企图，其命运并不比在它以前进行的努力强。1931年，雅典（比雷埃夫斯）和萨洛尼卡的社会主义组织发表共同宣言，并召集了一次团结大会，再次企图促成团结，但也未能建立一个能起作用的党；不过在这年，工会的主要团体“工人总联合会”进行了改组。1919至1925年担任铁路工人工会总书记、以后又担任改组前的“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的社会党人D.斯特拉蒂斯（1889年生）继续留任书记。曾为社会党的统一事业积极奔走的尼·伊安尼奥斯担任通讯员，保持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联系。总之，只要国内局势继续受维尼泽洛斯的控制，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发展壮大机会，尤其是因为雅典人和以萨洛尼卡为中心的一派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后一派一向是宁愿同其他巴尔干国家联合，而不愿同西欧联合。此外，即使在雅典，右派和左派的分歧也很深。从1929年维尼泽洛斯建立了一个大部分代表职业集团的参议院起，工人总联合会就接受了这个机构的席位，<sup>286</sup> 尽管社会党和工会左翼加以反对。共产党当然也持反对态度，虽然该党作为政党已被禁止活动，但仍有一定影响。后来成为希腊社会党领袖的亚历山德罗斯·J.斯沃洛斯教授（1892—1957年），二十年代是一个律师和法律教师，与政治无关系，不过已经以激进倾向而闻名。1917至1920年，他曾在财政部任劳工问题局长，但后又重操法律事务和教学工作。1929年，他任雅典大学宪法教授，从此便热衷于从事争取政治分权和公民自由的斗争。他的活动使他在1935年被免去教授职位，翌年，被逮捕并被流放到一个岛上。1940年希腊—意大利战争爆发后获释并重任教授。1944年，他再次被从大学的职位上赶走，短时期担任过企图将希腊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游击队政府的主席。后来他曾任帕潘德里欧政府的财政部长，第一次试图稳定德拉克马<sup>①</sup>。但1944年12月，他辞去

<sup>①</sup> 希腊货币名。——译注

政府职务,几个月后,任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46年再次离开大学职位。1950年,斯沃洛斯在雅典和萨罗尼卡同时当选为议员,他选择了后者的席位,从此领导人民民主同盟的党团议会。1953年起,由于人民民主同盟与社会主义同盟合并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党,斯特拉蒂斯和伊安尼奥斯等著名人士均属该党。斯沃洛斯除政治活动外,还撰写了许多有关宪法和宪政实施问题的著作。

(李梅彬 译)

## 第九章

### 两个对立的国际(1919—1921年)

1917年计划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如前所述,<sup>①</sup>不是由俄国人,而是由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发起的,这个委员会由西欧中立国人士建立,旨在加速结束战争并对和约的条款施加国际社会主义的影响。当俄国人在191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加入时,主动权并未操在布尔什维克之手,而是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这个苏维埃仍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而且仍然处于同临时政府争夺权力的初期阶段。因此,俄国人在呼吁对斯德哥尔摩会议给予世界范围的支持时,不是以一个政府的身份说话,而是以仅仅在试图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身份说话。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扩大的俄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并于随后访问西欧各协约国,以寻求对拟议中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支持的俄国代表们,存在着双重弱点:他们既难免被临时政府所否认,又难免不再能正确代表派遣他们的苏维埃的态度。固然,对临时政府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机构,因而它从未敢断然否认它派出的使者,或公开出面反对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但它的态度模棱两可,足以使协约国中反对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人们(包括他们的政府)加以利用。更有甚者,俄国代表们在西方逗留愈久,他们就愈不能真正代表派遣他们的那个组织,他们的意见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分量就愈轻。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2—43页。

布尔什维克在尚未掌握政权时，虽然没有积极反对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但这个会议无疑是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的。如前所述，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关于如何结束战争和关于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未来，曾经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处于少数而在昆塔尔会议上却处于多数的列宁及其集团，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个国际将保证忠于世界革命事业，并将肯定排除所有社会主义“爱国派”和“卫国派”，因为这些人曾经支持他们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列宁主义者曾经谴责“社会和平主义者”企图在各交战国政府之间媾和，而不是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这些政府后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而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则主张通过谈判获得和平，而不坚持以世界革命做为先决条件。因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执政，自然而然会导致俄国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发生根本的变化，并且试图以它为首创建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而不会做任何努力去帮助重建一个以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或以卫国派和失败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为基础的旧的国际。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一个原则是：帝国主义战争将为世界革命铺平道路。俄国革命只不过是世界革命的发端而已。因此，主要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纳入一个共同的组织之中，而是要动员每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去反对他们国家的反动政府和反对那些假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经同这些反动政府同流合污，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1919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完全是这种政策的合乎逻辑的体现。这些结果——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都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凭空臆造说什么先进的西方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如果有人领导的话，已经准备好追随一种革命的政策，就象列宁和托洛茨基期望他们追随的那样。在那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共产党少数

派的行动企图，似乎已自食恶果，而且，即使某地真的发生了某种革命，也为反革命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德国、意大利，而最快的是在匈牙利。恶果较小的地方是，或者那里的共产党人力量太薄弱，根本不敢进行革命——例如在英国和美国——或者那里共产党人力量虽然相对强大，但实际上并未追随一种革命的政策，例如在法国和挪威。

关于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想法，含有召开一次代表所有的派别和倾向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的因素，这个会议将与政府间的和平会议同时召开，并将坚持主张把全世界工人的要求纳入官方的和谈条件中。由于这种想法，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会见了来自所有它能动员派遣代表前来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小组派来的代表团，并且试图从这些团体的口头或书面声明中摘出一个和平计划的草案，准备提交斯德哥尔摩会议批准，如果这个会议一旦召开的话。如前所述，这个会议始终未能开成，部分是由于有些协约国的社会党拒绝同德国人坐在一起开会；部分是由于各协约国政府由于非常了解社会主义者队伍中存在的分歧，因而在某些情况下自觉强大到足以拒绝给他们的国家前往出席会议的代表颁发护照。事实上，在1917年，各协约国中主战的社会党多数派的领袖们宁愿彼此商谈，试图求得一个一致同意的协约国社会党人的“战争目标”，而不愿在他们自己取得一致意见之前，参加任何范围较大的讨论；因而他们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不很热心，尽管他们并未积极反对这个会议。

结果，在第二次俄国革命之后，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就失去了它的推动力。俄国人不再需要它，协约国中曾经有过的对它的支持也化为泡影。与和平会议同时召开一次社会党会议的想法并未放弃；但是意见分歧；有些人希望这次会议代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有些人则宁愿召开一次协约国社会党会议，目的仅仅是为

了对各协约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此作为协约国胜利的收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后，这样一次协约国的会议自然会摒弃俄国人，以及中立国和中欧强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918年，尽管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仍然存在并继续鼓吹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但是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却被搁置幕后，尤其是在法国，占据舞台中心的是那些鼓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人们与那些主张通过谈判获得和平的人们之间的内部斗争，还有一些少数派——通常人数不多——则反对上述两种人而主张执行一种以俄国为榜样的彻底的革命政策。

在法国，到1918年夏季时<sup>①</sup>，以让·龙格为首的少数派已经成了多数派；这个变化彻底改变了协约国社会主义者的意见的力量对比。因为迄至那时为止，法国和比利时一直是召开一次斯德哥尔摩式的社会党会议——包括德国社会党的代表在内——的主要障碍；而阿瑟·汉德逊尽管遇到了重重困难，却在英国取得了支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微弱多数。到1918年秋天，中欧强国的抵抗终于瓦解，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了革命，这时，除比利时以外，再没有坚决反对同德国人会晤的了，尽管还有很多人坚持要求德国社会党人必须到一次国际会议上准备承认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政府所犯的战争罪行。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斯德哥尔摩已不再被考虑作为会议地点——特别是由于它已丧失了俄国的支持；而对西欧各党的领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迅速在一个中立国家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讨论社会主义者对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的态度，并至少为重建一个社会党国际打下基础。

1919年2月举行的伯尔尼国际会议从形式上来说，既不是与战前的社会党国际对立的一个组织，也不是1917年斯德哥尔摩计

---

<sup>①</sup>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466页。

划的结果。召开这次会议的通知是由1918年3月协约国工党和  
社会党会议上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发出的，它与比利时籍的国际社  
会党执行局书记卡米耶·胡斯曼关系密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他还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主席）、阿瑟·汉  
德逊、阿尔贝·托马——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  
——这些人全都在战时联合政府中担任过部长，并曾积极参加协  
约国社会党人关于战争目标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伯尔尼会议的目的  
是要实现公开宣布过的意图，即：世界社会主义的代表应当与官  
方的和平会议同时开会，并应向和平会议传达国际社会主义和工  
人阶级运动关于和平解决方案和关于未来的国际关系结构的主  
张。由于这些主张既有工业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包括通过一  
个国际劳工宪章，以规定工人阶级组合的权利和最低限度的雇佣  
条件，因此，看来重要的是，伯尔尼会议应当包括来自各国工会运  
动的代表，以及工党或社会党的代表；并据此以平等的条件同时  
对双方发出邀请。然而，在战前的国际里，在有些情况下，同一个  
国家可以有几个对立的政党或其他团体的代表；而伯尔尼会议发  
出的邀请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给每个国家的一个政党和一个工  
会中心。对英国来说，其结果便是不让曾以各自的名义作为第二国  
际成员的独立工党、英国社会党和费边社有各自的代表，而让它们  
都参加了的英国工党去决定，如果它认为合适的话，可在它的代表  
团中包括这些团体的成员。之所以采取这个引起有关的社会主义  
团体很大不满的排他性作法，部分地是由于1917年英国工党代表  
会议曾坚持认为，这些团体不应有代表出席当年计划召开的斯德  
哥尔摩会议的结果。关于只邀请每个国家中的主要的工会中心的  
决定，也排除了工会总联合会（前已提及，它曾代表英国参加战前  
的工会国际），而把代表工会的权利只交给职工大会，而说来可笑  
的是，它曾经与战前的社会党国际而不是与工会国际有着联系。就

美国而论，曾经积极参加建议通过一个国际劳工宪章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受到了邀请，但拒绝前来出席，因为它不愿在友好地条件下同德国代表会晤。比利时工党和它所属的工会中心以同样的理由拒不接受邀请。

还有其他以各种不同理由拒绝参加的情况。曾经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意大利社会党和瑞士社会党，反对由协约国中“爱国派”社会党人主持召开的会议；塞尔维亚社会党和罗马尼亚社会党以同样的理由置身会外。在保加利亚，以扬科·萨库佐夫为首的“广义”社会主义者接受了邀请，而正在改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过程中的“狭义”社会主义者则拒绝参加。然而，代表意大利人的是列奥尼达·比索拉蒂（1857—1919）和伊万诺埃·博诺米（1873—1951）的少数派改良社会党，这两人于1912年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曾支持意大利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总共有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伯尔尼会议，还有两个代表团——澳大利亚和乌克兰——不在此数，它们到达得太晚了，未能参加会议。其代表团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荷兰、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西班牙和阿根廷；派有代表团的还有俄国、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意大利、巴勒斯坦犹太人，爱尔兰、加拿大和阿尔萨斯—洛林——最后这个地区正在由德国转为法国统治。俄国代表团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但不代表布尔什维克或左派社会革命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代表团的组成情况相同。波兰人代表皮尔苏茨基的波兰社会党，而不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事实上，没有共产党或与共产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政党的代表参加，只有挪威人例外，他们的左翼已经在不久前控制了党的机器。

伯尔尼会议于2月3日开幕，选举瑞典的领导人亚尔马·布



兰亭(1860—1925年)为主席,他曾经担任过筹备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的主席。阿尔贝·托马(1878—1932年)属于法国的右翼,几个月以前,这一翼在法国党内失去了多数派的地位,他立即建议优先讨论社会党的战争责任问题——即主要是优先讨论出席会议人数众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战争罪责”问题。托马进一步建议第二项议程应当是讨论民主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即是说,关于以议会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些建议被采纳了,关于社会党人的战争责任问题的辩论,占去了头两天的日程。这个问题显然是棘手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来自协约国的某些代表们将拒绝继续开会,除非能使德国人多少承认一些“战争罪责”,另一方面,不能指望德国的多数派会宣布自己有罪,无论他们可能准备对他们刚刚协助推翻的德意志帝国政权加上什么样的罪名,他们也不会那样做。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设法让德国人声明:新的革命的德国坚决与应对战争负责的旧政权一刀两断。由于这个声明,大家同意留待“将来在正常情况下召开的一个国际代表大会去肩负起对战争责任这个世界历史问题作出国际的判断的任务。”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得以在这次会议剩下的日子里以平等的身份自由参加;而且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此束诸高阁,因为如果一个新的国际建立时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作为其成员的话,这个问题也只能束诸高阁。

然后,伯尔尼会议便转入讨论“民主对专政”的问题。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委员会起草了两个对立的决议案——多数人同意的“布兰亭”决议案和少数人同意的阿德勒—龙格决议案。头一个决议受到大多数代表团的支持,它强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不可分割性,谴责“专政”,言外之意就是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政策。用议会政治的词句明确阐明“民主”的定义如下:“构成民主制度的

一些制度——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的权利、普选权、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采取措施来保证公众的合作和尊重人民的愿望、结社的权利，等等——这些也会给工人阶级提供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另外一段写道：“要实现一个社会主义愈来愈深入的改革的社会，必须以民主的胜利为基础并植根于自由的原则，否则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长期确立了。”这个决议虽然在开头时“欢呼”革命“在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胜利，已经摧毁了旧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并推翻了它们的政府”。但是，说完这几句以后，它紧接着宣布：“为了完全符合以前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伯尔尼会议坚定地遵循民主的原则”——然后它继续阐明了这些原则。在表明了总的态度之后，这个决议接受了俄国代表（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的建议，即应派遣一个“代表所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团去俄国，以便“将那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向国际报告”。它还进一步建议：应将布尔什维主义这个问题列入下一次会议的议程中，在那次会议上将要收到这个代表团的报告并加以辩论。

与这种公开谴责布尔什维主义的作法相反，那个对立的阿德勒—龙格决议一开头便抗议并警告将“任何种类的罪名加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头上”的作法。这并不是为布尔什维主义辩护，它宣称：“我们（即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足够的材料来作出判断”。“我们不希望，”这个决议继续说，“由于对政治方法做出不成熟的判断而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玩弄谋略和有意诽谤的牺牲品。”决议的提案人宣称他们不能光是听信俄国代表们的说法，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俄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少数派”——尽管这些代表们的忠实信仰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这个决议草案提醒人们注意：由于意大利、瑞士、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党的缺席，伯尔尼会议并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并警告会议不要做出任何可能使召开一次所

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会议更加困难的事情。“我们希望为所有国家的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政党保留自由参加国际的权利。”这样，少数派就宣称，他们拒绝受整个布兰亭决议案的词句的约束。

这个少数派的决议案，受到了法国多数派——一直到不久以前还是少数派——和挪威、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代表团以及奥地利代表团的半数和一个希腊代表的支持。另一方面，支持布兰亭决议案的有英国人、德国人、瑞典人、丹麦人、芬兰人、匈牙利人、俄国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的“广义”派、加拿大人、阿根廷人、阿尔萨斯—洛林的代表、法国少数派、意大利改良社会党人和奥地利代表团的一半。虽然这个多数派由于俄国和以前受俄国统治的边界国家的代表团的投票而变得更多了，但它的核心是由英国人、德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以及仍然不容忽视的法国少数派组成。本来会跟着多数派投票的比利时人缺席；但是意大利多数派和瑞士人也缺席，据推测，他们是会投票赞成阿德勒—龙格决议案的。布兰亭决议案的主要结果是不仅同右派决裂，而且也坚决同共产主义左派决裂了。同右派的决裂是列宁及其支持者从1915年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以来一直呼吁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中间派，它要求重建一个兼容并纳的国际，暂时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专政；而突出的问题是：鉴于两个极端派都不肯妥协，这个中间派究竟应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然而，伯尔尼会议并不象上面所概括的那样已无法挽回，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因为在那个建议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访问俄国归来后，整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辩论——如果说这个委员会真的能去那儿的话。伯尔尼多数派则拒绝把它在会上对专政的谴责和它赞同议会民主的声明推迟到调查委员会完成其工作以后。

处理完这些“先决问题”之后，伯尔尼会议才专心致志去完成

赋予它的主要任务——起草社会党和工会向官方的和平会议提交的意见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设立了三个委员会——一个研究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一个研究领土问题，一个研究拟议中的国际劳工宪章。关于这一系列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伯尔尼会议满足于起草一个非常笼统的决议草案，主张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把如何具体实施这个原则的工作留待以后去做，或者由将来召开一次会议去做，或者由伯尔尼会议所设立以继续它的工作的一个常设委员会去做。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伯尔尼会议宣称它赞成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以一项体现公正解决的和平条约为基础，并将在平等的条件下包括所有的，或将成立的以民族自决和自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国家。然而，伯尔尼会议所鼓吹的国际联盟，在一个主要方面完全不同于由巴黎和会所实际产生的国际联盟；因为组成它的各国代表团将不是由各国政府派遣，而是由成员国的议会派遣，而且这些议会代表团应当按照各政党的议席数目由议会中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因此，伯尔尼会议所公开要求成立的，不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或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而是一个由代表所有拥有议会机构的民主国家的舆论的国际代表大会所控制的联盟。显然，这样一个代表大会，由于控制了国际联盟，必将损害国家主权，实际上将是走向国际政府的一个步骤。如果认为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在1919年的情况下能够接受任何这样严重背离它们的民族独立传统的事情的话，大概是异想天开；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实际上建立的各国政府联盟，丝毫不能体现哪怕是右翼社会主义者关于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各国之间的和平的国际机构的愿望，也丝毫不能作为一个向国际社会主义秩序转变的工具。

由某些国家的工会代表所组成的伯尔尼会议的第三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国际劳工宪章，准备提交和平会议，以便写入和平条约中。这个宪章的内容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劳工立法委

员会，作为国际政府这个新机构的一部分，它不仅包括参加联盟的各国的代表，而且包括这些国家的全国性工会中心的代表，两者的数目相等。关于保证所有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原则，包括承认人们普遍有工作或维持生活的权利，将体现在拟议的宪章中，并将被认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政府具有约束力。由于这个建议的结果，1919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建立了国际劳工组织；但是，就是在这件事上，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达不到伯尔尼会议的要求——因为这个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由三方组成的机构，工人和雇主的代表人数加起来等于政府代表的人数，而且其权力只不过是达成达成的各项协议提请几个成员国的政府通过施行。

最后，伯尔尼会议由于认识到它不可能立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党国际，试图为这样一个机构打下基础，即选出一个常设委员会，由每个国家各出两名代表组成，担负的双重任务是：继续伯尔尼会议的工作，仔细推敲它的决议，并将它们提交和平会议，为再召开一次会议作准备，在那次会议上肯定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在这个常设委员会之下，任命一个由三人——布兰亭、汉德逊、胡斯曼——组成的执行局，负责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处理日常工作。1919年4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除上述三人外，又增加了四个执行局的成员。其中两人——拉姆齐·麦克唐纳和邮政工人联合会的G·H·斯图尔特—邦宁（1870—？）——是英国人，另外两个——让·龙格和皮埃尔·勒诺德尔——是法国人，代表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如前所述，比利时工党曾经拒绝出席伯尔尼会议，却派代表参加了阿姆斯特丹会议，因而重新加入了这个新的酝酿中的国际。然而，意大利党和瑞士党仍然置身会外，就象曾经拒绝了伯尔尼会议邀请的美国人 and 东欧各党一样。

正当上述重建社会党国际的步骤由主要是西欧的议会社会

主义者主持进行，并得到俄国和以前臣服于俄罗斯帝国的那些国家内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时，布尔什维克急忙将他们建立一个国际的对立计划付诸实现，这个国际将肯定排除所有战争期间的“社会爱国者”和那些主张实行改良政策而反对革命政策，或主张实行议会主义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政党和团体。但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在别国的追随者在191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处于不利地位，不能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对立的国际，甚至无法召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西方国家隔绝，甚至在同国外潜在的支持者进行联系时也不能不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前沙皇帝国之外，仅仅有几个国家存在着比萌芽状态稍强一些的共产党，而且，它们即使存在的话，也仍然非常软弱，如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情况。在大多数国家里——例如在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挪威和荷兰——右的和左的主要力量仍然在同一个党内打内战，或者，如在瑞典、巴尔干和美国那样，虽然已经存在相互对立的右翼党和左翼党，但左翼还没有明确是共产党，至少在名称上没有明确。除苏俄外，有真正的共产党存在的唯一国家是波兰，也许还有乌克兰和德国，尽管某种形式的共产党也存在于匈牙利、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此外在很小的规模上存在于奥地利和亚美尼亚，而在保加利亚则早就形成的“狭义”社会党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其他地方则只有分散的小组存在，尽管已经采取步骤在别的一些国家里建立共产党。 299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甚至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认为试图立即建立一个对立的共产国际还为时过早。然而，也有强烈的相反意见。正如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仍然相信的那样，世界革命迫在眉睫，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只需要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革命领导以促使危机爆发，显然，应该刻不容缓地提供这种领

导，并应不遗余力地使工人脱离那些正在竭尽全力阻止革命爆发的改良主义领袖们。显然，布尔什维克似乎应当竭尽全力来阻止重建旧国际，领导这个国际的自然还是那些人，他们曾经在1914年背叛了它，彼此混战四年之后，现在又忙于在共同对付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的基础上重新言归于好。伯尔尼会议不可能不受到挑战；而除了立即着手将反对它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力量置于唯一的一个已经真正将社会主义革命付诸实践的大国领导之下以外，如何能向他挑战呢？

这种论点占了上风。1919年1月24日，从莫斯科发出了一份  
300 致所有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无线电报，呼吁他们派代表参加将于3月在那儿举行的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目的是建立一个“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邀请是以俄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出的，得到了波兰、拉脱维亚、芬兰、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共产党以及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支持——美国社会主义工党也在邀请书上署了名，尽管它除了通过它那居住在俄国的代表赖因斯泰因外，根本没有机会表示赞同这项邀请。还有，据说与邀请书同时发出的第三国际纲领草案是“与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的纲领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一致的”。这个纲领包括十五条，讲到新的国际所据以建立的原则和拟议中的组织形式。其目标是：鉴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即将瓦解，必须立即普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将包括：(a)夺取政权，以便在每个地方用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代替之；(b)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将无产阶级普遍武装起来，以便确保革命的安全；(c)运用专政来镇压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并将这些生产资料转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管理下的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建议采取的方法是“无产阶级采取大规模行动，直至与资本主义政权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以下有七条规定了新的国际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计划成立的“伯尔尼国际”被谴责为是一些

完全不同的团体和派别的一种机会主义的结合，它们明显地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老的“社会爱国者”，他们应该受到无情的谴责，因为它们在危机时刻总是反对革命。第二种是“中派”，主要包括战时的少数派团体，例如法国的龙格及其追随者，德国的考茨基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它们的特点是由“动摇”<sup>301</sup>分子组成，不能采取坚决的态度。它们的领袖应当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应尽一切力量对它们进行分化、瓦解，以便把那些革命分子争取到共产党一边来。第三种是那些革命团体，可以说服它们同共产主义共命运。这最后一种人不仅包括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还包括革命的工业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实际上，包括所有工人阶级的小组和组织，它们虽然没有公开加入左派革命运动，但从它们的发展来看，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左倾。最后，纲领规定这个新的国际应当命名为“共产国际”，应当把它建成一个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组织，其基本指导原则是：“每个国家里的运动的利益，应服从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普遍利益。”这样，计划建立的共产国际，不是一个以旧的国际为样板的独立的各国党之间松散的联盟，而是一个指导整个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的集中控制的权威机构。在社会主义和国际活动问题上两种根本矛盾的概念之间的斗争，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从当时的主要情况来看，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要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仍然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对那些已经存在的这样的团体的代表们来说，也很难取道前往莫斯科。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团体无法举行会议来委派它们的代表。有些代表甚至无法启程，有些人则在途中被扣留或逮捕。结果，19个党或团体获得了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的表决权，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代表们的立场犹豫不定。例如，美国社会主义工党虽然被给予最大限度的表决权（5



票)，却没有授权给它的所谓的代表；获得了 3 票表决权的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共有 11 个公开的共产党，总共获得 29 票表决权——俄国和德国各 5 票；乌克兰、芬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各 3 票；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 1 票。挪威社会民主工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瑞典左派社会党和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各 3 票，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则如前所述有 5 票。最后，在俄国的德意志侨民区的共产党和俄国东方民族集团各 1 票，还有 5 票留给 1916 年昆塔尔会议上建立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组织。这个临时性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组织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宣告结束，它的职能转给了新建立的共产国际。

除了这些拥有表决权的代表以外，莫斯科代表大会还包括相当多的人以没有表决权的谘询代表身份参加。这些人来自许多没有正式代表的国家，包括英国（约瑟夫·法因贝尔格）、法国（雅克·沙杜尔）、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波斯、朝鲜和中国，还有一些人来自各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以及来自一些曾经是沙皇帝国一部分的国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斯坦。还有少数来自瑞士和美国的个人。此外，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娃以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

在莫斯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有些人怀疑：鉴于这次代表大会代表性肯定不足，而且现有的许多社会党内部情况混乱——例如在法国、意大利、瑞士和美国，因而立即宣布着手组织一个新的国际是否明智。在上述这些党内，似乎可能赢得拥护共产主义的多数，从而使现有的党的机构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显然是对运动中的革命派极为有利。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立即建立共产国际是否会损害取得这种胜利的机会呢，还是会有助于取得这些胜利？起初，主要是德国人主张推迟，大部分原因是目前的德国共产党——新名称是斯巴达克同盟——需要考虑它对待德国独立社

会民主党的立场，该党是革命分子和议会分子的混合体，而其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帮助对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斯巴达克同盟分子想通过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成员拉到共产主义一边，同时排斥其议会分子，并接管它的报纸和它的中央及地方组织，来分裂该党。他们担心，如果建立新的国际，在德国只有斯巴达克同盟分子参加的话，其结果可能疏远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从而帮助议会领袖们——例如考茨基——继续控制该党。然而，俄国人决心干下去，而且，由于代表大会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因此把由一位主要的德国代表阿尔布雷希特提出的反对意见置诸不顾。1月间与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同时从莫斯科发出的一个呼吁书中，有一份包括39个党和小组的名单，建议它们“参加第三国际，拥有完全的表决权”，因为它们“完全接受它的观点”。这份名单中包括11个已正式建立的共产党（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荷兰），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保加利亚“狭义”社会党，意大利、挪威和罗马尼亚的整个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党，丹麦的“阶级斗争”小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英国社会党和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正式建成单独的党），捷克社会民主党、比利时工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中的，以及爱尔兰的“革命分子”，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美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特别是那些以尤金·德布斯为首的人，以片山潜为首的日本社会主义小组，“在基本问题上与洛里欧意见一致”的法国社会主义小组和工会小组，还有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英国<sup>304</sup>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工长运动中的革命分子”，最后，还有维利·明岑贝尔格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

这的确是“革命”团体的大杂烩，它十分广泛，甚至包括敌视议会政治活动的工团主义者（但排斥无政府主义者）；但同时又非常

狭窄，甚至连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新的龙格多数派和英国独立工党这样一些重要团体也丝毫没有提到。当然，不让它们参加，并不意味着不同这些团体进行旨在将它们中的多数人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谈判；但是拟定这份名单的目的在于明确承认那些包含在名单中的团体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意大利社会党的情况——其用意显然是期望左翼多数派清除右翼分子，以便履行他们在促进世界革命方面被指定的任务。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清除右翼分子的问题，对一些有关的党来说，在决定是否同意它们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上，将要起最重要的作用。

尽管在莫斯科作出的决定赞成立即建立新的国际，但是人们认为当时当地就给它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是不适宜的。在这方面，除了给共产国际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外什么也没做，这个执行委员会由来自“每个最重要的国家”的共产党的各一名代表组成，这样的国家首先是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瑞士，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这个执行委员会将选举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局，而且，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尚未到达之前，“执行委员会驻在国”（即俄国）的共产党人将负责国际的事务。这两个机构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充分的行动权力；执行委员会将起草章程草案全文，准备提交日期尚未确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

除了这些有关成员和组织的问题外，1919年莫斯科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批准一个新的《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是1848年宣言的继承者，准备将它发行全世界，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首先是不久以前参加伯尔尼社会党会议的那些党——的挑战。这个宣言不久就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历史性文件；但在起初，很多人怀疑它是否是真正的原本。它于1919年3月10日印行，即在莫斯科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四天，签署的有5

个人——俄国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巴尔干联盟的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瑞士的弗里茨·普拉廷——这也就是签署过《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参加者宣言》的5个人，这个宣言被提交给莫斯科代表大会，宣布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终结。因此，这五人便成了第三国际的首批公开发起人。

对任何一个研究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当他今天阅读1919年的《共产党宣言》时，便会发现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没有明确地谈到共产党在每个国家中进行革命时所起的作用，也未谈到革命将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疑问，这种省略主要是由于强调革命基本上是国际性质的，和强调国际本身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中央控制机构的作用。各国共产党显然必须完全服从国际的控制权威，与第二国际在这方面仅仅是各国独立的社会党之间的联盟组织形成鲜明对照。然而，仍然突出的是，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完全强调苏维埃作为革命工人的群众机构，而几乎绝口不提共产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真正的分歧，而列宁是坚持在组织革命的起义时要把党放在主要的地位上。<sup>①</sup>《宣言》的说法是：“凡群众已经觉悟的地方，就要组织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苏维埃）”，“当这些苏维埃获得了劳动人民中大多数人支持时，通过这些苏维埃，工人阶级将会最容易地和最有把握地在所有国家赢得政权。通过这些苏维埃，工人阶级在一旦获得权力后将控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所有各方面，正如在苏维埃俄国一样。”这里并没有暗示说，在任何国家，与苏维埃不同的共产党，将要起特殊的作用。它规定：“在苏维埃制度中，群众组织进行统治，并通过这些组织，群众本身也和委员会即苏维埃一样，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国家行政管理；也只有通过

---

<sup>①</sup> 见本卷第84—85页。

这个过程，整个工人群众才能逐渐变成政府的一部分。此外，苏维埃制度，正如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一样，直接以委员会本身，以革命的工会、合作社等等为基础。……苏维埃制度以这种方式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

实际上，唯一的一段谈到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共产党一词没有用复数，因此不是具体指哪些共产党，而是极其意味深长地指“国际共产党”，它的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并“建立起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结构以取代它”。所有国家的男女工人被号召“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它是已经取得初步伟大胜利的象征。”然后《宣言》继续说：“在工人委员会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整个的重点一方面放在苏维埃上，它将到处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权和自治的直接工具；另一方面放在共产国际上，它将作为一个中央的和实行集中制的领导机构，首先是进行革命，然后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合作联邦，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友爱和自由。”《宣言》的结束语是：“工人苏维埃的国际共和国万岁！”

因此，整个《宣言》变成了一个号召进行世界范围革命的呼吁书，这种革命被认为是超越国界的一个单一的大规模运动。它坚持认为：“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予巨大推动力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来说，已经是过于狭窄了。”它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国要想取得独立乃是幻想，而主张民族自决的“威尔逊计划”具有“伪善性”；它提出：“唯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保证小国的生存，这个革命把所有国家的生产力从民族国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它把各国人民团结在以普遍的经济计划为基础的最紧密的经济合作中，使小国和弱国人民能够自由而独立地发展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不会损害欧洲以至全世界的统一而集中的经济。”

尽管这样一再坚持世界革命乃是唯一的目标，而且坚持必须超越只由各国采取行动而造成的局限性，但是，当《宣言》为具体的共产主义纲领下定义时，却无法避免提出一些从内容上说大部分是属于各个国家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是直接与在那些落入无产阶级政权手中的各个国家内采取建立新秩序的行动有关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它说，“在于文官政府及其由资产阶级一容克贵族军官控制的资本主义军队、它的警察和宪兵，狱吏和法官，它的传教士，政府官吏等等。”它声称，夺取政治权力，“不仅仅是更换各部的人事，而是消灭敌人的统治机器；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白卫分子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撤换所有资产阶级法官，组织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法庭；清除反动政府官吏的控制，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新的管理机构。无产阶级的胜利，包括粉碎敌人的组织和组织无产阶级政权，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当然，这是列宁在布 308  
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不久所写的著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中已经确立的原则。它明确规定要用以专政原则为基础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虽然这样的无产阶级国家注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合并成一个“国际工人共和国”，但必须首先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同样，《宣言》中规定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和生产的社会化”所要采取的措施，也首先要以一国一国的方式来实现。它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号召瓜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相反，它的目标是进一步使生产力集中化并使所有的生产服从于一个有组织的计划。”《宣言》接下去号召，“作为第一步，”是将大银行，将政府控制的一切经济事业和公有企业，将“辛迪加式的和托拉斯式的生产单位，以及所有其他生产部门社会化，只要在这些部门中资本集中的程度足以使社会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进一步将大型农

庄转变为合作社，消灭“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对人民的剥削，把大型的楼房移交给当地的苏维埃，并让工人家庭搬进资产阶级的住宅中去。”与此同时，它谨慎地反对任何企图没收小量财产或剥夺“不剥削劳工的财产所有者”的作法。在分配领域里，它是谨慎的，只是说：“下列作法将予以考虑——批发公司的社会化；接管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和城市的分配机构；控制大型合作社，因为它们仍将起重要作用”；以及“逐步对所有这些组织实行集中化，并把它们转变成负责全国产品分配的一系列单位。”它还以总结的方式说：

309 “在这个伟大的过渡时期，苏维埃政权必须不断把整个行政组织变成一种比较集中的机构，但是，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分子直接参加政府管理。”

这样，《宣言》充分地重申了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所强调的经济集中化和生产与分配的集中的国家计划，同时鼓吹必须使新的国家机构民主化，方法是让工人的群众组织参加管理的任务，并使属于工人阶级的人越来越多地参加这种管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写道，“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集中化的管理机构并实行工人管理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在这里，工人管理”这个词显然不是指建议工人在具体的产业部门或企业里实行工业自治，而是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对整个生产机构实行管理。伯尔尼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曾经宣称：“真正的社会化意味着在民主管理下经济活动的不同部门有条不紊地发展。由人数很少的工人专横地接管少数公司的作法不是社会主义；它只不过是许多股票持有人的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是针对共产主义者说的，而是针对工团主义者和其他产业主义团体而说的，这些人被指责为要求“矿山归矿工所有”，或者提出类似的口号，要求“全部劳动产品”归个别的工人团体所有。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不是整个“人民”而是整个工人阶级才是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单位，整个问题是

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的角度来看待的。

但是，在这个《宣言》中，无产阶级专政被说成“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制度。”“随着资产阶级反对的被粉碎，随着资产阶级的被剥夺和被逐渐吸收入劳动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了，直至最后国家消亡和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还有，“无产阶级作为人民中的压倒多数，通过它的群众组织和通过它的苏维埃来公开行使其阶级权力，以便废除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改造成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联邦。”<sup>310</sup>

人们可以有正当的理由问道：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是“人民中的压倒多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显然，就工业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说真有任何国家是这样的话，那也只是极少数。在大多数国家里，组成人口大部分的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工人和依附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或种植园的人们，通常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匠，和从事各种“白领”工作的其他非雇主；而在大多数最先进的国家里，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和职员形成一个人数非常可观的少数，这些人绝大多数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毫无联系。因此，“无产阶级”一词在这里必须从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包括在阶级斗争中可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一切人群——农民，或者至少是贫农以及农业工人；大部分职员以及体力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匠，以及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在《宣言》的其他地方，工业无产阶级与这个在较广泛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有严格区别的。

《宣言》说，“无产阶级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在内，不论他们的职业或政治成熟程度如何——这是一种有伸缩性的组织形式，它能够不断更新自己，不断扩大和把新的成份吸收进来，随时向城市和农村中接近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体敞开大门”。在这里，“无产阶级”一词似乎是，至少主要是指产业



工人，其他群体被说成是接近它或亲近它。苏维埃在开始时主要是产业工人的工具，但被认为其本身有能力满足整个劳动人口的需要。《宣言》在稍后说，“苏维埃制度实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而且还说，“工业<sup>①</sup>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中获益，因为它是最有进取心，组织得最好和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在它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和小农将逐渐成长。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暂时的特权，使小农摆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控制，并把他们训练成为建设共产主义体制的助手。”因此，看来只有当这种训练的过程已经在产业工人的指导下完成后，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压倒多数”。从上面可以看出，在这段文字中，被描写成一个“阶级”的是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未来扩大了无产阶级。

在所有这些地方，使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但基本思想是相当明确的。有组织的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组成革命运动的先锋队，这种工人的全体组成无产阶级本身并构成积极创建苏维埃的基础。但是这种伸缩性很大的组织形式，很快表明它适合于作为传达其他有不满情绪的人群的忧虑和要求的工具，特别是对大部分来自农业人口的士兵和对农民或无地的农业工人来说是如此。结果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委员会，即苏维埃就结成了联盟，成为新的工人国家的基础；而这种形式的国家，一旦建立以后，就能够把其他过分落后，或在效忠于谁的问题上分歧很大的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在革命方面起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对产业工人、士兵和农民（或与“富”农相对的“贫”农）在革命中的相应作用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曾经抱不同的看法。但是，毫无疑问，意识形态领导者和革命突击队的角色主要是赋予工业无产阶级。至于工匠们和小规模的工

---

① 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业生产者，他们同小农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一道，“将逐渐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组织中来，方法是通过榜样的力量，通过实际显示新秩序的优越性，和通过那些使（他们）……免于受高利贷资本和地主所有制的经济束缚和免于赋税的重压——特别是由于宣布国债不再有效——的规定。” 312

在转变到新社会的过程中，现存的民族和国家的界线究竟在什么时候消失，《宣言》中没有任何地方讲明这一点；既然它的作者们也只不过是假装具有预见革命进程的专门知识，它也就无法试图讲明。但是有一处顺便提到“工人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国家”，说明并不指望革命在世界所有部分同时发生，尽管在所有地方均将发生同样的过程，为革命铺平道路。不论在时间先后上有多么不同，它基本上属于同一次革命，因为它是一个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问题，这种秩序已经从根本上被破坏，不可能重新建立起来，为未来的一种可行的制度提供基础。

这种关于战争已经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绝不可能复兴的说法，在《宣言》提出的一般论据中十分突出。在开头的几段中，它回顾了71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并说“最后决定性战斗的时代，比社会革命的倡导者们所预料和希望的要来得晚一些”，然后，它接着毫不含糊地说，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共产党人当前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实际革命经验，清除混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并团结一切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以便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有一段回顾了第二国际关于资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世界引向战争的预言，从而提出共产国际的警告说，战争将导致革命，即“无产阶级对军国主义罪行的反击。”《宣言》进而指责德国的“社会爱国者”，在充当了德皇的帮凶之后，又同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勾结在一起搞“庸俗的阿谀奉承”，“企图抹掉对他们自己的罪行的回忆，和博得战胜国的好感。” 313

然后它转而同样激烈地攻击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统治者们由于揭露了1914年战争爆发前的一些外交事件而暴露出的“罄竹难书的无耻行径”。它说，“伦敦需要战争”，因为它希望除打垮德国之外，还可使法国和俄国筋疲力尽，从而使英国处于完全的优势地位；而如果德国过分强大难以打垮的话，美国在欧洲问题上，就会处于英国在以前历次战争中所处的、而且在1914年仍想处的那种地位。”它指责英国人故意使德国人产生错觉，认为他们会置身战争之外，希望以此防止德国在危急时刻退缩。

然后，《宣言》大肆渲染欧洲所遭到的破坏，通过抹煞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工人们所得到的一切显而易见的利益，和赤裸裸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辩称：其后果证实了那种引起很大争论的“日益贫困”的理论。它指出：财政资本本身由于通货膨胀和“纸币的完全贬值”而经历着灾难，“它现在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全面的致命危机。”它继续争辩说，以前由资本主义托拉斯和垄断组织行使的范围越来越大的控制，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已经由对供应和生产的军事控制所代替。“所有这些世界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通过自由竞争来调节，也不再是通过国内和国际的托拉斯的联合来调节，而是通过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来控制。由于国家的权力完全服从于财政资本的目的，从而，经过大规模屠杀，不仅使国家完全军事化，而且使财政资本本身也完全军事化，与此相同，它（财政资本）除了通过流血和破坏的手段以外，不再能执行它的主要经济职能。”

然而，《宣言》的作者们说，“机会主义者在战前以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为名，鼓吹工人应当采取温和态度；他们在战时以“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名义要求工人服从，现在又要求工人们自我克制，以便克服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果工人们听信这种说教的话，资本主义将会在“接连几代的白骨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和

更加庞大的机构，导致一场新的和不可避免的世界战争。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这再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这种结果被认为不可能呢？《宣言》作出的回答很不明确。它只不过说，“唯一的问题是，未来国家生产的支柱是什么，是帝国主义国家呢，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并且争辩说，只有后者能够“在几年之内医治好由战争引起的公开创伤，并把人类提高到现在作梦也想不到的高度。”随后有一段谈到：民族国家不合作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威尔逊式的民族自决的概念的虚假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的统一和集中的经济”中“保证小国生存的唯一手段”。

然后，《宣言》谈到殖民地问题。它指出帝国主义大国是怎样将他们的殖民地强行拖入战争的，其结果是“在所有的殖民地里都发生一系列的公开反抗和革命骚动。”它列举了爱尔兰、马达加斯加、安南和印度作为突出的例子。《宣言》指出，“在比较先进的殖民地里，战争不仅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进行，而且带有公开的和明确宣布的社会性质。”它声称，殖民地的解放只有通过压迫别国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获得。”并说，“社会主义的欧洲将以它的技术，它的组织，它的精神影响力帮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以便实现有秩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但是，所有这些无非还是重复关于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复兴的这种并没有根据的论调。其实，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这种说法需要新的证明。他们认为这种说法的证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就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已经开始。他们满怀信心，认为世界革命已经开始并且势不可当，除了最后关于无产阶级起义的争论以外，其他已无进一步争论的必要。

从这一点出发，《宣言》继续揭露所谓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存在

着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说法是欺人之谈。“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指责共产党人破坏自由和政治民主”；但是实际上，“无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权（例如在俄国），只不过是主张采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已完全不可能，并为实行更高水平的工人阶级民主创造条件和方式。……在不仅生产和交通手段而且政治民主制度都已被摧毁并处在血泊之中的残垣断壁上，无产阶级必须创造它自己的形式，首先作为团结工人阶级的纽带，并使它在未来的人类发展中完成进行革命干预的任务。”这种新的形式就是苏维埃，一种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工具<sup>①</sup>。而且，随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同时出现了帝国主义所征召的庞大军队的分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正在过渡到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这种内战是“劳动阶级的主要敌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发展。”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要“让它出现”，而是要“尽可能地缩短它的时间，减少它的受害者的数目，而最重要的是保证无产阶级获胜。”这就有必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组成一支共产党的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可侵犯性。这就是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它与苏维埃国家是不可分的。”

316 《宣言》随后说，国内战争是革命的一个必要部分；因此，不仅必须对“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国家的附庸工具的工党”进行无情的斗争，而且必须对“现在正在企图复活第二国际的动摇不定，变化无常和优柔寡断的社会主义‘中派’”进行无情的斗争。这个“中派”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目前的多数派、俄国的孟什维克集团、英国的独立工党，以及类似的团体，它们“由于主张调和和妥协而存在，从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拖长了危机的时间，

---

① 见本卷第75页。

结果是增加了欧洲的不幸。”“反对社会主义中派的斗争是战胜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第三国际是公开进行群众行动的国际，是革命实践的国际，是行动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已经充分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丑恶。国际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推翻这种秩序，并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以替代它。……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宣言》的本身就是这些：附在它后面的是纲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所述。它主要是谈夺取政治权力的问题，剥夺资产阶级和生产社会化的问题；在它的结束部分，则是谈“取得胜利的道路”。它重申保证“支持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便加速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崩溃”，这与“社会爱国者的黄色国际”的态度相反；它声称：“革命的时代迫使无产阶级使用战争的手段，这种手段将集中它的全部力量——即群众行动及其必然的结果，即与政权机构在公开斗争中直接冲突。”它还说，“所有其他的方法，例如革命地运用资产阶级议会，只不过具有第二位的意义。”

正当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在巴黎集会制订他们的专横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正当法国和英国社会党人中的议会主义者刚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一起开会并采取第一个步骤以建立一个肯定是议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国际的时候，提出这种直截了当的挑战，于是就发动了一场争取控制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大规模斗争。正如不久以后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它不仅完全低估了资本主义复兴的力量，而且同样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立即进行革命的可能性；不久，新的共产国际就被迫承认，实际上，它在两方面都估计错误了。但是，基本的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来说，正如在他们之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承认他们把世界资本主义“最后危机”

的时刻判断错了，从而把世界革命的时刻判断错了，比起承认这两大事件即不能科学地预见其必然发生，也并非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来到；要容易得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毛病——二十年代的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和失业——似乎证明了旧秩序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恢复；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发展的限度，越来越无法从每次接踵而来的周期性危机中恢复过来，特别是面对主要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日益增加的不满，面对中国和印度以及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而对同 1914 年以前相比一般来说力量已经壮大了的工会和劳工运动，情况更加如此。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的出现，可能多少打击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将要接替衰落的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是，共产党人却自我安慰地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衰落中的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是无法解决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任何根本矛盾的表现。关于资本主义由于它日益发展的矛盾而必然要崩溃和社会主义必然要继之而兴起的信念，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成分，因此是不容怀疑的，即使事实已很明显，不得不承认“最后的危机”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成熟，而且就在这时俄国

318 人除了试图“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外别无其他选择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无疑在开始时就已经感到这样一个任务是他们无力去完成的。

无论如何，俄国人在 1919 年时满心以为资本主义注定要迅速崩溃，而世界革命行将到来；他们在其他国家里的许多支持者也有同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南欧和东欧。如前所述<sup>①</sup>，在德国，对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怀疑，即使在共产党人当中，尤其是德国独立社会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28—129 页。

民主党的左翼成员中亦是如此；而在法国，更甚的是在英国和美国，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当中，也很少有人真正相信——至少是长期相信——他们能够很快进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或者甚至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然而，在这些国家里，那些清楚地知道当时他们没有能力进行革命，而且实在无法试图按照第三国际关于武装起义的概念行事的共产党人，并不因为这种看法而使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或者不相信世界革命必然会按时来到。他们只是由于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从而使他们把保卫俄国革命免受敌人侵害，把等待有朝一日他们将可能按照莫斯科的概念行事，做为他们的高于其他一切的任务，而且与此同时，尽他们一切可能来破坏和削弱资本主义秩序，并破坏工人们对于改良主义领袖们和“动摇分子”的信任，因为这些人试图保持一种“中派”立场，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拉回到一个兼容并包的国际中来。

共产党人对“中派”的这种敌视，实际上是1919年莫斯科代表大会上的关键问题。共产党的领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计划的革命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有必要争取这些人当中的主要部分，这部分人在当时追随这样一些“动摇分子”的领导，例如法国的龙格，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意大利的塞拉蒂，英国的独立工党和美国的社会党。<sup>319</sup>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中派领袖们中的大部分人同他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理论上的鸿沟。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肯定无疑的议会主义者，笃信议会活动可以而且应当用于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进行革命宣传的讲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赞成苏维埃，而且并不排除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但拒绝承认在拥有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内战也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说法，而且拒绝承认那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是一种伪装——一种表面的东西，在它的背后大帝国主义的资



本家们肯定可以为所欲为——因而可以不予考虑的主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自认为是优秀的国际主义者，也都认为民族国家是实行符合民意的治理的必要工具，并且主张通过某种国际联盟推行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支持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的概念，并且希望看到它更普遍地应用于殖民地区和欧洲。最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把全面内战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的号召吓坏了，因而向后退缩。他们如果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概念的。

因此，共产党人没有希望能够使大部分中派领袖转而按照莫斯科宣言所宣布的行动哲学行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正在追随中派领导的工人当中的主要部分脱离他们那些走入歧途和头脑糊涂的错误领导人，并使他们坚决地转到共产党方而来。当然，共产党人也希望将那些不是追随中派而是追随右翼领导的工人中的许多人拉过来；但在当时来说，中派集团是最理想的攻击目标。因此，不是对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而是对那些正在寻求保持一种中间立场的“调和派”发动最猛烈的攻击，看来是适合时宜的。于是这些“调和派”发现自己处于最激烈的辱骂之中，这种

320 辱骂既来自共产国际，也来自他们自己党内和团体内的共产党支持者。正如列宁曾经最激烈地攻击那些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试图促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和解的“调和派”一样，现在共产国际也对那些不完全追随他们的“假左派”表现了最大的敌意。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立即全部摊牌，因为它当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争取一些社会党支持它，这些党或者拒绝参加伯尔尼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但有很大一部分成员反对该会议无保留地谴责整个专政概念和强调信奉议会民主。在这些对伯尔尼会议不满的党当中，最重要的有法国、意大利、挪威、瑞

士、奥地利、西班牙和美国的党，还有英国的独立工党。莫斯科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发动了一场紧张的运动，争取这些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并努力在那些还不存在共产党的国家建立共产党。第一个有利的反应来自意大利人，他们的执行局在1919年3月以10票对3票表决加入第三国际。第一次挫折则出现在4月，追随龙格集团的法国社会党举行复活节会议，表决结果仍然留在伯尔尼国际内，但是争取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以及右派和中派在内的单一的、统一的国际。赞成这一方针的是894票，而757票赞成无条件地留在伯尔尼国际内，只有270票赞成加入第三国际。之后，5月里，挪威工党表决加入莫斯科国际，已经加入它的保加利亚“狭义”社会党人则把他们党的名字改为共产党。6月里，希腊社会主义工党脱离伯尔尼国际，并决定采取步骤加入第三国际。同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与匈牙利共产党人合并，加入了第三国际。此外，瑞典左派社会党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翼均改名共产党。8月，瑞士社会民主党会议以压倒多数表决反对伯尔尼国际，并以相当大的多数表决拥护第三国际，但把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留待举行一次全体党员的投票来决定。9月里宣布的投票结果表明，相当大的多数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与此同时，8月里，由于贝拉·库恩的苏维埃政府的失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重新加入了伯尔尼国际。10月，美国社会党决定就是否加入莫斯科国际的问题举行一次全党投票，同时对两个国际都保持距离。1920年1月宣布说，投票结果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另外，1919年10月，奥地利社会党人尽管对两个国际都不满意，却决定派遣代表出席由伯尔尼国际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英国社会党举行支部投票的结果却以压倒多数赞成加入莫斯科国际。在这个月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也加入了莫斯科国际的行列。12月，西班牙工人联合总会加入第三国

际，而西班牙社会党则以微弱多数反对加入莫斯科国际，而赞成一项决议，要求伯尔尼国际纯洁组织并与第三国际联合。同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放弃了伯尔尼国际，并决定试图与其他革命政党采取共同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统一的国际。

就这样，到1919年年底时，共产国际似乎已赢得了意大利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党、挪威工党和英国社会党的忠诚，但是失去了瑞士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未能争取到法国或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美国社会党和西班牙社会党以及其他一些党的立场仍然犹豫不定。捷克人、英国独立工党和其他一些党则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比利时工党、以及瑞典、丹麦和荷兰的社会党多数派则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集团，支持改良主义国际，伯尔尼委员会准备在1920年2月于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给这个国际通过一个正式的宪章。但是，在12月，决定把日内瓦代表大会推迟到1920年6月，以便留更多的时间让那些犹豫不定的党决定它们的政策。

与此同时，伯尔尼会议上建立的常设委员会已经开了4次会，第1次紧接在全体会议之后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第2次于4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3次于8月在卢塞恩召开，第4次于1919年12月在伦敦召开。其中第1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代表团，将伯尔尼会议的决议提交巴黎和会，并建立了一个已经提到的行动委员会<sup>①</sup>。第2次会议由来自17个国家——包括比利时——的代表参加，主要是通过很多与领土和民族问题有关的决议，这些问题是伯尔尼会议没有能够详细讨论的。它也重申和补充了伯尔尼会议就拟议中的国际联盟的结构的结论，并派遣它的行动委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84—285页。

员会前往巴黎会见“四巨头”并对和平会议就一系列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提出抗议；它还决定于1920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新的社会党国际制定宪章的代表大会，并指示行动委员会起草章程草案。这是在协约国的和约条款于5月间递交德国人之前。当这些条款发表后，行动委员会立即发表一个宣言详细批评这些条款，并直率地宣称“这种和平不是我们所要的和平”。

8月间在卢塞恩，常设委员会代表十九个国家，根据上述宣言详细地批评了和约条款，批评大部分经两个主要的集团——即布兰亭—德国—英国多数派集团和在伯尔尼会议上追随阿德勒—龙格路线的少数派——一致同意。但是，这两个集团在有关新的社会党国际的问题和对待苏俄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少数派不顾莫斯科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条件，仍然希望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并且避免直截了当地谴责俄国的共产党政权。多数派和少数派一样，准备谴责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但是它坚持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少数派则希望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考虑“社会党策略的一般问题，民主和专政的各自的价值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坚持认为，“只有在国际的永恒原则的坚实基础上一—即是说，与资产阶级政党毫不妥协地进行阶级斗争——全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之间才能建立富有成果的谅解”。

卢塞恩会议还批准了由行动委员会起草，准备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章程草案及大会日程草案，并决定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一次“工党和社会党议会成员国际会议”，就象曾经存在过的与战前的国际有联系的同样会议一样。12月举行的伦敦会议主要是研究推迟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问题，如前所述，它从2月被推迟到1920年7月底。

到日内瓦代表大会实际召开时，计划中的新国际的基础自从伯尔尼会议以来已经大大缩小了。法国社会党于1920年2月通过一次投票，以占压倒多数的票决定脱离伯尔尼—日内瓦集团，并试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革命的国际，同时以几乎是二比一的多数反对立即加入莫斯科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已决定反对日内瓦会议；还有几个已经派了代表的社会党，包括奥地利人和西班牙人在内，也已经声明他们对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的基础感到强烈的不满。实际上，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德国多数派的事，支持它的有比利时人、瑞典人、丹麦人和几个较小的党派，但是要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提供足够的基础显然还差得很远。几乎象莫斯科主宰着第三国际一样，英国和德国多数派主宰着它的对手。然而，会议的倡议人继续推行他们的计划，当代表大会实际召开时，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毫不含糊地体现了社会党右翼的改良主义哲学，对共产主义或专政未做任何让步，虽然也试图讨好中间集团，因为这些集团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福音作渐进主义的解释等基本问题上，和他们的立场最为接近。

日内瓦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决议，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点，值得全文加以引述。它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接受议会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包括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尽管它有条件地赞同某种代表各行各业的“国家工业委员会”“可能是可取的”，然而它明确地说，这样一个组织只不过是顾问性的，或者至多只是由国会赋予某些从属性的、委托它行使的权力。它不止一次地坚持——追随英国工党关于“劳动和新社会秩序”的宣言中的路线——必须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参加为基本条件。它对“劳动”一词所下的定义是“不仅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挣工资者，而且包括各种脑力劳动者，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

业耕作者，总之，包括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努力在生产各种有用的东西方面进行协作的人”——这个定义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所有的职业工人，甚至还包括积极参加最广泛意义上的生产的所有雇主和经理。

以下是决议的全文：

在战争年代里已经逐渐发生，并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继续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日趋瓦解，使得劳工应该在社会上执掌权力成为更加紧迫的事。我们认为劳工一词的含义，不仅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挣工资者，而且包括各种脑力劳动者，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业耕作者，总之，包括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努力在生产各种有用的东西方面进行协作的人。

(1) 劳工执掌权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工的队伍应当充分团结，而且它应当懂得怎样行使它手中的权力。

(2) 代表大会在谴责暴力方法和一切恐怖主义的同时，认为劳工如果不利用其在工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权力，是无法达到目标的；因而在某些决定性的冲突中不能完全排除直接行动。同时，代表大会认为，想使工业罢工自动地转变为政治革命的任何倾向，无论怎样强烈地加以谴责均不会过分。

(3) 社会主义联邦只有在劳工掌握了政府权力以后才能实现。一个劳工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同时把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它立法和行政的根本基础。

社会主义不把它的政治组织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上。它不能寻求压制民主；相反地，它的历史使命是使民主达到完善的地步。劳工的全部努力，它的工会和合作社的活动，同它在政治方面的行动一样，不断趋向于建立愈来愈适合工业社会需要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加完善和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

今天，主要是劳工的力量在保证维护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容许少数人出于宗派的利益，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使公众的自由成为徒有其名的东西。在以往历次革命的伟大传说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者将毫不畏惧地抵抗任何这类攻击。

(4) 社会主义议会的选举，必须实行普遍的选举权，男女绝对平

等,不因种族、宗教、职业或政治信仰而受到排斥。议会的最高职责是从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出发,代表所有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它将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侵略进行抵抗。它将负责管理社会的财产和财政。

它将制订法律,管理公共事务。主管各部事务的部长们将从它的成员中遴选;全国政府将是它的执行委员会。

但是它将有权把某些权力和职责委托给下面将要提及的社会的任何其他组织行使,以便保证那些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每个部门的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参加。议会不仅要保证广大消费群众的利益,因为它将让他们在各个部门和委员会中有代表参加,而且要保证整个社会今后世世代代的利益。

(5) 议会将决定社会政策的总路线和制订法律:它将决定社会化的原则将在何种条件下适用于哪些工业和服务行业;它将行使最高的财政管理权,并将决定怎样分配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最后,它将行使稳定物价的权力。

(6) 在发展和扩大社会的生产性生活中,按照每个健康人所从事的生产职业而组成的各种组织将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必须按照下面所说的方式来作出规定,使在某个特定的工业或服务行业中工作的所有各个等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人的代表们能够参加对该工业或服务行业的行政管理。与此同时,每一门职业,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工人所从事的职业,均要求规定它自己的职业生活的条件,无论这个工业或服务行业中的成员们是多么分散。因此,每一特定的职业部门均自行组成一个职业联合会,议会将赋予这个联合会以管理、调查或进行职业教育的职能。

(7) 那些从事各种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们将要组织起来的组织,无论是工会或职业联合会,均可能成为进一步组成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机构的基础。

与议会并行,设立一个全国工业委员会是适当的,该委员会由属于每一职业的人们自愿地组织起来的各种行业的和职业的组织代表们组成。这样的全国工业委员会可以自由地进行讨论和批评,进行调查和提出建议,并将它可能通过的任何报告提交议会。议会可以不时地委托全国工业委员会拟订适用于整个工业的措施,或者起草在一个国家的权力范围内实行的各项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个主要决议是关于社会化的决议。决议一开始一般地宣称主张“由社会拥有和控制”所有那些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所必须的工业和服务行业，然后宣称主张“从广大的实际生产者在私有制下所受的经济上的奴役，转变到由从事工作的人们普遍参加管理。”但是，这种普遍的社会化，不是一下子全部实现，而是要分阶段实现。“社会化将逐步地从一个工业到另一个工业，根据每个国家可能容许的情况而实现。尽管社会主义者反对为私人制造利润的企业，但在他们可以用一种比较有效的组织形式来代替它以前，不会在任何工业部门中摧毁它。这样一种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一般地说，不会无补偿地废除私有制；不仅因为那将不公平地使某些被选中个人遭受损失，而且因为采取没收的方法将要损害在那些还不能立即实行社会化的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给予补偿所需的资金来自对私人财产的征税，包括资本税、所得税、遗产税，以及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限制继承权的所得。”

接着，社会化被说成是采取三种主要形式——国有化、市有化和合作化。土地将实行国有化，规定在凡是有农民耕种者的地方要保证他们的安定。其他一些具有全国性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部门，例如交通、发电和矿山，也要收归国有；但是其他很多工业部门将由地方公共当局，或由这些地方当局联合所有，但是家庭用品的生产和分配主要由消费者合作社负责。暂时由私人经营的工业将由国家控制，包括确定物价和规定最低限度的雇佣条件。 328

接着，决议声明，实行社会化的原则并不是要排除个体农业耕作或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独立活动——“只要他们一般是不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原则排除个人或任何种类的个人联合体拥有自然资源或拥有大规模初级工业的生产工



具，排除任何人或团体在他们所工作的企业中实行专制。”这显然是对工团主义的打击。它还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任务是控制商品价格和随时向社会化的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新的或额外的资金。”

然后决议详细论述了“社会化的工业部门的行政管理”问题。它强调“控制”和“管理”二者极为重要的不同，前者“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执行”，后者“必须同政权机构完全分开并加以区别。”由于各个工业部门的情况互不相同，它给每个国营工业提出一种普遍的管理形式，即一个由三种成分组成的委员会——有关的工人代表，管理人员代表，包括技术人员，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代表。在必要的地方建立由同样成分组成的地区委员会，在每个单独的机构建立工作委员会。决议然后说，为了集体进行协商，应该建立性质不同的机构联合委员会，其中一方代表管理人员，另一方代表工会或职业联合会。罢工的权利必须维护，但在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时候和地方，“可以指望整个社会的舆论将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

最后，对于那些建议由当地公共当局控制的范围甚广的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则提出：由这些当局进行行政管理，并“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代表参加他们自己的服务事业的管理，而且对集体协商作出明文规定”，作为一种正确的解决方法。

这个非常具体的决议，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一方面完全否定工团主义并充分坚持议会和城市的民主控制这个总原则，一方面对许多积极鼓吹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的人们做出让步，这些人从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到法国的“工业国有化”的鼓吹者，到德国的“参与决定权”的支持者，以及诸如“普卢姆计划”的作者之类的美国工业改革者。它之所以接受这些条文，证明当时即使是右翼社会党人也感到了来自这些形形色色的鼓吹各式各样的工业自

治的人们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内特别强大。当这种压力由于战后的萧条而失去其大部分力量后，大多数议会社会主义者很快就表示要减少这些让步，甚至想要完全撤消这些让步。但在1920年，他们渴望同那些支持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类似派别的人们和解，因为这些人不会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人方面，完全没有准备做出类似的让步：他们拉拢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人大会，因为他们是革命的，但是坚持合法的“工人管理”是由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管理，同时对工人们提出的在特定的工业部门或机构中实行工业自治的要求不表同情。

在这些决议的基础上，日内瓦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显然是改良主义的国际，作为它的狭窄的基础的那些政党不但准备拒绝接受共产主义，而且准备放弃建立一个重新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一切希望。在有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1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仅仅派出了观察员，无权代表他们的党承担义务；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代表团不能声称他们代表统一的全国运动。实际上，日内瓦国际是由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比利时人、瑞典多数派、荷兰多数派、丹麦人和一些零散人员炮制的。总部设在伦敦，实际上由英国工党负责它的事务。

早在日内瓦代表大会正式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之前，各国的 330  
工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联合会，以取代战前时期松散的组织国际工会秘书处。在这个联合会建立之前经历过许多反复，因为提出过几种不同的打算，而且在协约国的某些工会运动当中，同样不愿以平等的条件同德国代表会晤。以卡尔·列金为书记，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工会书记处，从战争爆发后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1916年7月初，一个协约国工会代表会议在利兹举行，参加的有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这个会议拒绝了美国劳工

联合会的塞缪尔·龚帕斯提出的建议，即在和平会议召开的同时，应当举行一个全面的国际工会会议。拒绝的理由是不愿这样快就同德国人友好地会晤。代表们在利兹通过了一项由法国总工会的莱昂·茹奥提出的一项决议，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写入专门条款保护劳工的权利，包括诸如结社和迁徙的权利，社会保险规定，以及关于雇佣的时间和条件与工业卫生等事项。

利兹会议促使列金采取行动，1916年10月，他从国际工会书记处发出一个关于12月在伯尔尼召开工会大会的号召。当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工会认为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时，列金撤消了这个计划中的会议，但同意瑞士各工会的意见，即它们将发出一个在第二年召开会议的类似邀请。正当这个计划还在协商的时候，关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邀请发出了，而且建议工会会议应当从伯尔尼改到斯德哥尔摩举行。瑞士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而荷兰总工会作为战前国际工会书记处的一部分发出了于1917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一次会议的邀请。这次会议开成了，但出席的只有来自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代表。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会拒绝参加；法国和英国根本不予答复；美国劳工联合会虽然最早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时却以时机不成熟为名拒绝接受邀请。斯德哥尔摩会议由于认识到组成人员不够充分，因而把它的活动仅限于要求瑞士总工会再做一次努力。于是瑞士人发出了于1917年10月在伯尔尼举行一次国际工会代表会议的号召。

这次会议也失败了；新参加者只有瑞士人和捷克人，法国人本来打算派代表参加，但法国政府拒绝发给护照。英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再次拒绝出席。茹奥从法国发出一封信，要求将国际工会书记处的总部从德国迁至一个中立国，但是列金强烈反对这样做，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德国的不信任投票”。由于他的反对，茹奥的建

议未能实行；但是荷兰人被委任为暂时负责国际联系的中间人。此外，伯尔尼会议通过了前一年在利兹举行的协约国工会会议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并进一步要求工会代表应被允许参加草拟和平条约中的经济和社会条款，而且各国政府应承认国际工会是劳工在有关国际劳工立法问题上的发言人。

为重建工会国际而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各国工会与工党和社会党一起参加了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工党和社会党代表会议，会上，工会代表们举行了单独的会议，起草了一个准备写入和平条约中去的国际劳工宪章草案。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独立推行同样的主张时，却拒不参加伯尔尼会议或荷兰人再次试图召开的国际工会会议（这次是在阿姆斯特丹）。<sup>332</sup> 龚帕斯另外要求举行一次纯粹的协约国工会会议，实际上，这样一次会议从未举行，因为只有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预定日期来到。然而，伯尔尼代表会议总算打破了僵局；1919年7月，在比利时总工会为了同德国人“算账”而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之后，一次全面的工会会议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从而诞生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后来被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由西欧大部分重要的工会运动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的这些集会，在开幕时就由比利时的卡米耶·默滕斯和由龚帕斯对德国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结果是最后接受了“萨森巴赫”决议，德国人在这个决议中承认德国是战争中的侵略者，并对在比利时犯下的罪行表示遗憾，但归咎于德帝国政府欺骗了劳动人民。德国人只是在极端勉强的情况下才接受了这个决议，他们先是同意了 this 决议，然后又不同意，当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个决议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工会国际时，他们终于又同意了它。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进而研究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但是，在龚帕斯和欧洲的代表们之间，对和平条约中的劳工条款，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这些条款是由以龚帕斯为主席的一个属

于和平会议的委员会起草的，被大部分欧洲领导人认为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在这个问题上只有英国代表同美国人站在一起；各工会同意参加即将举行的旨在建立国际劳工组织的华盛顿会议，条件是应该向德国和奥地利也发出邀请，工人的代表应当只限于那些参加新近组成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那些工会团体。在拟议中的国际联盟宪章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组织问题上，还发生了一些别的冲突；但这次会议并未彻底分裂，尽管最后龚帕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拒绝让美国人承担参加新的国际的义务。

接着举行了国际劳工组织华盛顿会议——这是由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参加的会议，包括来自41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有14个只有政府代表参加。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没有出席，因为对他们的邀请发出太晚，来不及克服所遇到的障碍。美国人也缺席，因为美国没有批准和平条约。不管怎样，华盛顿会议拟定了一批劳工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在先进国家里普遍推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尽管要使先进国家批准这项公约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它在华盛顿会议上获得通过一事被社会主义者广泛地认为是向接受工人阶级长期坚持要求的八小时工作制迈了一大步。共产国际对它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断然谴责国际劳工组织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反革命代理机构。

这就是共产国际于1920年7月和8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的形势。比起1919年8月那次规模很小、没有什么代表性和仓促召开的会议来，这次会议是一次重要得多的事件。这次有几百个代表，号称代表着37个国家，其中包括相当数目的代表来自亚洲国家，来自埃及和土耳其，以及来自那些申请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参加第三国际的欧洲各党。所有这些代表都没有表决权。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仅仅作为观察员出席，他们的代

表权仍然要等共产国际执行局审批，这个执行局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例如，吕·奥·弗罗萨尔(1889—1958年)和马塞尔·加香(1869—1958年)代表的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处境就是这样。只有俄国人和来自东欧的几个代表团代表着牢固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其余的来自几个国家内已经或正在脱离社会党的一些小党，或者来自工团主义者或例如世界产业工人大会那样的运动。

这次第二次莫斯科代表大会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召开的：当时尽管世界革命未能扩及西欧，俄国共产党人还是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新近战胜了高尔察克和其他将军们的反革命势力，而且他们成功地战胜了协约国的军事干涉。这些胜利足以弥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革命的挫折和共产党在整个德国所遭到的失败。此外，对波兰的战争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俄国人尽管由于战争和饥荒使得他们筋疲力尽，却对他们坚持革命的能力更加充满信心，即使革命扩及西欧国家已被推迟，而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又令人不快地延期了。这并没有使他们降低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国推行革命的热情，也没有使他们不再尽一切可能去瓦解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改良主义的劳工领袖们的帮助下为实现恢复和稳定所做的努力。相反，这促使他们以加倍的努力到处建立共产党，这些党准备接受前一年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理論的全部精神，并准备严格接受由俄国人控制的共产国际所制定的正统条件。

根据这种精神，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二十一条”，完全接受这二十一条是参加第三国际的一个条件——比起1919年的“十五条”来，这是一些严格得多和限制得更紧的条件。代表大会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内战的时代，已经处于危急关头。”战争遗留下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况，被说成是正在驱使各地的工人进入“革命的战争，以便有目的地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在

进行这种战争时，所有国家的革命的工人被号召起来同社会党决裂，并组成旗帜鲜明的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集中化的纪律。所有这些党必须准备采取合法以及非法的行动，包括在军队中进行积极的宣传，和尽最大的努力“加速革命”，不过不要用布朗基式的政变来人为地推动革命。特别是，一个新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希望参加第三国际的党，应当把所有的改良主义分子从负责的岗位上撤掉，而且应当清除所有那些可能被第三国际认为是革命事业的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的人。另外一“条”是要求所有拥护第三国际的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来反对黄色工会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组织。为了进行这一斗争，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会代表会见了亚历山大·所罗门·洛佐夫斯基（1878—1949年）和季诺维也夫，并建立了一个赤色工会国际临时委员会，以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对抗。实际上，这个组织除了在俄国以外没有什么群众支持；在其他地方，它的拥护者只不过代表一些小的派别。但是，这些团体积极地进行指派给他们的任务，即破坏现有的工会领袖们的权威，正如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试图破坏改良主义政治领袖们的威信一样。赤色工会国际及其各国的参加者们是否应鼓励以牺牲工人阶级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方面的经济团结为代价而成立对立的工会的问题，很快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如果世界革命立即会到来，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力量如何就无关紧要，因为资本家的势力总归要很快消灭。相反，如果世界革命还要推迟相当时期，那么事情很明显，对工人们非常重要的是，在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优势的年代里，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的力量应当保持和增加，而工会队伍的分裂，可能损坏革命早日成功的前景。与此相反，人们清楚地感到，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在工会中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而且由于他们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可能很容易被开除，因而他们必须准备至少在那些他们不能在已有的

工会中进行鼓动活动的地方建立对立的工会。如前所述<sup>①</sup>，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很早就出现在德国，特别是在鲁尔矿区和萨克森的一些地区。在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地区，这个问题出现得较晚，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地位在开始时是比较薄弱的。

就这样，两个极端——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工业领域中也展开了。然而，有一个不同之点。在工会方面，共产党人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宣战时，是在向一个不仅得到右翼的支持，而且得到象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这样一些比较有战斗力的工会运动支持的国际提出挑战；而在社会党方面，唯一对立的国际——伯尔尼—日内瓦国际——主要是一个右翼机构，相当多持中派观点的组织使他们在其中占优势的那些党拒绝最终加入任何一个国际。法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奥地利的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党，还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独立工党，仍然在效忠于哪个国际的问题上进行着内部斗争。其中有些人——例如意大利人——已经表决原则上参加共产国际，但是现在面临着由于“二十一条”的提出而造成的后果。另一些人——例如法国人——虽然仍由中派所控制，但是正在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还有一些人——例如奥地利人——仍然是坚定的和几乎是团结一致的中派，没有显示出愿意进行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而出现分裂的迹象，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朝不保夕，显然经受不起这种斗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决心把所有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地站在他们一边的组织——或至少是所有的领袖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不能仅仅用指出伯尔尼—日内瓦国际是敌人的方法来进行这场斗争，就象他们在阿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31页。



337 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问题上所使用的方法一样。他们必须分别对右翼——伯尔尼—日内瓦集团——和对一些国家的中派倾向占统治地位或强大到足以阻止完全屈从“二十一条”苛求的党——进行斗争。

这种情况到1921年2月时发生了变化，当时来自13个国家的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在维也纳开了一次会，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它后来被称为“维也纳国际”或更普遍地被称为“第二半国际”，因为它处于作为“第二国际”继承者的伯尔尼—日内瓦国际和作为“第三国际”创始者的莫斯科之间。维也纳国际本身否认它是一个“国际”，宣称它的目的仅仅是为建立一个既包括议会主义者也包括苏维埃主义者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国际开辟道路，以便恢复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然而，它不可避免地成了这样一些党和小组的中心，它们既不满意伯尔尼—日内瓦国际所属各党的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也不满意共产国际的不妥协的苏维埃主义。

除奥地利人以外，派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的党有：法国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捷克人，匈牙利人，瑞士人，俄国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有来自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小组，来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小组。芬兰的和阿根廷的社会党虽然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发来了表示支持的信件。然而，派有代表参加的法国党和德国党，并不是以前曾在内部进行不同倾向的斗争的党，而是从不久前的分裂后所产生的一些派别。在法国，原来的社会党终于在1920年12月决定无条件参加第三国际，成了法国共产党。原来的右派和中派，分别以皮埃尔·勒诺德尔和让·龙格为首，从此分裂出去，并在大多数社会党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重建了法国社会党。在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一度存在的  
338 剧烈争吵，由于共产主义的崛起而退居幕后；龙格派远比由勒诺德

尔领导的旧的多数派得到更多的支持，因而能够把这个新党纳入维也纳国际的轨道。同样地，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1920年10月举行的哈雷代表大会上投票决定在二十一条基础上加入第三国际。哈雷代表大会于是分裂为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两个都自称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由多伊米格和海伦妮·施特克尔领导的多数派，随后于1920年12月与当时的德国共产党——前身是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合并，会上建立了德国统一共产党。少数派则决定在累德堡·克里斯平和希法亭的领导下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少数派参加了维也纳国际。

在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发生了分裂，其结果是在经过激烈的冲突后共产主义者被逐出了社会民主党。<sup>①</sup>在维也纳会议召开时，捷克的左翼还在重新组织共产党以便参加第三国际的过程中。派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清除了共产主义分子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前已提及<sup>②</sup>，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同共产党人一起支持贝拉·库恩的政权后，由于库恩的苏维埃政府垮台，已经同共产党人分手，重新组成了自己的党；就是这个随后经受了白色恐怖的重建的党，派代表参加了维也纳会议。如前所述<sup>③</sup>，在瑞士，社会党代表会议已于1919年8月多数通过加入第三国际，但这个决议被一次全党投票所否决。1921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党投票，以几乎是三比一的多数肯定了上次的否决；于是党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就分裂出去同已有的人数很少的瑞士共产党合并。维也纳会议上的瑞士代表就是代表着这个没有共产主义分子的社会民主党。<sup>339</sup>

最后，英国独立工党在同共产国际进行谈判以后，拒绝接受二十

① 见本卷第228—229页。

② 见本卷第238—239页。

③ 见本卷第306—307页。

条，经受了人数并不很多的共产主义派的分裂。它仍然是作为伯尔尼—日内瓦国际台柱的英国工党的成员，但是保留执行独立的国际政策的权利，并派代表参加了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国际自称是“这样一些社会党的联盟，这些党的目标是，沿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路线，夺取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它的“任务是统一加入该联盟的各党的活动，组织共同的行动，并促进建立一个包括世界全体革命工人阶级在内的国际。”凡是接受这些原则而且既没有参加第二国际也没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党都可以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的决议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特别是所有属于这个联盟的党不得就加入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任何单独的谈判，此外，在决定它们的国际政策时必须经过互相同意。”

维也纳会议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尖锐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的声明”，阐述了维也纳国际对待已经存在的各对立国际的立场。在这个声明中，主要的重点是论述不顾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广泛差别而给所有国家规定一条唯一的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错误，这些差别存在于例如，农业占绝对优势和工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拥有大庄园和农民只占有小规模土地的国家之间；存在和不存在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之间。它争辩说，国际社会主义若约束自己只能使用议会民主的方法，那是荒谬可笑的，因为这些方法在有些国家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由于反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可能对民主制度进行镇压，而使这些方法归于无效。但同样荒谬可笑的是，硬给所有国家的工人规定要“机械地模仿俄国的工农革命，就象共产国际想要做的那样。”工人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在不同的国家里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只有在那些资本家阶级没有掌握必要的权力，特别是被剥夺了军权，

从而不敢用公开的内战代替政治民主的斗争的国家，只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才可能用民主的手段获取政权。但是，即使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资本家阶级一般来说总要运用它的经济力量来抵消工人阶级获得的民主政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在获得政权后也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以便粉碎资本家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将采取以专制手段行使工人阶级获得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在那些革命是在对议会民主制度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地方，事情的发展预计就是这样。

“但在那些资本家阶级强大到足以用暴力手段对付劳动人民中的革命群众以维持它的统治的地方，它就会破坏民主，掌握暴力手段，迫使工人阶级进行公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选票，而是敌对阶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群众罢工，武装暴动等）才能成为统治力量，而且它必须对被推翻了的资本家阶级进行镇压才能维持它的权力，这样，工人阶级的专政必须以工农兵代表会议，以工会或以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为基础。”因此，“专政”这个词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在一种情况下，它可能采取“以专制手段行使工人阶级获得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要求由专门的工人阶级组织来行使专政权力，这些组织如“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共产党人宣称必须全面摧毁旧的国家而代之以 341 完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维也纳国际则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须这样做，但它坚持认为，在别的情况下，工人通过宪法手段夺取的现有国家机器，可用来作为社会主义国防和革命建设的工具。

维也纳国际的声明接着承认资本主义力量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并得出结论说：“因此，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不能在国境线以内获得，而只能是国际行动的结果。组织这种行动正是工人阶级国际的任务。”但这就要求国际必须考虑各国斗争的不同具体

情况。它不应当把所有的党都束缚在一种严格统一的行动方式内，正象现存的两个国际想要以相反的方式所做的那样。“但是，尽管在不同国家应采取不同方式，然而国际必须团结国际工人阶级的所有力量，统一行动，反对国际资本主义。”但，除非能有一个世界工人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即一个真正无所不包的国际，否则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无论各党根据它们的理论进行鼓动和采取行动多么重要，最终同样重要的是，不是党的理论，而是工人阶级的自决才是决定的因素。这种自决只有在把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团结在一个组织内才能行使。但是，这样的国际组织只有在其决议能够约束其所有成员时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因此，国际组织的每项决议都意味着是对所有国家的党的自治施加的一种自我限制。”维也纳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认为，一方面各国必须有不同的方法和行动，反对两个国际所规定的统一方式，而另一方面，必须有共同的纪律，反对伯尔尼—日内瓦国际各党

342 所赞同的松散联盟。从实际影响看，维也纳国际声明的缺点在于它太敏感。尽管同伯尔尼—日内瓦的声明相比，它要左倾得多，但它没有抓住左派的想象力，因为它未能将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激起的强烈情绪为自己所用。它得罪了改良主义者，却又没能吸引革命者。因此，维也纳国际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所谈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良知，而这个阶级所需要的绝不是倾听什么良知，而是要人们求助于它激动的同情心。从逻辑上来说，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要求工人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采取统一行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从1918年以后世界的普遍情况来看，要想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际是很不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同议会改良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太宽，无法弥合。不仅因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相距太远，而且因为两个极端彼此仇恨，势不两立，不可能在任何共同的组织内一起工作。

(周叶谦 译)

## 第十章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 殖民主义、和平与裁军

我在上文叙述两个对立的国际在 1919 年及随后的几年中所发生的冲突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主对专政”的问题上，这样做也许看起来对对抗者双方不太公平，因为没有叙述其他同样使他们分歧加深的问题。在所有这些其他问题中，就其对整个政策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殖民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问题——即是在对待各大国和某些较小的国家例如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领土的问题上，和在对待没有直接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不发达地区——例如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问题上所要执行的政策。本书上一卷<sup>①</sup>中曾经谈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政策的讨论，和社会党领袖们对帝国主义互相对抗与世界战争的危險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我们看到，社会党的领袖们一致认为战争的危險主要地（如果不是绝对地）起源于经济因素，而且随着各大国在争夺“势力范围”和帝国主义剥削机会上发生激烈冲突而迅速加剧。我们指出了欧洲列强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东南欧和近东的对峙，俄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在远东的冲突，列强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的曲折过程，美国向中南美——特别是向墨西哥——渗透早期阶段，以及财政资本作为一种国际动

<sup>①</sup> 见第三卷上册，第 42 页和 57 页（中译本第 52—53 页和第 68 页）。

344 乱力量所起的作用的更多表现。我们也指出在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主义的争论，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对帝国主义的普遍敌视由于以下的态度分歧而变得复杂化了：有些人采取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剥削的坚定立场，另一些人则准备为某些形式的殖民发展辩护，认为这些殖民发展较好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同时他们也坚持认为，对那些自称是文明和人类普遍进步的卫士因而有权利统治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先进国家而言，有义务保护当地的利益和改善这些国家里的生活水平。

的确，我们看到，至少有一位世界闻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肖伯纳在《费边主义和帝国》一文中采取极端路线，说在二十世纪，形势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利已成定局，落后民族没有任何权利不让他们潜在的生产资源在只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才能提供的现代技术和投资的帮助下加以有效利用，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sup>①</sup>诚然，这种理论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社会主义者会同意。但是有不少人，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有不少人宣称，那些在兼并殖民地的竞赛中落后了的强国，有权和其他强国一样行事，在他们能够达到的地方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帝国。在荷兰社会党人当中，也有迹象表明，他们认为在爪哇以及其他荷兰海外领地上的殖民主义做法是合理的。比利时人的处境不同，因为对治理刚果国所承担的责任，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作为他们唯一可以用来结束利奥波德国王令人憎恨的统治的途径。然而，由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承担这种责任，他们就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很难不为他们所鼓吹的部分地改良了的殖民主义辩解。不过，总的来说，第二国际的情绪是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因为

345 它的领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制造战争的最大力量，而战争是他们

---

① 见第三卷上册，第190页（中译本第202—203页）。

尽可能设法避免的，以便为他们自己国内的社会政策的进展和为通过议会手段和平地取得政权扫清道路。无论右翼的德国、英国或荷兰的代表们可能作出什么样的保留，只要把这个问题付诸表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总是有把握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获胜。而一般地说，除非是就防止战争的方法问题进行大辩论，否则很少就此进行表决。

当然，无论何时，只要就殖民政策进行辩论，社会党人都一致坚持认为，每个殖民大国都有责任从当地居民的利益出发来统治它的领地和附属国，避免对当地人民进行野蛮的剥削或镇压，而要注意采取措施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也都一致要求对外国投资应加以控制以保护当地利益；一致抗议滥用强迫劳动，并敦促应当把自治做为努力的目标，因而凡是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地方（例如印度和埃及），均应给予这种运动以全面的支持。但是在1914年以前的时期内，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地区只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在大多数部落社会里，几乎还未开始形成任何相当大的规模；因此，社会党人关于殖民地自治的要求，除了在少数几个地区外，大部分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且即使有关印度的问题，也未引起国际很大的注意或采取某种具体的形式。有一两次，社会党代表大会热烈欢迎来访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这些人是被邀请来代表印度人民向他们发表友好演说的；但是，当欢呼声过去以后，除了通过支持反帝要求的一般决议以外，没有做任何事情。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大部分殖民地世界——特别是亚洲和中东——的群众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基础以前，也不可能发生更多的事情。

战争及其间发生的俄国革命根本改变了整个形势。战前的俄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属它管辖的有广大的处于不同的社会<sup>346</sup>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民族臣民，但它跟其他殖民帝国不同的是，



它的领土是连成一片的大块陆地。所有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中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即要求给予沙皇帝国的所有民族以自治和平等，至少对其中的某些民族——那些有着强烈的民族传统和自己的发达文化的民族——来说，包括在他们希望的时候脱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列宁属于最坚决地维护这种权利的人，而且如前所述，他在这个问题上同罗莎·卢森堡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坚持沙皇帝国的各族人民必须为一个革命共同工作，这个革命不应导致建立一些民族主义国家，而应导致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工人共和国，因此，她激烈反对皮尔苏茨和波兰社会党的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列宁希望俄罗斯帝国分裂成许多单独的民族主权国家，而仅仅是表明他准备承认某些民族集团分裂出去的要求，如果它们的人民希望这样做的话。就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来说，在1917年以前从来没有实际面临这个问题，而在1917年则随着乌克兰在德国占领之下而发生的分离，以及沙皇的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分崩离析而以剧烈的形式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由于德国的占领和由于内战，布尔什维克被同旧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隔绝，红军只能靠战斗逐渐恢复对亚洲领土和南方的控制。不仅芬兰和波兰，还有在北方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单独国家。乌克兰和高加索各共和国只是作为几次侵略战争的后果才归于苏维埃统治，在这几次侵略战争中，苏维埃军队竭力以把这些国家的人民从反革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面貌出现。<sup>①</sup>日本人和白卫分子在远东逐渐被击败。出现了一个联盟的体制，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一些名义上主权平等的国家组成，其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大和人口最多，而且包括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和

---

<sup>①</sup> 关于格鲁吉亚和其他高加索共和国的命运，见本卷第197页。

民族集团或部落集团。除了那些已经分裂出去的地区以外，全体群众被中央联盟——苏联——强大的力量和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领导当局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所有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包括农业在内有关的经济力量高度集中时，而在政治和主要经济领域以外的问题上，则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仅让较大的民族社会，而且让较小的民族社会发展文化自治。所有的居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或其文化水平或类型如何，形式上都是苏联平等的公民——男女都一样。因此，代替由许多处于俄国统治和俄罗斯化压力之下的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出现了一个在整个地区大家都是公民的基础上建立的稍微小了一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俄国不再是一个帝国，整个帝国主义的问题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西方人可能仍在指责苏联是一个在新的伪装下的老牌沙皇帝国。布尔什维克对这种指责嗤之以鼻，而是骄傲地指出他们由于慷慨地承认合法的文化权利，而在恢复新秩序的统一和团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建立对其邻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亚洲；热衷于推行世界革命事业的布尔什维克，迅速地尽一切可能不仅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且在那些处于各种形式的封建或专制统治下的国家煽起革命情绪。1920年9月举行的以季诺维也夫为主席，由拉狄克和贝拉·库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加以支持的东方人民巴库代表大会，就是他们第一次试图把亚洲和近东各族人民当中的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置于他们领导之下。参加巴库会议的代表们或那些自己任命自己的人们来自许多动荡的地区，代表着许多迥然不同的意见，但是全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反对现存秩序的民族主义革命或社会革命。从那时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项任务就是，对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可能的反叛者提供避难场所和进行革命训练，并把经过训

练的人派回本国作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而且有时候干脆代替那些不充分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如后面将要谈到的,许多中国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拉狄克曾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学校的校长。<sup>①</sup>

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态度很简单:它的激动人心的目标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各附属领地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并支持任何可以用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它还在那些不直接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地区给统治阶级制造麻烦,尽一切可能把民族主义运动同社会骚乱联系起来,并劝说各个地方的当地民族主义者把苏联看做是巨大的解放力量,它十分乐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如后面将要谈到的,在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出现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还没有社会党存在,尽管在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左翼中都存在着社会主义倾向。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在拉丁美洲传播共产主义,只不过在美洲各共和国里,共产党人不是以民族主义的同盟者,而是以民族主义的敌人出现,因为当时,即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民族主义主要是一股右翼势力;至于后来与庇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群众性民族主义,在三十年代以前还未显示出任何可观的规模。

并不奇怪的是,在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印度,共产主义宣传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里,在民族运动的左翼支持者当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那里,M·N·罗伊<sup>②</sup>在一段时期内是这种新理论的杰出鼓吹者;罗伊还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代表<sup>③</sup>。但是,在大部分殖民地,政治上

---

①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785页。

② 关于罗伊的情况,见本卷下册原文第811页。

③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752页和第786页。

的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仍然非常不发达,因而未能给成功的共产主义宣传提供广阔的前景,尽管在爪哇,由斯尼弗利埃特所领导的一群宣传家,相当成功地渗入了民族主义运动。<sup>①</sup>有一个时期,共产主义渗透最突出的例子似乎是中国,直到蒋介石转而对付他以前的盟友,摧毁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止;毛泽东不得不去完成在完全不同的农村起义的基础上重建共产党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sup>②</sup>

详细论述二十年代共产主义者在殖民地和其他受帝国主义侵入影响的国家进行活动的复杂历史,一定是枯燥乏味的。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地使帝国主义列强处于尴尬境地,首先是希望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革命,希望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立即瓦解,然后,若这些希望不能马上实现,就让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应付殖民地的和其他的动乱和问题,以致不可能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用来反对苏联。这一政策自然包括动员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不断谴责帝国主义剥削;于是,这些党坚定地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先进国家靠殖民剥削过活,这些国家里的工人——或者至少说比较富裕的工人——的生活水平是靠剥削殖民地的工人而保持的,因此,除非他们坚定地站在殖民地人民的一边,他们就成了进行剥削的资本家的支持者。它争辩说,世界资本主义只是靠控制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市场和原料,才能使自己摆脱固有的矛盾,因此,推翻它的最好方法是在这一点上,即它的致命的弱点上打击它。把这种说法向先进国家里的工人们宣传并不总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不免等于是暗示他们: 350  
如果说他们的较高的生活水平是由殖民剥削而来,那么放弃这种剥削就将是愚蠢的,因而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最好是让它原封不

①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 823 页。

②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 800 页。

动。但是共产党人争辩说，先进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并未从殖民主义中获利，这种利益主要由资本家获得，尽管有小部分利益落入了熟练工人之手，而且，社会主义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远远超过少数人由于放弃半资产阶级特权地位而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

右翼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议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乃是改革和改善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突然的革命巨变的结果，因此，这些人在确定他们战后对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时，比共产党人要困难得多。在防止未来战争的问题上，在促进国际合作以促进普遍福利的问题上，他们需要建立一种国际权威，这种权威强大到足以制止侵略和强国间的对抗，而且，由于怀疑战后列强政府的意图，他们要求这个国际机构的组成能够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政府，因此希望最好是有一个能够代表成员国的议会而不是代表它们的政府的组织。至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他们希望那些他们认为已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尽快走向自治，并认为这将不是通过殖民地革命而实现，而是由帝国主义列强在拟议中的国际权威的压力下在实行自治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的结果。为了使这种压力有效，他们要求各殖民强国同意将它们的殖民地政权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之下，这种托管将由新建立的超国家权威机构行使，而这个机构有义务保证这些托管地的行政管理主要着眼于当地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着眼于殖民强国或它们在该地投资的阶级的利益。概括地说，他们要求所有国家保证将一切国际纠纷或者提交给由新的世界权威机构所支持的国际法庭裁决，或者提交这个权威机构本身裁决。最后，如前所述，他们要求和平条约和国际权威机构的宪章中应当包括一个全面的关于劳工权利的宪章，每个成员国均须保证遵守这一宪章。他们希望用这些方法为所有的工人制定一部规定最低经济权利的世界范围的法

典，并创造出一种手段，以便不断提高这种最初规定的最低权利。

按照和平条约的条款所实际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在各方面都距离这种要求很远。首先，它实质上不是一个人民的或者至少是议会的联盟，而是一个由行政当局代表的各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其次，国联盟约尽管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并赋予国联行政院以某些有限的权力来制止成员国的侵略行动，但没有关于仲裁国际纠纷的普遍规定，也没有关于宣布以战争作为解决纠纷问题的手段为非法的普遍规定。第三，国际劳工组织据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联机构的劳工宪章，没有制定关于最低权利的强制性法规；而且，国际劳工组织本身由三方代表组成，其中一半席位给予各参加国政府，而另一半席位又由资方和工人平分。国际劳工组织没有任何立法权；它只能提出一些国际劳工协议，而每个国家都有权接受或拒绝这些协议。第四，控制国联的各战胜国完全拒绝将他们的几个殖民帝国置于任何种类的国际权威之下，尽管在剥夺了德国的殖民帝国并将其领土在他们之间瓜分后，他们同意将这些移交的领土置于从国联获得的委任统治权之下，但不同意把它们置于任何形式的国际管理之下。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委任统治地成了接管它们的那些大国的附属帝国的一部分，只受到很少几项 352 保证，例如在贸易上“门户开放”的约束。

在所有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由 1919 年社会党和工党伯尔尼代表会议任命的代表们，尽可能地对在巴黎的官方谈判代表施加了压力，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各战胜国的战后政府，丝毫不想把它们的主权的任何实际的部分交给国联，或采取任何可能削弱资本主义势力的行动，或把它们的附属帝国投入一个公共机构，因为这意味着让非帝国主义国家在决定这些附属帝国的未来地位时有发言权，而那些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当他们的要求被否决后，发现他们已无能为力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既未控制帝国

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未控制其议会，因而必须做出下列抉择；或者是承认国联，从而也就是承认其全部缺陷，或者拒绝承认它——这就意味着否认它确实具有的优点，和放弃逐渐将它改变为一个更有效的机构的希望。在表明了他们的不满之后，议会派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国联，认为它聊胜于无，而共产主义者则谴责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阴谋。前者继续致力于国联的修补工作——特别是加强它的防止未来战争的能力；但是他们除了通过一些决议以外无能为力，直到他们成功地在一些主要国家里取得政权从而掌握了修改国联盟约的权力。由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1924年的英国工党少数派政府，竭尽所能用加强裁决国际纠纷的规定来使国联盟约有更大的权力，但还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就下台了。

所以，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不得不在一种基本上与1914年以前没有多大差别的体系的范围内制定他们关于帝国和殖民地事务的战后政策，只不过这时德国已经退出了攫取领地的角逐。这意味着，为了取得任何迅速的结果，他们必须致力于改善他们国家的殖民地政策和帝国政策，即要求较好地对待当地的民族，和在那些从这整个体系范围来说可以实行自治的地方在走向自治方面取得有限的进展。根据这种精神，英国社会党人支持印度民族主义的比较温和的要求，做了一点努力来促使英国政府实行比较自由的，旨在提高殖民地福利的殖民地民主自治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政策，而且连续通过一些决议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托管。然而，大部分选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即使社会党领导人希望使这些问题成为竞选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希望——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况且，在温和的社会党人当中有不少人认为，英帝国的瓦解对大不列颠和世界都将是一个不幸，因此认为，正常的前进路线是逐渐发展殖民地

的自治制度，即让比较先进的殖民地以及印度和缅甸这样大的附属国分阶段地取得自治领地位——这种解决方法将使获得独立的地区继续同英国保持联系，并将殖民帝国分阶段地转变成一个由在内部实行自治的国家组成的联邦，这些国家在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上，基本上推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从这种观点出发，甚至从整个议会派社会党人的观点出发，共产党人煽起殖民地暴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给各殖民强国制造麻烦的种种企图，遭到了各种方式的反对，因为它们被看成是对新型的、自由化式的帝国关系有条不紊的发展的威胁；而在共产党人看来，主张逐渐转变殖民帝国性质的政策，是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事业的又一例证。因此，互相对抗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在有关对印度和对其他附属国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也展开了斗争；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在比较先进国家中进行的关于“民主对专政”这个普遍问题上的斗争。

后面有一章<sup>①</sup>将讨论印度问题。而在印度以外，在那些主要居民是当地土人而又有相当大数量的白人殖民者定居的国家里，殖民地的麻烦最为尖锐——例如，在与西非相对而言的东非就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地区，关于自治的要求是由白人殖民者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提出的，而且，甚至是在开始认真考虑以当地大多数人的名义提出这种要求之前。在有关这些地区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不得不把英国的殖民统治看成是反对白人殖民者统治——首先是在肯尼亚——的一道屏障而为之辩护。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殖民部或当地的英国总督的政策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不管怎样他们可以对上述当局施加一些压力，而白人移民的统治将会使当地全体居民处于无力自卫的境地。因此，英国社会党人分阶段地为自己制订了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政策，使他们能够把他们进

---

①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809页。



步的原则同暂时维持殖民统治调和起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脱离了反帝阵营。

在这个殖民政策的问题上，英国社会党人尽管有上述局限性，但整个说来在坚定不移地反对滥用帝国权力上，和在揭露在白人殖民者已经占相当数量的殖民地区白人殖民者虐待当地居民的问题上，有着良好的记录。埃德蒙·迪恩·莫雷尔在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利奥波德国王在刚果的残酷政治以后，继续进行斗争以反对英国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而诺曼·利斯博士，由于他对肯尼亚当地居民受白人统治和剥削的情况进行了长期专心致志的研究，对最初由费边社赞助而写成的伦纳德·西德尼·伍尔夫的综合性调查报告《非洲的帝国与商业》（1920年）中所得出的一些比较笼统的结论，作了精确的阐述。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也在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他和莫雷尔与伍尔夫一起，对制订《英国关于1917—18年战争目标的备忘录》中规定的进步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政策成了《协约国社会党关于战争目标的声明》和1919年伯尔尼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批准的政策的基础。<sup>①</sup>关于把各附属国纳入正在拟议中的民主的国际联盟（这个联盟应是“人民的联盟”，而不是“政府的联盟”）掌握下的国际托管制度的建议，也毫无结果可言，因为各国政府拒绝接受由于承认任何种类的国际控制而放弃或限制它们的某些主权的做法。但是这个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证明共产党人关于议会派社会党人只不过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者的无根据的断言是胡说八道。

其他殖民强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须要对付——法国在这个阶段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摩洛哥，其次是在突尼斯——这两个附属

---

① 见本卷第281页。

国都有相当数量的欧洲殖民者同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低下地位的非欧洲居民住在一起。法国对待这些地区的官方政策大致说来是一种有选择的同化政策。肤色的限制比在英国控制的地区要小得多，官方的目的是要使当地社会中比较富有和比较有教育的成员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并接受法国的霸权，同时把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占少数的殖民者手中，并拒绝占多数的当地人关于自治的一切要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同，它在法律上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里它的政治动荡比较少，而摩洛哥则是风暴的中心。在1914年以前，以饶勒斯为主要代言人的法国社会党，有着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要求的良好记录；但是在分裂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获得了多数，因此在分裂以后，共产党和改组后的法国社会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前者当然是追随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后者在对待殖民者的要求上则采取一种比较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过总的来说，是主张维持法国的最高权威，同时促使在对待非洲人民的社会和经济要求上采取比较自由的和进步的政策。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除摩 356  
洛哥外，这些问题并未真正激化。

在此期间，荷兰政府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它未实行肤色限制，而且在爪哇有些地方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程度的种族融合——顽固地反对当地人民关于自治的一切要求，并尽最大力量镇压刚刚开始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左翼当中有一些影响的人数不多然而活动积极的共产党。在荷兰，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大多数其他问题上一样）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荷兰共产党人数不多，但很活跃；而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右翼和左翼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意见分歧，不久就导致了真正的分裂，这在后面将要叙述。<sup>①</sup>

<sup>①</sup>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517页。

比利时人在刚果接管了利奥波德腐败而残酷的政权后，在对待当地居民上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没有同时在自治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在那里几乎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有组织的自治要求。在朝的和在野的比利时社会党人，都支持对旧弊病进行改革，但没有受到任何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因为那时还不存在这种运动。根据和平条约，比利时获得了对毗邻的人口众多的领地卢旺达—乌隆迪的委任统治权，那里以前是德属东非的一部分，而且是为加丹加矿区及附近其他地区提供外来劳动者的重要来源。从1925年起，卢旺达—乌隆迪被划为比属刚果的一个省，同时仍然处于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之下。和在刚果一样，这里也未形成任何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比利时行政当局没有受到当地班图人的自治要求的困扰。

余下的欧洲殖民帝国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了；就本章的目的而言，对它们毋须多述。从1920年起，在摩洛哥的法属和西属地区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920年在西属地区开始了由阿卜杜勒·克里姆领导的里弗起义，并于次年在阿努阿勒击败西班牙人时达到高潮。<sup>①</sup>此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于1926年合力击败民族主义者；但在这两个殖民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对抗，西属地区成了反法宣传的中心，矛头指向由利奥泰及其继任者推行的法国殖民政策。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寻求摩洛哥部队支援时作出的长期未能兑现的关于自治的诺言，则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与此同时在葡萄牙，1910年10月共和革命以后出现的完全不稳定时期一直延续到1926年，当时戈麦斯·达·科斯塔将军和卡尔莫纳将军建立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不久以后卡尔莫纳成了唯一的领导。后来卡尔莫纳任命萨拉查教授担任他的财政部

---

<sup>①</sup>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541页。

长，1932年，萨拉查在成为总理和实际上的独裁者以后，通过一次公民投票使人们接受了一部社团主义的新宪法，这部宪法在葡萄牙一直行使到今天。萨拉查的主要成就是用严格节约和改善税收的方法使葡萄牙的预算获得平衡；他把同样的政策运用到葡萄牙各殖民地的预算上，他改善了那些地方的行政管理，但丝毫没有对自治的要求做出让步——当然，他在葡萄牙的内政问题上也拒绝了自治的要求。

在欧洲以外唯一重要的殖民强国是美国，它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后吞并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并且获得了干涉古巴的广泛利。然而，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不是在这些地区，而是在对墨西哥和中南美的关系上，采取的形式是美国的投资机构和大型商业联合企业日益扩大的侵入，正如后面我们将要谈到的，<sup>①</sup>这些地区的左翼民族主义运动日益激烈地反对这种侵入，共产党人则竭尽所能地使自己居于反美鼓动的前列。

在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以及保护当地人民免遭更为极端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等问题上，以及在世界政府的思想 and 在国际纠纷中接受仲裁以防止战争等问题上，属于战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社会党人重新采取了老的第二国际的政策，积极要求采取可以和平地实施，而不致引起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或他们之中互相冲突的势力之间发生斗争。如前所述，他们开始时雄心勃勃地计划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国际联盟，这个联盟的组成不是作为政府间或甚至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实际享受到民主的议会政治的自由人民之间的联盟。他们计划谴责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力求把世界发展的合作计划同把附属领地置于国联管制之下结合起来，同联合使用先进国家的资源以提高落后国家的生活

---

<sup>①</sup>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750页。

水平结合起来,但是,事实立即表明,没有很快建立这样一个国联的前景,而且尽管威尔逊总统在他的“十四点”计划中所提倡的自由原则被认为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的,加速中欧强国的瓦解,但对和平条款或对国联及其附属机构的实际组成则没有什么影响。美国关于不加入国联和尽可能摆脱欧洲事务的决定也是使威尔逊宣布的原则归于无用的一个因素。议会派社会党人因而调整了他们的政策以适应他们面对的实际情况;这就意味着把他们大部分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束之高阁,而尽可能把坏事变好。他们仍然致力于要求加强国联盟约以便扩大国联防止战争的权力;鼓吹裁军;呼吁修改当前的赔款要求和使德国及其他战败国回到国际大家庭;但是,用议会民主的方法是不可能近期达到这些目标的,除非是在一个复苏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结构里,和在一个由各战胜国控制的各独立国家的组织里。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关于在世界范围向贫穷进军的计划(其形式是制订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促使落后国家的发展)显然就无从考虑了。唯一可行的似乎只是在每个先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改善其管辖下的人民的待遇和要求在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结构内逐渐对要求自治的呼声做出某些让步。

这样一种政策完全意味着对理想主义的巨大牺牲,和与共产党人的政策针锋相对,共产党人的政策是支持任何地方的反帝革命,支持在任何有机可乘或可以人为地制造机会的地方煽起内战。实际上,共产党的这种行动计划在它显然已经失败后,已经作了非常重大的修改;一般的重点已从立即发动世界革命改变为利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作为代理人来保卫苏联。但是,在殖民地和发达国家,这种修改没有带来多大差别;因为帝国主义大国的附属领地和势力范围内的情况愈混乱,这些大国利用那里的资源反对苏联的可能性就愈小。因此,共产党对待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态度,仍然主要是颠覆性的,而且与议会社会党人发生了日益尖锐

的对立,因为后者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逐渐改善殖民地的状况和政权上,并且设法在殖民地寻求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同盟者,以逐渐改善状况,反对鼓吹反帝革命的好斗的人们。在殖民地区,共产党“颠覆者”与进步的“渐进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规模比以前要大得多,特别是在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北非;但在二十年代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障碍,使得社会党人无法通过一个共同的国际采取统一的行动,这个国际应该具有足够广泛的基础,包括共产党人和主张采取民主的议会手段的人。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曾经再三强调战争如果不是完全地也应该大部分归咎于资本主义——归咎于各国资本家集团的角逐,归咎于资本主义强国开发和剥削不发达地区的共同行动,以及它们不断地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垄断区域,还应归咎 360 于一种只有靠扩大向资本主义剥削开放的市场才能摆脱日益加重的严重危机的制度的内在矛盾。这些被认为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因此认为,只要资本主义一旦被推翻,各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战争就不会再折磨人民。无疑应当承认,即使在资本主义已被替代以后,各国之间的争端仍然可能发生;但是人们认为,妨害用和平的合法裁决或用仲裁来解决这些争端的障碍将会清除,实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被认为包括反对战争的斗争,而国际调停和仲裁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一旦被消灭以后将很快被人们接受。诺曼·安吉尔在他的《大幻想》(1910年)一书中曾企图驳斥那种认为战胜国能够指望凭借战争获利的说法。他基本上证实了他的论点,但是未能证明,即使这一论点得到普遍承认,就能够使战争不发生。因为即使没有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国家而言)能够指望从现代战争中获利,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就没有任何国内利益能够指望从战争中获利,或者这种利益不可能大到足以带来战争,甚至使被卷入的国家遭受到普遍的损害。强大的资本

主义集团对他们国家的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仍然能够为了他们的私利而把他们的国家引入战争；而这种影响确曾支配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列强所推行的政策。

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即使说资本主义利益完全能够把国家引入战争，战争的原因就可以用纯粹经济上的原因加以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地有着经济动机的巨大因素；但也有其他的力量在起作用——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欲望，经济权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尽管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这种仅仅由于权力会带来威信因而加以追求的情况，在德国特别强烈，在那里，这种追求是基于一种所谓德国“在文化上”优于其他民族的说法，基于对那些在征服殖民地方面走在德国前面的国家的忌妒，基于把显示出军事力量作为国家优越性的最高表现。日本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同样的倾向，经济动机和更普遍的“权力”动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不能用纯粹的经济词汇加以说明的侵略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理论基础的第二国际，低估了在国际紧张局势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据此制定一种理论，说资本主义是制造战争的唯一真正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在坚持这种理论方面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坚决，而在贯彻执行这种理论方面要坚决得多，以致得出结论说，战争一旦爆发，就应该利用它做为通过世界革命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机会。这种坚持固然与1907年第二国际通过的斯图加特决议中众所周知的最后一段话中所写的内容相符合，这个决议是在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初的反对而坚持下通过的，后者只是在压力之下才接受这一决议的。<sup>①</sup>但是，这种名义上被接受的政策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组成第二国际的那些党的政策的一部分；1914年第二国际的崩溃，就各

---

<sup>①</sup> 见第8卷上册，第62页（中译本第72—73页）。

交战国的主要党中的多数派而言，这种政策实际上就结束了。德国人在他们 1918 年的革命中，没有在摧毁军国主义专制的同时试图摧毁资本主义。奥地利人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走得这样远的话，协约国对他们的帮助就会撤消，而他们的新共和国甚至更加依靠这种帮助才能存在下去。在英国和法国没有发生革命，除了人数有限的少数派以外甚至没有人想要闹革命，因此，立即摧毁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本无人提起。在意大利，距离革命要近得多，但是即使在那里，大部分社会党人在占领工厂向资本主义挑战后又后退了——因此意大利革命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如果社会党人在 1914 年以前关于资本主义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的说法是正确的话，这种原因在 1918 年以后仍然在起作用，因为除了在俄国以外，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维护了它的权威，而且，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权最后决定采取自己的路线，甚至采取战争手段。而且，即使说他们把战争完全归咎于经济因素是错误的，战争的危險显然并未因为赋予国联的有限权威而消除，国联充其量只不过能在战争的道路上设置某些障碍而已。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它关于战争起因的宣言里，基本上是重复第二国际时期曾经说过的话，但是，尽管它对国际联盟不是人民的联盟而是资本主义政府的联盟这一点持批判态度，但它仍决定参加国联工作，目的是为了改进国联的机构和方法，特别是为了接受仲裁作为代替战争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为了促进裁军，或至少是逐步限制军备。在个别的社会党人作为非社会党政府的代表参加国联事务的问题上，发生过一些争论，特别是在关于法国的 J·保罗·邦库尔的地位问题上。他在 1924 年第一次被任命为赫里欧政府的代表，在继任的白里安政府下继续任职，而白里安政府是法国社会党所反对的。人们认为，社会党政府，或包



括社会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然有权派遣社会党代表参加国联事务，但问题是，社会党人除了在上述情况下被遴选者外，是否有权参加。然而，没有采取行动来阻止这种参加，而且在后一阶段内，阿瑟·汉德逊在任命他为代表的工党政府垮台以后仍然担任国联裁军委员会的主席。一般地说，社会党的政策是利用国联做为推行裁军和国际仲裁政策的工具，同时不断强调它的缺点和要求充实它的权力。

363 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把精力集中到一些与社会主义毫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上，而且在一些议会派社会党人可能与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或不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战争危险的主要原因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和平主义者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社会党人没有做什么明显的努力来宣布战争为非法，接受仲裁作为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以及由列强共同达成协议实行逐步裁军，以便减轻人民由于紧张的军备而带来的沉重负担。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显然是可取的；问题在于要想通过国联来实现这些是否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国联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政府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它肯定会否决任何试图从根本上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倡议，而在现代世界上，它们是与国联不可分割的东西。议会派社会主义者大部分人愿意利用国联，希望逐渐改善它，正如他们希望依靠在选举中获胜的方法加强社会主义的影响以改善他们自己国家的活动，从而导致在适当的时候控制政权一样。相反，如果否定国联及其一切行为，其结果势必是意味着，必须先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可能建立任何能够有益于人类的国际联盟；而任何这种看法都不可能同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用和平的而不是革命的手段分阶段争取到的某种东西的思想相一致。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大部分活动是同国联的事务而不是同社会主义有关的；所以在书记处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篇幅最长

和内容最详细的部分是谈论它为促进裁军和仲裁而做的努力。

很多理想无疑变成了由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们所鼓吹的和平。在许多社会党人的思想上，认为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显然是互相联系的事业；面对191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恢复，通过世界革命推翻它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大部分议会派社会党人的倾向从试图用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消除战争的起因——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转变为谋求用减少战争危险的方法来改善促进社会主义的机会。因此，和平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似乎就结合在一起，而且实际上由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各党所同时推行，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只有共产党人和少数其他革命者对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进行的改革不感兴趣，仍然企图重新进行暂时处于半停顿状态的发动世界革命的任务。

这种强调和平、仲裁和裁军的结果之一是，国联可能进行的经济方面的活动被贬低了，有时是无意识地，而有时则是故意贬低的。因为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必须从无论什么地方寻求可以找到的同盟者，特别是从支持建立一种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寻求同盟者；但是这些同盟者当中的大部分人会强烈反对建立一种有计划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计划，这些计划曾经是那些提倡组织一个各国人民的联盟而不仅仅是一个各国政府的联盟的社会党人的主要目标之一。争取把各国的附属领地纳入一个用民主方式组成的国际权威当局的管辖之下，或者争取组织一个世界性改革运动以提高比较落后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主要的希望都已落空，剩下的只不过是继续进行激进的和和平主义的长期斗争以防止战争和建立一个几乎只限于这个唯一目标的国际权威机构。这在当时对一些社会党人来说，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普遍革命理论而又不得不面对重建起来的资本主义似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如何也能维持下去的事实。只是当资本主义陷入三十年

代的危机和萧条时，形势才起了变化，又一次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已迫在眉睫的想法戏剧性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到那时，和平主义已经成为温和的社会党政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因素，以致西方各社会党发现自己很难使他们的政策适应由于纳粹主义的兴起和法西斯主义对和平以及对以民主的方式对待世界问题的作法所造成的威胁迅速增长而带来的新形势。

实际上，在二十年代，对议会社会主义来说，没有一条有效的中间道路，要么接受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同时谋求通过加强国际联盟，和在每个议会制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逐渐走向“福利国家”，以此来改变这种秩序的运行——这是各西方社会党实际执行的政策——要么就同俄国人妥协，采取一致行动以实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俄国积极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或阻止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继续受资本主义路线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不妥协态度，西方许多左翼社会党人仍然极不愿意放弃希望的原因；他们不仅希望同苏联取得缓和，而且希望同它在世界事务方面结成积极的联盟。这些社会党人抱着一线希望，即希望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必须推迟后，将会放弃他们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尖锐的敌意，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取得反对资本主义的进展，而且希望苏联会加入国际联盟，并不再仅仅以破坏的方式进行活动。现在很容易说——而且甚至可能是正确的——在斯大林的多疑的领导下，根本不可能指望苏联会奉行这样的路线。然而不管怎样，在二十年代后期里，这一点还非常不明显，当时俄国人刚刚在中国遭到巨大挫折，正在迅速恢复他们的工业并准备开始执行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不仅像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和亨利·诺埃尔·布雷克福德这样的左翼人士，而且像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这样的老牌的渐进主义者

部显然愿意考虑把他们的政策放在希望东西方社会主义之间的和解和联盟的基础上。由于双方均持不妥协态度，而且由于他们各自的理论和基本教条根本无法调和，这样一种联盟也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一个两种极端理论都不接受的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除此以外又能追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两种极端主张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当然无从作出选择。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坚持阐明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同时，即使不能把双方拉到一起，也要抓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同任何一方合作，希望用这种方法完成某些值得做的事情。在二十年代，这意味着比较经常地同右翼社会党人合作，因为这些人比较愿意接受帮助，而且不那么动辄把试图帮助他们的人说成是叛徒。而在三十年代，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以后，中间派就更经常地与共产党人采取联合行动，特别是在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方面是如此。但是，不论倾向于哪一方面都未能取得持久的成就。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之间的裂痕包含着极深刻的分歧——不仅在原则和理论问题上，而且在日常活动问题上——以致双方的对立无法克服，也不可能互相同意保持沉默而不了了之。两个对立的国际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互相对立的信念，而且是格格不入的气质之间的一场真正的斗争。我认为，这是两种谬误之间的斗争，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而变成一种正确的东西。

(周叶谦 译)

## 第十一章

### 法西斯在意大利获胜

如前所述<sup>①</sup>，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大多数反对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坚持反对态度。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意见不同的集团——特别是以列奥尼达·比索拉蒂（1857—1919年）和伊万诺埃·博诺米（1873—1951年）为首的改良社会党人，这些人于1912年由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提议被开除出社会党，从此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党。就在1912年7月在勒佐内尔艾米利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议会中的社会党也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议会外“指示”的各项命令；墨索里尼替代克劳迪奥·特雷韦斯（1869—1933年）成为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当时正值利比亚战争期间，那场战争是社会党坚决反对的——墨索里尼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社会党人主张严守中立；而当欧战于1914年爆发时，该党在开始时似乎团结一致反对意大利参加。但是，到1914年10月，墨索里尼改变了主意，鼓吹意大利站在协约国方面参加战争。这种态度的改变导致他被开除出社会党。丧失了《前进报》主编的职位后，他开始创办他自己的《意大利人民报》，并开始建立“战斗的法西斯”，从这个组织发展起法西斯运动。1915年4月，萨兰德拉右翼政府签署了伦敦秘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意大利为了获得一些领土上的让步，同意在下个月内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于是，原来的首相焦利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9页。

蒂试图取代萨兰德拉并获得了下议院的大多数支持；但是国王拒绝将萨兰德拉撤职，他仍然掌权并在5月里向奥匈帝国宣战，但未向德国宣战。面对这个既成事实，社会党通过它的老领导人康斯坦丁诺·拉扎里(1857—1927年)发出通知，号召它的成员“既不合作也不破坏”，这在一段时期里一直是党的官方路线。1916年8月，新首相保罗·博塞利对德国宣战；他的内阁中包括比索拉蒂。意大利已经有许多人对伦敦秘密条约不满，条约的条文已经泄露出来，但直到俄国人在革命后从沙皇的档案中发现了该条约的副本之前，它一直没有公布。比索拉蒂本人成了被称为“放弃权利运动”的主要鼓吹者——即是说，放弃根据这个条约让给意大利的一切领土要求，除了那些主要由意大利人居住的领土以外。墨索里尼与社会党意见一致，也是“放弃运动”的支持者。368

1917年2月，意大利社会党通过了一个新纲领，作为它战后行动的依据。它宣布主张实行普选，主张成立共和国，而且要求广泛发展公共工程，特别主张开垦荒地。在罗马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以阿马代奥·博尔迪加(1889年生)为首的党的左翼，与受到比较微弱的右翼支持的中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方面都谴责参加议会的党无所作为，并且要求它靠拢群众运动和更强烈地反对战争。实际上，唯一真正的分歧是，左派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对参加议会的，而占多数的一派人，尽管也宣布了革命的意图，却支持当时的议会活动，条件是，参加议会的社会党不应与资产阶级的任何派别结成任何种类的联盟，而且不应参加，也不应保证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政府。

这些事情发生在战争正在不利于意大利人的时刻。由于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军队开始解体，奥地利人头一次可以腾出手来把他们的主力用来反对意大利人，德国人也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在社会党会议之后不到两个月，卡多尔纳在卡波雷托遭到惨败，意大369

利军队面临瓦解的危险，同俄国人即将面临的局势一样。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奥兰多取代博塞利担任政府首脑，以弗朗切斯科·尼蒂为他的主要同僚；由迪亚兹取代卡多尔纳任总司令，成功地恢复了军队的纪律并扭转了整个军事崩溃的局面。民族危机加剧了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以党的元老菲利波·屠拉梯（1857—1932年）为首的社会党右翼，尽管没有多少群众支持，在议会中的力量却较强，他们公开支持战争努力，而左翼，包括作为具有强烈煽动力的领袖而出现的尼古拉·邦巴奇（1879—1945年）在内，从普遍的混乱中找到了机会来加强反战宣传作为走向实际革命的一个步骤。邦巴奇后来成了法西斯的一个主要人物，并于最后在1945年与墨索里尼一起被处死，这时他站在极左方面；但他主要是在党组织内得到以党的元老康斯坦丁诺·拉扎里为首的大多数人的支持。1918年初，他和拉扎里都被捕入狱；但鼓动仍然继续进行。战争在意大利人民当中不得人心，工会和社会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如前所述，意大利社会党人曾是1915年齐美尔瓦尔得和1916年昆塔尔两次会议的主要鼓吹者；<sup>①</sup>他们的领袖们以最大的热情和同情注视着1917年俄国事态的发展。这个党的大多数人热情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左派和中派都在等待机会效法俄国的榜样，尽管他们对这个榜样的解释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认为，在战争结束以前，这个机会是不会来到的。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强大到足以在前线战事结束以前试图采取行动，而战事结束后，政府不得不面对由于军队复员和由于一些政治家许诺给农民以土地和通过符合产业工人利益的社会立法——工人和农民们肯定知道那些做出这些许诺的人根本不打算兑现——而引起的无数问题。

由于法国和英国派遣部队的支持，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惨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0页。

败后没有瓦解。迪亚兹由于对逃兵和违反军规者采取明智的宽大政策而把他们维系住了；但是，大群的逃兵散在国外遥远的地方。然而，在1918年发生决定性崩溃的是奥匈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意大利人发现自己站在战胜者一边，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卡波雷托的屈辱以后和由于俄国发生的事件使革命情绪更加强烈，战争就更加不得人心。

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是在1917年以后影响迅速增大的许多力量之一。浪漫的民族主义在诗人—飞行员加布里埃莱·邓南遮(1863—1938年)的影响下，在1919年最初几个月里，在一部分青年人当中成为一支日益增长的力量，这部分年轻人强烈反对放弃意大利根据秘密条约得到的权利，并强烈反对牺牲意大利人在达尔马提亚或的里雅斯特的权益而向斯拉夫人的要求让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团体，领导它的是一个首先决心要对社会党人进行报复的人，因为他们因他支持意大利干预战争而把他逐出党外。然而，在1919年头几个月里，法西斯主义还是一支变化无常的政治力量。墨索里尼本人在对待秘密条约的问题上还是一个“放弃权利派”。他的唯一明确的看法是，社会党人尽管公开声称抱着革命意志，实际上并不认真去做，也没有一项他们具有足够的决心加以实现的一致同意的政策。他准备等待时机到来时用他法西斯党人的全部力量反对他们；但就当时而论，他知道力量太弱，不能采取独立的方针。当时重要得多的力量似乎是罗马天主教主义，它作为一个谋求议会权力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

1918年以前，罗马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尽管已经放弃了号召善良的天主教徒拒绝承认世俗的意大利国家的政策，但仍然反对组成任何公开的政党以保护天主教利益。一些积极的天主教徒在议会政治中主要是作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而起作用，而占



主要部分的天主教农民根本没有参加。但是到1919年时，由于选举改革，出现了按比例代表制参加选举的选民群众，这种情况迫使政党领袖们必须寻求群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改变了它的传统政策，让西西里的神父唐·路易吉·斯图尔佐（1870年生）创建人民党，作为民主的天主教主义的代表，制订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改革纲领，作为一个反对反教权主义和反对革命的堡垒。1919年初成立的人民党是由立场十分不同的各种成分组成，从反动的保守分子到进步的社会激进分子；但是它为了迎合人民的意愿，强调它的激进的一面，特别是有关土地改革和社会立法以及要求地方分权和减少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势力。因此，它能够利用一些老的政党脱离群众和丧失信誉的条件，成为表达广大农民群众不满的中心，特别是在社会党人未能把农民拉到自己一边的南方是如此。的确，社会党人的巨大弱点是，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他们除了象在艾米利亚等少数几个地区外，未能赢得相当数量的农民支持，并且表现得几乎毫不了解农民的问题或态度。他们在某些省份的农业临时工当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在天主教农民中，尽管这些人境遇很苦和日益不满，却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

新的人民党在迎合这些落后集团的要求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很快就在城镇的天主教徒中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在1919年的普选中，它赢得了100席——几乎是每5席中赢得1席。如果社会党人和天主教人民党人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们本来可以凑成一个微弱的多数，如果再稍微得到激进党人的支持，便可组成一个能够工作的政府。法西斯党人和邓南遮的追随者在1919年的选举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是，这种联合的前景渺茫。不仅

872 因为社会党人激烈反对教权，而且他们完全信守这样一种政策，即如果不能立即革命，无论如何也要做革命的准备，这就排除了利用

议会作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工具的任何打算。1919年8月,他们宣布正式退出第二国际,更确切地说,他们拒绝参加伯尔尼会议关于重建第二国际的决议。此后,在他们在大选以后不久于1919年10月举行的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上,决定赞成根据俄国的榜样进行暴力革命,宣称“无产阶级必须使用暴力以保卫自己免遭资产阶级的暴力进攻,以夺取政权和巩固革命成果”。由于他们作出决议,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决定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便最广泛地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才使上述宣言得到肯定。在这个基础上,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修改了1892年制定的社会党纲领,并在修订的文本中加入了“一个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深刻变化将导致此后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统治”。纲领继续宣称:“资产阶级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工具(国家,地方行政区和文官)决不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机构”,而且,“针对这些机构必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机构(工农代表会议,公共经济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首先应该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作为用暴力斗争争取解放的工具,然后作为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在共产主义新秩序下重新进行建设的机构”。这个纲领宣称,这种“暴力夺取政权”将建立“整个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过渡政权”;在这一过渡之后,“随着阶级的消灭也会出现任何阶级统治的消灭,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最后,这个决议宣布意大利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把它视为 373 “宣传和捍卫这些原则的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组织”,并且决定与那些承认阶级斗争的工会达成协议,以便这些工会可以“深刻了解这些原则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基础”。

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意大利社会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一派,在宣称自己奉行暴力革命政策的同时,认识到自己还没有条件立即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且设想将有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议会

政府将继续存在，社会党的议员是资产阶级政府（无论它的组成或政策如何）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而在议会以外，社会党人在工会的协助下将尽最大可能使这种政治制度归于无效，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机构，以便准备在他们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把政权拿到自己手中时代替那个制度。他们这样计划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无疑是由于不仅他们自己认识到还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且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因为俄国革命分两个阶段进行，而且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战略是以两次连续的革命的理论为基础，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革命。<sup>①</sup>当然，俄国 1917 年以前存在的情况和意大利 1919 年时的情况并无真正相似之处；因为在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至少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即俄国人在 1919 年必须为之而战斗的制度，已经存在了。然而，在俄国发生的事件，诱惑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似乎有必要在意大利也重复同样的过程；而且这种战略正好适合意大利社会党人还不具备立即进行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

波洛尼亚代表大会的这个政策宣言，是根据构成这个党的主要力量的所谓“最高纲领选举派”提出的建议写成的。这个建议以 48,411 票对 14,880 票击败了由右派支持的“最高纲领统一派”提出的建议，右派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个建议还击败了仅仅获得 3,417 票的极左派的建议，该派反对参加议会选举，主张立即进行革命尝试。这个左翼由阿马代奥·博尔迪加领导，他的追随者们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共产党。作为议会派右翼领袖的屠拉梯和特雷韦斯未敢强制推行他们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不使党分裂，不论是与党决裂，或者是被党开除。因此，他们同“最高纲领统一派”投了一

---

① 见本卷第 73 页。

样的票，因为这一派和他们一样反对分裂，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推崇布尔什维克和赞成革命的而不是改良主义的政策。由于“最高纲领统一派”的人这时候没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因而这一策略使右派得以免于立即被驱逐出党，尽管他们强烈反对绝大多数人赞成的革命口号。

社会党和工会内部的斗争到1919年10月时达到高潮，但从前一年11月的休战以来就日益激烈。斗争达到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主要的工会组织总工会于1919年1月在波洛尼亚举行的代表大会期间。当时总工会通过了一个战后纲领，号召建立一个共和国，废除元老院，要求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要求实行能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制度，在立法问题上有复决权和否决权，以及要求废除政治警察，和由众议院完全掌握外交政策。此外，总工会纲领中还含糊地提出要求召开制宪会议，把它主要看成是一个有权修改意大利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全面土地改革和处理拟建立的共和国的工业管理和财产地位等整个问题的机构。但根本没有清楚地说明制宪会议如何选举以及这个会议的权限和任务为何。纲领中的词句只是一种口号而不是一种条理分明的计划；而且所提的要求立刻引起了以下两种人之间的争论，一种人坚持认为它应当是一个375纯粹的无产阶级机构，它的基础是地方上的工人行会，另一种人则主张它是某种选举产生的全体性会议，与正规的下议院并肩工作。当时的下议院中的社会党议员，大部分是屠拉梯的追随者和议会政府的支持者，他们立即反对总工会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社会党左翼更加激烈的反对，他们主张暴力革命和彻底摧毁现存的政权，因为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机构。

实际上，1919年时，总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社会党主体的右翼。主要依靠存在于许多市镇的当地工人行会的支持，它主要是依靠地方性的聚合力而不是靠行业或工业部门全国性的结合而团

结了大部分的工会会员。它包括很少几个组织严密的全国性的产业联合会，例如意大利五金工人联合会，曾是1920年秋季占领工厂运动中的主要角色；但是这样的组织只是个别的，而另外的最重要的产业工会，铁路工人工会，并没有参加总工会。在铁路工人工会里，工团主义者的影响很强大，而且还有一个对立的工团主义者的工会组织、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其人数和影响都比总工会小得多。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单独的工会运动，意大利劳工联盟，它是在战前成立的，但在1919年成为新的人民党的工具之前，不起多大作用。总工会本身的领导由社会党人占绝对优势，但是主要的重点放在为改善劳动条件、要求物价稳定和社会立法而采取罢工行动上，不是放在革命上。但是，它象法国总工会一样，对于工人管理和要求分享企业的管理权很感兴趣；而且它的有些地方工人行会积极参加生产者的合作运动，以及在严格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推动消费者的合作运动。1919年期间，工会和工人合作社都迅速发展，而且充满革命精神的社会党热切盼望跟总工会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希望把它的组织拉到革命方面来。

正如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一样，意大利在1919年也是萧条、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一年。里拉在1918年底时对美元的比价是6：34，一年以后差不多贬值三分之二，成了18：47。在进口煤和原料方面发生了严重困难，而意大利的工业和交通是完全指靠进口来维持其存在的。生产被迫削减，铁路业务缩小；复员的军人只能在打短工的基础上与已经在业的人员分摊一些工作。食物价格猛涨；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津贴面包费用。罢工此起彼伏，而且通常总是获胜——不管怎样，从生活费用上涨的角度来看，工资总算不断增加。雇主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但是，面对工会不仅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要求实际分享企业的管理权时，大企业主们变得越来越顽固。到1919年夏天时，有些大雇主开始资助法西斯主

义者，把他们视为能够采取有效行动反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

实际上，法西斯主义者已经采取了非法的暴力行动，在几年之内摧毁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并使墨索里尼掌握了最高权力。墨索里尼的“勇士”们在1919年最初几个月里已经对社会党人和工人行会采取了零星的暴力行动；而且在4月里，墨索里尼对他以前的同志们采取了第一次大规模报复行动。在他的命令下，一群“勇士”袭击和烧毁了米兰的《前进报》编辑部；这次暴行没有受到惩罚和报复。虽然米兰工人曾举行总罢工来进行报复，而且筹集了一大笔钱来重建被毁的建筑物。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粉碎法西斯匪帮；就是从这时起，墨索里尼开始寻求大雇主们支持他反对社会党的暴力行动和毁灭性打击。

1919年6月，比较开明的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继奥兰多出任首相。尼蒂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意大利南部人，没有大的政党做后盾，对他必须加以应付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除了理论上的知识外，没有实际的了解。他本来应该乐于领导一个得到国会广泛支持的温和的自由化的改良政府，而且本应乐于接受温和的社会党的支持；但在意大利当时的政局下，这样的政府没有存在的基础，而且尼蒂也不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对付土地改革和通货膨胀之类非常困难的问题的人。他实际上最关心的是外交事务，在这方面他不得不接受奥兰多在巴黎和会上徒劳无益地采取不妥协态度所造成的局面，而且尽他可能使协约国以不太苛刻的价格供应更多的煤和原料，以及缓和意大利同亚得里亚海对岸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19年9月，邓南遮率领他的义勇军团占领了由协约国部队驻守的阜姆<sup>①</sup>，既公然无视政府，又引起了一场国际关系危机，他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法

<sup>①</sup> 阜姆，今名里耶卡，属南斯拉夫。——译者注

国和英国的驻军没有与这些义勇军团作战，而是撤退了，让邓南遮占领了该地；他着手组织一个实际上是独立的政府，而且占领这个城市达一年多，因为意大利政府不敢命令国家的武装部队驱逐他。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尼蒂不止一次辞职，但又重新掌权，因为没有其他政府似乎能够对付社会党和人民党的联合力量。罢工和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1920年3月，实业家们发出呼吁，要求政府采取有力行动制止罢工运动，削减公共开支；而在5月，尼蒂在右翼的强大压力下发布一项国王敕令，大大削减了对面包的津贴。因此而产生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了左翼的强烈抗议；尼蒂先是撤消了这项敕令，然后在失去了国会  
378 本已朝不保夕的支持后辞了职。早在窥伺机会的“老狐狸”焦利蒂重新执政，他领导的政府里包括斯福尔扎伯爵、前社会党人博诺米和杰出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内代托·柯罗齐，他主编的杂志《社会评论》誉满全欧。焦利蒂为了减少麻烦，命令意大利部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但感到还没有力量对邓南遮采取强制行动。焦利蒂在阿尔巴尼亚采取的行动引起了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但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国内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实业家和五金工人联合会之间发生了一次大的争执，这个联合会是总工会中最强大和最积极的一部分。由于雇主拒绝同意工人们的要求，这个联合会于1920年8月发出命令，要求它的成员们不要罢工，而采取怠工和死扣规章制度而减少工作的办法。这激怒了雇主们，将近8月底时，米兰规模巨大的罗米欧工厂的管理当局宣布停工并把他们的工厂关闭。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进行报复，并且要求雇主们同意让工人代表参与管理这家康采恩。争端迅速扩大：在五金工人联合会的命令下，工厂一个接一个地被工人们占领，他们或者强迫经理和技术人员接受他们的命令，或者任

命他们自己的经理，试图在工会的管理下进行生产，同时要求各地都实行新秩序，以便工人们有效地参加管理和制定工业政策。由于大的金属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北部，特别是在都灵和米兰，这个运动暂时对该国其他部分还没有重大的直接影响；但它紧接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工人们是否会象他们扬言的那样，一旦条件成熟就要把占领运动转变为革命。为了在他们自己管理之下继续生产，工会必须获得原料和燃料，还必须有钱来支付工资；除非他们多少能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东 西，而且除非他们也能获得信贷以便度过出售产品和支付工资 379 之间的一段时间，否则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无论是雇主阶级或者银行家，或者政府本身，似乎都不会在任何这些方面帮工人 们的忙；因此必须立即决定是放弃维持生产的尝试，还是夺取那些控 制销售过程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把运动转变为一场革命。在这种 情况下，焦利蒂也必须做出选择，是使用武力把工人们从工厂中驱 逐出去，恢复资本主义经营呢，还是让占领继续下去，但不帮助工 会克服困难，等待这个运动或者转变为一场革命，或者当工人们因 饥饿而屈服后自行瓦解。焦利蒂深信工人们不敢实际采取他们扬 言要采取的革命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党人提出的威胁 ——因而他采取了等待政策；事实证明他正确地估计了将要发生 的事情。五金工人联合会要求总工会确定政策，但总工会既不承 认失败，也不宣布进行革命，而是企图命令把占领运动从金属制造 业扩大到其他行业来继续进行斗争。与此同时，焦利蒂亲自前往 占领运动的主要中心和社会党人与工会左翼的坚强堡垒都灵，在 那里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表明他似乎准备做出巨大的让步来满 足工人们的要求，包括他们关于分享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他建议成 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由工业联合总会——雇主们的中央组织—— 和总工会各派相等的代表组成，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拟定方案，



以便政府采纳用来提出一个法案，在工人参加企业的技术、财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上改组工业。”作为交换条件，工人们将交还工厂，并在委员会工作期间恢复正常工作。

焦利蒂当然非常清楚，这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不会达成协议，  
380 最终将由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正象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的那样，他的目的是要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破坏占领运动，“使工人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建议是多么荒谬可笑，这样他们的头目们也就没有借口来责备别人了。”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供动用，既不足以驱逐工人和守卫工厂对付工人，也不足以维持街上的秩序，工人们可能在街上聚集起来进行示威，而且肯定会转为暴力行动。如果他认为除了对政府方面使用武力做出反应以外，会有发生革命的实际危险的话，他无疑会采取不同的做法；但他知道得很清楚，总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反对进行革命的尝试，社会党的领袖们也四分五裂。因此，他认为时间对他有利，占领运动很快将会失败，特别是如果有少数一部分参加者可能被引诱相信政府想要做某些事情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更会是如此。事情正如他所预料。社会党在总工会向它征询意见时，建议接管工会对运动的控制，但在负责把运动转变为革命的问题上退缩了；这时，社会党的议员们要求正在休会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局势——焦利蒂则认为他在没有议会参与的情况下能够处理得更好。结果，在双方都施展了大量的策略后，混合委员会成立了。它花了一些时间争论关于占领期间的工资如何支付的问题，在工人参加管理的问题上则意见完全相反，于是便破裂了。工人们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回去工作，而且当政府未能实行焦利蒂似乎曾经允诺过的联合管理时，感到非常失望。社会党人互相之间激烈地指责对方未能使占领运动成为革命的起点。在整个意大利都感到，工人中的革命热情的高潮已经过去，并正在开始退潮；而法西斯党人，由于从大企业得到越来越

越多的援助，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暴力行动，以反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相信他们终于开始把可恨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赶跑。虽然法西斯党人向罗马进军、从而使墨索里尼成为政府首脑是在两年以后的事。但在1920年9月，社会党人未能抓住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机会发动革命；从那以后，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希望一样很快就一步步地消失了。 381

就在社会党人和工会正在实际的革命面前退缩时，共产国际给社会党送来了在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致同意的“二十一条”这颗炸弹。前面已经谈到的莫斯科最后通牒，<sup>①</sup>发表在1920年9月21日的《前进报》上，同时发表一篇社论，强烈批评它的条件，并说不管这些条件是谁起草的，他简直对意大利或其社会党人毫不了解。在接受“二十一条”上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在于社会党必须遵循的政策，而在于它公开要求该党必须开除它的右翼领袖们，包括它的杰出的国际人物、深受欢迎和尊敬的屠拉梯在内。屠拉梯尽管完全不同意党所正式奉行的革命政策，但仍然留在党内，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这种信念是他和大多数中派以及不那么过左的领袖们所共有的。开除他和他那些改良主义的伙伴，就意味着分裂，那就绝不止是开除改良主义分子。这将至少牵涉到相当一部分社会党议员以及很大一部分追随党的工会，并将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在它面对法西斯党人日益强大的进攻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自己的队伍的时候陷于分裂。因此，许多曾经热情支持第三国际及其政策的人们发现“二十一条”实难以接受。虽然他们并不准备撤消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或者放弃他们参加共产国际的愿望，但他们认为该组织对待他们的做法不合理，<sup>382</sup>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努力说服莫斯科改变其政策，至少要让意大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18页。

利社会党人自己决定开除谁和在何时开除。《前进报》主编贾钦托·门诺蒂·塞拉蒂(1872—1926年)在同共产国际进行最初的谈判时曾起重要的作用,而且曾是最著名的鼓吹加入共产国际的人,他就持这种意见;而他的意见在大多数左派和中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党直到1921年1月才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决定如何答复共产国际。但在刚刚收到“二十一条”后,党的指导委员会就开会,以7票对5票赞成接受。此后,在党内进行辩论的同时,法西斯黑衫党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暴力袭击,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接连不断地袭击和捣毁社会党、工会和合作社的建筑物和设备,殴打工人阶级中积极参加斗争的人,或强迫他们服蓖麻油,在进行所有这些暴行时,实际上没有受到警察的干涉,而且往往得到他们的默许。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0年11月19日的波洛尼亚袭击事件。那一天,黑衫党人在贴出布告,命令除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外的所有人都留在屋内以后,占领了这个城市,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抢劫和强迫服用蓖麻油,有组织的工人由于毫无准备而未能抵抗,类似的事件接着在其他地方发生。工人们尽管进行抵抗,但是墨索里尼雇佣的暴徒们都经过训练,而且有充足的资金,占据有利条件,而且他们夸耀的那些极端残酷的手段,在瓦解抵抗者们的团结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383 与此同时,促使邓南遮于1919年占领阜姆的浪漫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已经退落,邓南遮的许多追随者们转而效忠于法西斯党人,法西斯党人则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国际革命威胁的国家捍卫者。在社会问题上,邓南遮从来不是一个右派人士;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非常接近于工团主义,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个人专制的味道,而且甚至掺杂着一些苏联的影响。焦利蒂让他继续占据着阜姆,他曾从事起草一部关于他想要

建立的半独立国家的宪法；而且由于巧合，这部为意大利的夸尔内罗<sup>①</sup>“摄政区”（他自己为摄政）所起草的宪法，是在开始占领意大利北部工厂的同一天公布的。它包括经常被引用的第九条，该条的条文是：

国家不承认财产是个人对物质的绝对统治，而把它看成是对社会最有用的东西。任何人不能把财产当成似乎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保留；不容许懒惰的财产所有人把他的财产弃置不用或滥用，而不让别人过问。劳工是唯一有权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或交换手段的人。只有劳工才是商品的主人，它使商品极大地丰富并对整个经济有极大裨益。

事实上，邓南遮正在设法使自己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工团主义的鼓吹者，在国际事务中求助于那些主要属于右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妥协的斗士们，在国内事务上则求助于那些工团主义者和反对政客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们的左的情绪。在1919年，这样一种呼吁在被遣散的军队中的好斗分子和在青年人当中有很大的市场；因此邓南遮似乎才十分强有力，以致政府不敢对他采取激烈行动。但是随着法西斯运动的发展，给爱好暴力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和更引人注目的出路，邓南遮的追随者们也就作鸟兽散，他的许多崇拜者，例如迪诺·格兰迪伯爵，投向了法西斯运动，由于这些人的到来，在那个运动中很快就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因为，说来奇怪，这时墨索里尼正在玩弄花招，要求放弃他的暴力运动而与人民党和工会的右翼甚至社会党握手言和，以便组织一个他本人指望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另一方面，格兰迪的一派则宣称它坚持邓南遮的“夸尔内罗”宪法所宣扬的民族工团主义，决心继续进行暴力运动直至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会完全被摧毁为止；结果这一派获胜，把墨索里尼拉入更富有侵略性的民族

---

<sup>①</sup> 夸尔内罗(Quarnero)，亚得里亚海北部伊斯特拉半岛东南海湾名。阜姆在该湾内，所以邓南遮称他的“摄政区”为夸尔内罗。——译注

主义，于是也就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尽管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有了如此的发展，但邓南遮自己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因为活动的主要中心从阜姆和亚得里亚海对岸的意大利“未收复的领土”转移到法西斯党人和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之间的内部斗争上。在法西斯党袭击波洛尼亚后不到一个月，焦利蒂感到已强大到足以派遣军队将邓南遮从阜姆赶走，从而摧毁“夸尔内罗摄政区”；而且，在这件事进行中，只放了几枪就使邓南遮的义勇军团投降。他们的领袖放弃了阜姆，不再是意大利事务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大部分支持者投向法西斯主义，而且形成了它更极端的一翼。

这就是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在里窝那开会决定它就有争议的“二十一条”如何答复共产国际时所处的形势。会上仍有三派——“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赞成全部接受，包括开除右翼；“统一派”共产党人，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它的总方针，但是拒绝秉承它的意旨决定开除谁，或应在何时开除；另有一派叫“集中主义者”，反对开除任何人，并把继续维护党的统一做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因而完全反对“二十一条”。最后这一派人中除了以屠拉梯为首的纯粹改良派社会党人外，还包括以卢多维科·达拉戈纳为首的总工会中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塞拉蒂、拉扎里以及社会党左翼中大部分较老的领袖们属于中间那一派。“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以都灵年轻的领袖人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年生)为首，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五金工人联合会和都灵工人行会中有很多追随者。

385

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胜利归于中间派，主要是由于塞拉蒂的影响。该派获得92,028张选票，而“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只获得54,783票，集中主义者右翼只获得14,695票。投票以后紧跟着便是

“纯粹派”脱离该党，他们单独集会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做为莫斯科国际的一部分。分裂扩大及工会。在随后召开的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代表433,000工人的代表们脱离该工会倾向共产主义一边，而大多数代表，代表着1,436,000工人，仍然留在总工会中。这样的分裂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因为意大利工会主要是以地方为基础，因而每个地方组织可以决定它自己忠于谁。

社会党中获胜的集团尽管反对莫斯科最后通牒，但不准备放弃参加第三国际的愿望。它派遣老党员拉扎里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谈判，希望说服它修改条件；但是拉扎里空手而归，就象塞拉蒂在他以前的遭遇一样。共产国际不需要一个哪怕只包括并没有什么力量的少数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的社会党参加。它要求分裂，宁可要一个只得到少数支持、但毫无疑问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不愿要一个包括大多数人但坚持其有权奉行自己的路线的党。因此，从1921年初开始，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不仅由于受到法西斯的攻击而大为削弱，而且其分裂的程度，比起前些时候由于人数较少的反议会主义的博尔迪加集团脱离时要严重得多。在这种困境中，它在参加1921年5月的大选中令人惊奇地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在1919年时，它作为一个统一的党曾经赢得156席，这次它赢得128席，新建立的共产党仅仅赢得13席。人民党从100席增加到106席，法西斯党人仅有33席，而右翼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的“全国集团”加上少数独立人士，总共获得220席。焦利蒂就这样处于少数地位，他企图继续组织政府；但当人民党人和法西斯党人撤回他们的支持后，他下台了，前社会党人伊万洛埃·博诺米在人民党的支持下成为首相。就在此时，选举刚刚过去之后，墨索里尼和格兰迪之间在法西斯运动内部爆发了大争吵。墨索里尼实际上跟社会党人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结束他的暴力运动；但他受到他自己的追随者们的谴责，因而辞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但是这种奇怪的状态

没有延续多久。墨索里尼很快放弃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拒绝遵守的协定，接受了格兰迪关于进行一场消灭社会党人的战斗的政策，而且恢复了他在法西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1年10月，社会党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听取拉扎里关于他的失败的俄国之行的报告。它仍然不准备接受“二十一条”，但重申希望参加共产国际的愿望，并通过一个新的不妥协的决议，反对同议会的任何调和与合作。党内斗争继续进行：在议会内势力强大但很少得到群众支持的右翼，要求建立一个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法西斯党人的非法暴力的比较开明的政府，但是由于整个党的态度，未能做出任何有效的东西。软弱的博诺米政府执政到1922年2月，由于一系列的阴谋诡计而倒台。焦利蒂曾想重新执政，但由于人民党拒绝给予支持而失败；而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路易吉·法克塔，一个能够被唐·斯图尔佐接受的焦利蒂分子，担任了内阁的首脑职务，这届内阁比前届肯定更加右倾。法克塔的上台使意大利政府几乎完全停止了统治，法西斯党人比以前更加为所欲为。在没有参加总工会的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建议下，各个工会组成劳工联盟，包括总工会和大多数独立工会在内，目的是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暴力。工人们也开始第一次（但仅仅是分散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人民勇士”——以使用经过训练的抵抗力量对付法西斯党徒；但是，不象法西斯党人那样，社会党的“勇士”受到警察的严厉对待，而且除了在很少几个地区——主要是在帕尔马——以外一直没有能够成为有效的力量。他们无法与法西斯党人分庭抗礼，因为共产党人拒绝合作，而且甚至社会党也未能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尽管如此，劳工联盟和“人民勇士”的建立，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多少有助于使工人运动坚持下来。1922年8月，联盟号召全国罢工，孤注一掷地试图打败法西斯党人；但是法西斯党人以加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来对付罢工，罢工者被击败，而且几乎是一败涂

地，被驱赶着复工，尽管在帕尔马和其他一两个地方，“人民勇士”很好地组织成准军事组织，击败了法西斯党的进攻。1922年8月后，工会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显然被彻底击溃了。

紧接着这次失败以后，社会党向莫斯科屈服，终于开除了屠拉梯及其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屠拉梯最后的罪名是，在6月里，当法克塔政府辞职后，他曾接受国王的邀请前往奎里纳尔宫商谈组织新政府的事宜。商谈没有结果，法克塔继续任职；但这使屠拉梯招致社会党领导机构的激烈攻击，指责他“与王室和资产阶级勾结”，并且宣布他的行动已使他与党的联系终止。这个决定在10月的罗马党代表会议上批准，尽管仅仅以32,000票对29,000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屠拉梯及其追随者被迫组织了一个新党——意大利工人社会党——它在社会党的议员当中有一定力量，但在议会以外没有什么力量。实际上，这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同一两年前相比已经削弱到有名无实了。

到这时，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即将来临。1922年10月28日，法西斯党人组织了他们的没有遭到抵抗的“向罗马进军”，紧接着是要求墨索里尼组织政府。4年混乱的斗争结束了；社会党人曾经鼓吹暴力政策但没有实行，而法西斯党人不仅鼓吹而且实行，这给了它的实行者以优厚的报偿。从1918年以来，意大利第一次有 388 了一个无论如何可以试图进行统治，而不再被各种非法的力量所摆布政府。但是，法西斯党人这时还没有达到能够单独进行统治的地位，即使仅仅得到工业家和右翼政党的支持也仍然如此。他们依靠在议会中还没有解体的唐·斯图尔佐的人民党的支持，这个党在教廷的驱使下支持法西斯党人以反对在议会中仍有相当势力的社会党。人民党仍然打着坚持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幌子，但在梵蒂冈和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的压力下，已经向右走得很远；而一位反动的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出现，使它在1922年更加右倾。它同意参



加墨索里尼的内阁，并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帮助法西斯党人在“向罗马进军”后巩固了他们的权力。

当然，“向罗马进军”并不是事情的结束。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才完成了清除反对派的工作并使法西斯政权拥有没有人再挑战的权力。在整个1923年期间，力量大为削弱的社会党继续争取参加共产国际，这时，屠拉梯和其他右翼人士已确定无疑地被开除了。塞拉蒂再次访问莫斯科，回来后建议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但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正在崛起的年轻的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1891年生）表示反对。同年的早些时候，人民党终于退出政府，转为反对派。他们最后一项支持政府的行动是帮助墨索里尼通过一个新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获得选票数最多的政党或集团，即使它原处于少数地位，也将拥有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这个制度使法西斯党人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于1924年的大选中获得了议会中的稳定多数。这种选举上的变化，加上人民党的背离，标志着法西斯党人加紧了对意大利残存的民主的进攻。选举是在法西斯党人进行大规模恐吓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对派获得的票数总计大约2,500,000票，其中大约1,000,000票属于共产党人和联合竞选的两个社会党。当新的众议院开会时，改良社会党的书记贾科莫·马泰奥蒂（1855—1924年）企图控诉墨索里尼在选举中的行为；但他被狂喊声压下去了，几天以后，他被乘着汽车的五个人暗杀，这些人是在他从家里去众议院的途中抓住他的。他的尸体被扔在市外的一个水沟里，两个月未被发现，但有目击者能够证实这次暗杀。

马泰奥蒂的被暗杀，引起了法西斯党人在他们走向掌握绝对权力的途中必须面对的最后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想阻止逮捕暗杀者或阻止进行刑事调查已不可能，这次调查仅仅以找不到关于墨索里尼本人共谋的合法证据便告停止。在随后的几个月

中,发生了强烈的政治骚动。反对党的150位议员参加了一次集会,屠拉梯在会上发表了纪念这位被暗杀的社会党人的葬礼演说;而且为了表示抗议,整个议会中的反对派退出众议院,根据屠拉梯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这次由南方的自由主义者乔瓦尼·阿门多拉领导的行动,通称之为“阿文廷分裂事件”。但是反对派的议员在这样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之后,除了继续集会和表明他们对民主的信念以外,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根据宪法的规定,众议院可以合法地控告墨索里尼;但是对一个由法西斯党控制的众议院来说,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而墨索里尼却可以平安无事地这样做,向众议院提出挑战。1925年初,他提出了这种挑战,否认他本人对马泰奥蒂的被暗杀负有责任,但是承认要对法西斯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整个暴力性质担负完全的“政治的、道义的和历史的责任”。墨索里尼接着建议并得到赞同,把“阿文廷反对派”的全体成员开除出众议院,理由是他们在议会开会期间自动缺席6个月因而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席位。然后他宣布赦免所有因那次谋杀事件而被判刑或被控告的人,随后又制定了许多镇压性立法。反对党遭到镇压;报刊受到严格的审查;设立特别法庭来审判政治犯;由于授予 390 了新成立的法西斯工会以垄断与雇主谈判的权利,自由的工会实际上被取消了。从这时以后,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积极的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剩下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袖们或者逃往国外,或者被关进了监狱或集中营。共产党的杰出领袖葛兰西于1924年一度前往莫斯科,但又返回意大利企图进行地下宣传。他于1928年被捕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从此再未出狱。他于1937年死在狱中,身后留下许多著作,从监狱中秘密送出来,直到解放后方才出版,这使他获得了意大利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的名声。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代托·柯罗齐的哲学》(1948年),他在这本书里试图把柯罗齐的哲学纳入对马克思主义

的一种新的解释中。更早一些时候,1919年,他曾在都灵创办了他自己的刊物《新秩序》周刊,在这个刊物上,他试图以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观点,就当前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作根本性的阐述。同他一起办这个刊物的是另外一位富有创见的思想家皮耶罗·戈贝蒂(1901—1926年),他在二十岁时成为《新秩序》周刊的戏剧评论员,次年,当这家刊物的编辑部被法西斯党人捣毁后,他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自由革命报》,一直出刊到1925年被查禁为止。第二年,他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遭到殴打,但被允许逃往巴黎,在那儿仅仅几个星期以后便因伤重死去,死时仅24岁。戈贝蒂曾经热情地投入都灵的革命运动。他把法西斯的胜利归咎于老社会党所犯的错误。由于它对起义没有一贯的政策和有计划的行动,其结果是行动上的无力。针对这种情况,他把新建立的共产党加以理想化,但他鼓吹一种“自由共产主义”的信念,与共产党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它的基础是否认教条的权威并坚决认为,普通工人只要不被制订计划的人引入歧途,具有创造性的共同意识。戈贝蒂所向往的是一种能够永远接受新的观念和尝试新的行动方式的共产主义。跟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一样,戈贝蒂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他擅长写作,除了在刊物上撰写文章以外,还善于写小册子。他的死对于战后一点也不丰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左翼的其他杰出人物中,陶里亚蒂在失败后前往莫斯科避难。塞拉蒂和他在社会党中的左翼追随者终于和共产国际达成协议,他们在博尔迪加及其极左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加入了共产国际。塞拉蒂死于1926年;拉扎里死于第二年。

在右翼社会党人中,曾于1915年做为意大利的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朱塞佩·埃马努埃莱·莫迪利亚尼(1872—1947年)和他的妻子韦拉前往巴黎,在那儿先是遇见了克劳迪奥·特雷韦

斯,后在1927年遇见了屠拉梯,1929年遇见了卡洛·罗塞利(1899-1937年)。1927年,流亡在西方的人建立了一个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共同组织“反法西斯中心”,在巴黎出版了它的刊物《自由》,由克劳迪奥·特雷韦斯主编。这个中心试图暂时消除对立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和社会党人与其他准备在国外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进步人士之间的分歧。这一合作有助于两个社会党的重新合并。这两个党是以屠拉梯为首的统一社会党和在流亡中重建后以皮得罗·南尼为主要人物的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和特雷韦斯一样,南尼也是从意大利步行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出来的,而且拒绝与塞拉蒂及其集团一起加入共产党。1930年,这两个在流亡中重新组织和重新命名的社会党合并了;合并后的党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统一社会党人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与此同时,卡洛·罗塞利不满意这两个流亡中的党,带头组织了一个小组(不是第三党)名叫“正义与自由”,它发行了一个同名的刊物和一些小册子以便秘密送进意大利。该组织主要由卡洛·罗塞利拟订的纲领是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在其中特别强调的 392 是伦理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它比“反法西斯中心”与意大利国内的抵抗运动,特别是与费鲁乔·帕里(1890年生)有更密切的联系。帕里在与罗塞利一起协助屠拉梯逃跑后,决定留在意大利,成为“地下活动”的最重要的人物,后来成为行动党的领袖。这个党接受并发展了罗塞利的思想。他在解放后曾于1946年短时期任总理。“正义与自由”于1931年参加了“反法西斯中心”,使社会党人在这个组织中占压倒优势,以致共和党人于第二年退出该组织。三十年代后期,“正义与自由”小组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行列;卡洛·罗塞利从西班牙回来后,与他的弟弟内洛(1900年生)一道,于1937年在诺曼底被法西斯特务暗杀。南尼也属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之列,在那次战争中他被指责在共

产党人反对合并后的社会党的斗争中，充当了为共产党效劳的极端分子。屠拉梯于1932年死于流亡中，特雷韦斯死于第二年。曾任五金工人联合会书记，并在以后担任意大利总工会最后一任书记的布鲁诺·博齐(1881—1944年)于1926年到达巴黎，在法国总工会的帮助下，设法于该地组织一个骨干组织，主要是为了迎合在法国工作的意大利人的需要。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1943年博齐返回意大利着手秘密重建总工会为止。他在次年被德国人逮捕并被枪杀。

当人们回顾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6年完全消失为止这段历史时，首先禁不住要说的是，每一个担任过与它有关的任何有影响或有权威的职位的人，其行动实在愚蠢。固然，人们不禁会说，1919年对意大利社会党来说有两条路可走，而他们一条也没有遵循。一条道路是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摧毁现有的国家，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是说，遵循“莫斯科道路”，但采取的方法和新社会的性质均适合意大利的条件和意大利的特性。另一条道路是，拒绝走第一条道路，而是与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集团，包括人民党中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激进的一派进行合作，建立一个由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并试图用这种方式处理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些根本问题，并在外交事务上采取“睦邻政策”，以便克服意大利缺少粮食和原料的问题，并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福利国家。但是，当人们把这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明白地阐述后，显然就会看出，两条道路中没有一条道路比社会党人，或者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实际想要走的更为现实一些。人们非常容易看出，除非继之以真正的革命行动，否则占领工厂本来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如果没有支付工资和保证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的手段，是不可能维持工厂开工的，而如果不控制政府，就不可能得到这些保证。但是，社会党人是否拥有将占领工厂

转变为革命所必须的力量呢？在那些就信仰和职业来说都是革命者的当中，有很多人认为不具备这种力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包括大多数工会领袖。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政府强大到无法推翻。它实际上非常虚弱，而且很可能屈服。但是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社会党和工会在意大利南部或者在西西里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即使他们能够在北部的工业城市中夺取政权并保持它，但南部将仍然是反社会党的各派势力集合的基地，那里会发生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各协约国的政府，包括美国在内，一定会站在反对意大利“布尔什维克”的一边，北部将无处寻求帮助，并将很快因饥饿而屈服。而且，即使在北部，革命不仅必须对付软弱的政府，而且必须对付法西斯主义和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因此即使眼前能不能取得胜利也决不是事先所能预料到的。

其他的政策，即放弃革命行动，鼓吹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和 394  
在非社会党的帮助下推动社会改革，同样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它意味着必须与人民党妥协，因为要想在议会里赢得多数席位，它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将意味着背离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反教会传统，而且至多不过能获得社会党中少数人的支持，即使人民党准备合作的话。从人民党方面来说，也不可能在与社会党人结盟中充当小伙伴而不遭到教皇和教会统治集团的摒弃——那将意味着他们的队伍的分裂，即使大多数人准备遵循这样一种路线的话。但是，对社会党人来说，要想组织或者参加一个左派政府，如果没有人民党的参加，也是很现实的。即使屠拉梯曾经试图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如果它试图采取哪怕是温和的社会主义政策，他领导下的政府也将被推翻；而以焦利蒂或尼蒂为首、得到社会党支持的政府，甚至根本不会去设法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它只能继续采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政策，这种政策在战前就曾使意大利的议会主义威信扫地。屠拉梯尽管

比较稳健,但他经常采取的路线是,社会党人只有在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时仍能够以一个真正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名义讲话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合作;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即使把那些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撇开不计,得到社会党的多数派和工会运动中很大一部分人支持的是塞拉蒂和拉扎里,而不是屠拉梯。如果屠拉梯参加或组织一个必须与人民党或议会中其他左翼政党合作的政府的话,那他只不过是加速使他自己被社会党开除而已。由于知道这一点,并且相信如果工人阶级运动分裂成若干敌对的派别的话肯定会使它遭到失败,因此他只好紧紧依靠党,尽管这样做意味着他必须一再接受他完全不喜欢或不赞成的政策。

395

两种主要的选择——彻底的革命路线和改良主义的合作路线——同样是行不通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只有一条道路——迅速建立一支能够与法西斯党人抗衡的力量。法西斯党人开始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黑衫党暴徒的力量,并利用他们有组织地袭击工人阶级的办事机构和有计划地殴打工人阶级的领袖,而且正规的警察听任这样做而不加干涉——有时还得到他们积极地纵容——同时历届政府袖手旁观,把权力拱手让人。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社会党人和工会能够组织起一支自己的力量并采取行动,不仅能够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领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能够战胜和摧毁法西斯的突击队,否则它们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法西斯党人不仅在不久以前得到了企业家们供给的大量金钱,而且能够拉拢数量很多的心怀不满的退役士兵和受到挫折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可以被拉过来,参加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并且以积极参与鼓动他们进行的暴力行动为乐事。工人阶级运动供养不起大量职业的半军事化的打手;它也无无论如何不能象法西斯党人完全准备干的那样肆无忌惮地号召采取肆虐行为和暴力行动。如果它要进行有组织的回击的话,一

定会遇到严重的阻碍，而且很可能把斗争引向最坏的结果。但是，它至少可能迫使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来反对法西斯党人以及反对它本身的作法，设法做出某些恢复秩序的努力；这本来是会大大有利于社会党人反对他们的对手的行动的。

不幸的是，在为时太晚以前没有采取任何这类的行动，终于听任法西斯党人变得过分强大而无法击退，而且终于使工人阶级运动本身被共产党人所分裂。到左翼开始组织“人民勇士”时，街头的战斗已经失败了；而且即使是那时，这个组织也过分限于局部行动，而且得到的支持有限，无法与墨索里尼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暴徒相对抗。总工会和以后的劳工联盟中意见分歧而且太地方化，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它们的地方化使得法西斯党人能够从广阔的地区调集他们的力量，然后在一个时期集中力量，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击败工人，从波洛尼亚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来兰，从米兰到都灵，带着他们的纵火器、橡皮棍棒和蓖麻油等武器，使每一个被袭击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心无可挽回地遭到削弱和挫折。 396

这种地方主义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这个运动中，工人阶级效忠的主要中心是当地的工人行会，而不是全国性的工会或工人联合会。那不勒斯可能从不与北部工业区的其他城市协调行动；而且即使在以都灵、米兰和热那亚为基础的著名的“三角地带”，也经常不断发生分歧和争论。在人民党力量强大的南部，除少数几个孤立的地点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法西斯党和社会党的巨大冲突。社会党人和工会同样与农民太隔绝，不知道如何跨越宗教的障碍去求助于他们，然而法西斯党人，虽然在开始时是反教会的，并且象谴责社会党人一样严厉地谴责天主教会，然而当争取右翼的支持，或至少是友好地中立，对他们说来是重要的时候，却毫不困难地改变了他们的调子，并且乞灵于上帝的



名义。

当人们回顾意大利在 1918 年以后发生的事件时，的确会产生某种印象，即工人阶级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一开始起，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在组织上就是混乱的，而且尽管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却只有地方性的工人阶级领导。在一个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它主要是一种城市的运动，主要依靠北部的产业工人的支持，而他们在被剥削阶级中仅仅是少数。曾经试图打破城市和农村的隔阂并煽动农民造反的不是社会党人，而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只不过在靠近工业地区的大庄园里的打短工的工人当中进行了一点工作。左翼的天主教徒们，其中罗莫洛·穆里<sup>①</sup>是二十世纪初年伟大的先驱者，曾经做了较大的和比较成功的努力来获得农民的支持，但遭到教廷和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激烈反对，直至 1919 年，唐·斯图尔佐才出头组织起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政党——而它的比较进步和民主的大多数，却越来越受到梵蒂冈和比较保守的天主教集团的反动影响的压制。

而且，即使在工业地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也经常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被巴枯宁的追随者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甚至在安德烈亚·科斯塔已经改变立场以后，仍然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组织继续怀疑“知识分子”并且坚持把群众运动严格置于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社会党内，这种对立状态很快就不再十分突出了，知识分子在众议院中控制了社会党的席位。但是，这就扩大了党与工人行会之间的分歧，后者是工会组织的主要基础；而随着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衰退，它的地位日益被工团主义所取代，这种工团主义又鼓吹一种主要受法国思想影响的“直接行动”的福音。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始终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工会会

---

<sup>①</sup> 见第 3 卷下册，原文第 725 页和 731 页。

员大部分脱离社会党；但他们在1914年以前的若干年里，在阿尔图罗·拉布廖拉（1859—1904年）和恩里科·利昂纳（1875—1940年）的领导下，日益与总工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导致在1912年分裂而成立了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的人数始终不多。铁路工人联合会尽管在工团主义者领导之下，但仍然独立于它和总工会之外。但是工团主义者联盟的影响足以在1913—1914年的罢工运动中起很大作用，那次罢工导致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而且遭到总工会的抵制。当欧战爆发，墨索里尼被社会党开除后，有一派工团主义者，以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1874—1934年）为首，支持墨索里尼的干涉主义政策，脱离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组织了一个新的团体，成为后来在法西斯党赞助下建立的工会运动的前身。战后，这个组织和其他一些以前的工团主义者支持邓南遮在阜姆的冒险行动；“夸尔内罗宪法”就体现了相当多的工团主义思想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在邓南遮从阜姆隐退以后，他的大部分追随者转而效忠于法西斯主义，而且如前所述，在反对社会党和比较正统的工会的暴力运动中，他们成了一批最不妥协的分子<sup>①</sup>。但是，这批人尽管表面上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激烈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但保持了他们许多的社会左倾主义成分，而且在形成一种总体社会的理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种社会被墨索里尼说成是法西斯体制的基础。实际上，这种总体成分始终只不过是一个门面，但在法西斯主义中总有一些人把它看得很重要，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投向法西斯一边的前工团主义者。在他们背叛以后，真正的工团主义丧失了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大部分据点；但是，远远扩及到工团主义组织以外的关于工人管理工业的要求，仍然是强烈的，而且在1920年占领工厂时提出的要求中得到了新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64页。

的反映。在工会运动中，除了那些主要对通常的集体劳资谈判和对在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改革工业感兴趣的团体外，仍然包括很大一部分人，这些人不相信议会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的方式，而把工会看成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能的工具，或者至少是可以争得真正参加管理工业的权力的工具。后面这部分人在总工会和工人行会中与工会中的右翼保持着一种不和谐的伙伴关系，因为右翼在卢多维科·达拉戈纳(1876—?)的领导下，深切同情社会党中议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一翼。在工会中和在党中一样，改良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不断进行斗争，后者进一步分裂成革命的共产党人或近似的共产党人，和鼓吹民主管理工业的人。

从某些方面来看，意大利在1919年和1920年似乎是共产主义革命在欧洲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地区之一，不仅由于现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工业明显地虚弱并趋向于分崩离析，而且因为它的工人阶级运动总的来说远比其他西欧国家的左倾得多。但是，尽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大部分军队的支持下，并利用群众普遍不安的情况和农民中的革命情绪夺取并保持政权，但在意大利，这些因素都不能用来从敌人手中拯救革命。归来的士兵接受民族主义的影响要比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容易得多。而农民则大部分由于唐·斯图尔佐成功地建立了人民党而远离革命。如果工业地区起来进行公开的革命，南方将为集合反革命力量提供基础；而且即使在北方，工人不仅必须对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人，而且必须对付一大批具有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这些人不久以后就加入了法西斯运动。在俄国，正如列宁充分认识到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给士兵和农民以他们需要的东西——和平与土地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胜利。在意大利也一样，士兵和农民需要这些东西，但是，除了在前线以外，和平在革命力量还未聚集起来之前便来到了；而且也没有相当于社会革命党左翼那样的组织去号召

农民起来自己夺取土地。的确发生过夺取土地的事，但那只是偶然的，而且缺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支持，因而很容易被镇压下去，无法迅速扩大。意大利尽管象俄国一样拥有规模虽小但有高度组织的先进工业，却没有完全靠镇压维持的可憎的沙皇统治；不可能形成象反对沙皇的革命那样的真正全国范围的反对意大利国家机器的革命。而且，协约国在他们胜利的时刻，能够对意大利施加的压力，远比他们在1917年和1918年能够用来反对俄国人的压力要大得多，这不仅因为意大利更多地依靠进口供应品，而且因为意大利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要紧密得多。 400

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也一样，意大利总的说来是缺乏创造性而富于模仿性，这并不是由于缺少大批的思想家，而是因为它的主要的理论家们大部分是模仿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创造者。安东尼奥·拉布廖拉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继承者。柯罗齐在跟法国的工团主义者有过短暂的联系后，背离了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屠拉梯有显著的思想影响，但完全限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范围，不适合意大利的情况，未能吸引大部分意大利工人。埃里科·马拉泰斯塔(1853—1932年)是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但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大量的追随者。<sup>①</sup>工团主义的领袖们，例如阿尔图罗·拉布廖拉和利昂纳，只不过是第二流的人物。意大利人翻译和出版了许多经典的欧洲社会主义著作；但他们自己的著作却很有限，而且大都思想混乱。1918年以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在思想上处于混乱状态，组织上也是如此。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两方面的弱点；但在遇到怀疑和困难出现时，没有人能够推动他们向社

---

<sup>①</sup> 关于马拉泰斯塔，见第2卷，原文第356页(中译本第354—355页)和第8卷，下册，原文第727页。

会主义前进。因此，在紧接着战后的关键时期，他们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当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于紧密团结行动时，他们却分裂了。在这些危机的年代里，共产国际在使他们失败上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它的领袖们在强迫加快整个欧洲的革命步伐，因此，当社会党急切想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联系在一起时，却对它加以排斥，从而强迫制造了一系列的分裂。正当这个运动最需要运用团结的力量力量的时候，这种分裂致命地削弱了它。1918年以后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历史虽也有它的喜剧成分；但它主要是遭受失败和在狂风暴雨的  
401 海上盲目航行的悲剧。

还有一件不能忽略的事是，摧毁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它的领袖及其主要的理论家是一位以前的左翼社会党人，他能得到相当多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继续在某些方面贯彻一种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工团主义的传统。墨索里尼式的“社团国家”，毫无疑问，主要只是一个幌子，在这个幌子后面，资本主义能够维持它的权威而且残暴地对待工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不在于那种旨在把雇主和工人拴在一起共同为国家效力的社团体制，而在于刺耳地宣扬好斗的和军事的民族主义，以及把它体现为一种独裁制度，由一个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领袖”来主宰和统治。它坚持说法西斯党及其执行领袖英明命令的总委员会拥有最高权威，这同被它宣布为死敌的共产主义的主张有某些相似之处。固然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没有“领袖”——没有象法西斯主义公开承认的那种“个人崇拜”；但是列宁，更有甚者他身后的斯大林，实际上变成了几乎与墨索里尼一样的超凡的“领袖”。法西斯主义就其本身来说，没有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不象共产主义那样，起码从一开始就宣称有党内民主；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地方是，它给予法西斯的集体领导和社团体制以相当程度的自治责任，而且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个人独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强调阶级的绝对统治，法西斯主义则以“民族思想”代替阶级斗争，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包含着民族的“神圣利己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国际的野心，以在俄国人领导下进行世界革命为目标；法西斯主义则具有民族的野心，谋求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咄咄逼人地与其边界以外的世界对立。

不仅在对外事务方面，而且在对内事务方面，这种富于斗争性的民族主义都要求人民不分阶级，团结一致，维护民族的事业。必须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使别人对这个国家望而生畏；这就意味着，它的内部结构必须建立在一切派别利益坚决服从由法西斯党所体现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可能地谋求各个派别的利益都与法西斯主义一致，同时无情地镇压那些不能使其符合法西斯党的意志的团体和利益集团。由于未能使社会党人或工会就范，同他们合作，墨索里尼就千方百计地彻底摧毁这些反民族主义的机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自己过去曾是社会党人和无产者，因此，他企图建立一个法西斯党和一系列新的法西斯工会，以便能吸引以前曾支持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或支持半工团主义和工会主义的人。法西斯工会尽管对改善工作条件没有真正的权力，但远比希特勒的“劳动阵线”来，还象是真正的工会，因为该“阵线”更为直接和完全地服从党的任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半工团主义的自我调节因素，这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所完全没有的。墨索里尼攻击议会是富豪民主，并主张社团理论，这使人在很大程度上联想到索列尔和极端形式的工团主义，而且的确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前工团主义者支持他。象他的合作部长朱塞佩·博塔伊那样的人，的确把他们的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同对各种旧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真正仇视结合在一起，并且试图在法西斯

民族主义这个压倒一切的要求所施加的限定的范围以内，使社团体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正权威和管理权。社团制度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事实证明它不可能诱使资本家在他们的老对手工会被摧毁以后又来与新的法西斯工会分享权威；也不可能诱使工人在看到这些新工会显然从属于法西斯党的情况下对它们有任何真正的信任。不过，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虽然都认为有必要建立各种形式的劳工组织作为他们各自的党的辅助机构，但在对待这些组织的态度上，存在着真正的不同。固然，纳粹的一些特殊人物中，例如施特拉塞尔兄弟<sup>①</sup>，多少有些类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的工团主义分子；但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一样，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同情，他们很快就被清洗或被驱逐。

我不是说墨索里尼在担任了法西斯运动的领导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社会主义者。我只是说由于他曾与社会主义者长期的紧密联系，这影响了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而且有助于形成他的关于社团国家的概念——根本没有付诸实现——在这种概念中，既包括黑格尔的国家民族主义，也包括黑格尔关于“文明社会”阶段中的社团组织的各种主张。就这些方面的一个方面而言，墨索里尼与工团主义者要比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更为近似，就象从另一方面而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人与共产党人要比他们与主张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更为近似。墨索里尼在过去曾是社会党人，这一点有助于他成功地消灭了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因为这使他赢得了一部分老的意大利左派人士，使他们相信他鼓吹社团主义是真实的。希特勒也是靠蛊惑性的煽动来反对德国社会党人的，这种煽动使他把很多工人争取到他那一边。但是希特勒蛊惑宣传属于另一种教派，它更加靠领袖的超凡魅力来进行，而且在

---

<sup>①</sup>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1892—1934)和他的弟弟奥托·施特拉塞尔(1897年生)均为纳粹政治家，希特勒的追随者。——译者

推行其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方面更加表现出极权主义。顺便提一句,意大利的犹太人要少得多,所以反犹太主义没有成为主要问题。

(周叶谦 译)



## 第十二章

### 从1914年到总罢工之间的英国

在1914年以前,英国人在第二国际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能与德国人或法国人所起的作用相比,甚至不能与比利时人或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相比。第二国际中的大斗争,主要是在统一的德国代表团与严重分裂的法国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之间进行的,英国支部没有在任何真正重大的场合下起过决定性的影响。只有一位英国代表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以与倍倍尔、饶勒斯或与王德威尔得或维克多·阿德勒相比。这个人就是基尔·哈迪(1856—1915年),他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他激烈的反军国主义言论,由于他坚决鼓动国际采取反对战争威胁的行动,并由于他主张采用罢工武器达到这一目的。但哈迪跟上面所说的其他人不一样,他不能以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说话,甚至不能象饶勒斯那样以一个这样的政党中的多数派的名义说话。英国工党只不过是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萌芽的团体,但在1914年以前那些年里,工党既未拥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也未把献身于社会主义当作目标。它主要是一个工会的政党,跟某些很小的社会主义团体结为伙伴,其中独立工党是最重要的,而费边社则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社会主义团体中没有一个是标榜马克思主义的,而其他国家的与国际有联系的所有主要政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信条,至少是这样标榜的。英国也有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第二国际中的代表是社会民主联盟,在1911年以后,则是其继承者英国社

会党。但社会民主联盟几乎在它于 1900 年成立后不久就脱离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英国社会党则在 1916 年以前一直留在工党以外，直到那一年才终于被准许加入，尽管它反对战争。虽然被排斥在工党之外，但没有妨碍社会民主联盟或后来的英国社会党成为第二国际英国支部的一部分；但是这两个团体，尽管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它们的最知名的领袖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 年)的强烈的反德态度，因此在第二国际中没有任何影响。海德门于 1916 年脱离了他自己的党，因为该党持反战态度，他于是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强烈主战的国家社会党，但只有很少的人支持。不管怎样，无论是社会民主联盟或英国社会党都同样是力量薄弱，不能对整个英国支部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支部根本无法采取共同的政策。基尔·哈迪关于举行一次国际反战罢工的主张，甚至未能得到他自己的独立工党的全体同意——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在这个问题上都反对他。他甚至更不能以费边社或整个工党的名义，或以英国职工大会议委员会的名义讲话，后者也派代表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历次代表大会。除基尔·哈迪以外，英国代表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的一些重大争论中只不过起次要的作用；而在战前，英国人参加工会国际的次数甚至更少，因为英国职工大会不属于工会国际，英国的代表权掌握在人数少得多和重要性小得多的工会总联合会手中，它根本无权代表整个英国工会运动讲话。就社会主义来说，英国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地区，它迄今未能建立一个能与主要的大陆国家的社会党相比的社会党。工党和职工大会之所以被准许加入第二国际，其理由是，尽管它们不是正式的社会党，甚至不愿公开声明支持阶级斗争，但它们总算是在工会—社会主义联盟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斗争，并且代表一种群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那是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不能予以忽视的。他们只不过是勉强地被接纳；而且他们那

种暧昧的立场,实际上使他们不能起重要的作用。此外,在1914年以前的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大部分英国代表或者来自社会民主联盟,或者来自独立工党。工党和职工大会只派了很少的代表,因此,在会议讨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

当战争来到时,工党和工会在只有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为民族的事业团结在一起,正象德国和奥地利的,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的——但如前所述,没有意大利的或俄国的——社会党多数派所做的那样。与此相反,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采取反战的态度,尽管内部有人反对。但是,到1917年,德国反战的社会党人被社会民主党开除,被迫组成一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在英国却没有发生这种开除的事,尽管在许多工会中和在主战的议员中有着强烈的反对这些持不同立场的分子的情绪。虽然如前所述,反战的英国社会党在1916年被容许加入工党,但那是在主张谈判缔和的情绪还没有得到任何重大的支持以前很久。我认为,保持这种容忍的态度的原因,首先主要的是基尔·哈迪所享有的几乎是整个运动对他的深深尊敬,只有那些最狂热的沙文主义者除外,那些人中有些是“号角”小组和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后来则是由于阿瑟·汉德逊(1863—1935年)的个人影响,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保持党的团结,因为他着眼于战后采取一致行动的必要性。汉德逊曾在战争爆发时继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年)任工党领袖;而且,尽管他从1915年至1917年担任了一系列的政府职务,起初是在阿斯奎斯政府中,以后是作为劳合·乔治领导的战时内阁的成员,但他从未放弃他对党的机器的控制;在他由于在俄国的活动和支持1917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而从政府中被解职以后,他在把党的机器变成一个真正能够争取政权的工具上起了主要的作用。避免分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麦克唐纳的立场,他在哈迪于1915年逝世以后,担任了独立工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工

党司库的重要职务。对麦克唐纳来说,尽管广泛地被谴责为“亲德”和民族事业的“叛徒”,实际上(至少在最初)所采取的多少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强烈批评那种将英国引入战争的外交政策,但在同时也说,战争一旦来临就必须战胜,并且与独立工党内外那些毫不妥协的反战斗士保持着距离。

实际上,战时的独立工党代表许多完全不同的观点。在拒绝接受该党的反战路线的少数派中,有很多人,例如J·R·克莱因斯(1869—1949年),尽管他们暂时不在党内起任何积极的作用,而且反而把他们的活动转向工党方面,但仍然还是党员。在杰出的领袖中,菲利普·斯诺登(1864—1937年)、弗雷德里克·威廉·乔伊特(1864—1944年)、J·布鲁斯·格莱西尔(1859—1920年)和其他一些人站在一起,在战争问题上比麦克唐纳左得多,但是,即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仍然主要是议会主义者,当然也就完全没有鼓吹俄国式的革命。另外一个重要的集团以克利福德·艾伦(1889—1939年)为首,他后来成为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作为对他在1931年支持麦克唐纳的报酬,但在1914年,他还是一个来自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命运不佳的《公民日报》的经理。这批人宣称他们本身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出于良知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暴力;正是这个集团吸引了那些新参加者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在战争期间参加独立工党的中产阶级人士。独立工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来没有变成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完全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党内的和平主义非常强烈,有力地影响了它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应,以及在战后,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关于进行全面内战的要求的反应。<sup>①</sup> 还有其他一些参加独立工党的人,采取一条更加革命的路线,而且在1917年以后要求它应该与苏联和共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93—294页。

408 产国际共命运；但他们总是处于少数，而且在1920年以后，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新成立的共产党，尽管很多人不久又找理由离开了它。尽管有这个左翼集团的努力，独立工党的占压倒优势的态度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工党从一开始起主要是一群讲伦理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谴责资本主义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宣传社会主义伙伴关系的福音，而不是宣传经济决定论，尽管他们也并不反对利用唯物主义的论点。战争使这些伦理社会主义者的良心感到震惊，迫使他们把和平而不是社会主义做为他们当前的主要目标；由于列宁坚持通往和平之路在于世界起义和全面内战，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能被开除。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经受过沙皇甚至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压迫，因此认识不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他们要求结束战争，并把全世界的工人重新组成和平的十字军以夺取政权。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也完全想象到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这样的选择，甚至对德国或奥匈帝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接受俄国的福音，认为它也适合他们国家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民主制度无论怎样不完善，毕竟为和平变革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他们感到自己与那些在考验的时刻忘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而鼓吹把反对民族“敌人”的战争进行到底的社会主义者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工党的极左翼分裂成了共产党人，同时其右翼的一部分则参加了改组的工党，它本身在1921年参加了维也纳国际，但又感到有必要同维也纳“声明”<sup>①</sup>中主张把使用暴力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那一部分脱离干系。

在这些问题上，已经清除了海德门派的英国社会党，比独立工党的主体要左得多，毫无困难地全部接受了共产主义者的理论。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23页。

英国社会党实际上构成了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以后终于在1921年建立的英国共产党最大的组成部分。其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工党的主要部分，它的整个力量几乎都在苏格兰的工业地带（主要在克莱德赛德）；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1882—1958年）的工人社会主义同盟，它是从伦敦东区妇女参政同盟发展起来的，这个参政同盟是从西维尔亚的母亲和姐妹埃米林和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好斗的工人阶级组织；人数虽少但很活跃的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以及战时的车间工会代表运动中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分子。除了这些团体外，还有一些脱离独立工党的人，一部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分散的个人；但是由于车间工会代表运动在1918年以后迅速瓦解，他们没有大量的追随者。

如前所述，工党在战争期间没有分裂；独立工党仍然正式参加工党，它在下院的议员也是工党的议员。但是，在实际上，无论在议会内外，独立工党在战争期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党而活动，它支持的一小批议员采取他们自己的路线，不过它的一些工会支持的该党议员并没有遵循这条路线。少数独立工党的成员——麦克唐纳、斯诺登、弗·威·乔伊特、W·C·安德森（1878—1919年）、汤姆·理查森（1868—1925年）和直到去世为止的基尔·哈迪——都不断要求推行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方针，并采取一种反对政府施行的危害工人阶级的自由和经济条件的那些战时措施的立场。但是，他们在不涉及社会主义原则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继续与他们的工党同事们合作；麦克唐纳特别积极从事重建主要由汉德逊和悉尼·韦伯创建的工党。但是，独立工党未能在战争条件下保持其在战前作为社会党国际英国支部的一个积极的独立成员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国际本身实际上已没有活动，而且因为当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问题提出来时，矿工联合会成功地把以下条件作为

410 工党接受邀请的条件之一，即英国代表团应当只代表工党和职工大会，而把那些曾以平等地位参加第二国际英国支部的社会主义团体排除在外。汉德逊竭力反对这种排斥其他团体的作法，因为它违反斯德哥尔摩会议邀请书的条件，但未能成功，职工大会否决了他的意见。然而，这种排斥并没有能阻止工党选择麦克唐纳作为它的代表之一；而且麦克唐纳实际上参加了在战争期间举行的各次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还参加了在1918年以后最初试图重建第二国际的伯尔尼会议。<sup>①</sup>这是使麦克唐纳在战后与独立工党的联系较少而与改组后的工党联系较多的原因之一，他在几年以后便重新成了工党的领袖。

对英国劳工运动来说，特别是在工会方面，战争使它的力量 and 影响大增。由于1914年没有征兵，因此无论在社会党或工会运动中发生的混乱都比在其他交战国里发生的要少得多，尽管当然也有许多自愿参军的人，包括许多技术工人，他们在国内本来是会得到较好的收入的。在1914年，人们几乎完全没有预料到战争会发生的经济后果，或它将引起的人力短缺。的确，在开始时还有很多人失业，人们普遍担心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广泛流行的说法是战争不会持续很久，德国在西线的进攻很快就会被击退。但是，在几个月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前线缺乏弹药，不得不把所有可能利用的人力物力投入战时工作。录用大量妇女进入军事工厂，并与工会就废除或暂停执行妨碍武器和其他必需品生产的劳动规定和做法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物价的上涨使得有必要同意增加工资，增加工资大部分是以暂时的“战争津贴”的名义发给的，因为当时错误地估计物价在战后还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发生了由于工资问题引起的罢工，而且由于把非熟练工人提

411

---

① 见本卷第278页。

升到通常由熟练工人担任的工作岗位而出现的劳动力“削弱”也引起了争论。1915年3月，政府与工会谈判了一个“财政协议”，同意在战争期间减少工会的活动，条件是战后应当恢复，而且也同意在军事工厂中暂停罢工的权利。不久以后，于1915年7月2日通过了战时军需品法，使上述规定获得了法律的效力，而这个法令很快就在当月的后期由于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罢工而遭到抵制。那是一次同煤矿主由于工资而引起的纠纷。尽管有上述法令，但纠纷在对矿工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因为政府无法对付煤田长期停止生产所造成的后果，而该煤田是海军燃料的主要供应来源。

回想起来令人吃惊地看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阿斯奎斯政府是多么力求在最低限度的干预工业活动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固然，铁路被立即接管，置于一个铁路行政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这个委员会由主要的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们组成；而且根据战时军需品法，从1915年年中起，制造军需品的工厂被置于国家管制之下。但是，其他工业，包括煤矿在内，仍然由私人经营，直至1916年末劳合·乔治把阿斯奎斯赶出政府为止。从那以后，由于人力和供应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特别是由于德国人采取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国家管制的范围才迅速扩大；在1916年3月仅仅适用于单身汉的征兵法，这时才普遍适用于一切适龄的人，并通过从工厂中“裁减”出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更加严格地予以实行，代替这些工人的是妇女以及残废或年老的男人。从1915年6月起，工党在阿斯奎斯政府中有少数代表，以阿瑟·汉德逊为首。1916年12月，<sup>412</sup>作为对包括建立一个劳工部在内的一些让步的交换条件，工党同意支持劳合·乔治赶走阿斯奎斯，因而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包括在负责组织战争事务的人数很少的战时内阁中给了阿瑟·汉德逊一个席位。但是，汉德逊没有长久保持他的职位。如



前所述，<sup>①</sup>他被迫辞职，因为在他于1917年春天作为英国政府秘使访问俄国回来后，鼓吹英国支持计划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工党没有退出劳合·乔治政府。工程师G·N·巴恩斯(1859—1942年)——他曾在早期积极参加独立工党的活动——代替汉德逊参加战时内阁，工党只是在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签字后方才退出政府。它当时离开政府是为了便于以一个独立的党参加竞选，这次大选是作为胜利的组织者的劳合·乔治决定立即举行的。巴恩斯和他的一些同事拒绝接受退出政府的决定，从而离开了工党并组织了一个联合的国家民主党继续支持劳合·乔治，而且在大选中获得了少数几个席位，但从那以后便迅速瓦解了。

虽然工党一直参加了劳合·乔治的政府，而且工会同政府在战争努力上的合作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但在战争的后期，反战情绪迅速增长，特别是在1917年初俄国革命以后。部分的原因是，到1916年末，那些多少愿意参加武装部队的人已经被征召去了，因此，以后征召的那些留在民用部门工作而被“裁减”出来的人，越来越是一些不愿入伍的人。还因为，随着这场消耗战无限地拖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通过谈判实现一种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的和平，比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战争造成如此多的死亡和残废，造成食物和其他供应品日益短缺，似乎要好些。此外，对协约国的战斗目标愈来愈抱怀疑，而且，在俄国革命以后，对精疲力尽的俄国人坚持呼吁和平的作法抱有极大的热情。独立工党和受到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和社会党人支持的民主管理联盟，人数迅速增加，尽管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乔治·兰斯伯里(1859—1940年)的《先驱》周刊——左翼的《先驱日报》在战争爆发后由于财政上的

---

<sup>①</sup> 见本卷第46页。

原因被迫改为周刊——有了很大的销路，成为有影响的反战运动的喉舌。但是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言，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非工会的车间代表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军事工厂里。

这个运动开始于克莱德河一带，<sup>①</sup>与1915年2月克莱德兵工厂工人工会组织的非罢工有关。为了进行这一运动，来自各主要工厂的克莱德工人代表组织了一个撤销劳工控制中央委员会，从这个委员会又发展出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称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当然，由当地工会组织任命的车间工会代表在1915年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于许多工厂，作为次要的代表，其任务主要是在他们的车间和部门里保持和发展工会会员，在少数情况下还代表工会负责车间谈判的次要任务。但克莱德运动以及很快就在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类似运动的新特点是：车间工会代表拥有独立的任务和权力，而且出现了非工会的车间代表，他们不是由工会任命的，而是由某些工厂的一些工人集体任命的，代表这些工人，在某些情况下不顾他们所属的工会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就这样建立了车间工会代表委员会，由一个工厂的各种类型的各种级别的工人的代表组成；还建立了当地的工人委员会，由某一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工厂的代表组成——后来这些当地的或地区的工人委员会联合成一个非工会的全国性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向正式的工会领导挑战。这个运动的鼓吹者是左翼的社会党人，他们争辩说，工 414  
会由于接受了一种“劳资休战”并让他们自己受“财政协定”和战时军需品法的约束，已经背叛了工人的事业和放弃了阶级斗争。在初期阶段，促使这些非工会运动成长的是由于“削弱”劳动力和暂停工会活动而引起的不断争论；但在征兵开始以后，它越来越关心的是抵制日益严厉的把工人“裁减”出来去服兵役的做法，因而它越

---

① 克莱德河在苏格兰，其下游的克莱德赛德是工业中心。——译注

来越多地带上了政治色彩。俄国革命以后，工人委员会采用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1917年6月的利兹代表会议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次会议发出了要求以俄国为榜样建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号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几个月举行的这次非工会会议，有许多反战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人绝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不过是一些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人；但是会议上的主要气氛是革命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表现出了俄国革命在加强英国反战的左翼方面所起的影响。在前一个月中，曾经发生了广泛的“五月罢工”，蔓延到一个又一个的军事生产中心，引起了政府的严重注意。这个非工会的运动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从正式的领导人手中夺取对工会的控制，或者在被许多正式的领导人认为已反动到不可救药的工党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但是，这个运动的确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动乱因素；它的控制权也日益转入极端的左派手中。战争的结束和随后停止大规模的军需品生产，从根本上打击了它的力量；因为在战后的形势下，正在裁减人员的雇主们很容易赶走那些“煽动者”，而那些逃脱了解雇的人当中，许多人由于害怕解雇而变得远不是那样积极了。1918年以后，车间代表运动很快就变得徒有其名了。

415 在克莱德和在其他地方剩下来的好斗的核心，形成了后来组成英国共产党的重要集体之一。革命的车间代表——当然不仅包括英国、还包括德、法和其他国家以及英国的——在1919年2月发出的关于建议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号召中<sup>①</sup>受到了特别的提名。

当然，并不是所有车间代表运动的领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车间代表运动的成分极为复杂，其中有些人反对它在1917年至1918年的日益“政治化”，主要感兴趣的是把它当作一个争取在工厂和车间实行“工人”管理的工具。这些团体中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87页。

的很多人所支持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或者某种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当中有一小部分人的确走向了共产主义，但大部分人强烈反对集中和独裁，仍然属于工党或加入工党的各团体中的一个，例如独立工党。但是，随着车间代表运动的影响和活动的日益衰落，这部分人也失去了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支持。建筑业很快就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发挥影响的新中心，它在建筑工人工会的帮助下，随着战后的住房修建计划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建筑行会结构。但是建筑行会由于战后的不景气而在1921年瓦解，这种不景气使政府完全改变了它的住房政策，以致破坏了该行会的财政基础。他们试图在没有政府资金帮助的情况下坚持下去，但很快就无法履行他们的财政义务；于是整个运动就衰落下去了。不景气对在其他一些行业，例如土木工程、成衣和家具制造业中建立起来的行会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打击对整个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说也是致命的，它一度曾经得到工会的很大支持，并对工会和社会党的社会化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采矿业和铁路方面。

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在工会提出的战后社会化计划<sup>416</sup>中要求实行“工人管理”。当时要求社会化的主要压力来自两个行业——煤矿和铁路——它们在战争期间都曾由国家统一管理。英国矿工联合会曾经在1912年授权起草一个将该工业国有化的法案，这个法案是由H. H. 施洛塞(1883年生，后成为贾斯蒂斯·斯莱塞勋爵)为它起草并由费边社予以发表的，斯莱塞是该社的一个积极的成员。这个草案规定由政府接管煤矿，由一位大臣管理，受国会的监督。但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联合会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管理将交给一个全国矿业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一半由该工业的工人任命，一半由政府任命。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同样提出了国有化计划的要求，根据这个计划，工人们将任

命管理委员会的一半成员。这些计划与同时在法国由法国总工会提出的计划不同，后者要求实行由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方代表管理的方式，而英国的计划则把国家看成是代表消费者的利益。

1919年2月，矿工联合会威胁要举行全国性的罢工，以支持它关于提高工资，实行六小时换班制，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人管理的工业国有化等要求。而政府除了准备稍微增加一点工资外，只答应把其他要求提交一个调查委员会。经过匆匆举行的谈判后，矿工们被劝阻暂停发出罢工通知，并参加一个有着广泛权限的调查委员会，条件是矿工联合会应被准许任命除主席以外的一半成员。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半的成员应是由联合会任命的人，或者是由联合会与政府双方同意的人，另外一半由煤矿矿主任命的三个人和由政府任命的代表其他雇主利益的三个人组成，而由法官<sup>417</sup>约翰·桑基爵士(1866—1948年)——后来是桑基勋爵，1929年工党政府的大法官——以独立资格任主席。矿工联合会就这样成功地坚持了在拟议中的调查委员会中有平等代表权的原则；而政府，由于面对罢工的威胁，而且在其他行业中，以及由于军队的复员，有许多麻烦问题需要处理，因此无可奈何地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桑基煤矿委员会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矿工们和他们在委员会中的同盟者——悉尼·韦伯、理查森·亨利·托尼(1880年生)，和前自由党的宣传家利奥·奇奥扎·莫尼爵士(1870—1944年)，最有效地把煤矿主们置于被告的地位，指责他们在煤矿工业中经营不善，从而不仅说服了约翰·桑基爵士，而且说服了其他三位雇主成员，使他们相信不应再恢复战前的煤矿管理方式。煤矿委员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它的工作：1919年3月发表它的中期报告，给工人们提高了不少工资，而更重要的是，把井下工人的工班从八小时减到七小时，并答应在1920年底进一步减至六小时，如果那时的工业状况容许的话。或者更明确地说，这些

建议包括在约翰·桑基爵士和其他三位非煤矿主和雇主成员的报告中；而煤矿主仅仅同意实行七小时换班制和增加较少的工资，矿工们和他们的三位同盟者则主张六小时换班制和更多地增加工资，并立即实现国有化。最有意义的是，由主席和他的三位同僚签署的这个报告主张实行“国有化或者实行由国家购买和（或）联合管理的一种统一管理方法”，报告接着说道，“煤矿工人将来应对煤矿管理拥有有效的发言权，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当政府在矿工联合会的强大压力下宣布它准备“按照字面和精神”执行约翰·桑基爵士的报告以后，矿工们撤消了他们的罢工通告。于是委员会开始其第二阶段的工作。在这个阶段中它主要关心的是为今后管理煤矿工业制定具体的计划。它终于在1919年 418  
6月提出了报告；而在这次提出的竟有四个对立的报告，分别由委员会的六个工党成员，由三个煤矿主和另外三个雇主成员中的两个，由剩下的一个雇主成员阿瑟·达克哈姆爵士和由主席签署。因此，严格地说，没有一个代表多数人的报告；但是约翰·桑基爵士同意六位工党代表提出的将这项工业国有化的建议，而且所有四个报告都主张将煤矿本身实行公有——即是说，将煤矿国有化，而付给其地面特许权所有者以赔偿。约翰·桑基爵士的报告还规定了工人在领导这项工业方面的代表权，不仅在矿井委员会而且在更高级的委员会均如此。但这些代表在任何一级上都居于少数。六位工党成员的报告采纳了主席的大部分建议，但是要求工人有更大的代表权和管理权。煤矿主和他们的两位盟友实际上拒绝在管理这项工业上做任何重大的改革，而且不准备容许联合委员会超出作为一个咨询机构的范围。最后，阿瑟·达克哈姆爵士提出一个成立地区性统一矿业公司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工人的代表将居于少数地位，同时规定限制利润。

鉴于大多数报告已经宣布要求实行国有化，矿工联合会立即

要求政府应当执行它的关于矿产收归公有的诺言。但是，不久就表明，政府无意这样做。相反，劳合·乔治以阿瑟·达克哈姆爵士的那个内容冲淡了的报告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方案，因此很快就被起了一个绰号叫“达克哈姆和水”。当矿工们拒绝这个建议后，劳合·乔治坚持他的立场，干脆不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项仍然由国家实行临时管制的工业的结构；矿工联合会于是要求整个工会运动支持它旨在迫使政府让步的各种措施。首先，矿工联合会不再要求举行罢工，而是要求把劳工运动的全部力量集中用于开展一个教育运动，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到国有化上面来；1919年9月，职工大会保证支持矿工，并安排在12月举行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来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次特别代表大会同意支持计划开展的运动，并同意在运动开始后再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来考虑如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在工党和合作联盟以及职工大会的支持下“矿产归国家”的运动在1919年最后几个月里一直进行；但是由于当时有其他一些令人激动的原因，它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很小。当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于1920年8月召开时，正值矿工联合会要求举行总罢工以施加压力实现国有化；但是代表大会由于知道矿工本身已出现分裂，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是主张采取“政治行动”，方式是“加强政治宣传以便为大选作好准备”。实际上，事情就此结束；因为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战后的繁荣也已结束，萧条眼看即将来临。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政治上的注意力集中在煤矿问题上，把它作为大选中的中心问题；但是，除此以外，在1920年的下半年，前一年的劳工大动荡迅速消沉下去。政府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复员和战后调整时期的困难，不再准备对任何违反资本家利益的要求做出让步；各个工会面对着各种工业相继面临萧条的威胁，更关心的是一个工业部门一个工业部门地维护它们自己，而不是去支持矿工联合会或其他任何团体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要求。工人阶级的大进攻已被成功地躲闪过去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受到经济灾难的威胁，但再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稳固，并且能够在工业方面和政治方面对付劳工方面仍然可能作出的任何试图推翻它的努力。

我们有必要把对煤矿业所发生的事件的记载一直延伸到1920年。因为迄今所论述的一切事件，都直接起源于紧接着1918年11月停战之后所发生的矿业危机。但是，煤矿危机在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英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所面临的总危机的一部分。在此以前很久，所有大的工会组织都一直在准备就战后的要求提出自己的纲领，而左翼派别则一直在制订其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劳合·乔治预见到将要出现的麻烦，决心立即举行一次大选，在这次大选中，他将会居于由一切优秀的“爱国者”所组成的政党联盟之首，以民族救星的面貌出现。这使两年前被他赶下台的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和工党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除非他们准备留在一个“重建”国家的资本家政府中，充当处于从属地位的伙伴。如前所述，工党以很大的多数决定退出这个联盟，从而使阿瑟·汉德逊为此而建立起来的新的选举机构接受考验。仅有极少数工党成员脱离队伍，成为“联盟工党”的候选人。但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劳合·乔治的联盟，以及它所“认可”的候选人——大部分是保守党人，但包括劳合·乔治在自由党人中的追随者——完全如愿以偿。“绞死德皇”，“要德国赔偿”的口号，很受选民的欢迎。选举的结果，联盟获得的席位中有359名保守党人，127名自由党人，15名“工党”支持者，而构成反对党席位的只有51名正式或非正式的工党成员，34名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7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及几名无党派人士——不包括73名拒绝接受席位的爱尔兰新芬党成员。即使这少数工党成员当选，也使工党从战前地位向前进展了一步，因为该党在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只获得42个席位。但是就工党以其新



的社会主义纲领《劳工与社会新秩序》为新基础而进行的加强工党的工作来说，以及就由于战前时期那个势力强大的自由党已经分崩离析而工党在议会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随着自由党因其深刻的内部分歧而四分五裂，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直至1914年还几乎微不足道的工党，到1918年  
421 时已成为唯一有可能与保守党控制的联盟争夺政权的挑战者——除非联盟破裂，自由党人得以恢复其团结，否则情况起码会是如此，而自由党并没有出现恢复团结的迹象。1918年以前的选举中，工党在争夺议席中，每次都只不过争得极少数席位，而在1918年，工党拥有368名获得支持的候选人，还不包括另外30名左右的不是由工党和社会党正式出面支持的候选人。

“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新工党，确实也以议会中的正式反对党自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执政。为此它从组织上和纲领上都作出了剧烈的改变。直到1918年以前，工党基本上一直是各工会和独立工党的党，独立工党是作为该党的一个单独的支部而起作用的，同时在费边社的帮助下，又在工党内部起着社会主义发酵剂的作用。工党本身，除了在一两个极个别的选区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它的选举工作主要依靠地方上的行业与劳工委员会，以及独立工党的支部，它的大部分议员主要是作为工会提名的候选人而当选。从理论上讲，工党坚持不依附于所有其他各政党而独立竞选，但实际上，它的几乎全部席位都是由于自由党人的支持才获得的，而且在1914年以前，工党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是自由党政府的一个俯首贴耳的仆从。到1918年，它至少在大多数选区中建立起它自身的核心组织，并开始扩大吸收个人党员的工作，以便与各个社会主义团体相抗衡，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独立工党，战争期间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党而活动——虽然它始终保持对工党的隶属关

系——因此完全不喜欢它的地位的变化，因为工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出现，要求所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者都为它工作，对它效忠，因而意味着较小的独立工党将被推到次要的地位。不过，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工党意见一致，因此，已无法与工党决裂。他们已经与工党共命运，实际上把工党的成就看成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拉姆齐·麦克唐纳虽然由于战争问题的争论被赶下了工党的领导地位，但仍是该党的司库，战争期间曾代表该党出席协约国社会党的各次代表会议，并与韦伯和汉德逊一起，在拟订工党新的党章和纲领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无论如何，他对新的工党的同情，大大超过他对他自己的独立工党中的左翼，或甚至其中派的同情。此外，菲利普·斯诺登虽然仍旧主要是独立工党党员，而不是工党党员，但也根本不同情独立工党的左翼，因为这些人正在向苏维埃献媚，并对他十分虔诚信仰的彻底的议会主义大肆公开攻击。独立工党对汉德逊在各选区以发展个人党员为基础扩大工党组织的做法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但除了在苏格兰以外，它并没有积极反对这样做，而是设法在汉德逊忙于建立起来的地方工党组织中加强自己的控制。

至于工党的纲领，即作为该党的原则而通过的主要声明《劳工与社会新秩序》，意味着与工党的过去完全决裂；因为它以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明确目标，从而把党从一个由社会主义者与工会组成的松散联盟，改变成为一个由工会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党。《劳工与社会新秩序》所包含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彻底的渐进主义，是非革命的；它是悉尼·韦伯的费边主义，加上在一些地方承认某些新的时代精神——例如，它提到对工业的民主管理和工人参加管理。承认这些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很快就会看出来。实质上，工党所规定的目标是费边社会主义，是通过议会民主的手段来争取实现这些目标，是作为进步自由党人的传统的继承者与执

行者，而并非任何新的革命学说的首创者。而且，《劳工与社会新秩序》并不是选举纲领，而是一个关于原则和长远目标的声明，所以，它并没有规定工党目前应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只不过是工党的一般性表态。这个纲领在几乎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战争的年代里，工会的意见已大大地改变了，而且自由党的瓦解已破坏了以前人们对主要是不墨守成规的自由党—工党联盟效忠的基础。

因此，工党于1918年已成为一支觊觎政权的力量，虽然距离成功仍很遥远，但愈来愈跃跃欲试，而且十分有希望获得普遍的支持。1914年以前，它的候选人从未获得大约50万张以上的选票。而在1918年，由于选民总数达到战前的两倍半，而且第一次包括了妇女选民，工党获得225万张选票；参加联盟的各政党共获得550万张，独立的自由党人获得150万张。由于很多选民离家外出，很多士兵无法投票，1918年的总票数是很低的。但是，尽管由于劳合·乔治的威望，大多数工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到沉重的失败，但工党在未来是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已很清楚。不过，它已经能够严格地按照已确立的规划玩弄议会策略了。在整个欧洲，只有英国看不到什么迹象，表明俄国革命，或中欧和东欧各王朝和帝国的覆灭使政局有所改变。

英国1918年的大选是紧接着停战就举行的，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工业领域提出自己的要求，军队或军火工人的复员还没有造成麻烦问题，大选就过去了。因此，当这些麻烦问题形成的时候，面临的已经是一个政权已经确定，一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府已牢牢掌握权力的局面。这个政府意识到行将遇到的困难，首先决心赢得时间，防止过多的问题同时爆发出来。所以它赶紧临时稳定工资，不仅为复员军人，而且为被解雇的军火工人提供紧急的“捐赠”，直到他们能找到和平时期的工作为止。政府还尽量使吵嚷着

要迅速复员的士兵都能够为工业部门所重新雇佣——总的说来，这些措施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政府在国内的下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应付各工会坚持要求改善条件，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国有化和某种“工人管理”的问题。此外由于住房奇缺，以及大量的人要求成立新的家庭，政府着手新建住房的工作。前面已经谈到，政府如何通过指定桑基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所提出的中期报告中所做出的让步，防止了一场矿工们扬言要举行的全国性罢工。下面我们要研究一下在其他主要工业部门中所发生的事情。

工业领域愈来愈严重的骚动最初显示出来的迹象，是发生在克莱德河地区和贝尔法斯特的要求缩短工时的非工会领导的罢工——前者要求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后者要求每周44小时工作制，而战前的标准，在大多数地方是每周50到54小时不等。铁路工人已经得到允诺，每周工作48小时。当克莱德河地区和贝尔法斯特的工人们，主要是那些因停止战时生产而受影响的企业中的工人们，拒绝接受其全国性领导人的意见而于1919年1月自行号召举行地区性大罢工时，在一些工业部门也已在进行要求实行每周工作47或48小时的谈判。这些运动遭到了失败——克莱德河地区曾经历了一些暴力行动——这以后，土木工程业工会和造船业工会谈判达成了一项每周标准工时47小时的全国性协定。但在1919年1月，除非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制止，罢工运动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2月，政府召集了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代表们来自所有的工会组织、雇主团体，以及诸如新成立的惠特利委员会之类的联合团体——来考虑改善劳资关系和促成劳资双方和解的办法。一些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已经结成三边产业联盟的矿工联合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以及工程师工会——拒绝参加，理由是他们已经在进行自己的谈判。但大多数工会和雇主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

就移交给它的各种问题提出一项报告，其中包括工时，最低工资  
425 额，以及成立一个代表“工业界”与政府各部门及政府本身打交道的联合组织等问题。这个联合委员会存在了两年多——一直到1921年7月才解散——先是起草它的报告，以后就这个报告的通过与政府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这个委员会从建立时起，其真正的作用就是让各工会领导人继续争论和谈判，直等到紧接着战争结束而出现的纷乱局面平静下去，工业方面严重骚动的危险消失为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雇主代表们在开始阶段表现出和解态度，并在原则上做出让步，而在以后付诸实施时，很多雇主又加以反对。但随着国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合作，而且早在工会方面决定结束这一幕滑稽剧以前，就已经和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拒绝按照他们早先似乎要接受的方案行事。

在全国性矿工大罢工的紧迫威胁消除之后，工业领域仍然存在的主要危险点是在铁路方面。各铁路工会不仅要求充分承认他们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并大大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而且要求实行铁路国有化，在新的管理体制中，要给予工会以半数的代表权。如前所述，战争期间，铁路均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协调运营，所以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再交还给许许多多单独的公司。普遍的意见是，即使不完全统一经营，至少也必须合并成为少数大联合企业。但对铁路国有化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铁路工人更加紧迫的要求是在工资方面立即作出让步，包括在全国重新评定劳动等级，而不是要求实现公有制。因此，在1919年夏季，当与政府谈判破裂后，工资问题成为首要问题。于是各铁路工会在1919年9月26日宣布全国性罢工。由于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当时已与矿工联合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结成三边产业联盟，旨在使三  
426 派力量统一行动，铁路罢工有把这另外两个组织的工人卷进去的危险。但是全国铁路工人工会没有呼吁他们加入罢工，实际上却

是由运输工人联合会召集了一次各工会参加的特别会议，建立了一个斡旋委员会，以帮助铁路工人与政府之间重开谈判。在这个委员会的帮助下，于1919年10月5日达成了一项总的来说对铁路工人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罢工就此结束，不过随后的细节谈判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在这些谈判中，没有直接涉及铁路国有化的问题，但自始至终，这个问题却在起一定作用，因为政府正在考虑如何结束国家控制铁路的战时状态，实行某种统一经营措施，来改组铁路管理体制。

最后，在1920年，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作为运输大臣提出了一项计划，它与解决煤矿业问题的达克哈姆计划不无相似之处。根据这项计划，各铁路公司将合并成少数大联合企业，而且将允许工人在这些联合企业的管理机构中拥有少数代表权。这个计划，后来砍掉了其中有关工人代表权的规定，成为1921年的铁路法。这项法案规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组成4家大型联合公司，从而结束了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各铁路工会不愿接受格迪斯计划中给予工人的很少一部分“管理”权，作为替代办法，同意建立一种协商委员会和法定谈判机构制度，这种制度至少充分承认了工会的权利，这是各铁路公司在此以前一直加以拒绝的。铁路工人并未放弃其对国有化的要求，但是在右翼领导人詹姆斯·亨利·托马斯(1874—1949年)的领导下，当他们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的其他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后，他们也就把国有化的问题搁置到一边了。

就这样，国有化问题在铁路和煤矿两个工业部门中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政府让这两个工业部门都恢复了资本家所有制和管理权。在工业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动荡不安现象，在1919年的铁路罢工以后，还发生了一些大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的事件，但这些事件都与国有化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它们都是由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争端而引起的，并不意味着对重新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

制度提出挑战。

1920年第一次大的纠纷发生在码头上，完全是由于工资和雇佣条件问题而引起的，与任何其他问题无关。运输工人联合会崭露头角的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年）说服了该联合会，没有宣布立即罢工，而是把他们的要求提交根据不久以前刚颁布的工业法庭法成立的一个调查法庭（第一个建立的这样的法庭）审理，从而使这次纠纷在没有造成停工的情况下，以有利于工人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这个由一位高等法院的法官任庭长的法庭上，贝文以非凡的巧妙和敏锐为码头工人进行辩护。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每周工作44小时和每天16先令的最低工资额——实际上，除了要求废除临时工制的要求之外（这项要求又过了二十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他们得到了一切。而以前只不过是一位工会中的小人物的欧内斯特·贝文，也突然一跃而成为不久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的运输和杂务工人工会的首领，站在了工会运动的最前列。运输和杂务工人工会是在组成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许多工会合并的基础上组成的一个工会组织。贝文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是在物价仍在上涨，战后的繁荣尚未中断之前为他的案件进行辩护并且打赢这场官司的。但是他取得成功是理所应该的，无愧于赢得“码头工人的皇家大律师”的绰号。

接着，在1920年夏季，由于英国声称要干预俄国一波兰战争而舆论大哗。波兰人于该年4月向俄国人发动进攻，并于5月初攻克基辅。随后局势逆转，俄国人于6月间收复了基辅，7月，俄国军队逼近华沙，并号召波兰工人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以便把俄国革命扩大到德国的边界，但没有得逞。法国派遣魏刚将军援助波兰人，英国只供给他们军火，但工会会员拒绝装运这类供应品，这时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弗利·乔治号”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弗利·乔治号”是一艘包租来从哈里奇

往波兰运送军火的船只，当时码头工人成功地拒绝给它装货。事情很清楚，任何企图利用反对罢工的工人来挫败抵制运送军火的做法，将造成广泛的同情罢工。各种最荒诞无稽的谣言在国外不胫而走。在俄国，甚至有报道说，英国已爆发了革命，一时之间，人们还信以为真。在英国工人中，确实突然情绪高涨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弗利·乔治号”事件，虽然本身是一件小事，却具有一种坚持国际团结，支持俄国革命，反对其资本—帝国主义敌人的象征意义。而且，当时人们广泛地担心英国政府正筹划与法国一起，站在波兰人一边进行武装干涉。这种担心竟变得非常严重，以致在8月初召开了一次代表整个劳工运动的特别会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同时直言无讳地告诉政府说，任何向俄国开战的企图，将遭到劳工运动的联合抵制，直至采取总罢工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工会运动感到它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因为它知道它既得到工人阶级的，也得到许多非劳工舆论界的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坚决态度，使得劳合·乔治不得不三思而行，宣布他从未有过向俄国开战的想。因此，行动委员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遍及全国而建立起来的地方委员会，没有被要求去执行罢工的警告，不过这些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俄国与波兰之间拟订了和平条约，并于1920年10月被接受为止。假如魏刚将军没有帮助波兰人拯救华沙，并把俄国人打退的话；再假如面对波兰人行将失败的危险，英国试图派遣军队，站在波兰一方作战的话，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这是很难说的。赞同并协助组成行动委员会的人们中，包括英国工党右翼领导人，他们肯定只有作为最后手段，才会同意使用罢工武器。

波兰危机几乎还没有过去，与之同时发生的爱尔兰危机仍待<sup>429</sup>解决。当时，在1920年夏季，由于矿工联合会提出了新的工资要求，在矿业中再次出现了麻烦。经过复杂的谈判，政府只答应在生



产增长的前提下增加工资，于是矿工于1920年10月宣布举行全国性罢工，并要求在三边产业联盟中的另外两个伙伴给他们以全力支持。但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们极不愿意为了矿工的利益而卷入全国性罢工，于是他们着手在矿工联合会和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结果达成一项临时解决办法，矿工们虽得到了某些让步，但矿业中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政府于1921年4月1日宣布它打算结束战时的控制，并将煤矿发还它们的私有主，这时一场比1920年的危机更严重得多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这一点已经很清楚。煤矿主们宣称：一俟政府结束对煤矿的控制，就有必要急剧地降低工资和增加工时，因为再也不可能以较为有利可图的煤矿的收入去贴补利润较低的煤矿了。煤矿主们坚持：在将来，各煤矿的工资问题应由各煤矿根据当地的支付能力单独解决。而矿工联合会则辩称：如果政府拒绝对矿业实行国有化，就必须有一笔“全国基金”，用以给那些在入不敷出的矿井和矿区工作的工人们支付可以维持其生活的工资。

1921年4月1日，当矿工们拒绝按煤矿主提出的条件去上工时，一场全国性的煤矿罢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封闭煤矿的运动开始了。矿工联合会再次呼吁三边产业联盟中的伙伴们提供支持，但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们再一次表现出对于号召举行罢工来支持矿工毫不热心。不过，这两个组织宣布，除非根据矿工联合会认为满意的条件重开谈判，否则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支持矿工。当矿工联合会拒绝接受完全未能满足其要求的政府建议时，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在另外几个工会组织的支援下，重申他们打算罢工。但是，在这个时刻，又做了多次努力，试图把双方再拉到一起举行谈判，并建议对工资问题做出临时性的解决，而把拟议建立的“全国基金”和全国工资委员会等问题留待以后的谈判中去处理。矿工联合会书记弗兰克·霍奇斯(1887—1947

年)在一次议员会议上讲话,当时他对一个问题的答复被人们解释成是对上述建议表示某种支持。但是当劳合·乔治写信给矿工联合会,询问它是否准备在此基础上谈判一项临时解决办法时,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却断然予以拒绝,重申它关于建立“全国基金”和全国工资委员会的要求。三边产业联盟的各工会以及参加各该工会的人,以矿业联合会拒绝上述建议为理由,于1920年4月15日召集会议,取消了他们关于罢工的指示,结果让矿工继续孤军奋斗。从此以后,4月15日就被劳工界称为“黑色的星期五”,因为人们认为就是在这一天,势力很大的三边产业联盟很不光彩地垮台了,战后产业工人斗争旺盛的时期也随之而决定性地告终了。确实,其直接的影响是:在这个“黑色的星期五”以后,整个劳工运动被迫退居守势。矿工联合会孤军作战,继续其毫无希望的斗争,直到7月间终于不得不承认失败。到这个时候,已到处出现工业衰退,各工会一个接一个地被迫接受大幅度工资削减。在享受保险的工人中,1920年的平均失业率仅为5%,而1921年达到17%,1922年为14%,1921年煤矿停工期间,失业人数上升,大大超过了200万。工资率在1920年底曾经超过1914年7月份水平的170至180%,而到1923年,逐步降到仅超过该水平的65至70%。工会会员总数从1920年的8,344,000人,降到1923年的4,328,000人。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并将在1936年的总罢工中达到新的高涨,但是不景气状态以及矿工斗争的失败,暂时使积极斗争的时期确定无疑地宣告结束了。

而且斗争的失败并不限于工业领域。工业萧条也在政治领域 431  
导致了一个“全民节约”的大规模运动,其主要表现是1922年2月由一个指定来拟定削减政府开支计划的委员会提出的“格迪斯削减”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被用来减少失业津贴,而且也被用来削减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事业,并且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削减了用于

公共工程的开支。为了寻求出路，失业工人开始在工业地区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工会组织由于自己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便听任一些非正式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一运动，其中有很多是共产党人。共产党只是到1920年才最终组成，1922年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它改组成为一个有纪律的集中领导的政党的指示，经历了彻底的改组。“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开始组织从各工业地区向伦敦的“饥饿进军”，进军中举行示威，并汇集伦敦，以便向政府和工党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指责工党对他们的要求持冷淡态度。到1922年12月，在克莱德赛德和其他地区，还发生了广泛的房客拒缴房租的运动。在此期间，保守党人在10月间把劳合·乔治赶下了首相宝座，而由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博纳·劳取而代之，成为清一色的保守党政府的首脑。紧接着举行了大选，工党所得选票从220万增加到420万张，议席从1918年的57席，增加到142席。保守党人仍然遥遥领先，获得了540万张选票和347个席位；独立自由党人获得250万张选票；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支持保守党的民族自由党人获得170万张选票。这两派自由党人各得59个席位；共产党人只争夺5个席位，他们赢得了其中的1个。在新的下议院中，克莱德赛德地区的议员们完全选错了人，他们让拉姆齐·麦克唐纳重新担任工党的领袖，而把在竞选中被他击败的J·R·克莱因斯作为他的副手。

432 新的议会只存在了一年。1923年5月，斯坦利·鲍尔温接替博纳·劳担任首相，并决定诉诸全体选民，要求授权政府全面实行关税保护制度。在就业情况仍然糟糕，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继续增长的情况下，这个决定有利于工党，在1923年12月的大选中，它所得选票票数虽然只略高于前一年，但它的议员数却增加到191人，保守党为258人，自由党为158人，这次两派自由党人联合成了一个党。共产党人失去了他们仅有的一个议席。这样，工党虽还不是最大的政党，但保守党人已失去他们明显的多数，于是自由

党人决定使工党上台执政。拉姆齐·麦克唐纳组成了他的第一个少数党政府，他明知自由党人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把他赶下台。

工党是否应该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执政？如果同意执政，它应遵循什么样的政策？有关这些问题，在劳工运动中有很多争论。大多数工党政治家们都赞成执政，但其中的一些人要求工党执政以后立即着手实行一项激进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肯定会在下院遭到某种失败，那时，就以这项纲领为基础，诉之于全体选民，把搞垮政府的罪责归咎于自由党人，指望以此把相当一部分左翼自由党人争取过来。但是麦克唐纳完全无意照此行事。他赞成执政，并执行一项温和的改良主义纲领，自由党人将难于从中找到充分的借口把他赶下台。尽管1924年的工党政府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执政的，但是它的上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它的很多支持者。曾几何时，工党还被人们认为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附庸而已，尽管它宣称自己是独立的，但它的几乎全部议席都依靠自由党的选民。因此，它的上台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已经改变，表明那种一向把执掌政权看成是上层阶级和中等阶级的特权的制度，已经在消逝。一个在贫穷中长大的家庭佣人的私生子，竟然跃上了首相的高位，而且竟然十足地象个首相的样子，这一点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征兆，即使由于工党在下院中处于少数党的地位，甚至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政党，工党的执政，暂时说来，并不能产生某种实际上具有任何深远意义的结果，也仍然如此。人们并不指望工党会采取任何革命的态度，但仍然激动地期待着在这种完全新奇的政治局而中，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拉姆齐·麦克唐纳在组成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把大多数工党领袖人物都选入政府，只有乔治·兰斯伯里除外，只给了他一个非内阁成员职位，他拒绝了。工党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约翰·惠特

利(1869—1930年),他成为卫生大臣,从而负责主管紧迫而困难的住房问题;有少数几个职位,麦克唐纳选任了工党以外的人士,任命切尔姆斯福德勋爵为海军大臣;前自由党政府大臣霍尔丹勋爵为大法官;帕穆尔勋爵为枢密院长;苏格兰的各司法官也任命非工党人士担任。内阁中右翼人选占优势。麦克唐纳不仅担任首相,而且兼任外交大臣,而把阿瑟·汉德逊排除出外交部。菲利普·斯诺登任财政大臣,悉尼·韦伯任贸易大臣,汉德逊任内政大臣。总的说来,这个内阁是温和的,也是胜任的,但除了住房问题以外,看来不大可能试行任何冒险的方针。1924年的工党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它的上台正值经济状况有某种好转,而且法国政局由于彭加勒在前一年占领鲁尔区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而向左转。在这些事态发展的帮助下,工党政府得以实施某些有益的社会立法,特别是约翰·惠特利的住房法。这个法案第一次认真地试图使地方当局能够提供新的住房,以普通工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房租出赁。惠特利也成功地与各建筑工会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这些工会同意作出安排,把非熟练工人提升到熟练工的位置,以便更多提供熟练工人,并采取专门措施培训更多的工人。这是政府在国内实行的最有作为和最有成就的措施,其影响在该政府下台若干年以后仍然可以看出。其它重要措施改进了接受失业津贴的条件,恢复了战时制定的、在战后萧条时期取消了的农业工资管理制度。政府还促成实施一项新的工资协议,它使煤矿的状况稍有改善——煤矿由于鲁尔区被占领期间德国煤矿的关闭而得到了好处。此外,在左翼势力对麦克唐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以后,政府承认了苏联,向莫斯科派出了大使,着手谈判一项英苏条约,并开始商讨向苏联提供贷款的计划。政府促使处理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获得通过,从而至少开始实行了一项较为现实的对德政策。在国际联盟中,政府竭尽全力加强国联盟

约,并推动裁军和普遍仲裁的事业。如前所述,从1924年6月起,由于法国成立了以爱德华·赫里欧为首的左翼激进社会党政府,使它得到了帮助。

就其实施的情况而言,这些都是稳健的步骤。但在8月,政府逮捕了共产党的《工人周报》主编J. R. 坎贝尔(1894年生),指控他犯有煽动叛乱罪,接着又因受到因此而引起的抗议,而撤销了指控。这件事使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的报告,政府因撤销对坎贝尔的控诉和拟向苏联提供贷款而受到猛烈攻击,于8月底宣告倒台。麦克唐纳辞职,并在距上次选举仅一年之后,又举行了一次新的大选。如果不是由于在即将进行大选以前发生了一起事件,几乎置工党于绝境,大选的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这就是“季诺维也夫”事件,或称“赤色信件”事件,这是一封据称是共产国际给英国共产党的信,信中除了共产国际对其所属组织的通常指示以外,还出现了一段话,明确地鼓动英国共产党采取阴谋行动,在武装部队中煽动不满情绪,鼓动叛乱。这个“信件”究竟是真的还是伪造,始终没有弄清楚,一直没有看到该信的原件,只有一个据称是抄件的东西,落到了《每日邮报》的手里。外交部得知《每日邮报》打算在大选前夕公布这个“信件”,并要求首相兼外交大臣的麦克唐纳答复苏联政府,要它惩戒共产国际。正在作竞选旅行的麦克唐纳,在经过一些延误之后,才收到外交部的报告,他自己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才采取行动。在此期间,外交部公布了它起草的送请麦克唐纳批准的答复。后来它解释说,它认为不能让《每日邮报》公布该“信件”而不作任何官方的答复。这个答复正式发表以后,所有的人自然都认为这是得到麦克唐纳批准才公布的,答复中扬言,除非共产国际否认它与此信件有关并加以斥责,否则就要阻止批准英苏条约。但是,当麦克唐纳本人最后提出旨在作解释的意见时,所发生的这一切就变得比以前更加

令人费解了。因为他既没有肯定说明他是否认为这个“文件”是真的，也没有肯定说明他是否真的批准或授权外交部作出那个答复。实际上似乎曾起草了两个答复，以便任择其一，而那个答复却把两者都包括在一起，因此既温和又严厉，使人觉得几乎是自相矛盾的。

这一离奇而丢人的事件造成的影响，使正在竞选的工党候选人陷入难堪的境地。在我看来，不论其真伪如何，这个“赤色信件”很可能是对一份原来并没有什么破坏性内容的信件，经过润色渲染而成的，原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煽动叛乱的内容。不过，任何人的猜测都和我的猜测一样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人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原件，这封所谓的信件是根据据说是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的报告所编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赤色信件”以及麦克唐纳对这次事件的笨拙处置，使工党失去了本来可以哪怕是仅仅保持上年的选举成果的一切机会。选举的结果，工党得 151 席，而不是 191 席，不过，由于总投票人数要高得多，它实际所得选票增加了 100 多万张。保守党人得选票 200 万张，获得 415 个席位，重新取得明显的多数。自由党人失去了 100 万张选票，从 158 个席位猛跌到只有 43 席。鲍尔温卷土重来，再任首相，以温斯顿·丘吉尔为财政大臣，着手按同等比值恢复金本位，这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导致了 1925 至 1926 年的危机。

英国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尽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上台，而且所实施的某些措施具有积极的价值，却这样很不光彩地以失败而告终了。这次可耻的失败理应归咎于麦克唐纳，他完全上了他的政敌的当。工党在被自由党人所左右的情况下执政是否明智，这固然是可以争论的。但有一点不能不加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立法都是不实际的。而这种局面对麦克唐纳和他的许多同僚来说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希望

尽最大的可能谨慎从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对付那些要求更直截了当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人。在麦克唐纳和其他许多人看来,第一届工党政府应遵循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构成威胁的,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政策,以此赢得“温和派”的信任,这样做是只会有好处的。他们无疑希望能够在以后的阶段进而实行更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一种渐进主义的措施,但这只有当他们争取到更多的选民,并且使自由党人沦为了一支微不足道的残余力量时才有可能。他们毕竟是一些彻底的议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某种只能严格地通过议会途径——就是说,通过把大多数选民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来争取的东西。他们虽然在 437 劳工运动的舆论压力下承认了苏联,并准备与苏联签订条约,但他们深深地憎恶共产主义(反过来,他们也为英国的共产党人所深深憎恶)。除去任何“赤色信件”不谈,麦克唐纳和其他许多人大概对于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也心存疑虑。这样的工党人士当发现他们自己受到指责,说他们竟然与一个只不过是希望通过共产国际千方百计暗中伤害英国及其工党政府的国家交好时,他们自然感到非常不安。

列宁是在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的前一天在俄国逝世的。在工党执政期间,苏联内部列宁继承人之间的斗争继续不断,以托洛茨基于 1925 年 1 月辞去一切职务而达到了高潮。在英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公开谴责工党政府,一方面却坚持企图获准加入工党——这种企图在连续几次工党代表会议上均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拒绝。在 1922 年的大选中,共产党人提出了 6 个候选人,其中只有 1 人与 1 个工党候选人竞选。其中的两个人——J. T. 沃尔顿·纽博尔德(1888—1943 年)和印度人沙普尔吉·萨克拉特瓦拉(1874—1936 年)——当选,后者是作为工党议员面当选的。1923 年,他们都失去了议席。在 1924 年,他们只有 1 个人当选。在工会工作方



面，共产党人干得很好。在1923年，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同意与“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26年。1924年，共产党主要的工会人物阿瑟·库克（1884—1931年）当选为矿工联合会的书记。同年，他们以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汤姆·曼恩（1856—1941年）为领导人，发动了“少数派运动”，其任务是作为赤色工会国际在英国的支持者，反对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此外，在1924年11月，英国工会与苏联工会同意建立一个英俄工会委员会，以促进双方工会运动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决定于1925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代表联席会议上获得批准，这已是工党政府倒台很久以后的事。在对苏关系问题上，工会——如果说不是作为政党的工党的话——的态度正在确定无疑地向左转。在国内事务中，工业战线也出现了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迹象。这一切远非意味着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出现了一种脱离工党政府的极右政策而向左转，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加持挑战态度的倾向。1925年1月，乔治·兰斯伯里（1859—1940年）辞去其《每日先驱报》——1922年工党正式接管了这家报纸——经理的职务，创办了他自己的期刊《兰斯伯里劳工周报》，作为鼓吹左翼的社会主义和工业政策的喉舌。左派势力正进入阵地，准备进行新的斗争。独立工党已摆脱了麦克唐纳的影响，在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1873年生）和克利福德·艾伦的领导下，制订它的“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政策。曾经听任三边产业联盟于1921年瓦解的各工会，也开始拟订建立一个新的产业联盟的计划。

1925年夏季，出现了新的煤矿危机。随着鲁尔危机后德国煤矿的重新开始生产，英国煤矿业的短暂繁荣宣告结束，煤矿主提出了大幅度削减工资，以地区性协议代替全国性协议，以及延长日工时的要求。他们说，英国的生产成本太高，出口业受到严重威胁，特

别是在按战前英镑与美元的比值恢复金本位以后，情况尤其如此。矿工联合会由于 1921 年失败的影响而吃到了苦头，到 1925 年已在大多数煤矿重建了自己的组织，不过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煤矿，力量仍然薄弱。矿工联合会拒绝了煤矿主的上述要求，呼吁整个工会运动给予支持。1925 年 7 月 10 日，它的领导人与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举行会谈，双方向所有的工会组织发出呼吁，号召团结一致支持矿工。7 月 14 日，政府建立调查法庭，处理这一争端，但宣告失败。由于关闭煤矿的警告通知将于 7 月底到期，总委员会建立的特别委员会与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会谈，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在铁路和港口，对煤炭实行全面禁运。7 月 30 日，首相斯坦利·鲍尔温在与矿工代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代表们说：“我国全体工人都不得不削减工资，以帮助工业恢复繁荣。”他的论点是：这样的削减对于维持出口，维持新恢复的金本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的讲话自然在整个工会运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以前，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工资与工时都是由矿工与煤矿主之间解决的问题，政府没有责任介入。鲍尔温曾宣布：政府不可能提供任何津贴来缓和局势。但到最后时刻，面对迫在眉睫的关闭煤矿和运输工人的禁运决定，他突然改变主意，宣布政府准备提供临时津贴，来缓和煤矿主们声称已不可避免的局势严重恶化。这笔津贴只提供 9 个月，在此期间，一个皇家委员会将就整个矿业问题提出报告。在宣布这一决定后，煤矿主们撤销了关闭煤矿的通知，并且一直推迟到皇家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以后，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政府之所以突然改变态度，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工会运动支持矿工斗争的明显决心感到吃惊。他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来应付由于煤矿全面罢工，再加上实行全面禁运而造成的危机，这种禁

运也很容易导致运输的全面停顿。他们虽然完全有决心支持煤矿主，并实行普遍削减工资，但是他们需要时间来组织抵抗，以便能够即使面对广泛的罢工也能维持最基本的供应。提供临时津贴的唯一目的在于赢得时间，准备为击败工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皇家委员会，以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后来是塞缪尔勋爵）为主席，于9月开始工作，1926年3月10日提出了报告。在此期间，政府运用1920年的紧急权力法所授予它的权力，安排建立了一个志愿机构——“维持供应组织”——它着手招募大批人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准备在一旦发生广泛罢工时充当破坏罢工的工贼。政府还着手动员一批运货汽车，并为火车和货车训练紧急备用司机，和紧急备用的报务员、电话员，以应付可能发生的邮政罢工。

在工会方面，则没有为行将到来的斗争进行任何相应的准备，虽然情况很明显，一旦津贴停止发给，危机一定会重新出现。至于皇家委员会，几乎不可能指望它会达成一项或者为煤矿主和矿工所能接受，或者为政府和矿工所能接受的方案。矿工们决心反对或者削减工资，或者增加工时，并决心坚持全国性谈判的原则。煤矿主则坚持按地区谈判，并坚持说如果不降低工资，不能增加工时，他们就无力维持下去。政府既反对国有化，也反对在9个月后继续提供津贴，并且同意把普遍削减工资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这意味着，政府与煤矿主紧密地站在一起反对矿工，而矿工则受到工人阶级中其他人的支持，因为人们感到矿工的失败势必会导致对各工会的全面进攻。所以皇家委员会承担的是一个很不值得羡慕的任务，因为它不可能提出任何能够打破僵局的建议——除非它确实能够或者劝说矿工让步，或者劝说政府不论实行不实行国有化都承担责任，经营亏损的工业。而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根本不可能得到同意。

到1925年11月，政府已为对抗做好了主要的安排。把全国分

成了10个地区，每个地区都由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大臣或文职专员掌管。而在职工大会方面，虽然在其9月举行的年会上一片战斗性的演说声，但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大概是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而不被指控为组织公开的叛乱反对政府的权威。它的领导人一方面坚持采取罢工行动来支持矿工的权力，一方面却没有决心去做任何哪怕是使他们的对抗在表面上带有革命性质的事情。他们要么是认为，尽管政府进行了一切准备，但到时候无须实际上宣布罢工，政府就会屈从于工人阶级的全面行动；要么就是认为，只要举行一次总罢工，就可以在不超越严格的合法范围的情况下，成功地与政府相对抗。另外，或许是因为他们完全被事件的进程弄得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了。

《兰斯伯里劳工周报》，以及共产党人，都谴责职工大会无所作为，要求整个劳工运动动员起来，以便做好准备，等时机到来时接管主要公用事业。10月，政府突然袭击了共产党的办公机构，以煽动非法活动为由，逮捕了一批共产党领导人。11月，政府把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计划公布，并通知了所有的政府部门。

1926年3月，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它的建议。在工资和工时这个紧迫的问题上，它认为除了矿工做出大的让步以外，别无他法。但它辩称，究竟是维持7小时工作日并接受大幅度的工资削减呢，或是同意增加工时，以免减少工资的削减，这两者要由矿工自己去选择。在较大范围的问题上，它重申以前桑基委员会的主张，即把煤矿的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但拒绝将煤矿国有化，并且仅仅建议应鼓励煤矿主合并成为较大的单位，同时含糊不清地提出：如煤矿主未能采取自愿行动，以后也许有必要采取某种强制手段来合并。它还建议采取步骤发展研究工作，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明确反对任何延长津贴的办法。矿工联合会立即宣布它不能接受皇家委员会的这个报告，重申它的口号：“不削减一便士工资，不增加一秒

钟工时”，并呼吁其他工会实现其支援矿工的保证。职工大会总委员会犹豫不决，一方面重申“支持为求得公正解决而进行的各种努力”，一方面又说“事态还没发展到总委员会能够最后宣布其政策的阶段”。这些话意味着总委员会仍在希望，重新开始的谈判将会导致一项可劝说矿工联合会接受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得出结论，认为除削减工资外实际上别无他法；最大的希望在于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折衷方案。面对矿工们的态度，他们不能公开地这样说，但他们心里的意思就是这样。

但矿工们在他们的主席赫伯特·史密斯(1863—1938年)和他们的书记阿瑟·库克的领导下，决心寸步不让。前者是一位性格十分顽强的约克郡人，不过从其总的态度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左翼分子，后者则是一个性格火爆的人。在这方面，工会中大部分人的舆论显然是支持他们的。煤矿主们也是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对矿工联合会坚持全国性解决的要求，他们试图与各地区的矿工联合会举行单独的地区性谈判。这更助长了工会的强硬态度。在这种僵持局面下，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于1926年4月29日召集了一次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决定应采取什么步骤。这次特别会议也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欧内斯特·贝文为主席，来拟订应付已迫在眉睫的紧急状况的计划。会议期间，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在总委员会和矿工联合会参加下，继续进行谈判期间，向矿工发出的关闭矿场的警告通知应延缓执行。接着，矿工、总委员会与政府进行了匆忙的谈判。但关闭矿场的警告通知并未撤销，5月1日，谈判代表向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说，谈判已完全  
443 陷于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来支持矿工，他们从当天早晨起已被关闭在矿场之外。

5月3日，在政府突然停止进一步谈判以后所开始的“总”罢工，事实上并不是总罢工。首先，它仅限于运输工人、印刷和报业

工人、钢铁及其他冶金工人、化学工业工人以及除住房和医院建筑工地以外的建筑工人，要求电力和煤气工人拒绝向停工企业提供动力来配合罢工。有另一批行业作为第二线后备力量，以后如情况需要他们援助时，再号召他们参加。工会接到指示，负责保证医疗卫生和食品供应工作。各地区的职工大会委员会则接到指示，采取地区性的行动来支持罢工。但尽管号召举行大罢工，却有一个附加条件，即矿工联合会应将它的领导权交给职工大会总委员会。据说矿工联合会已同意了这一点，但这中间显然有一个误会，始终没有彻底澄清。总委员会对这一条件的解释是，即使在未经矿工同意的情况下，它也有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矿工方面则坚持认为，各工会是为支持他们的各项要求而号召罢工的，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这些要求是不能改变的。当时由于政府拒绝谈判，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几天以后，争论就出现了。

政府用来最后突然停止与总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借口，是一件几乎滑稽可笑的无足轻重的小事，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已下决心要较量一番。这个借口是，《每日邮报》的排字工人拒绝排印一篇社论，因为该文激烈攻击拟议中的总罢工是“有意把苦难加给社会上广大无辜群众的革命运动”，并说，必须用社会所能支配的一切人力物力与之进行斗争。在得知这一拒绝排印的消息后，内阁的谈判代表向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声称除非无条件地取消罢工，否则拒绝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总委员会准备否认排字工人的行动与它有关，但政府拒绝再与他们开会。因此于1926年5月3日号召进行罢工，它持续了9天。<sup>444</sup>

对罢工号召的响应是引人注目的：几乎所有接到号召的人都参加了，并坚持到底。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在开始几天警察逮捕了无数的人——直到监狱里人满为患，尽管政府方面大规模地组织工贼进行破坏，但并没有发生暴力行动。虽然罢工者明显地

是在向政府提出挑战,但谁也没有试图把这场运动变为一场革命,哪怕是一种和平性质的革命。总委员会始终坚持认为,它所进行的是一次“纯粹的产业斗争”,没有任何政治涵义,罢工者也都遵从它的领导。罢工工人与警察之间安排了足球赛,也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地妨害政府所组织的应急措施的事件。职工大会的各委员会随时向必要的运输服务发放许可证,他们并自行办理某些运输服务。整个的罢工绝大部分是在令人吃惊的良好气氛中进行的。而由政府紧急状态下发行,由温斯顿·丘吉尔主持的报纸《英国新闻报》却没有这种气氛,但工党发行的与之相对抗的单页报纸《英国工人报》基本上贯串了这种气氛。在罢工期间由政府控制的英国广播公司,清一色地用于官方报导,罢工工人则用临时发行的地区性油印报纸来应付,这些报纸几乎全部报导罢工消息。

在此期间,虽然人们以为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政府却利用不久前的皇家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让他起着非正式的调停人的作用。赫伯特爵士在与首相鲍尔温及其他大臣们磋商之后,以皇家委员会的建议为基础,拟订了一份备忘录,提交给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作为解决方案的大纲;他声称自己并无权力约束政府,但又有把握地暗示说,政府将准备根据备忘录提出的方针,接受一项解决方案。这一备忘录使矿工联合会与总委员会之间潜在的误解,变得明朗化了。矿工们断然予以拒绝,而总委员会则准备建议接受这项备忘录,作为恢复谈判的基础。当矿工们已明确表示拒绝后,刚刚决定号召“第二线”——主要是机械与造船业工人——投入罢工的总委员会,不仅取消了这一号召,而且晋见首相,将立即结束罢工的决定告诉了他。他们接着与有关的工会组织做出安排,发出立即复工的命令,尽管对他们说来事情很明白:塞缪尔的备忘录对政府并无约束力,他们事实上无疑是投降了。

就这样,大罢工于5月12日宣告结束,只有矿工除外,他们一

直斗争到11月，尽管在他们的联盟垮台以后，他们已不再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希望。一方面，事实已清楚地表明，一次必然是针对政府而举行的大罢工，除非使政府感到恐慌并做出让步，或者除非将罢工转变为一次革命运动，罢工者已作好准备夺取政权，否则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这次大罢工虽然同样清楚地表明那种把工人们团结到一起的强烈的团结情绪，但同时也表明，不仅罢工工人的领导人，而且那些具有这种团结精神，并准备在需要时据以行动的人们中的大多数，全都不是革命者。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全都是象拉姆齐·麦克唐纳那样的彻头彻尾的议会主义者，这些人即使在大罢工正在进展的时候，也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对大罢工的强烈憎恶。左翼分子是不少的，他们热诚地相信“直接行动”并欢迎大罢工，把它视为无产阶级对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但即使在这些人中间，也很少有人考虑到把罢工当成一场社会革命的开端，或者除了希望罢工得以使矿工们抗拒命运的进一步恶化以外，还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有很多人甚至直到最后都希望，而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团结精神，政府将感到恐慌，并作出让步。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预料政府将被迫辞职，或考虑政府辞职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工人们本能地团结到矿工们的一边，与政府作斗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当这样做，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推翻政府的任何意图。

1926年的总罢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除非罢工给政府造成了恐慌，而政府是绝不会感到恐慌的。从头年夏天起，政府就一直在准备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它不可能轻易地后退。政府成员中无疑有人希望，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和其余的工会领导人将会感到恐慌，而在罢工还没有宣布前就予以取消。无疑也有一些工会领导人，他们本来就想这样做。但他们也在一股他们无力抗拒的潮流中随波逐流，被那次决定性的工会执行委



员会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所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参加到罢工中来。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注意窥视，一遇机会就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现在他们已经给了矿工以帮助，在决定解决争端的条件时，已经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了。矿工联合会拒绝接受这一要求，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来结束这一罢工运动。这样的领导人始终害怕，一旦宣布罢工，控制权就会从他们的手中落入那些非正式的左翼领导人手中。实际上，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曾提出过这种危险，作为他们取消罢工行动的口实，尽管既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即将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也没有迹象表明对罢工工人正失去控制。

随着总罢工的瓦解——很多罢工工人开始时对此几乎不敢置信——战后产生工人的斗争高潮宣告最后结束。它几乎是在此之前，即在1921年的失败以后就宣告结束了；1925年和1926年的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而已，是由伴随着恢复金本位而来的蓄意降低工资标准的做法而引起的。1925至1926年的动荡局面，确实暂时使共产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但只不过由小小的5,000人增加到10,000人，而且很快就又失去了。工会中非工会正式领导的“少数派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汤姆·曼恩的领导下，能够召集代表大约100万有组织的工人的非工会正式召开的会议，号召行动起来，支持矿工。但在罢工失败以后，这批追随者很快就减少了。实际上，共产党人作为个人来说虽很活跃，但人数微不足道，他们甚至在工会左翼的大多数人中都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左翼势力确实曾热衷于支持1925年4月联合建立的英俄工会委员会，并支持英国各工会劝说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同意举行一次“统一”会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出现一个“统一工会国际”。但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25年12月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虽然苏联工会在第二年给予英国矿工以财政支援，但在大罢工失败，英国各工会不得不重新采取退守政策以后，争取统一的运动很

快就失去了基础。虽然1926年的职工大会投票赞成——并没有实际作用——按照产业工会<sup>①</sup>的路线对工会进行一次改革,但1926年以后,英国的工会运动已确定无疑地转而奉行劳资和平的政策了。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英国的雇主们在工会遭到失败的时刻,并没有全力向工会发动进攻,大部分雇主都有所克制,没有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把事情做绝,采取了使工会驯服而不是企图消灭它的办法。鼓吹雇主们这样做的是帝国化学公司总经理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后来成为梅尔切特勋爵)。他于1927年邀请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与一批有势力的雇主举行会议,旨在改善劳资关系。不过有关这些事态发展的叙述,属于本卷后面一部分的内容。<sup>②</sup>

虽然雇主们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向工会发动全面进攻,但很多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被削减。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的各工会,接受了适度的削减工资,而不是求助于罢工行动。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政府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克制态度,而是通过1927 448年的《工会与劳资纠纷法》,不仅竭尽全力遏制工会势力,同样竭尽全力来破坏工党。这个法案宣布罢工为违法,并以各种使人无法活动的禁律来限制工人采取同情罢工运动的权利,严格限制设置纠察线,禁止主要由公用事业工人所组织的工会参加职工大会或参加工党。更有甚者,政府把关于工会征集捐款的法律改成了关于政治基金的法律,从而给了工党以直接的打击。根据1913年的法案,工会有权为政治目的征集款项,但工会必须允许拒绝缴纳这笔钱的人签署“免缴”表格。而1927年的法案改变了这种制度,规定签署一种“缴纳”表格,这样就只能向那些实际签署同意缴款表

---

① 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即同一工业部门中不论什么工种的工人均可参加的工会。——译注

②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667页。

格的人征集政治捐款。这些改变使工党所属工会会员人数从1926年的3,388,000人减少到1928年的2,077,000人。虽然这种减少有些是由于工会会员人数普遍下降而造成的——1925年为550万,3年后减少到4,804,000人。

如前所述,独立工党在1924年工党下台以后,曾在“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发动了一场主张执行更加坚决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运动。这一政策的主要点是,要求工人们得到“最低生活的工资”,和实行具有长远意义的工业社会化措施。有一批小册子和一本书阐述了这项政策,这本书的书名为《当代社会主义》(1925年),它是由独立工党的刊物《新领袖》的主编亨利·诺埃尔·布雷克福德撰写的。这一运动使独立工党一时实力大增,并使它成为工党内部政治左翼的主要代言人。但1926年的失败,对工会和独立工党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推动这一运动的力量逐渐消失而一事无成。独立工党纲领中当前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必须把使所有的人都获得最低生活的工资,作为国民收入中一项首要的支出项目;工党也应把这条列为它的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目标。麦克唐纳和其他一些前独立工党领导人攻击《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纲领是“华而不实的空谈”。<sup>449</sup>但是当关于“最低生活工资”的决议被提到1926年10月的工党代表会议上审议时,工党执行委员会没有试图直截了当地否决它,而是把它移交给了一个联合组成的“工党一职工大会委员会”去审议,这个委员会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等于是悄无声息地把它埋葬了。此后,独立工党继续遵循其左翼的、但并非革命的路线,仍然留在工党内,但与其联系越来越少,直至1932年与工党断绝关系,最后破裂。

把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连续地一直叙述到1926年是必要的,因为这年的总罢工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再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截止点了。我曾试图说明,根本不存在任何有可

能爆发英国革命的时机。英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其社会结构实质上没有变化，它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丝毫也没有触动。确实，到1818年时，工党正逐渐变成一支相当大的政治势力，工会的力量也大大地增长了。不过，直到1914年还只不过是当时仍统一的自由党的一个附庸的工党，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和问鼎政权的力量，仍然须要一个习惯的过程。它当时太热衷于取代自由党人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以致感觉不到对议会制度有什么不满。而且它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尤其是阿瑟·汉德逊——以前曾是自由党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忠诚于党而随之摆脱了他们的自由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如麦克唐纳和悉尼·韦伯，都是虔诚的渐进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将不得不建立在自由党的改良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背叛这个传统。即使是菲利普·斯诺登，虽有时表现得比较极端，但也是一个彻底的议会主义者，比任何人都不同情任何形式的工业左倾主义。在主要人物中只有乔治·兰斯伯里，在次要人物中只有弗雷德里克·威廉·乔伊特和约翰·惠特利，始终一贯是左派，而在这些人中，兰斯伯里把他的左倾主义与基督教和平主义联系在一起，乔伊特和惠特利两人的主要兴趣则在地方政府和社会立法方面，而不在产业工人的斗争或国际事务方面。

约翰·惠特利久病之后，于1930年去世，这是英国工运的一个严重损失。他是1924年的工党政府中作出突出成就的人物，他的住房法是这届政府的措施中最富于建设性成就的措施。惠特利是克莱德赛德的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是与独立工党有联系的克莱德赛德议员集团中最有才智的一个。他生前是特别受人欢迎的演说家詹姆斯·马克斯顿(1885—1946年)的主要鼓励者。马克斯顿在独立工党进行“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该党的领袖。惠特利的职业是出版工作者，不长于演说，他宁愿在委员会中，或

在幕后发挥作用。住房改革是他最热衷的事业，这很可能是由于克莱德河地区住房条件惊人地恶劣的缘故。他在与建筑业工会谈判中表现出很高明的手腕，与他们达成一项协定，根据协定建筑工会准备积极配合他的改进住房条件的努力。惠特利的住房法的效果只是到了工党政府下台以后才显示出来。这个法案在促进提供归地方当局所有的住房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房屋用于出租，而不是直接出售。他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合不来，后者不喜欢他的左倾思想，并因能够把他拒之于1929年的工党政府之外而感到高兴。

在这些年中，独立工党的其他著名人物有爱·弗·怀斯(1885—1933年)、克利福德·艾伦和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德。布雷斯福德从1922至1926年非常能干地主编了《新领袖》——其前身是基尔·哈迪的《劳工领袖》——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激进主义者，以撰写外交问题的评论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闻名。他积极参加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原是费边社成员，由于费边社对待布尔战争的态度而离开该组织，并于1906年加入独立工党。他曾周游欧洲，包括1914年以前处于动乱年代的东欧，并作为一个激烈反对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写了大量国际问题的文章。他写的书《钢铁与黄金的战争》(1914年)，对各种制造战争的势力，以及第二国际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做了最好的论述。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前往俄国，并以真正的同情撰文介绍俄国的情况。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能够根据最高的原则去帮助一切美好的人道主义事业。怀斯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高级文官职务，负责对羊毛后来是  
451 对食物实行国家控制的工作，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强烈地支持发展英俄贸易，在和平时期，成为实行国营贸易的主要鼓吹者。他本能地属于中派，而不是左派。但是由于环境以及由于他同俄国人的

友谊,迫使他向左转,并作为经济计划专家而在独立工党中居于领导地位。最后,克利福德·艾伦是一位年青的剑桥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反对战争而拒服兵役的人,战争期间曾领导了“反征兵同志会”。他本能地也是一个中派,但是他对战争的态度,使他与独立工党站在了一起,而且他在组织方面的巨大首创精神,使他试图重申工党的各项要求,为工党提供了推动力。他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却精力充沛。经过几年的左翼活动以后,他转向右翼,在1931年的危机中,终于追随了麦克唐纳,作为对他的奖励,被封为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并脱离劳工运动,以后也就因此而默默无闻。

工党本身在1918年发表了《劳工与社会新秩序》的声明以后,一直没有再提出关于宗旨和原则的全面声明,直到1927年,才提出了《劳工与国家》的纲领。不过在这段间隔的时期中,它发表了一系列的小册子,或者阐明其政策的某些具体方面,或是论述诸如失业之类的紧迫问题。从这些小册子看,它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寻求零打碎敲的改良,而不是任何社会与经济的剧烈变革。在国际上,它参加了1919年2月的伯尔尼会议,并在恢复第二国际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是它最积极的共事者。鉴于战争期间存在的强烈反德情绪——特别是在德国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以后——英国工党竟能轻易地就专注于这种战后的合作,这一点是很引人注意的。这种合作是以对议会民主的优越性的共同信念,和对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政党专政的激烈反对为其主要基础的。而独立工党,则投入了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直到该国际同意与1923年在汉堡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合并为止。此后,独立工党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英国支部 452 的一部分,停止发挥其独立的作用,直到1932年脱离工党为止,此后就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真空中保持均衡。

基尔特社会主义一度似乎能够形成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对

工会政策起广泛影响,但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早在第一届工党政府上台以前很久,实际上就已经不再存在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最初出现在A·R·奥拉奇主编的刊物《新时代》的专栏文章中,在塞缪尔·乔治·霍布森(1864—1940年)和A·R·奥拉奇(1873—1934年)所著《国家基尔特》(1914年)一书中,第一次得到全面的阐述。战争期间,在“全国基尔特联盟”的赞助下,它得到了发展。威廉·梅勒(1888—1942年)和本书作者(1889年生)是这个联盟中的突出人物。它在车间工会代表运动以及在矿工、铁路工人和邮政工人中赢得了很大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后这些行业的工会所制订的政策。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它的队伍中造成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不过还没有达到分裂的程度。直到共产党的成立,它的队伍中的少数信徒脱离出去加入该党,才出现了分裂。当克利福德·休·道格拉斯少校(1879—1952年)作为灵丹妙药而提出他的信贷改革计划,并获得奥拉奇的支持时,发生了进一步的意见分歧。战争的结束和兵工工人的遣散,削弱了它在机械工业工人中的阵地。但是当塞缪尔·乔治·霍布森在建筑业工会的支持下,于1920年发起组织“全国建筑业基尔特”后,基尔特运动突然又不仅成为一种改组社会的理论的倡导者,而且成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行工人管理工业的一个实际的尝试。由各工会所建立并控制的“建筑业基尔特”根据政府的住房计划,在不营利的基础上兴建住房,设法帮助应付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以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提供有保证的就业。那时,国家建房的资金,主要由政府负责提供,建筑公司有可能在工程进行中得到款项,不过总是拖欠到完工之后才付。这使他们有可能以较少的资金来经营企业。有一段时间,“建筑业基尔特”由工会提供担保,能够从“批发合作社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当这种情况保持下去的时候,事情一直进行得很好。“建筑业基尔特”在向

国家支取较低费用的情况下，进行了卓越的建房工作。但这时，战后的萧条时期来临。1921年年中，政府突然改变了住房政策，禁止签订一切新的建房合同，而在开禁以后，改变了制度。原来的制度是建房费用由有关的地方当局提供固定数额的款项，其余不足部分由政府付给；而现在的制度改为由政府给地方当局支付一笔固定数额的补贴，其余部分由他们支付。在这种新的安排下，“建筑业基尔特”不再可能从政府获得大部分他们所需的周转资金。它们就必须筹集大笔的款项，而这是他们无法劝说合作社银行或工会提供的。他们试图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但很快就面临着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的局面，于是整个运动宣告失败，这给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他们的领导人，除塞缪尔·乔治·霍布森以外，都没有参与经营“建筑业基尔特”，他同样因该组织的失败而丧失声誉。在其他行业（如机械、缝纫、家具制造等）中建立起来的较小规模的基尔特，也由于经济萧条的结果而归于失败。剩下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决定不等它逐渐解体就结束了这一运动。他们中间很多人，包括本书作者，保持着自己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信念。但在1923年以后，已不再有任何有组织的基尔特运动，不过工会继续提出的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仍然有着基尔特运动的某些影响。

基尔特社会主义虽然主要是一个左翼运动，但从寻求以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意义上来说，它从来都不是一种革命运动<sup>454</sup>。它中间有革命的一派，转向了共产主义，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拉加尼·帕姆·杜德（1896年生）和罗伯特·佩奇·阿诺特（1890年生）；一度还有威廉·梅勒。但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右翼，他们中的大多数改变信仰转而信奉道格拉斯少校的信贷改革计划。但他们中最大的派别是由左翼，即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他们对改良主义的议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并把它们的主



要希望寄托在工会的产业行动上，把它作为建立“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组织的一种手段，这些“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能够在国家所有制下接管对工业的经营管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是工团主义者。他们承认必须实行公有制，必须代表整个社会，而不仅是代表每一个特定的工业或服务部门的工人，实行对主要经济政策的控制。但是，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必须把实际的管理权委托给从事各种行业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而且，除非工人不仅拥有政治权利，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实行自治，否则，社会民主就是虚伪的。在对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态度上，他们也有分歧，奥拉奇和霍布森主张基尔特是“特许的”社团，由国家发给执照来经营；而另外一些人——我是其中之一——是一些社会多元论者，认为主权国家在适当时期应由某种形式的联合权力机构所替代，这种联合权力机构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其他“职业”的代表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喜爱的一个口号是：“经济权力先于政治权力”。它的意思是：工人们只有获得经济上的自治权，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和许多国家的其他中派一样，在1918年以后受到共产主义和议会社会民主主义这对立两派的排挤；战后的萧条也削弱了他们的影响，使他们把“车间管理”作为实现其更高目标的第一步的计划无法实行。法国总工会进行的工业国有化运动，<sup>①</sup>以及1918年以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建筑业基尔特”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只有在巴勒斯坦，由犹太工人联盟领导的一个类似的运动，牢牢地扎下了根，一直继续到现在。<sup>②</sup>

（周叶谦 潘宗乾 译）

① 见本卷下册原文第470页。

② 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阶段的详细情况，见第8卷，上册，第242页（中译本第254—255页）。

##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 附：主要人物表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Vaillant, 1840—1915①②瓦扬	13
Greulich, 1842—1925①②格雷利希	14
Hyndman, 1842—1921①②海德门	12
Kropotkin, 1842—1921①克鲁泡特金	17
Guesde, 1845—1922①②盖得	13
Mehring, 1846—1919②梅林	5
Nieuwenhuis, 1846—1919②尼文海斯	15
W. G. Spence, 1846—1926②威·格·斯宾斯	28
Sorel, 1847—1922②索列尔	13
Axelrod, 1850—1925②阿克雪里罗得	3
Bernstein, 1850—1932②伯恩施坦	4
Gompers, 1850—1924②龚帕斯	23
Iglesias, 1850—1925②伊格列西亚斯	16
Ledebour, 1850—1947累德堡	4
Natanson, 1850—1919纳坦松	6
Vollmar, 1850—1922②福尔马尔	4
Blatchford, 1851—1943②布拉奇福德	12
Zasulich, 1851—1919②查苏里奇	3
V. Adler, 1852—1918②维·阿德勒	7
Malatesta, 1853—1932①②马拉特斯塔	11
Kautsky, 1854—1938②考茨基	4
Debs, 1855—1926②戴布斯	23
Anseele, 1856—1938②安西尔	14
Bertrand, 1856—1943②贝特朗	14
Hardie, 1856—1915②哈迪	12

Mann, 1856—1941②曼恩	12
Shaw, 1856—1950①②肖伯纳	12
Lazzari, 1857—1927拉扎里	11
Plekhanov, 1857—1918②普列汉诺夫	3
Smillie, 1857—1940②斯迈利	12
Turati, 1857—1932②屠拉梯	11
Zetkin, 1857—1933蔡特金	29
Burns, 1858—1941①②白恩士	12
J. A. Hobson, 1858—1940②约·阿·霍布森	12
Katayama, 1858—1933②片山潜	26
Lansbury, 1858—1940②兰斯伯里	12
B. Webb, 1858—1943②比·韦伯	12
S. Webb, 1859—1947②悉·韦伯	12
Jaurès, 1859—1914②饶勒斯	13
Branting, 1860—1925布兰亭	15
Troelstra, 1860—1930②特鲁尔斯特拉	15
Bracke, 1861—1955白拉克	13
Legien, 1861—1920②列金	5
Briand, 1862—1932②白里安	13
A. Fisher, 1862—1928②安·费舍尔	28
Sembat, 1862—1922桑巴	13
Vliegen, 1862—1947②伏列根	15
David, 1863—1930②大卫	4
Haase, 1863—1919哈阿兹	4
Henderson, 1863—1935②汉德逊	12
Chkheidze, 1864—1926齐赫泽	3
Hughes, 1864—1952②休斯	28
Jowett, 1864—1944乔伊特	12
Snowden, 1864—1937②斯诺登	12
Scheidemann, 1865—1939谢德曼	4
N. Bang, 1866—1928尼·班格	29
MacDonald, 1866—1937②麦克唐纳	12

Sun Yat Sen, 1866—1925②孙中山	25
Vandervelde, 1866—1938②王德威尔得	14
Wells, 1866—1946②威尔斯	12
Pilsudski, 1867—1935②皮尔苏茨基	19
Jogiches, 1867—1919②约吉赫斯	4
Gorki, 1868—1936高尔基	3
Cachin, 1869—1858加香	13
Gandhi, 1869—1948甘地	27
Emma Goldman, 1869—1940埃玛·戈德曼	23
Hillquit, 1869—1933②希尔奎特	23
Krupskaja, 1869—1939克鲁普斯卡娅	6
Connolly, 1870—1916②康诺利	12
de Brouckère, 1870—1951②德·勃鲁克尔	14
Ebert, 1870—1925艾伯特	5
Krasin, 1870—1926②克拉辛	3
Largo Caballero, 1870—1946拉戈·卡巴列罗	16
Lenin, 1870—1924②列宁	2及其他
Luxemburg, 1870—1919②卢森堡	4
Ryazanov, 1870—1935? 梁赞诺夫	3
Dan, 1871—1947唐恩	3
Holman, 1871—1934②霍尔曼	28
Huysmans, 1871— 胡斯曼	2
K. Liebknecht, 1871—1919②卡·李卜克内西	4
Merrheim, 1871—1925梅兰	13
Renaudel, 1871—1934勒诺德尔	13
Soukup, 1871—1940苏库普	7
Blum, 1872—1950勃鲁姆	13
Chicherin, 1872—1936契切林	6
Savage, 1872—1940②萨维奇	28
Serrati, 1872—1926塞拉蒂	11
Bogdanov, 1873—1928②波格丹诺夫	3
Brailsford, 1873— ②布雷斯福德	12

Chernov, 1873—1952②切尔诺夫	6
Martov, 1873—1923②马尔托夫	6
Orage, 1873—1934②奥拉奇	12
Rakovsky, 1873— ②拉柯夫斯基	6
Stauning, 1873—1942斯陶宁格	15
J. H. Thomas, 1873—1949②詹·亨·托马斯	12
Griffuelbes, 1874—1923②格里甫埃勒	13
Naine, 1874—1927?奈恩	2
Kalinin, 1875—1946加里宁	6
Lunacharsky, 1875—1933②卢那察尔斯基	3
Larkin, 1876—1947②拉金	12
Litvinov, 1876—1951李维诺夫	6
J. Longuet, 1876—1938让·龙格	13
Dzherzhinsky, 1877—1926②捷尔任斯基	6
U. Sinclair, 1878— ②厄·辛克莱	23
A. Thomas, 1878—1932阿·托马	13
F. Adler, 1879— 弗·阿德勒	7
Jouhaux, 1879—1953②茹奥	13
Stalin, 1879—1953斯大林	17
Tranmael, 1879—特兰梅尔	15
Trotsky, 1879—1940②托洛茨基	3 及其他
Tawney, 1880— 托尼	12
Tomsky, 1880—1936托姆斯基	6
O. Bauer, 1881—1935②奥·鲍威尔	7
Bevin, 1881—1951贝文	12
Fimmen, 1881—1943费芒	15
Foster, 1881— 福斯特	23
Grimm, 1881— 格里姆	14
Kerensky, 1881— 克伦斯基	3
Rykov, 1881— 1938李可夫	6
V. Tanner, 1881— V.坦纳	15
Yoroshilov, 1881— 伏罗希洛夫	6

Vigforss, 1881— 威格福斯	15
Dimitrov, 1882—1949季米特洛夫	8
Attlee, 1883— 艾德礼	12
Kamenev, 1883—1936②加米涅夫	3
Vysbinsky, 1883—1955维辛斯基	17
Zinoviev, 1883—1936②季诺维也夫	9
Popovic, 1884—1919波波维奇	8
Sandler, 1884— 桑德勒	15
N. Thomas, 1884— 诺·托马斯	23
Chiffley, 1885—1951奇夫利	28
Hansson, 1885—1946②汉森	15
Radek, 1885— 拉狄克	6
Spiridonova, 1885— 斯皮里多诺娃	6
Béla Kun, 1886— 1936贝拉·库恩	7
Ben-Gurion, 1886— 本—古里安	—
Thaelmann, 1886—1944台尔曼	20
Dalton, 1887— 道尔顿	12
Károlyi, 1887—1 55卡罗伊	7
Morrison, 1888— 摩里逊	12
Sokolnikov, 1888— 索科利尼科夫	6
Bukharin, 1889—1938布哈林	9
Nehru, 1889— 尼赫鲁	27
Cripps, 1890—1952克里普斯	12
Molotov, 1890— 莫洛托夫	3
Pollitt, 1890— 波立特	21
Tito, 1890— 铁托	8
Nenni, 1891— 南尼	11
Laski, 1893— 1950拉斯基	12
Lombardo Toledano, 1893— 隆巴多·托莱达诺	24
Togliatti, 1893— 陶里亚蒂	11
Bulganin, 1895— 布尔加宁	17
Haya de la Torre, 1895— 阿亚·德拉托雷	24

Mikoyan, 1895— 米高扬  
Zhukov, 1895— 朱可夫

---

① 第 2 卷中曾论及。

② 第 8 卷中曾论及。